

农民的终结

〔法〕H. 孟德拉斯著 李培林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农民的终结

〔法〕H. 孟德拉斯著 李培林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春光
责任校对：李小冰
封面设计：式一
版式设计：王丹丹

农民的终结
NONGMIN DE ZHONGJIE
[法] H·孟德拉斯 著
李培林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总 经 销 处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375印张 2插页 250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004-0863-3/C·9 定价：4.80元

译 者 的 话

H·孟德拉斯是巴黎第十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农村社会学研究组负责人和法国应用社会学协会主席，他长期从事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工作，是欧洲著名的农村社会学专家，著有《农民社会》(1978)、《社会变迁》(1983)等十余种著作。《农民的终结》可以说是孟德拉斯的成名作，最早于1964年问世，很快被誉为研究乡村社会变迁的杰作。1984年再版时，作者为该书加了跋，认为该书出版后20年的乡村变化证实了他的基本结论和预言。

孟德拉斯的这本力作以法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为背景，分析了欧洲乡村社会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变迁过程。作者认为，在今天的法国，传统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目前在农村中从事家庭经营的是以营利和参与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的农业劳动者，这种家庭经营体从本质上说已属于一种“企业”，但较工业企业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的运行机制。研究农村的变迁过程，探索全世界一、二十亿农民跨入工业文明社会的途径，这是二十世纪社会科学的重要课题。尽管作者的部分论点今天看来很值得商榷，但作者对乡村社会变迁的深刻分析显示了他细微的观察力和独到的分析角度。

我国自改革以来，最巨大、最显著的社会变迁发生在农

村。农村的社会结构、农业的生产结构、农民的职业群体结构这三个方面十余年来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弄清这种变迁的动力、过程、机制、结果和趋势，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农村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我国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尚付阙如。笔者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社会学研究室之邀译出此书，希望能为从事农村调查和研究的工作者提供借鉴。

译 者

1990年5月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6-25 01 / 09

乡下人！一个奇特的古词。渔夫、猎人、农夫、牧人，人们现在还能真正理解这些词的含义吗？人们对这个化石般存在物的生活思考过片刻吗？他在古代史的书籍中被如此经常的谈论，人们称之为“农民”。

G·塔德：《未来史片断》，1896年。

目 录

导 论	关于农民的研究	(1)
第一部分：农民社会的变迁和变革		
第一章	变迁的力量和机制	(29)
第二章	土地、劳动和时间	(57)
第三章	家庭和经营	(91)
第四章	一项变革：杂交玉米	(116)
第二部分：农业劳动者及其企业和社会		
第五章	企业家及其决策	(157)
第六章	农业劳动者的职业和状况	(195)
第七章	国家中的农业劳动者	(232)
结 论	可能的未来	(268)
跋	二十年之后	(297)
附 录：	一、参考书目	(336)
	二、人名索引	(350)

导 论

关于农民的研究

一、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长久以来，马尔萨斯的忧虑首次重新变得如此现实。在所有的陆地，人口都比生存的必需品增长得更快。从全球来看，农业的生产过剩不再会是令人恐惧的了，食品的欠缺变得令人焦虑不安，只有工业社会的管理和生产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农学家们发出报警的呼声。“不发达国家”的巨大农业潜力起初曾使他们产生过幻想。他们曾认为，某些先进的技术就足以使那些方法落后的国家的生产增长1倍，有时甚至增长10倍。但R·杜孟作为先驱者之一，首先惊愕地发现，一种技术，尽管十分先进，当它没有被农业劳动者接受和使用时就不会有任何帮助。然而，经验证明，技术在工业国家农业耕作中的普及要比在其他地方快得多。法国或美国的农业生产增长1倍要比印度农业生产增长10%更为容易，苏联在半个世纪中取得了工业生产的巨大成就，但难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农业国家更缺少解决自己吃饭问题的能力，他们反而要向工业国家乞食。

对于这些令人焦虑的问题，社会科学能够给予什么样的回答呢？有客观历史的研究，有经济学家们近来对增长问题

发生的兴趣，有一些人类学家的专题论文，还有社会心理学界关于人们对变化的态度的某些研究，但没有任何综合性的研究，没有任何可以指导执政者的政策和负责人的行动的整体理论。这就很容易理解，当农学家断言“黑非洲起步不好”^①时，社会学家却只是提出质疑：“黑非洲能否起步？”^②这种令人痛心的对话，当会引起正直人的愤慨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的羞愧。要想知道怎样使全世界的农民进入工业文明，以便使他们能够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和走向繁荣，难道思索的最好例子不是西方国家已经完成飞跃的农民吗？

19世纪的社会科学表明，它们对乡村事物的不了解令人惊讶。它们所有的分析和解释的努力都是针对工业经济和都市社会的。由于受工人阶级的诞生、资本主义企业惊人的效率以及货币构成的唯一手段所迷惑，它们对没有工资、没有企业主、没有货币条件下运转的社会体系失去了兴趣，然而一个世纪以前，西方大多数国家属于这种社会体系，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属于这种社会体系。

只有一些研究农民的专门作者继承着古代和中世纪农学家的伟大传统。但M·多巴瑟、F·诺沙都、A·葛斯林林和L·拉沃涅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往往只是在重复瓦隆、科伦麦尔、塞尔或罗兹埃教士所说过的东西。他们是优秀的观察

① 杜孟，1962年。（本书的所有注解都是根据原法文版译出的，这里注明的是参考著作的作者和出版年代，可在书后的“参考书目”中根据人名和年代查到书名。下同——译者）

② 梅斯特，1966年。

家，对于农业的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过，当古典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设计“工业经济”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对乡村经济作出什么革新。勒普莱^①和他的学派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中试图像考察工人家庭那样细致地考察农民家庭，以期把握农民家庭的精髓。毫无疑问，如果他们坚持客观性的志向，不被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引入歧途，他们的研究会有新的前景^②。

热衷于调和民法和习惯做法的法学家们，在法理上付出巨大的努力来分析家庭经营，因为家庭经营必须使家庭的需要和经济的强制要求以及农学家的愿望协调一致^③。不管在土地所有和土地经营的各种不同形式方面，还是在劳动成果的分配方面，乡村契约合同都是如此的丰富多样和精巧细致，表明法学家们对农村的技术与经济实践以及习俗和社会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法学理论作为一门由公证人和法官运用的、但却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很少了解的规范学，是观察和认识的成果，它比很多描述性的研究更适合于丰富的社会学构思。

此外，从玛丽-黛莱丝时期的奥地利到斯托雷宾时期的俄国，东欧土地改革的伟大运动都有它们的理论家和空论家。今天，人们读他们的著作仍有收获，特别是如果人们对不发达国家感兴趣的话。然而，人们却很少能从中获得适合于现代社会学的材料。

与此相反，俄国民粹派曾试图建立一种适合于现实的真正的乡村经济理论，半个世纪之后，这种设想仍具有令人惊

① 勒普莱，1879年。

② 勒费布沃，1919年。

③ M·儒齐拉尔，1958年。

奇的现代性。令人痛心的是，如此有希望的智慧之举都被一些政治领导人粗暴地破坏了，这项知识事业本可能恰好避免这些政治领导人的很多失误。特别是柴雅诺夫^①，他曾从帝俄时代地方自治会的核算出发，试图建立一种不考虑货币的农民企业制度。他从农民的观点和农场主的观点这两个方面对帝俄的国有体制进行了双重分析，提出了一些调和农业生产要求和现代经济需要的可能方式^②。人们可以想象根据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苏联农业将会是何种情景。

这些为观察和理解农民所作的孤立的努力都注定要遭到失败。但它们的贡献在于使得自己的时代相信，农业的活动所遵循的是芝诺芬和赫西俄德的箴言：关于主体我们已言尽其词，敏锐的精神应当转向其它领域。

与此同时，自由经济的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获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功。然而，这两者都一致否认农民经济社会体系的独特性，试图按照从都市和工业现实出发建立的范畴和观念对它们进行分析。这种在知识体系上对农民的虚无化很值得细致分析，以便向人们揭示它是如何产生的和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

在上个世纪，较之工业的高速发展，农业的缓慢发展可以给人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印象。与工业的狂热相对照，农民的明智适度似乎是永恒的：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梦幻。为了使人们既能保持古老的乡村价值，又能体验进步所带来的激动人心的冒险生活，空想社会主义者设想出各

① 柯布菜，1965年。

② 柴雅诺夫，1924年。

种和谐社会和法伦斯泰尔（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幻想要建立的社会基层组织——译者注），那儿的时间和劳动在田野和工厂之间分配，人类将会在和谐地发挥自己的各种才能中获得解放和全面发展。所有的人都认为，遵守社会秩序、道德和信仰的农民应当养活城市，并像供给步兵营那样供给工业营的富佬。

运动、革命和进步都在别处发生：在城市里，它们吸引着所有期望变化的人们。在19世纪，人们从这种对比中，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农业从来未发生过任何变化，农业劳动者始终遵守着田野的永恒秩序。

一个世纪以前，当制作业还处于手工阶段时，农业就发生了革命，农民动荡不安，并准备烧毁城堡，对农业和农民的这种写照大概会令人非常惊奇。农业的改进曾是那个时代的重大事务^①。在法国，国王做出表率，贵族大人物则追随其后，在自己的领地建立“农业社会”^②，探索说服农民的最佳方法。1788年，R·德·拉贝吉利发表了《对阻碍农业进步的主要流弊的研究》，其论题具有一种令人惊讶的现实意义。A·荣格面对某些地区的原始农业发出的愤慨“诅咒”和他访问一些美好领地的“欢悦”也表明了当时的进步所具有的规模。^③

大大小小的土地所有者都像英国人那样，想圈地养羊。但是，由于没有公共牧场而无法饲养牲畜的散工以及小农反对这种个人主义的财产专有形式，他们“为土地私有化而进

① 奥吉-拉里贝，1935年。

② 朱斯坦，1935年。

③ 荣格，1789年。

行的斗争”使整个王国动荡不安，打破了乡村社会的平衡^①。

大多数法国农业史学家都庆幸“法国的明智”，由于这种明智，我们的国家避免了18世纪的农业革命所带来的极端社会后果，从而能够保留下众多的农民，而英国人，由于他们向工业经济的逻辑让步，为工业的发展“牺牲”了农业。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国是在行进路上停顿下来，它停歇了1个半世纪，在缓慢接受技术新潮的同时，它的农民仍然是“农民”。

今天，第二次农业革命震撼了一切结构，明智的平衡被打破了。轮到农业自身“工业化”了，延迟了150年之后，法国农民被人们所说的工业文明所扼杀。我们突然感到十分接近18世纪，我们重新发现，自然会被技术所驯服，土地的历史是由不断的进步、革新和改进所组成的，农业劳动者都是不安分的。然而，从本质上说，我们仍然停留在19世纪遗留给我们的观念之中，而这些观念显然都已过时了。

对于驱使全世界农业社会投入更新技术和重建社会平衡的伟大运动，如果我们不想依然是那样麻木不仁和视而不见，最重要的就是要修正我们的观念，以新的眼光看待农村。农民在工业化最快的国家中的消失，与其说是由于经济力量的作用，勿宁说是由于把并非为农业而制定的分析方法、立法措施和行政决策运用于农业。

在一些国家，如英国和美国^②，农业完全服从于工业社会的逻辑，但农业仍是无法消除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过分地牵扯着华盛顿和伦敦领导人的精力。

在法国，一个恰当的著名例子就是完全按照工人联合会

^① 布洛克，1930年。

^② 贝内迪柯特，1955年。

的意图制定的1884年工会法案，这个法案之所以被扩展到农业：是因为一个参议员在会议结束时想起建议在法案的陈述中加上“以及农业”一句。由于这最后时刻添加的一句话，整个农业联合会运动才能够取得重大进展，并担负起立法者未曾预料到的重要经济职能。今天，人们仍可看到社会保障制度向农业领域的扩展所遭遇的各种困难。具有某种意义并对所有受薪者都似乎公平合理的立法，对农业经营者却像是一种施舍，不能解决他们的真实问题。最后，如果说法国自一个世纪以来没有真正的“农业政策”，这主要是因为它没有构思这种政策的知识工具。

马克思主义的职业政治家与他们的“资本主义”同事感到同样的无能为力^①：尽管他们建立了集体农庄、公社、合作社和农业城，他们总是与他们的农民存在争执，农业是他们的经济的薄弱点。令人奇怪的是，生产土豆和肉食品似乎比制造火箭和卫星更为困难。马克思曾显露出对农民缺乏了解，但从这一点来寻找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否会走向极端呢？

不论是波兰和南斯拉夫，还是印度和古巴，都还没有为人们所说的不发达国家找到出路^②。中国的经验是迷人的，但它的成功并没有把握。以色列的杰出成就由于其独特性而无法模仿。难道仅仅是由于工业社会的逻辑与传统农民社会的逻辑不相容？期望把前者应用于后者显然只能导致对后者的破坏。

今天，工业社会的观念已被普遍接受了^③。那么“农民

① 依齐比，1963年。

② 奥吉-拉里贝，1950年。

③ 河隆，1962年。

社会”还意味着什么呢？农民社会^①是在一个更大范围的总体社会中相对自治的整体。如果一个土地社会完全是自治的，在功能上并不是一个更大范围社会的组成部分，那我们是在谈论“蒙昧”社会，我们是在18世纪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它似乎比目前的那些术语更为适当（原始的、古代的、没有文字的、没有历史的，等等）。而如果乡村集体相对于包罗一切的社会来说不享有相对的自治，那我们是在谈论农业生产者、地方群体，也可能是乡村“阶级”，但不是农民整体。一言以蔽之，农民是相对于城市来限定自身的。如果没有城市，就无所谓农民，如果整个社会全部城市化了，也就没有农民了。

农民社会可细分成地方社区^②，这种社区在人口、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相对来说自成一体。根据马克思的著名描述^③，上个世纪的法国农民像“一个口袋里的马铃薯”。每个社区都是一个社会整体，所有社区都属于同一类别，但每个社区又都有自己的独特性^④。

每个社区都是一个互识的群体^⑤，其中每个人都认识所有的人和他人所有特点，社会关系是人格化的、非功能性的和分割成部分的。社区将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农业耕作者、牲畜饲养者、土地所有者、经营者或受薪者以及他们的家庭）和非农民（显要人士、手工业者和商人，等等）结合在一起，但社会主调是由农民决定的。权力一般属于那些处于地方社区和

① R·莱德弗尔德，1956年；托尔耐，1964年。

② R·莱德弗尔德，1955年。

③ 马克思，1852年。

④ 阿兰斯保，1961年。

⑤ 马热，1955年。

总体社会之间的边缘地位的显要人士。最重要的分层常常是在依照社会经济的威望来确定的等级方面。除此之外，分层也可以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生态方面或广义上的家庭方面的，亲族和主顾经常是混同的。最后，年龄和性别的范畴一般都是非常个性化了的。

在这些结构非常牢固的社区中，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整体的稳定，变化只能曲折迂回地通过否定自身缓慢导入。这些社区并没有僵化凝固，但除非有严重的危机，否则他们只能按照世代交替的节奏缓慢进化。所有的革新，不论是技术的、经济的、还是人口的，都来自外部。A·多扎几乎毫不怀疑在这方面存有的偏见，他断言“乡村什么也不创造，它的一切都来自城市，服装、习俗、歌曲”……人们还可加上机器和技术^①。

在这样一个社会体系中，个人不需要去适应新的境况或作出什么决定，也不需要向其他了解自己全部特性的人去表白和公开什么。于是，他会一成不变，保持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价值和规范的准则都不鼓励个人感情和观点的显示与表露，

自中世纪中叶直到19世纪末，这种典型的传统农民社会在西欧以不同形式呈现。今天，它仍然还是一种解释模式，有助于理解乡村社区在彻底的改造中的运行逻辑。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只剩下些遗迹，由于风蚀磨损过重，以致在一些根本相异的结构中无法再理解这些遗迹的意义。

在世界的其他地区，这个模式可以作为比较的基础，它的某些成分可以作为有用的解释工具，但是，如果把它视为

① 奥占-拉里贝，1955年，导论和第147页；多扎，1941年，第130页。

一种普遍的模式，认为它可以用来分析更广泛的社会中的所有农业社区，那将是很危险的。为了建立类似的模式，必须对不同的社会进行多方面的研究，然后人们才能够弄清楚是否存在着一般农民共有的唯一理想典型，以及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属类中，变化多样的欧洲农民是否仅仅是诸多种类中的一种。

二

蒸汽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它的逻辑强加给工业的，并继而将这一逻辑强加于整个社会^①。蒸汽机是固定的能源，所以所有的机器都必须集结在同一个厂房里，共同使用，从而使劳动服从于固定的时刻表和等级权威。但土地是不可移动的承载物，相对劳动资料(谷物、耕地……)来说机器是活动的，因此这里不像在工厂里，那儿情况完全相反。生物的自然机制有自己的节奏，尽管有时可以加速，但不会有根本的变动。空间和时间是田野劳动的两个重要约束条件，蒸汽机在这儿不会一路凯旋。几经试验之后，蒸汽拖拉机被抛弃了^②，由于这一失败，与一切等级权威不相干的农业经营者仍然是自己的企业、劳动和时间的主人。农业生产的社会组织与工业生产的社会组织在各个方面都形成鲜明的对比。

今天，农业较迟地经历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它已经逃避过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在等待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会改变很多自然机制的原子革命。借助于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内燃机使机器作用于固定的劳动资料上，从而战胜了空间的约

① 贝尔，1954年。

② 福舍，1954年，第82~88页。

束。化学和植物学的进步使生物节奏可以得以加速，并调节和提高果实产量，时间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克服了。

18世纪的农业革命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将进步普及到法国乡村。这一革命是按照工业还未能改变的传统社会节奏进行的。它带来了一些社会变革，政治革命又对这些变革进行了确认，有时还加速了这些变革，但乡村社会的本质特征仍未能改变。乡村人口经过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外流之后，目前的革命使农业劳动者的数量以每年16万人的可怕速率减少，其中有的是由于农业劳动者死后无继，有的是由于年轻的农业劳动者改行。尽管如此，留下来的农业经营者群体还会扩大，他们能够适应经济和技术的新的要求，但乡村社会却被彻底动摇了。

平衡被打破了，缓慢的农业被动摇了，它开始以工业的步伐前进，并利用工业的能源和最新发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农业产量增长1倍还多；过去满足于1公顷土地生产15公担小麦，1头奶牛在哺乳期产2000升奶的农民，现在可获得40公担小麦和5000升奶。农业机械也在大量增加，从1946年到1965年，法国的拖拉机停机场从2万处左右发展到100多万处。新技术直接来自实验室的研究，而不是来自进步农业劳动者的摸索。一切农业生产都受消费者的欲望和市场的变化所支配。像其它生产领域一样，农业也必须服从工业社会中技术和经济变化的节奏。

西方从一个缓慢变化的社会过渡到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D·哈列维称此为“历史的加速”，但这个美妙的表达与其说它揭示了现象，不如说它掩盖了现象。因为，为把工业化导入社会体系的自身运转，社会的整体配置被根本改变了。一种静态的、或几乎静态的平衡被一种动态的平衡所取代，从而造

成持续的不平衡。在法国，直到近些年，这种前进节奏的改变几乎没有影响到农业社会。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人们今天所谈论的是农业的“工业化”，而不是它的现代化。顾名思义，“工业化”这个词意味着农业在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中将追随工业的足迹：道路已经开辟，只需要起步了。但20世纪的农场为什么应当去步19世纪初手工业和制作业的后尘呢？

未参加第一次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农业是带着前机械化的和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进入工业社会的。因此，可以设想，农业或许会创造对生产进行经济和社会管理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会随后扩展到其它领域。这样，摆脱了一切“工业”遗产的落后农业，有时可能会走在工业的前面，并预兆未来。

农业给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分析天地，它使我们可以当前的社会结构中辨别什么是过时的生产方式的社会遗迹，设想更适合于未来生产方式的结构，更好地回答人类的期冀。这也正是P·纳维尔^①在结束了他对自动化所进行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调查研究之后指出的：“土地的耕作是为收获作准备，是设计和创造丰收自动地到来的条件。”这里的“自动”一词是指其在希腊语词源学上的真实含义，即自发的意思。人的手可以通报、启动、采集、控制和示意。它曾是农业的特征，它也会重新成为新的工业的特征。当然，工业体系有很多不同于农业体系的特点，但自动化旨在给予工业体系一种自主性，使它接近自然系统。

近15年来，法国成为一个独特的观察场地，几乎所有可

^① 纳维尔，1961年，第8页。

能的解决方法都在这儿尝试和实验过了。由于既保持了传统结构，又快速地引入进步，人们看到并存着一些不同的现象，有残存着的最古老的果实采集和粮食种植的方式，也有凯旋高歌的“工业式”生产方法，还有仍在试行中的完全新式的经营和管理形式。农业劳动者的社会创造能力以及变革的迅速进展，使观察者们总是落后于现实。

“新式的”大经营历来都是进行“理性化”管理的。从中世纪起，大庄园主们就要求他们的总管进行帐目簿记，要求他们的技术人员进行实验和引入一些“新东西”，在书中记载下好的农业习惯作法^①。但从苏吉到塞尔和目前的试点农场，这些典范几乎都没有成为附近农民追随的榜样，农民继续走他们熟悉的老路。今天，“工业化”的大经营分散在所有的地区，不过大部分在巴黎盆地。这些个案只是作为反衬来考虑的，是为了突出多种生产的家庭经营的主要特点，一切分析都是围绕这些特点进行的。事实上，这是在经营管理上从农民逻辑向经济理性的过渡，这种过渡集中地表现和标示了文明的冲突以及农民向农业生产者的转化。大经营应当引起经济学家们的重视，因为此类经营有时可提供一种生产的大部分产品（如粮食）。社会学家更感兴趣的是经营者，而不是他们的生产。法国的中等经营者掌握15公顷左右的土地，他们在管理中力图把自己经过验证的习惯准则与经济、技术的新要求协调起来；我们在这儿所关注的只是经营者本身。此外，在今天的农村，农民出名的守旧似乎已成了一种令人气恼的过时习惯；调查人员碰到的不再是“默守常规”的农民，碰到的只是拒绝追随进步的年迈的农业劳动者，而年轻人走在进

^① 戈朗和德拉图什，1950年；德拉图什，1956年。

步的前面或者气喘吁吁地赶上进步的步伐。需要举例说明吗？人们一再地指责农民害怕信贷，但农业债务是农业负责人主要担忧的问题之一。经济学家们为各种机械设备的过剩感到遗憾。计划人员也曾想取消玉米的进口；在几年的时间里，玉米已经生产过剩了，而所有这些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在各方面限制着农业生产者流动的农业结构。

著名的经济理论认为，农村人口外流是农业进步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足条件，因为经验证明，农村人口外流也带来外流地区的衰落，素质最好的人员出走了，社会僵化了，农业固守成规，农民带着怀旧的忧伤情绪回顾失去的往昔。J·松巴德洛威^①曾指出，上个世纪，在人口减少的阿坤延地区，农业开始萧条，而人口持续增长的布列塔尼地区却开垦荒地，使技术现代化，并投入全新的生产。政治家和意识形态专家无论是左派的或是右派的，都一致赞赏农民的美德和乡村生活的美妙^②，他们曾经反对过于简单化的经济理论，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

近15年来，情况开始发生逆转，从而最终表明其理论是正确的。需要的是新一代的青年农业生产者对经济的前途和乡村职业的高尚重新确立信心。他们可以按照我们工业社会的经济规则行事，利用邻居外流的时机扩展自身，把自己装备和组织起来。实际上，他们已决定充分运用工业社会的经济规则，并寻求改变这些规则，使这些规则对他们有利。

在传统世界中得到塑造的农民可以悠然自得地在现代世界中活动，这一直让观察家们感到惊奇。一旦那些“经济动机”并入严密的和有意义的经济规则，就会以令人惊异的速

^① 松巴德洛威，1946年，1930年。

^② 例如拉巴，1919年；约勒，1909年。

度立刻被青年农业劳动者所接受，而且，当这些缺乏文化的庄稼汉走出农场时，会以惊人的可靠直觉去创立一些全新的和非常适合现代要求的机构（农业技术研究中心、农业集体利益协会、家庭乡村培训所，等等）。在他们的不断推动下，农业核算的现代方法导入了法国，如果说乡村经济摆脱长期的迟钝，这是他们的要求所获得的结果。

还有比农民的个人主义和土地恋更为确定的真理和更为明显的事实吗？农民罄其所有来扩大自己的牧场，在高度的独立中固守其遗产，就像一个在自己的王国中的小国王。然而，自半个世纪以来，正是在农业中合作事业取得最辉煌的成功。购销合作社、互助保险公司、农业信贷银行、农业资料共用合作社、农业技术研究中心；没有任何其它生产领域能够出现如此丰富多样的合作组织。今天，一些农业劳动者试图迈出最新的一步，把他们的土地联合起来，重新组成一些更大的单位，每类生产组成一个由一名合作人员负责的工场。这种“小组农业”的尝试在没有立法和确定的习惯法的情况下肯定是会遇到困难的，因为先行者们在经济学家、立法者和政府将他们的经验提炼为法规之前，一切都要自己创造。

农业劳动者们热情地献身于这一从根本上变革社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事业，他们感到夺回了失去的时间，开始进入工业文明的时代。他们模糊地期待着，一旦适应期的危机过去之后，能够重新找到类似他们父辈所熟悉的那种平衡。在吸收了一些新技术和接受了一些经济制约之后，他们打算重新创立一种能够和以前一样持久的耕作与经营体制。但技术文明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变化，反对一成不变，默守成规和一潭死水。农民不仅远未重新找到传统的稳定，而且将经受技术

革新和经济趋势带来的长期变动。此外，农民怀着或多或少的自觉意识建立了一些帮助他们应付变化的机构。管理和农村经济中心正在研究市场的行情，因而可以作为经营者的管理导向；农艺研究和农技推广站形成一个完整的服务链条，不断地把实验室里的科学发现转化成具体的技术，以便使农业劳动者能把这些发现运用于自己的农田。

自芝诺芬和维吉尔以来，农民的价值作为我们西方文明的核心所在，曾受到无数的赞扬，但是那种古老的稳定被动摇之后，这些价值也无法幸免于难。永恒的“农民精神”在我们眼前死去了，同时灭亡的还有建立在谷物混作基础上的家族制和家长制。这是工业社会征服传统文明的最后一块地盘的最后战斗。因此，我们所从事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一次新的农业革命的研究，也是对传统农业文明消亡过程的研究，后者是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要研究农业文明是如何被新的技术文明所取代的，因为新的技术文明在乡村中的表现形式有时不同于它目前在城市中的情况。

三

我们看到，法国的农村目前给社会学家提供了一种实验室，那里收集了很多可供进行各种不同分析的“自发性经验”。地方境况的多样性和整体条件的统一性使我们可以进行系统的比较，就像在真正的试验中那样，每个变量都可被分离出来。快速的演变使得那些在一般演变中由于缓慢和错综复杂的情况而常常被掩盖了的运行机制与变化机制显露得一览无余。因此，从法国的经验出发，试图对本书开首处指出

的那些重大问题提供回答的基础材料，这并非是没有道理的。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所论述的仅仅是法国，但读者可自由地探索可能的推论和借鉴。

令人遗憾的是在法国乃至欧洲的各种地区，没有建立起众多的观察站来记录这个深刻变化的所有波折和所有征象。在几年的时间里，这些观察站本可以为社会变化的研究收集到一些独特的材料，那样我们对于农村社区动力机制的认识就会取得决定性的进步，就会从中抽取一些对世界上所有经受同样震撼的国家都是十分宝贵的教训。由于缺乏课题的多种层面所要求的系统研究和宏大规模，我们随后的分析所依据的诸多资料在价值上和意义上是不同的。

这项研究是12年前开始的，此后不断取得进展，但根据场合和情况而有所不同，调查和阅读，出外考察，与农民、行政官员、农学家以及经济学家交谈，等等。每一步研究都有新的扩展，发现一些问题和假设，也越来越不允许我们为这项事业固定时间期限。很快，这项事业吸引了其他的研究者，变成集体的活动。今天，这项研究也超出了它的倡导者的设想，成为一个小组的事业，明天它无疑会成为一个研究机构的事业。

现在，法国国立科研中心农村社会学研究组已进行了一些调查，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取得了一些成果，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作了一些粗略的描述^①，但这些工作还很不够，不能满足刚才提出的宏大抱负的要求。这些论述更多的是说明而不是证明，问题经常是被提出而没被分析和解决，对此作者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为清楚，恳请读

① H·孟德拉斯，1962年。

者对此见谅，同时也真诚地希望，再过12年以后，我们的认识会有巨大的进步，以致使作者不敢再像今天这样来写这本书了。

研究者的总体科学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技术选择、他以操作性术语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他对材料的处理。因此，作者应当尽力说明自己预先选择的方法论和分析技术，说明自己的理论公设和思想道德倾向，这既是为了他的读者也是为了他自己。然后可以由读者来判断，结果、结论和解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些先定成见的扭曲。

向农民提问被视为一项艰难的任务。众所周知，农民从不说“是”或“不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总是抱怨，谨慎地向一切陌生人掩饰他们的生活和感情。例如，当问到他们的收成时，他们总是这样回答：“对于一个丰年来说，今年并非丰年，但对于一个歉年来说，也不能说今年是歉年。”有时人们甚至指责他们故意撒谎和玩弄恶作剧，使对他们感兴趣的朴实人误入迷津。简而言之，由于失望或被愚弄，提问人员往往因此白费了力气。

乡村调查员对这种成见感到奇怪。但人们抱怨乡村调查员去会见的是一些非常神秘的人物。其实，一般来说，他们所访问的农民是乐于聊天的，他们有时会感到更困难的是停止谈话而不是继续谈话。总之，如果人们谨慎地作些基本准备，在农村中进行调查通常比在城市中更为容易。对于这种矛盾的情况，人类学家提出一种嘲弄性的解释：调查员可以使农民开口，这是确实的，但农民所说的事情并不具有人们所认为的那种意思，在他们看来，这样收集来的材料是没有用的或几乎没有用的。他们认为，为了了解农民，必须观察农民的行为方式，在没有亲身感受、没有十分熟悉农民的生

活和他们的每个人之前，先不要提出问题。只有为数不多的高资格的研究人员进行的“人类学的”调查才可能收集到有关传统农民社会的有效材料，这个传统农民社会更接近“原始”社会，而不是工业社会。

这样，人们看到，争论已不再是在纯粹的调查技术方面，而是滑向超出我们论题的有关认识的社会学问题和科学认识论的问题。虽说我们并不想在这儿作出回答，但我们应当提出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以自己的观念和技术武装起来的社会学家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吗？他能够在其它的社会中特别是在农民社会中富有成果地运用自己的技能吗？从理论上回答这一问题并非易事。在实践中，乡村调查员应恰如其分地运用调查技术，小心谨慎，确保良好的开端。

社会学家在其调查中始终求助于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愿意承认自己欠下了大量的人情债。每个学科为了完成自身的综合都到邻近的领域去寻找有用的材料，这样就把邻近的领域归入附属学科的行列，而得到的是这些领域同样的回报。在法国，自本世纪初以来，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并从这些研究资料中得出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综合结论。对每个地区，都有一些细致详尽的材料描述其景致和土地制度，有时是从遥远的过去追寻那一地区目前面貌的由来。M·希洛克、A·德雷阿热、R·迪翁已经粗线条地描绘了分布在法国的各种农业文明。近来，农村社会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一定的地区，我们有时对12世纪和16世纪的社会比对今天的社会认识得更为深刻。

农民越来越引起人类学家的注意，后者不再仅仅对野蛮人的奇特习俗感兴趣。

特别是美国人，例如R·莱德弗尔德和C·阿兰斯保，他

们前不久刚刚发现人类的大多数是农民。这一发现的幼稚性引起欧洲乡村研究者的嘲讽，他们常想建议大西洋彼岸的同事读一下O·塞尔的书，并关注一下14世纪的农业。但美国年轻的研究人员对五大洲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比较和思索，法国人在最近才着手此类工作，特别是开始研究非洲“农民”。在法国，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线索。

乡村生活是浑然一体的，这使所有把经济学和社会学区别开来的努力在这儿比在其他领域更为徒劳无益。农村经济学家和唯经济论的农艺学家掌握着他们在近些年里大大改进了的分析工具，他们的研究不断地接触到社会学家的研究。而社会学家又经常发现自己几乎有点“太经济学家”了。但他怎能不这样呢？如果他这样做时显得笨拙，那他有理由请求人们宽恕。

试图去整理一些很不协调的资料，并用个别试点调查的暂时结果来加以补充，这无疑是有风险的。而且，正处于变革之中的法国农村不断地超越分析和观察者。最后，社会科学在以惊人的速度前进：综合概括的时刻还未到来，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广泛而又变动着的主题，我们所具有的又是一些非常不确定的方法。

不过，在缓口气以便开始新的征途之前，我们应利用这个机会对研究进行一下小结，并得出一些暂时的结论。确定一些概念，作出某些区别，描述一些机制，提出一些问题和一些论点，有时是提出一些假设，让同事们来评论一切，把一切向其他富有热情、好奇的研究者进行介绍：这就是此书最直接的学术抱负，我们暂时放弃去建立一种关于农民的理论打算，满足于在阻隔我们的小河中“添加几块涉水的石头”。

这种方法说明了，但愿也证明了，为什么随后的章节更为注重论述模式的严密结构和运行机制的逻辑，而不是注重对细节的分析和对技术的严格运用。现在，最为重要的是更好地提出问题，可能的话，探索一下研究的方法。研究者懂得推出一项非常不成熟的和容易过时的成果所冒的风险；他不能企求那种把永恒的格言刻在大理石上的道德家的荣耀。但整个这本著作都是对法国农民的命运和社会科学的普遍性的一种探讨。

读者在各种路径的引导下不断地去察看一些前景和远景，但这些前景和远景有时过于广阔无边，有时又令人遗憾的残缺不全和轮廓不清，为此读者大概会感到奇怪，甚至感到气恼。但农村社会学家的全部使命和独特性在于对社会现象展开观点的较量^①。这种抱负驱使农村社会学家去相继地求助于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博学多识、经济学家的数字计算、社会心理学家的调查技术以及政治学家的分析，以便借鉴他们的结论，并把这些结论汇集起来，根据自己的假设来进行整理，以期从整体上来把握现象。

第一部分致力于揭示传统农民社会的逻辑性和结构的严密性，同时说明角色的混淆以及地位和组织的吻合怎样导致了关系和行为的个性化。农业生活和社会生活是在一些能感受到但无法簿记的世俗框框中组织起来的，它们在最小的细节上都受一种道德律令的支配，后者可以毫不迟疑地对人们和他们的一举一动作出评判。这种角色、组织和社会环境的

^① 孟德拉斯，1962年和1967年。

配置状况是与革新格格不入的，只有掩饰在缓慢社会变迁的形式下的革新才能被接受。下比利牛斯地区引进杂交玉米是说明革新和变迁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典型例子，它表明，由于现在的农业劳动者是在传统社会的模子中被塑造出来的，因而一项革新就使他们茫然不知所措，尽管这一革新的引进并无社会后果，但农业劳动者却从中察觉到会最终造成他们整个生活体系包括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全面动荡。

第二部分分析这些传统浓厚的农业劳动者对现代社会的经济机制、社会机制和政治机制的反应及其态度。旧的道德规范和世俗框框显得不适合于农业企业的管理，家庭企业主面临着很多新的选择，但经济理性仅仅为这些选择提供了一些不系统的指导准则。这些企业主自身境况的变化和前景的不确定更使他们的选择带有偶然性。当然，农业组织的发展以及经济与政治之间建立的新关系可以使决策转到新的层次，但这也会在个人的自由和责任方面带来一些严重的后果。

如果说我们的分析超越了它特有的对象，冒险地去推测未来，这是因为农业劳动者在经受动荡之后心中忧虑重重，我们不能一点不作回答。此外，在宣布了农民的死亡之后，人们不禁要满怀焦虑地自问，没有农民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在目前一切都被打乱又什么都还没有确立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在明天的工业社会中农业结构究竟是何种情形。

19世纪伟大幻想家们的乌托邦只是以实验的名义在美国大西部的一些伯爵领地上实行过。但这并未影响这些乌托邦为整整一个世纪的思索提供了养料，鼓舞着为那个时代带来荣誉的一大批理想主义者。以他们为典范来绘制21世纪农业

“和谐社会”的蓝图，这是一个狂妄的抱负：但在解剖和分析了社会躯体之后，社会学家不关心它的前途，不关心社会和人类的幸福，他又算是什么社会学家呢？

第一部分

农民社会的变迁和变革

旧时的农民已“颐享天年、寿终正寝”，因为他们是处在生命的生物周期之中，到他们的垂暮之年，生活已把自身的一切意义都给予了他们，不再存在任何他们还想解开的谜。所以，他们可以对生活感到“满足”了。文明人则相反，他们处在一种思想、知识和问题都越来越丰富多样的文化潮流中，他们可以感到对生活的“厌倦”，而不是“满足”。事实上，对精神生活所重新创造的一切，他们永远只能掌握极小的一部分；他们只能掌握暂时的东西，从来抓不住确定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看来，死亡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M·韦伯：《学者的职业和使命》（1919年）

第一章

变迁的力量和机制

传统农民社会在表面上是稳定的，但这并不等于没有任何改革。工具的改进，新植物品种的引进，耕作方法的改善，这些组成了农业通史的重要篇章。表面上最凝固的社会也是长期进化的产物，而进化是由探索、失败和进步所组成的。产生技术变化和社会变迁所依赖的那些社会机制很少被描述和分析过。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考察迹象和物品的播散；社会心理学家不断地研究人们对变化的态度以及思想和革新的传递；历史学家记载下一种技术的消失和一种机构或一种习俗的形成；历史哲学家探寻文明兴衰的原因；经济学家刚刚开始发现增长的定律；但总体社会或地方社区的动力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还未经过探索。

欧洲自中世纪早期以来的经济变迁和乡村社会的变迁为这种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欧洲怎样同时产生了12世纪的精巧农业和中世纪晚期的都市化运动？新作物品种和现代农业是怎样在16世纪的农村传播的？18世纪的农业革命被深入地研究过，但我们对19世纪欧洲农村缓慢的但却是根本的变迁知道些什么呢？技术进步，土地开垦，农业体制，生产结构，人口趋向，机构和习俗，社会群体和他们的等级制度，经济、法律和政治权力，要想把所有这些

因素联系起来，现有资料是否充分呢？是否可能同时分析这些因素在乡村社会中和在总体社会中的作用呢？这项G·杜比^①曾尝试过的巨大研究把我们从10世纪的地产经济引向14世纪的精巧农业。

在加洛林王朝时期，欧洲完全是乡村化的。没有任何城市，只有住满农民的乡村，农民在领主的领地周围组成村庄；这些领主自己组成了包容一切的整个社会。但他们自己只不过只是些尚武的农民。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个人的直接联系是地产制度的基础：领主把他的臣民“安顿”在他的土地上，给予他们份地，作为回报，臣民要偿付个人劳役，并交纳耕种保留地的贡赋。工具几乎都是农业劳动者自己用木材制作的，无论是铧还是步犁，这些工具使农业劳动者只能进行原始的耕作，收获甚微：谷物的收获是种子的2至3倍，不会再多。

人们吃面包，配合吃一些根菜、蔬菜或奶制品等“副食”。领主的副食较之农民更为丰富和多样，但所有的人都按同一种方式生活。为了制造农具，领主在自己的“宫廷”里养有一二个铁匠。若想碾磨谷物，只有人力磨，没有水磨。唯一的真正财富是开发土地的人：领主的臣民越多，他的领地则扩展得越大。然而，由于领地不可能无限地扩大，所以富有的领主拥有多块领地，像游民一样四处巡视，去就地消费生产果实和监督每块领地的管理。查理曼大帝就是这样从一个庄园到另一庄园地游走。为了使他的指令“法典化”，他让人草拟了《庄园敕令》，这是真正的农学论著，他也成了“乡村家庭培训所”的鼻祖。如果说这个社会是“简单的”，那么

^① 杜比，1962年。

我们所能建立的关于这个“简单”社会的简单图示就是：个人联系，粮食种植，狭小的和自治的集体。

家政有方的领主努力增加自己臣民的人数，这些臣民由于在村庄里挤得太满，便离开村庄去开垦已清理过的采伐迹地。在11世纪和12世纪，耕地和农民人口同时增加。与此同时，工具、种子和技术都有所改进，使得可以获得较好的收益。工具增多了，也变得更加有效了：铧、锹和步犁此时都是铁制品了，还出现了钉齿耙。马的轭圈和水磨也普及了。为了清除杂草和保持土壤的湿度，耕翻土地的次数增多了，特别是6月份的耕作，“庄园敕令”上曾热情地叮嘱过。

18世纪，英国农艺学家提出的收获和种子的比例是：大麦8比1，黑麦7比1，豆类6比1，小麦5比1。在同一块土地上，还可以随年代有一季收获和两季收获的变化。在某些土地，小麦的产量始终只能是种子的8倍，但在另一些受精心管理的土地，产量可达到种子的12倍。可以使用的厩肥很少，被十分珍惜地留给菜园。直到18世纪，西方农业的产量一直在这个水平上浮动，此后肥料使产量有了新的增长。从10世纪到12世纪的两个世纪中，农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随着收获的逐步丰富，乡村社会发生了变化，变得多样化和功用化了。去开发荒地的垦民不再隶属领主，领主常常使垦民获得人身自由，但要他们交付佃租。农具和牲畜的价值提高了，人口的增长使人力的价值减少、土地的价值增加，土地种植越好，收获则越多。随着人口的增长，家庭份地的面积缩小了。平均来说，人口大概增长到以前的4倍，份地大概缩小到以前的1/4。领主保留着优质的领地并征收税赋。这样，个人关系逐步被经济关系和税务关系所取代。

由于农具的改进，特别是由于出现了需要配有大型挽具

的牛犁，农民之间开始了社会分化：拥有挽具和牛犁的是耕夫，仅凭双手和锄的是散工。手工艺者增多了，他们从城堡到村庄，到处为农民制作必要的农具。那些懂得增加臣民和扩展领地的大领主，把管理事务都交给管家。管家指挥收取佃租，特别关切使领主保留地获得好收成。干全工的受薪劳动者越来越取代了徭役。由于领主征收的税不断增多，因而需要征税员。此外领主自己不再亲自去进行判决，将审判权交给了法官。封建社会的整个中间阶层都是这样产生的。

在领主阶层中，也有了小领主和大领主之分，小领主依然与地产制度相联系，靠近农民；大领主则越来越远离农民。日益富裕起来的农民以及精明的中间阶层盼望着晋升到贵族行列，最后被接纳进小乡绅阶层。在教会那里，有神甫、议事司铎和修士，他们也分布在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社会等级上。

当土地不再是简单地给人们提供食物以及精明的耕作者可以从土地那里获得一点收入的时候，土地就具有了经济价值：它可以进行买卖，也可以被用来作抵押。由于受到人口的压力，土地变得稀少了，土地价格上涨。陷入困境的土地所有者为了借款以永久性地租作为抵偿，这样债权人得到了一种很好的土地财产，使他有朝一日会被视为领主。扩展领地的土地所有者很容易在没有土地的农民中找到受薪劳动者。领地的农业生产果实不再被领主的“宫廷”就地消费掉，而是进行出售，这样就产生了贸易。领主和富人开始对豪华用品、华丽衣饰和美食佳肴感兴趣。

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畜群得到增加，新的牧场得到开辟，在扩大的城市中，手工艺者增多了。畜群一般属于城市的屠宰店老板、批发商或领主的财产。对一些人来说，农业和饲养业变成可以赢利的经济活动。在农民一边，产生了

真正的农业企业家阶层：如大户富裕农民、小乡绅、大领地的管理人和正在诞生的城市资产阶级。这些企业家开始反思他们的活动，重新阅读拉丁文农艺学著作，确立赢利管理的技术和经济准则。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进行的这种粗略概述指出了技术、人口、经济、社会和心理等不同因素的作用，正是这些因素的作用使得在200年的时间里从加洛林王朝的领地过渡到12世纪灿烂而又复杂的社会，前者在技术和社会组织上是如此的简单和原始，后者则已经完全都市化了，并拥有了现代农业和现代经济的大多数农艺技术、经济技术和司法技术。此外，这种概述还表明，在农民社会中，这些因素配合得何等密切和巧妙！最小的技术变化，最小的人口压力，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平衡，带来整个系统的变动和重组：而变动一旦启始，就受自身固有动力的驱使，直到建立一个全新的系统。

然而，如果说人们看到了这些力量的作用和这些因素的配合，那么人们对这一神奇的“发展”所具有的动力和机制却不是同样清楚的。关于这个时期的资料太少了，也太分散了，以致无法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但是，G·杜比清楚地表明了货币日益增大的作用，列举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例子来说明小城市中的批发商和公证事务人员的角色。经过全面的慎重比较，倡议似乎主要来自世俗的和宗教的领主。

从国王到最小的领主，所有的显贵人物都曾是土地所有者和农业劳动者，他们当中很多人很关心自己领地的进步，交往甚广，^④这使他们能够把一些新事物引进自己的家乡。在查理曼大帝和“庄园敕令”之后过了6个世纪，查理五世让德·布利撰写了《论牧羊术的状况、知识和实践》，他的掌玺大臣P·道吉孟是高耐斯地区一个庄园的主人，这位大臣在

那里养了600只羊。苏吉(法国12世纪的圣丹尼修道院院长和著名政要——译注)曾是一个很进步的农业劳动者:他从不忘记把革新带来的收入增长记入在册。圣阿尔贝尔(德国13世纪著名神学家和哲学家——译注)制定了一个果园的计划,并于1245年建立了著名的第一个温室。1213年,罗昂地区的子爵接受了埃及苏丹赠送的9匹阿拉伯种马。1337年,奥利维地区女领主的畜群里有了来自西班牙的一些母羊和1只公牛。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R·德拉图什^①提出,经营的方式是一种很好的“普及措施”,当然这是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表达。不仅领主的保留地可以起到“试点农场”的作用,他使用佃农劳役进行经营的方法也使他的保留地成了真正的“应用学校”;“在一个服从大数定律的共同体中,由于没有才智出众的首领和因循守旧的习俗,共同体的习惯作法便成了对一切进步创议的强大阻碍。如果共同体里有一位注意改善经营的指挥者掌握着牢固的权力并决心运用这一权力,使共同体的习惯作法成为他的强制性训练的结果,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时习惯作法几乎可以自动地应用和推广指挥者的创议。为了推广6月耕耘的作法,查理曼大帝除了通过历法进行宣传之外,还掌握着很多其他的手段。在遵循着共同的习惯作法的领地,他的指令也适用于领主的保留田:那些可被征做徭役的人执行着这些指令,对他们来说,这些指令是他们的地产必须追随的样板,因为他们受到劳动程序和大块轮作田的秩序的限制。”(第155页)这样,人们可以认为,尽管从18世纪开始,封建关系逐步松弛,领主保留地慢慢减少,小型自主经营渐渐普及,但这些

^① 德拉图什,1956年。

并没有促进农业的进步。

E·勒华拉杜利^①对朗格多克地区16世纪至18世纪的农民进行了研究，他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反证，从而证实了G·杜比的分析。在这个时期，小麦的平均产量始终很低（和种子的比例是3：1至4.5：1）；直到18世纪末，产量才开始提高，最好的领地产量达到5：1至8：1，这还只是在帝国统治下的范围内：“在其他的农庄，如果说那里的社会萎缩，经济僵化，以致到17世纪末经济跌到最低水平，这是因为那里的人们不懂得增加经济和更新储备：从狭义上说，这当然首先是指贵重金属的储备，但也包括良田的储备；在16和17世纪，如果没有良田的储备，那人们所说的技术进步“储备”会变得何等可笑啊！让我们进一步展开已经提出的假设：如果在1500至1700年之间，谷物的产量增加了几成（像18世纪那样），如果人们能够大量地和持续地种植葡萄（就像在1760年至1870年间几乎从未间断过的那样）或进行更大面积的灌溉（像西班牙卡塔卢尼亚人从1720年开始所作的那样），那么，仅凭土地收入的增加，朗格多克地区的社会就可以应付人口的急剧增长、土地被迅速的分割以及各种捐税的加重”（第641页）。

到15世纪末，人口稀疏了，可垦荒地很多。土地得以重新集中合并。人们由于吃得较好一些，不那么容易染上流行病了。这些条件促成了16世纪初的高速发展；人口发展的速度很快，但经济跟不上同一节奏，这就带来了从1530年起朗格多克地区、同时也是整个西欧的停滞；资金缺乏、工资下降、土地的小块分割加速，等等。该世纪末发生的战争使得

^① 勒华拉杜利，1966年。

经济无法复苏。

1600年以后，一个“成熟”的时期开始了。死亡率接近出生率，人口的增长速度减慢，人口曲线接近于水平线。利息和地租（高利贷、什一税、领主和皇室的税赋，等等）提高了，这使已经稳固的国家有能力发动重大战争了。“食利思想占了上风，压倒了企业家的创议。农学家们都成了土地均分论者。从某些特点上来看，社会趋于僵化，陷入社会保守主义；而这种社会保守主义造成的社会瘫痪后果进而加剧了技术保守主义的马尔萨斯效应”（第635页）。在一些地区，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努力促使人口重新增长和推动乡村开发，因为他们掌握着这种越来越赢利的投资所需要的资本。特别是在第戎地区^①和巴黎地区^②，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与此相反，大多数关心土地改革、社会改革以及技术进步的农学家和政治家（经常是新教徒）却没有使自己的见解得到传播，他们没有引起重要的变化：如塞尔^③和拉夫马斯^④，苏里和稍后些的沃邦^⑤。

到17世纪末期，从1680年开始，经营效益降低了，整个农业生产下降，返回到16世纪的水平。自两个世纪以来，由于失业、贫困和饥荒，人口第一次出现下降。一直到18世纪中叶和农业革命，才最终挣脱了这种枷锁。为什么塞尔和其他人倡导的技术在他们的时代没有得到推广，却与其它技术一起在18世纪得到普及了呢？答案是属于总体历史的范畴而非

① 卢普耐尔，1955年。

② 米娄，1958年；维纳尔，1957年。

③ O·德·塞尔，1605年。

④ 勒华拉杜利，1966年，第439~441页。

⑤ 沃邦，1707年。

乡村经济的范畴：工业社会的逻辑开始同价值体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世界观一起发生作用^①。

在这种总体研究不断增多之前，先对乡村社会引进新的耕作方法或新的技术的现象进行精确的分析，可以使我们以新的方式来提出农民守旧的老问题。D·福舍和M·布洛克^②在两篇具有启发性的文章中指出，当一种新的耕作方法能够在不破坏体系平衡的条件下导入该体系时，“革新的阻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减弱了。为了证明这个论点，M·布洛克援引了水磨的著名例子：水磨在古代就为人所知了，但直到中世纪才推广开来，很快就被墨洛温王朝时期种植黑麦的农民接受了，黑麦大概是通过大规模入侵而被带来的，属于草原游牧文明，黑麦类似于其它的谷物，但比小麦更有生命力，它不改变已确立的技术系统，就可以在某些土地上得到播种，从而增加播种面积。黑麦很容易得到普及了，成为所有乡村人口的食粮，特别是在法国中部，它几乎成了主要农作物。

同样，D·福舍也指出，在17世纪和18世纪，法国西南部引进玉米的过程是缓慢的和渐进的，但没有遇到阻碍。“种植玉米表现出很多的优点。它可以增加人们的食品种类，它的产量大大高于小麦。它的秸顶、叶和穗为牲畜提供了丰富的饲料，使饲养业得以发展，同时增加了厩肥。它可以与小麦配合种植，取消了土地的部分休闲时间：土地在玉米的收获和播种之间只休闲半年时间”（第97页）。但是用了两个世纪的时间，小麦和休闲田的两年轮作制才被小麦和玉米轮作制所取代。然而，小麦-玉米的轮作制既没有威胁到食物

^① 哈扎尔，1935年。

^② 布洛克，1935年；福舍，1948年。

平衡，也没有威胁到耕作系统；相反，这种轮作使食品丰富了，使耕作走向集约化。

不过，一种新技术的引进总会有人们预料不到的后果，玉米使阿坤廷地区和南部地中海沿岸地区发生分化，造成法国南部乡村文明统一体的分裂：“从此以后，西南部的农民将会有自己特有的反应……在玉米的引进引起知识的动荡之后，农民重新跌入消极状态……西南部的农民在放弃一种‘常规’后又返回到另一种‘常规’”（第98页）。我们在后面将会说明，当农民在今天为采用杂交玉米而摆脱常规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犹豫不决，我们还将说明杂交玉米所造成的一切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后果。

在同一时期，南部地中海沿岸地区在接受塞尔大力推崇的桑树的时候也表现出犹豫不决。由于18世纪末的危机，桑树才得以在一些地区推广开来。像玉米一样，桑树也可以并入传统的耕作系统：它可以种在田边，不占土地，丝蚕的养殖使农闲季节的劳动得到利用。与玉米一样，桑树的种植丰富了技术系统，但没有改变它：不过，玉米加强了食物系统，而用于商业投机的丝蚕却在全国的和国际的经济市场上打开了多种食品作物的销路。经济市场的崩溃给所有的生产村庄带来影响。远东丝绸的进口引起了危机，迫使养蚕业的劳动者转行从事一种传统的食物生产——葡萄酒，他们把葡萄酒的生产转变成一种容易进入城市市场的商业性生产。那时，城市市场已因铁路的发展大大地扩展了。葡萄的单一种植^①慢慢地取代了食物的多种耕作，根瘤蚜造成的虫害促进了这一过程。

^① P·克雷芒，1953年。

这样，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南部地中海沿岸地区进入了现代经济的循环圈，而西南部地区依然是务农和从事粮食生产，与之相随的是D·福舍提到的后果：土地所有者和佃农陷入相对贫困，人口变得不足，最严重的是产生了“一种阻碍革新的精神疲惫”。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比较这两种演变所带来的社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后果：一些人推崇阿坤廷人的睿智明哲，抱怨朗格多克人的变化不定；另一些人则蔑视前者的“倦怠”，羡慕后者的活力。社会学家的任务仅仅是要指出，一种在初始时不同的技术选择最后会带来整个社会的根本变迁。

这样人们便会理解，农民之所以在一切新事物面前都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已模糊地意识到，最小的技术变化也会带来社会影响。M·布洛克清楚地表明，18世纪的农业革命是由反对小农“习惯”的大农业劳动者进行的，小农几乎没有想到要增加国家生产，甚至没有想到要提高他们自己的生产水平：“他们知道销售市场是不稳定的，行情是变化的……他们主要关切的是保证他们的传统生活水平不受到大的影响。几乎在所有的地方，小农都认为自己的命运是与维持旧的集体束缚相联系的，后者成为耕作的重负。然而，这些习惯是以土地休因为前提的。取消了土地休闲，同时也就破坏了公共牧场。例如在实行3年轮作制的地方，公共牧场每年把1/3的耕地向整个共同体的畜群开放。如果剥夺了这种权利，很多经营者会不知道怎样饲养他们的牲畜。一言以蔽之，大多数农民害怕大的社会震荡，而这种震荡似乎是新的方法不可避免要带来的结果。他们的害怕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们更清楚地了解同一时期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侧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会在那儿找到自己感到严重不安的理由。农业革命在英国比

在法国来势迅猛得多，也彻底得多。作为英国农业革命的代价，乡村社会人口的一部分被整个地毁灭了。”^①

M·马利约特研究了恒河谷地的农民，那儿的农民不愿使用一项灌溉计划给他们带去的水，因为他们很清楚，这项计划主要是为大地主服务的，会使他们依赖于农业技术人员和农业官员；最后，“在他们看来，水渠是政府的一个计谋，是为了从他们那里提取更多的劳动和金钱”。此外，他们也知道，为了日夜看管灌溉，必须把住房分散在田地里，而他们是住在像是城堡的群体村庄里，外部世界在他们眼里是危险的，他们害怕在晚上到田野里去，因为那儿充满了“魔鬼和可怕的强盗”。因此，对于一项完善的灌溉技术，虽然农民完全认识到它的好处，但在他们看来还是无法接受，因为这一技术给他们的社会组织带来激烈的动荡。

当M·马利约特到达这个村庄时^②，他对那里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引进的技术和作物的数量感到吃惊：亚洲的胡萝卜，芥菜子，机械播种机，等等。仅这几项技术就使那里的人口在100年的时间里增加了1倍。除了集体灌溉网，较好地使用厩肥和进行选种本可以使那里的食物水平得到改善。但这两项革新是那儿的农民无法接受的。因为它们无法并入当地农民的技术系统：厩肥是唯一可使用的燃料；新品种的小麦产量是比以前提高了，但牛不吃它的麦秸。可是，牛像人一样必须进食，妇女必须有东西烧火做饭。

这样，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告诉我们^③，在正常时期，农

① 布洛克，1948年，第109页。

② 马利约特，1954年。

③ 在这个问题上，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很多，让我们援引一下先驱者的成果和最近的理论发展：莱德弗尔德，1950年；麦尔，1965年。

民社会的变化是很缓慢的，一种新事物在那里只有看起来不再“新”的时候，才真正被接受了，因为那时它已经并入了既存的系统。即便在美国，这也是符合实际的，但符合的程度差一些^①。作为各种技术之间的一种精巧配置的结果，生产体系保证了在整个社会体系中食品和人口的暂时平衡。只要生产体系不改变，社会体系也不会动摇。一项新技术的引进，也就是说它完全并入耕作系统，并成为群体的技术遗产的组成部分，这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那时儿子已从他父母那里学到新技术以及其他的技术。严格地说，革新在这样的社会里是没有地位的。只要它还是一个新事物，它就仍处在系统的边缘，而当它在系统中有了位置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个新事物了。变化是通过排斥原有意义上的革新来实现的。

* * *

历史学家们强调指出，一切农业进步，特别是18世纪的农业进步，都是农民社会外来因素促成的结果。我们曾提到中世纪的大领主和领地管理人的作用。在16世纪，“植物园”成为时髦，并起到重要的实验作用：1536年，拉伯雷从罗马给他的保护人寄来生菜、甜瓜和各种植物的种子，并一同寄来妥善种植的书面意见^②。在17世纪，常常是城市资产阶级使农业得到复兴和进步。“函授教师”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G·卢普耐尔说明了第戎市的那些法官家族是怎样使勃艮第地区的人口增加，并在那里创立了葡萄园^③。M·维纳尔分析了巴黎资产阶级对周围地区的农业产生的影响。^④

① 米耐，1949年。

② 奥吉-拉利贝，1955年，第16页。

③ 卢普耐尔，1955年。

④ 维耐尔，1957年。

在18世纪，农业革命经常遭到农民的反，农民在19世纪才缓慢地接受了农业革命。“乡村大众只是被动地跟着潮流，他们往往是首先毫不犹豫地反对农业革命。直到今天，这种抵制的痕迹仍深深地留在农艺学的文献里。农艺学仍以某种方式保留着对农民的积恨”^①。此外，农艺学往往不是讲给农民听的：拉丁文的、中世纪的和现代的农艺学家都不是为农夫写作的、而是为土地所有者写作的，但用塞尔的话说，土地所有者去农民那里是“不请不到”的。

M·奥吉-拉利贝也积累了一些例子，证明在近代没有任何一项发明是由农民社会里的农民完成的：“这些人在改进实施细节上是非常灵巧的，但他们没有发明。他们所利用的或他们所经历的一切重大变化都是来自外部，是城市强加给他们的。”他还提请人们注意卡达纽的话：“理性的农业劳动者亦并非都是都市人。”^②因此，R·莱德弗尔德不无理由也断言，农民是相对于城市或一个精英集团来定义自身的，只要没有城市，就不会有“农民”。^③

对传统村庄社会的研究，说明了为什么在一般情况下农民不会成为革新者；一切传统的影响和整个社会体系都阻止他们成为革新者。相反，非农民的土地所有者，由于他们所处的边缘境况，可以充当新事物的首倡者和尝试者的角色。

“传统”的农民不会怀疑“传统”，在他们看来，“传统”是理所当然的，是生活和工作必须遵循的正常方式。相反，领主、贵族或资产阶级受过教育，他们学习过一点历史、科学和“人文科学”，知道在别的地方还存在着别的“传统”和别的

① 布洛克，1948年，第108页。

② 奥吉-拉利贝，1955年，第147页。

③ 莱德弗尔德，1956年。

行为方式，如果他们愿意服从“自己的”传统，这是由于他们的传统主义和对变化的排斥态度。而传统的农民不会成为“传统主义者”或“反传统主义者”，因为他们是承受着传统，在他们看来，传统不会成为要回答或要解决的问题。^①

当然，在法国社会中，这种对比从来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甚至在上个世纪，领主在很多方面还是“农民”，他们常常像他们的邻居一样，服从村庄的传统。而他们的邻居与外部世界也并不是那么隔离，不致于从未想象过与他们不同的行为方式。在一些地区，他们运用自己的灵巧来改进一些细节。特别是在图卢兹地区，植物园对于具有创造性的耕作者来说，是永久性的“实验田”。但是，这些实验像中世纪博学者的实验一样，既不会转变为科学，也不会转变为技术；一切重大的农艺学进步都是来自外部^②。同样，农民 (Paysans) 按其字面上的本义是地方之人 (hommes du pays)，他们超越不了自己的土地的有限视野。

与此相反，显贵人物们既生活在外部世界，也生活在乡村世界，有时生活在外部世界的时间要多得多。他们阅读报纸和杂志，与邻近地区的同一阶层人士保持着联系；他们经常在城市里度过冬季，在那里他们推动着通常既对农业感兴趣同时也致力于研究美文学和考古学的学者社团。在他们所在的地区，他们的社会角色很自然地使他们在农业促进会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他们在那儿见到了当地其他经验丰富的农业劳动者、兽医以及负责推广农业先进技术的官员。他们虽不赞同M·奥麦(福娄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一个人物——译注)的科学宗教，但他们有时从自己的研究中学会

① 维叶，1953年。

② 福余，1962年，第123~134页。

了尊重科学和给予科学进步某种信赖。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还会对实验感兴趣，参加那个时代某个领域中的科学活动^①。

此外，领主们的生活方式要求他们从自己的田产中提取一些货币收入。他们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付孩子们的学费，经常要去城市里过冬。他们雇有许多受薪者。因此，在某些地区，只有他们的生活不是自给自足的。那些靠地租无法满足需要的领主试图通过赢利的投机生意来补充收入。尤其是，他们常常成为主要的谷物出售者和唯一为了获取利润饲养牲畜的人。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他们当然想改进耕种方法。总之，那些对佃农所交的佃租感到不满足的领主已经直接了当地进入市场经济，因而对经济的波动是敏感的；而他们所有的邻居却仍然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境况中，在那儿最重要的是吃饭问题。

最后，农业是“地方性的艺术”，任何进步，尽管在别处进行过实验，但仍需要在每个地方经受检验，如果说不是需要在每块田地里经受检验的话。一种新事物要想顺利地进入具体的农业区域，首先要完全适应那儿的气候。一切尝试都是包含着风险的，而领主是唯一具有足够的经济余力来冒这个风险的人；购买的机器、肥料和种子可能会显得没有效力，而且由于一念之差，还会使田地的收入和付出的劳动受到影响和损害。相反，小农一般不具有这种余力；如果他攒下了钱，他更喜欢把钱放在安全的地方，而不愿去进行农业投资，在他看来，除了土地之外，农业投资全凭侥幸。他对拿一块田地的收成做赌注来进行试验总是犹豫不决，因为那

^① 关于19世纪农业促进会的描述，请参阅福娄拜的《包法利夫人》。

收成要养活他的家庭和他的牲畜。只有一年又一年的连续成功才能说服他去尝试一种新事物，而那时这个新事物严格地说已经不是新事物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只有当农民从他父亲那里学到一项革新同时还能采用最传统的技术时，他才能真正地接受那项革新。

这就是显要人物的边缘角色和革新角色的社会学意义。由于这些显要人物既属于外部的人同时也属于村庄里的人，所以不管什么变化他们都会引进，如果这变化被证明是无效的或有害的，那它将不会真正地被村庄接受，如果它连续数年表明是有利的，那它将首先并入共同的经验，然后才会被农民接受。此外，如果显要人物在“自己的”农民面前扮演着“父亲的”角色，那么人们对他们的信赖也会对进步的普及有利。

所有这些分析表明，一个普通的农民要成为革新者是何等的困难。这要能够对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并被周围的人所接受的传统提出质疑，要了解城市里的学者或邻近地区有创造性的农业劳动者取得的进步成果，要感受到变化的需求，以便打破低层次的但却是保险的平衡，还要具有能够冒实验的风险的经济能力和知识能力，所有这些必备的条件很少能够结合在一起。即便是由于某个农民比周围的人更为富有、更有知识、更具有想象力和更有抱负，这些条件碰巧都具备了，那么他周围的人和整个社会系统也必然会反对他，使他感到自己的举动是不适宜的。

确切地说，一个农民尝试一种新事物，这会引起公愤：难道他自以为比他的父辈更灵巧、比他周围的人更聪明、比显贵人们更有知识？否则他怎么敢做显贵们没有想到要做的事呢？他的行动可以说是对其他人的一种侮辱，其他人必然会

报以嘲笑和敌意，并运用各种社会约束的武器来令其遵守互识社会中的传统规范。所有的人都预言他将遭到失败，为的是使他这个冒失的人能够摆脱病态的幻想，使一切都能够按照秩序进行，使大家都对传统的无可争议的价值感到放心，因为这价值比一切进步都更为重要。

当革新者意识到引起公愤的危险时，必然会对周围的人掩饰他的试验，这倒不是为了在试验成功的情况下独享其利，而是为了逃避议论和谴责。只有当试验完全成功了，当它的结果是可靠的和无可置疑的了，他才敢把它向其他人公开，就像是一件完全自然的和不言而喻的事情，或者像是一项只有他自己才能够进行的和实现的小变革，变革的成功完全是由于他的“创见”，他的特殊能力或他与外界的接触（工程师，或一个搬到城市里去的亲戚……）。这样一来，他与显要人物完全处于同一地位，起到同样的作用：他之所以能够与传统对抗，正是因为他是与众不同的，是处于边缘上的人。

这就说明，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虽然在农村中有一些具有现代意识的杰出农业劳动者，但他们周围的人却视而不见，没有模仿他们作出的榜样。所有关心普及农业技术进步的人都相信什么“扩散”效应，但他们没有考虑到，如果进步真的可以“扩散”，那整个法国应当布满了杰出的农业劳动者，因为自18世纪以来，每个地区都会有一个出色的农业劳动者、一个模范的农庄或一个农业学校。然而，这些进步的“水珠”几乎没有在乡村的画布上留下扩散的痕迹。

由于只有与众不同才能进行变化的尝试，那么大多数人也同样会认为，所有的变化对他们都是无益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能够变化的是具有特殊潜力的他人，但绝不会是不具

有同样实力的“我”。“他”可以这样做，因为他认识某个人，那人可以教给他这样做，并给予他资助(如补助金)；但在正常的条件下，即“我们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

这样，我们可以认为，在传统的社会里，革新是一种富人的奢侈品，普通农民是无法企及的。然而，财富是根据资本，而不是根据收入来确定的。因此，若是一种新事物能够增加标志着社会声望的资本，它就会更加具有吸引力。我在别处曾引证过的一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①：在法国的中央高原，有个农业劳动者拒绝他人以5头种牛替换他的8头贫乳的瘦牛。因为在这个地区，牛的拥有数量是作为确定各个家庭在村庄里所属社会阶层的依据。虽然5头优良的奶牛比8头干瘪的瘦牛带来更多的货币收入，但拥有8头牛的人就是个“富人”，而拥有5头牛的人，就成了地位低微的人。如果有人要出嫁女儿，上述情况是不可忽视的。所有可以增加财富的外部标志的进步要比其他进步更易被人接受：因此，拖拉机比肥料更受人偏爱，尽管它的价格和它带来的费用很高。R·杜孟^②叙述道，在乍得，“厩肥有时堆成高高的坟头似的。我向一个附近地方的首领说明厩肥具有各种可能的用途，但得到的回答大约是这样的：‘我已经老了，很快就要过世了。那时当路人看见这小丘时，他们会怀念我并在心里思量：这是个大首领，因为他有很多的牲畜，所以留下了这么一堆厩肥’！直到那时，我从未想到，这些肥料可以用来当作纪念碑”。幡然醒悟的这个农学家最后作出这样的结论！

如果进步是与显贵和富人的社会声望相联系的，那么有些农民自然会愿意与他们进行比较，模仿他们的言行举止，以

① 孟德拉斯，1958年，第15页。

② 杜孟，1954年，第100页。

便能够享有他们的那种声望。在某些地区，领主和显贵是村庄社会公认的并为大家所接受的首领，人们尝试着去模仿他们，追随他们作出的榜样，对他们表示信任。相反，在那些难以忍受或激烈反对这种父亲式监护的地区，人们之所以要在那些自诩为精英的人士面前表现得毫不逊色，那不过是为了反对他们，证明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因而也就是否认他们的优越性。

从18世纪起，人们提出利用整个精英阶层来加速进步。托克维尔援引过一个农业劳动者的例子^①，这个农业劳动者建议让神甫在礼拜天讲道时朗读一些简短的农业技术使用说明，并给最优秀的农业劳动者颁发奖赏。托克维尔作出结论说：“农业劳动者是些对告诫抱有强烈抵触的普通人，但他们却倾向于认为，如果农业没有改善，主要是政府的过错，政府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建议和帮助。”这种思考在1967年所表现出的现实意义是令人惊奇的，说明这并非是一个新问题。

19世纪农业促进会的历史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机制，因为那些促进会的领导几乎总是由显要人物来担任，他们在行政机构和兽医的支持下，力图使“杰出”的农业劳动者受人注目。后来，小学教员充当了同一角色，随后又把这一角色让给现代的“科技普及者”。但在这些“科技普及者”和他们的先驱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区别：人们模仿显要人物，是因为人们信赖他，或者因为人们承认他的才能。这种以“父亲”本位主义为基础的个人权威和社会权威被科学的普遍主义取代了。当然，昔日的“老爷”是有知识的，而今天，这些科技普及者即便是和别人具有同等的知识，也会比别人得到更多的

^① 托克维尔，1953年版，第4～135页。

信赖。

从根本上说，传统村庄里塑造出的农民会更快地承认带有社会权威色彩的科学权威：这两种“权威”可能具有不同的组合形式，对此有些调查材料已作了透彻的说明，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将分析这些调查的结果。此外，变化的机制在本质上说具有集体的特性和社会的特性：要想使革新能够被接受，必须使它并入整个村庄所共同遵守的习惯。因此，一个农民从不会想到要单独地做某件不寻常的事；相反，他受自己的群体所驱使。如果以为个体化的科学普及会更为有效，那是错误的。心理学家们表明，最近的实验也证明，单独的个人很难下结论说：农业技术进步在成为群体和机构（农业技术研究中心、科学实验区，等等）的行动时，会发展得更加迅速。

* * *

在引进变化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政治也粉墨登场，并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19世纪末，M·奥麦无条件地信仰科学，在地方首府，一部分信仰科学的资产阶级成为乡村的政治代表，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些显然都不是偶然的。科学可以成为社会进步力量同保守的传统精英争夺权力的斗争旗帜。

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假定显要人物扮演了革新者的角色，这是由他们在农民社会中的边缘地位所决定的。但是，也常常出现相反的情况：在他们处于领导地位的社会中，他们特别关心保持这个社会的稳定。由于他们比农民更遵守传统，或者仅仅是由于他们忽略了农业问题，他们会认为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一切新事物，无论是技术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都是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想获得一部

分权力的人，即“上升的阶级”，自然会成为促进变化的带头人，并把变化称之为“进步”^①。

在拥有权力和声望的人和希望获得这些东西的人之间存在着斗争，这种斗争也会存在于两类非农民的“显要人物”之间：贵族和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两个阶层。D·哈列维^②描述了整个国家从“公爵共和国”向“显要人物共和国”的过渡。这只不过是当时各个地区正在进行的权力移交过程的反映。R·塔博特^③在叙述马兹叶桑戈提地区他的家乡的村史时曾举例说明过这个问题，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农业组织的全部历史可以概括为保守领主和激进议员的长期斗争史^④。

农民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可以说是受争夺的对象，因为敌对者们都自诩是他们的“代表”或为他们“服务”的^⑤。农民也试图利用这种敌对，站在这一方或另一方的后面，追随它的意识形态倾向，学习它的有效手段，从而在为村庄服务的同时也为自己带来各种好处。农民会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利用各种地方精英向省政府和国家政府说情，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写一章很有趣的社会史。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地方上会出现态度的完全转向，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政治态度的改变，而仅仅是反映了主导政治倾向的地方性特点和功用性特点，为了获得照顾，这样做似乎比别的选择更为有利。

① 约勒，1909年版。

② 哈列维，1937年版。

③ 塔博特，1945年版。

④ 参见下文，第七章。

⑤ 诺夫堡，1945年版。

在等级森严的农民社会里，农民圈外的人无关紧要，斗争会在“富人”的两个高等社会阶层之间进行：例如一个从旧时农民演变过来的贵族阶层和一个最近才富裕起来的资财群体。有些地区没有出现很明显的分层。虽然有的农民富，有的农民穷，但他们之间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然而，权力斗争却把敌对的派别和他们的亲属以及他们的支持者都卷进去了。

为了使分析简明扼要，我们假定，传统的和墨守成规的贵族阶层自几代人以来一直掌握着权力，现在这一权力受到另一个群体的挑战，J·约勒（1909年）称这个群体是“暴发户”或“新贵族”。对于一项技术革新，后者大概会比前者更快地表示欢迎，但在这项革新被一方接受以后，必然会受到另一方的诋毁。如果这革新能带来某些好处（津贴或某种资助），如果人们会从中得到某种利益，上升的精英阶层自然会留心让他们的亲属和朋友从革新中得益，后者在对革新表示欢迎的同时会自动地表示自己属于“进步人士”的阵营，而反对派的支持者们必然会对这一革新表示轻蔑，就像他们的“老板”，对一切变化都嗤之以鼻。

所有的技术革新以及一般的进步，一旦与村庄里的敌对竞争缠和在一起，就具有了政治含义。在技术人员和经济学家看来，技术是中立的，但当技术进入村庄时，就变成了政治赌注，它是善是恶要看谁接受它和谁拒绝它。而且，它会变成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使支持者更加忠顺，它还会成为一种思想旗帜，可以使支持者在这个旗帜之下痛斥那些“实行蒙昧主义的反动派”，因为他们“想使农民继续处于悲惨的屈从地位”，或者相反，谴责那些“不负责任的煽动者”，因为他们“想讨得人民的欢心，同时又使他们背离自己祖辈的传

统”。这样，在非洲，咖啡成了“白的”，棉花成了“黑的”^①。在法国，企业联合组织是“白的”，合作社是“红的”；我们在后面还将看到，玉米的一个品种在某些人眼里可以成为教权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传播媒介。

这种把技术进步政治化的运行机制在所有的农民社会里都起作用，在其他的地方大概也起作用。关于这一点，威廉曾在描述威尔士一个村庄的情况时作了很好的说明^②，那个村庄的名字叫哥斯福士，那里的绅士徒劳地反对具有现代意识的农业劳动者，后者购买机械设备，发财致富，嘲笑那些无力供养自己的庄园绅士，而这些绅士仍自以为了不起，因为他们把持着俱乐部主持人的位置。

在过去的殖民地国家，整个西方文明都与技术联系在一起，技术是社会争议的焦点。在那里，引进技术和社会“进步”的常常是与殖民者有来往的上层集团。对于这种西方化的倾向和放弃部落传统、地方传统或民族传统的行为，敌对的集团自然会感到愤慨。M·马利约特对印度的这种情况作了很好的描述。在他考察的那些村庄里，婆罗门种姓等级向西方化和城市化，使他们将其在村庄里所拥有的一部分权力让给了次一级的种姓，但后者却更进一步地强化了宗教戒律和社会传统主义，并确立了自己的权威，甚至模仿起婆罗门种姓的特殊举止^③。这种情况在第三世界不是非常的普遍。在西方学校里受过教育的文化人经常在乡村中反对传统的领袖，就像哥斯福士村的农业劳动者反对他们的绅士那样。然而，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在一个狭小的和互识的村庄社会

① 当皮埃尔，1960年。

② 威廉，1955年。

③ 马利约特，1955年。

里，在各种各样的气候和文化条件下，角色会被完全颠倒过来，而且并不会改变竞争的意义和规则。

在大多数传统的农民社会，社会声望是用两种尺度来衡量的：一是符合传统的程度，二是资本的规模。在技术革新方面，我们在前面充分地证明了，一切为了变化而进行的努力都会对一个农民的声望和地位造成威胁，只有某种最高的声望，由于它以某种方式超越了村民的衡量尺度，因而可以使“显要们”能够通过一些实验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和权威，但这类实验也会使最受农民尊敬的人名誉扫地。

其实，一切事情都是如此：人们是通过尽可能完美地体现传统的价值来提高或保护他在传统社会里的权威。然而这并不排除，在一些地区，某些异常行为以及在思想上和习惯上表现出的独立性，也会引起尊敬和重视。不过，不循习俗者的声望与墨守成规者的声望永远不会处于同一层次。而且，在正常的情况下，个人主要是从家庭那儿得到自己的地位和名望，这就涉及到对家庭所有知名成员的评价：那些跨越好几代至今还活在上的人和仍留在村民记忆中的已死去的人。一个人的总体地位，即他的“身份”，更多地是由规定的地位而不是得到的地位构成的。因此，个人几乎既没有可能性也没有欲望改变别人对他的期待。

一个人出生在有着正统思想的家庭，其思想也会变得正统，因为别人期望他能够做到这样。而且，如果他想逃避为他规定的角色，那他的一切企图都会遇到全体村民的强烈反对。人们在一生中所要做的就是去符合别人根据你在村庄里的地位为你塑造的形象：在一个不循常规的家庭里，儿子也必然是不循常规的，如果他想成为循规蹈矩的人，那他的一

切努力都会遇到整个村庄的怀疑，甚至奚落。这样，他的村庄迫使他成为像他父亲那样的儿子。

有经验的农业劳动者，吃苦耐劳的勤快人，或者浪荡懒散的人……都是这样产生的。如果一个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而遇到那么多的阻碍，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自然会甘于忠实地担当与他的地位相适应的角色。这个简要的分析足以证明，社会控制的整个系统都在迫使农业劳动者放弃变化的念头，我们已看到，在农业劳动者眼里，变化从技术的角度上说总是前景莫测的。

如果说尊重传统可以确保声望的稳定，那这种声望的主要基础则是对资本的占有，特别是对土地资本的占有。在由农民和土地占有者构成的文明体系中，家庭的地位是由地产的规模确定的，社会等级与财产等级大致相符。或者，在次一级的层次上，对于自由租地佃农、包税制佃农或分成制佃农来说，社会等级是与经营规模的等级基本一致的。一旦物质的和食品的需要得到满足，一切生产剩余都会转化成资本：货币、黄金、土地或牲畜。

人们把收入或者积蓄起来，或者用于投资，而不是用于消费：消费不受看重，花费“太多”是受人轻视的，除非是在某些不常有的并需要夸耀的消费场合，例如结婚。在这类场合，人们要尽力显示的是他的财富和资本，而不是他的收入；为了使婚礼华丽隆重，人们花掉积蓄，也就是花掉资本。事实上，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中，收入的概念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们消费的是他们所生产的东西。

货币一般被视为资本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种交易的手段。甚至可以说，它是土地的某种替代物。因此，它像土地一样受高度重视，而且它也是比较稀少的，因为农民很少进

行交易活动。这样，我们可以断言，农民越是很少把货币作为交易手段，货币在农民眼中就越是宝贵。在这种情况下，收入的增加不会成为经济活动的动力。

人们的劳动是为了生活，如果人们想付出更多或更好的劳动，这首先是为了能够积蓄钱财和增加资本。不过，一项具体的劳动与资本的增加之间的联系是非常间接的和不确定的，而收入则更为直接地与某项劳动相联系，例如在工资的形式下就是如此。所以，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和比较稳定的社会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的生产系统，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人口的压力增加时，人们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吃的稍差一些或离开家乡到别的地方去，但人们并不想改变耕作系统。

只有资产阶级和贵族容易考虑经济方面的要求，因为他们不是完全处于农民自给自足的系统。不过，农民自给自足的系统受到另外的影响：税务。18世纪末领主税的增加肯定是商业性作物进入多种食品作物系统的原因之一，例如桑树和丝蚕进入南部朗格多克地区，或茜草进入孔塔韦纳森地区。通过这两种迂回的渠道，经济的考虑进入了传统的农民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经济人员没有经济选择的余地，就像我们所指出的他们没有技术选择的余地一样。

* * *

这种选择的缺乏是属于这种生活水平和这种生活领域的，它无疑是这种社会的根本特征。对于平衡的耕作系统和自给自足的经济，农业劳动者从未提出怀疑：对他们来说，这是类似自然资源的既有条件，他们可以进行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加以利用，但他们不会想到去改变。这些既有条件的缓慢变化不是个人决策的结果，而是一个长期的社会

过程所造成的，涉及到许多集体的机制，这些机制在个人没有清楚地意识到的情况下起作用。

在缓慢变化的社会，人们更为关切的是维护传统，而不是弹性和适应，当这种社会和处在这种社会中的人们必须跟上迅速变化的工业社会的节奏时，他们就茫然不知所措了。一切机构、一切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都必须改变，人格结构必须要重组。但是，这些变革总是非常缓慢地实现的，在今天的法国，两种社会并行，农民必须在若干年的时间中从一种社会过渡到另一种社会。那些由传统世界所塑造出来的人就会完全晕头转向，他们在父辈开辟的道路之外，看到的只是危险和变化不定：对他们来说，离开常规，就等于在冒险，感到自己是赤手空拳的。

第二章

土地、劳动和时间

传统的农民耕种着祖传的土地，从父亲那里学会种田。对于这土地，他甚至了解更小的细节：如可耕土层的结构和厚度，以及岩石、湿度、光照、地形，等等，这常常是因地而异的。这种知识作为常年培养、劳动和观察的结果，是他所独有的。在他看来，这是农业劳动者的基本技能。而且，他感到是他“创造”了自己的土地，他了解这块土地就像创作者了解自己的作品，因为这块土地是不断加工的产品：耕作、施肥、轮作、休闲，等等。且不说农民与自己的土地的情感联系，这里只要指出关于田地的直接知识的意义就足够了，这种知识就蕴含在农民的技能中：如果我是唯一熟识自己田地的人，那我也是唯一能种好它的人，所以，没有任何其他的人能在这方面帮上我的忙。

获得一块新的田地，需要重新进行长期和细致的训练。与这块新的田地建立密切的关系涉及到人们的态度和心理机制；人们了解他们所拥有的东西的优点和缺点，但人们会高估他们所期望得到的东西的优点和缺点。这是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合并会遭到强烈反对的原因^①。

^① 古丹，1953年。

这种不无根据的看法显然会走向极端，导致不相信借助于土壤分析的科学方法可以认识一块土地的化学、生物和物理特性。一个技术专家，虽然从未见到某块田地，但根据一些选择，他完全可以测量出该土地的“潜力”，提出一些改良建议，换句话说，他比从年轻的时候起一直治理和耕种该土地的人更了解它。在经验性的个别知识和科学的普遍知识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人们无法想象有比这更为尖锐的对立了。

此外，每块土地都有自己的个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土壤的特殊性，还有微观气候变化的影响。如果说人们可以进行土壤抽样分析，那对每块土地都作气候记录则更为困难，因为这种气候记录要连续进行多年才具有价值。在这方面，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又经过多年观察得到补充了的经验知识使农民拥有一种难以被替代的技能：唯有他知道那块表面看来光照很足的土地实际上地温很低，那片夏天很快枯萎的牧场春天很早就会长出茂盛的绿草，等等。

过去的农艺学家在意识到法国农村这种无限多样性的特点之后，便教导说，农业是“地方性的艺术”，任何已有的科学数据都必须根据地方特点进行非常细心地检验和修订。这就是说，他们只是用理性的术语转达了他们所熟悉的农民的深厚情感，而且，他们的一大部分“科学知识”是从这种深厚情感中获得的。

每一隅土地都是独特的，要想耕种一块土地，首先要对这块土地有深刻的了解，这仍然是现代科学无法取消的一种束缚。经正规的传统塑造出的农民自然会倾向于高估这种“独特性”，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知识，而不是技术专家提供的准确数据。而且，他们的这种态度由于他们对自己祖传地

产的情感依恋而变得更为坚定了：人们爱恋的东西总是独特的。农民的土地恋是文学经常重复的主题，它不会轻易地屈从于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分析。

所有的农业文明都赋予土地一种崇高的价值，从不把土地视为一种类似其他物品的财产。无论土地作为上帝的恩赐还是作为群体的体现，它只有一个等同物：女人。所有关于土地的性象征系统都为这种类比提供了根据。如果把人们赋予土地的女性特征和人们期望女子在不同的乡村社会中具有的经济技能逐一加以对照，那会是很有意思的。人们可能会发现，土地越是被当作生产资料，女子的情感特性和“女性”品质就越受到重视，反之亦然。

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法规使地产的这种拟人化特征法典化了^①，地产与它的所有者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这可以说是一种谁也无法打破的亲属关系。地产曾是家庭的一个成员。在特殊的情况下，当人们需要转移一块土地的所有权时，一种司法技巧可以使得他们在这样做时不违背原则和不打破亲属关系：人们把一块田地里的土块扔到河里，土块在水中分解，象征着那块田地消失了，这样，土地获得者得到的是被假定从未属于任何人的一块处女地。

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强调人们从一种文明进入另一种文明时所感受到的差异。在关于理想农民典型的经典描述中，根据莱德弗尔德的看法，赋予土地一种情感和神秘的价值是全世界的农民所特有的态度^②。唯一的例外是地中海沿岸的农民，无论是拉丁血统的^③、希腊血统的^④，

① 凯辛，1952年。

② 莱德弗尔德，1956年，第112页。

③ 庶弗尔德，1958年。

④ 孟德拉斯，1962年。

还是阿拉伯血统的。根据J·沃勒斯^①：“在叙利亚的土地上，爱和劳动是同样缺乏的，那儿的农民大概是耕种土地的，但却像是不情愿的，他的经营仅仅是为满足眼前的需要；他的劳动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他的土地：他感觉不到土地超越了他，并使他得到延伸……确切地说，很少有农民表现出这样淡薄的土地观念和对地产如此不合常理的轻蔑。”在J·皮特利沃看来^②：“缺少对土地的神秘态度暴露了一部分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所具有的价值体系，这些人为了种地走出城市，但并不爱恋土地。”这样，地中海周围城市化了的农民对他们的田地已经具有了理性的和经济的观念，这正是会计师和经济学家企图向现代农业劳动者灌输的：这是一种资本，一种生产资料，仅此而已。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法国的大多数地区，农业劳动者仍然是“真正的”农民。直到现在，只有一次在局部地区进行的试点调查把农民对自己的土地的依恋情感作为对象，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这次调查的假设和初步结论。这儿我们只限于指出，土地与整个自然、人类和社会环境是在怎样的程度上密切相连。对农业劳动者来说，土地这个词同时意味着他耕种的田地、几代人以来养活着他全家的经营作物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土地这个词同样还让人想起农民的状况和一个国家的全部农民。在交谈当中，我们发现农业劳动者从土地的一种含义跳到另一种含义，他似乎没有想到，这些含义是不同的；他同时还断言，这个词所唤起的情感是难以表达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为了使对话者能够理解这种情感，他求助于他个人的体验：“如果你是乡下人，你知道我想说的意思。”

① 沃勒斯，1946年，第173页。

② 皮特利沃，1954年，第47页。

相反，在巴黎盆地，一个富裕的佃农可能会拒绝购买他耕种的土地，因为对他来说，租种土地和把资本投资到牲畜和农具上在经济上更为有利。在一次交谈中我们看到，他的“经济理性”显然与他的“农民情感”相冲突，当他试图为自己拒绝购买土地的作法进行辩护时，他就抱怨自己租种的土地：“这块地很糟糕，定居在这样的土地上是让人难下决心的”，或者更进一步，把他租种的土地说得微不足道：“那块地或另一块……现在，土地不再被当回事了。”他把他所拒绝购买的土地说得微不足道或大加抱怨，这显然违背了“农民”提到的并避而不宣的那类情感。然而，别的农业劳动者会以异常明晰的语言来分析他这样做的原因以至内容：“了解自己的土地，使它具有价值，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而且他越了解自己的土地，就越是依恋它。”我们所分析的农业劳动者几乎是以福音般的语言承认道：“该归谁所有的东西，就归谁所有……一个农民，就是土地所有者……当人们成了土地所有者，人们就有了对土地的情感和忧虑。”与富裕的佃农相反，也与一切经济分析相异，一个小土地所有者会说：“农场的土地，价钱昂贵，但又毫无价值。”

农民在内心深处坚信，他的土地是独特的，因为他是唯一了解、爱恋和拥有它的人。认识、爱恋和占有，这三者是不可分离的。即便是在农业劳动者以理性的和经济的方式对待土地资本的时候，他依然对土地保持着深厚的情感，在内心把土地和他的家庭以及职业视为一体，也就是把土地和他自己视为一体。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正在消失的历史境况的产物，在这种境况消失后，这种情感还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另外，这种情感已经被新一代的农业劳动者正在建立的思想观念打开缺口。青年人希望，经

营者能够解除土地财产的负担，土地财产能够被农业劳动者、政府和资本家仅仅视为一项生产要素^①。

传统的农业经济使土地成为重要的资本和唯一可靠的财富。在以植物生产为基础的农业系统中，饲养牲畜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奢侈；生产工具仅限于牲口的套具；有时甚至只是某些农具；因此，一种农业作物的经营首先是一块可耕面积，一块土地，正像语言本身所表明的：土地、地产、遗产、经营，这些都是意思相近的词汇。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中，农业生产为的是养活人口，只有剩余的产品才被卖掉，以便交纳国税和领主税，获得一些村庄里所没有的食品和服务。只有生产是重要的，销售并不重要。显然，由此可知，土地的占有是社会等级制的基础和声望的标记。

此外，全部土地史可以被概括为农民争取完全占有土地、摆脱领主税和集体束缚的斗争史：农民的解放是由法国大革命通过法律形式完成的，但这一解放始于中世纪，经过19世纪一直延续到当代，在这个过程中，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大片领地被分割成小块，卖给经营者和邻近的人。在昔日的法律和经济体系中，经营者只有拥有自己的土地才能确保自己的经营的生存，也就是确保自己的永远的生存。而且，历史告诉他，土地所有权是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必要条件。耕种别人土地的人，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成为土地所有者的债务人，甚至仆人。

总而言之，整个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法律的和政治的系统赋予土地一种崇高的价值，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无与伦比的财产。父子相继地作不懈劳动，会进一步增加这种对土地

^① 参见第七章；塔韦尼埃，1966年；德巴提丝，1963年。

的看重，并会使土地染上个人的和情感的色彩，这是确切无疑的。不过，这种“情感”特征大概是次要的，而它的社会基础则是首要的，后者的消失会带来前者的消失。与整个传统思潮相反，随着与新的技术经济条件相适应的新的社会法律结构在更多的“农民”地区普遍建立起来，这个假说将很容易受到心理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验证。另外，年轻一代的农业劳动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趋向于在自己的理性的、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自己祖辈的思想观念之间达成妥协。如果对土地的兴趣和依恋真的随年龄而来，如果青年人心中盼望的新的法律经济体系给他们留下的是一些失望，那么在那些认为自己身上没有存留一丝土地情感的人当中，很多人可能会在将来发现土地恋的某种意义，而在今天，他们把这种土地恋如此粗暴地抛弃掉了。

农民为了使他那块独一无二的土地能够丰产，努力去掌握传统的技术，因为这些技术构成了一个由祖辈几代人整理、检验过的耕作工艺系统。在他从自己的田地获得知识的同时，他的父亲也把自己的技术和方法传授给他。在一些地区，农业系统在中世纪末就达到了自我平衡和相当完善的状态。那些被从新大陆引进的植物只是补充和完善了这一系统，但既没改变它的结构，又没有改变它的逻辑。

在一个经过几个世纪的逐步改进和不断完善的复杂系统里，各种技术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此外，一个社会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农艺学知识以及该社会掌握的工具和技术，二是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三是社会本身的结构。这三个方面之间存在着一些结构性和相互性的关系。农学家和地理学家已描述了很多耕作系统，已能够使这

个概念精确化，并把它定义为“一种种植和饲养的组合形式，一种耕种土地的方式，一种通过互补关系构成整体的乡村配置方法，它可以确保每年的收入在总体上达到平均水平，并使系统的每个组成部分通过互利关系与其它的组成部分相联系”。^①

自从各种不同的临时耕作和土地休闲形式消失之后，轮作成为组合形式的主要成分。在前者依然存在的地方，它们或者已成为过时的形式，或者是为了适应非常特殊的自然环境的需要。在土地轮作中，通过交替种植需经常除草松土的作物和可以再生氮的作物以及饲料作物，可以使地力不被耗尽。选择作物的自由和延长或缩短生长周期的可能性使轮作具有某种弹性，但轮作必须遵循能够保障土地肥沃的基本节奏。

轮作的完善和土地休闲的取消是近两个世纪来农艺学的重大成果。现在，土壤学和化学的发展已可以使农业劳动者摆脱这种束缚，可以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多年种植同一作物，利用化肥向土地提供植物生长所需的养料。拥有大机器的现代农业劳动者，借助于化学肥料，年复一年地在同一块土地上生产玉米，无须与任何别的作物或饲养业进行协作配合，这奇怪地令人想起了印第安的农民，后者每年用他们的掘地木棒在一块新近烧荒施肥的林地里种植玉米。现在耕作不再移动地点，肥料取代了烧荒肥田，但人和土地的关系仍属于同一类别：重复的单一种植。与此相反，家庭的多种经营者从事各种轮作生产，巧妙地把这些生产组合成一种并入耕作系统的轮作方式。现代农艺学的进步是与农民的农业改进措

① 乔治，1956年，第70~84页。

施背道而驰的。

在种植业和饲养业的关系中，人们可以观察到同样的反复现象。在过去的农业系统中，种植业和饲养业是比较独立的，近几个世纪的农艺学使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过去，在法国的大多数地区（以及今天的农业落后地区），人们往往是在广阔的牧场上大群饲养牛羊，独立于小农经营，小农经营主要是从事种植生产和小畜禽饲养（家禽、猪）。在小农经营中，拉车的牲畜常常成为主要的大牲口：当母牛被套在车辕上时，人们无法把拉车的牲畜和产乳的牲畜区别开来。而且，小羊群放牧在路边，在没有耕种的空地，在牧场或休闲田里乱闯。牲畜饲养者和农业劳动者之间的冲突是经常发生的^①。

近一个世纪来，农业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饲养业被逐步引入小农经营和并入他们的耕作系统：产乳的母牛把它们的牵引角色让给公牛和马，后来又让给了拖拉机；它们吃的是在田地里人工种植的草料，并以厩肥给这些田地带来肥力。目前坚持把自然牧场并入长期轮作的趋向是这个发展过程的最终结果。与此同时，交通的便利，农艺学和核算方法的进步倾向于促使种植业和饲养业重新分离：在最肥沃的土地上集约耕作，在畜棚和牧场里饲养产肉、奶的牲畜（由于“自由圈养”而弄得混在一起），在粗放型牧场上从事生殖性饲养业。

杰出农民的全部艺术在于能够尽可能广泛地发挥种植业和饲养业的作用，把它们并入同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类生产中在别人看来的副产品，并通过各

^① 例如可参见斯克拉非，1959年，第167~180页及其它一些地方。

种精巧的计算，使人们在恶劣气候和收成不均的情况下具有生活保障。这样，连续几代人的耕作努力是与这样一种观念相矛盾的：一切变化都可能扰乱已有的平衡，引进最微小的新事物也是冒险的，人们总是有可能使平衡解体，而不是使它完善。

* * *

时间在农村和城市里并不具有同样的价值。很久以来，这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居利维（18世纪爱尔兰小说《居利维游记》的主人公——译注）很费劲地向小人国里的人解释他的手表的用途，因为他说，不看表就什么都无法进行。这些小人国里的人因而得出结论说，那表是他的上帝。进出工厂时敲打考勤钟的惯例大概会引导人们对现代集体农主进行类似的观察。事实上，农业劳动者是在一定的时间界限中生活、思考和作出决定的，这种时间界限不仅仅是自然周期和大气条件强加给农业劳动者的，而且也是、还可能主要是传统文化的遗产^①。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弄清楚自然在何种程度上把它的时间强加于传统文明，也不是要说明传统文明为何能够塑造时间，而只是指出时间在法国农民社会中所具有的根本特点，以便阐明当代农业劳动者的某些反应。

在钟表几乎还未传入的农村，测量时间的主要工具是日历，日历规定了农业生活和宗教生活的重要日子，这二者往往被混杂在一起。由于对古代宗教日历和巫术日历的研究，因此于贝尔和毛斯概括出传统社会中表现时间的一些重要特点^②。

^① 弗利德曼，1966年，第22~24页；费布沃，1942年，第426~434页；古尔维奇，1958年；埃万-普里查，1940，第94~108页。

^② 于贝尔和毛斯，1929年。

这些古历测量时间的方法与现代日历不同，后者把年代划分为长度相等的月和日。古历是通过一些使时间持续性中断的节日和重要日子来使时间“具有节奏”。由此可见，时间是一个至少同时带有质的特性和量的特性的概念：它的组成部分不能无限分割成相等的单位。时间的每一个细分的部分都被包括在两个节日或两个重要日子之间，被视为一个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和自身存在的整体，因此不能被分割成更小的单位。这些细分的部分可以被看作是相同的，即便它们的时间长短显然是不同的。这样，在量上不等的的时间被感受和体验为相等的，反之，在量上相等的时间被感受和体验为不等的。卡比利亚(阿尔及利亚的山区——译注)的农民说：“时刻就是一刻。”换句话说，“每一个时间单位都是一个与其它时间单位并置的不可分的整体”^①。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说时间不是一个量，但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在它的所有部分都是同质的量，不是一个始终可以与自身比较并能精确测定的量。在关于时间的评价中，除了天赋、机会、持续、恒定、相似等方面的考虑外，还有其他的因素起作用。时间的单位不是测量的单位，而是一种节奏的单位，在这种节奏中，多种多样的现象交替更迭，周期性地返回到同样的现象。一句话，日历是“时间的质的密码”。事实上，古代年历的主要功能是标出吉日和凶日以及做某件事情的有利时期：例如，人们若想确保好的收成必须播种某种植物的时期，或者应当洗衣服以便使衣服能够洗得干净的日子。古历的每个日子都用一个圣徒的名字命名，从而使每个日子在某种意义上个体化和人格化了。每个日子都有自己

① 布尔迪厄，1963年，第59页。

的生命和独特的身份：圣约翰不同于圣马丁或圣尼古拉^①。

换句话说，与其说时间是可以赋予人类生活一种维度的抽象观念，不如说它是一个实际经验的序列。对于其劳动受季节和大气条件支配的农业劳动者来说，现代日历的传播和它所表达的时间观念的传播并没有取代古老的观念。人们在秋天耕种，在夏天收获，但季节可能会“提前”或“迟到”。因此，人们不会连续两年在同一时期干同样的活；如果在某个地区，所有的播种通常应当在诸圣瞻礼节（天主教祭圣的节日，在每年公历的11月1日那天——译注）时结束，而在某些年份，播种延续到了圣马丁日（一般为公历的1月30日——译注）之后，那这或者是因为人们进行收获的时间过晚了，或者是因为水灾或旱灾使人无法在惯常的时期下田。所以，真实体验的时间与日历的时间永远不是完全同步的，其证据是，限定这些时间单位的日期（特别是不确定的日期）是随地区而变动的，在法国西部的多林地区，特别容易变动。当然，新技术的引进（如脱粒机）也导致这类日期的某些变更^②。

再者，季节这个词的确切意义是什么？当然，四季在农民对1年时间的划分中是重要的。但季节也表明了植物的生长状态。人们常常用季节来称谓各种不同的劳动时期，如播种季节、草料收割季节、收获季节。我们在这儿只列举具有最明确定义的季节，然而，这些季节在不同的年份、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经营中所持续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随大气条件和耕作系统而发生变化。它们大概趋向于成为一些在时间上不可分割的、不相等的单位，但实际上这些单位却被人们体验为相等的。最后，季节甚至可以表示它的产品：收获，如

① 可参见利维叶和马热的著作，1943年。

② 马热，1942年。

人们常说迎来了“丰年”或“好季节”。

在过去的农业实践中，佣人和短工的工资大概是标示时间的价值的最好指数。用货币这个始终相等的单位来衡量时间这个易变的单位，是一种少有的情况。季工在从圣约翰日到诸圣瞻礼节的夏季租种土地，但他的工资几乎与全年租种土地的人一样多：夏季的4个月几乎与全年的时间具有同样的“价值”。短工对这一点很清楚，他在整个冬季都没有工作，每年只有100或150个劳动日。因此，在某些方面，劳动是时间度量。

关于农历的研究^①显示了那些脱离太阳月的节奏的复杂情况和太阴月的重要性，后者仍有助于完善农历这种时间刻度。只有一些细致的调查可以告诉我们，这些不同的单位和不同的节奏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在法国的每个乡村社会它们是如何被感知和体验的。

* * *

星期大概是最稳固、最能按其本来意义来体验的时间单位，特别是在星期天与其他日子有所区别的时候。在宗教活动普遍的地区，一周的全部社会生活都是围绕主日弥撒来组织的，特别是在居住分散的地区，礼拜日弥撒是离开农田和会见邻居的主要时机。在其他的地区，星期天是不劳动的日子，这就足以使其在整个以劳动为主导的社会中显示出独特性：即便是在从事饲养业的地区，由于牲畜需要时常的照料，所以也不总是能够允许有不同于常日的时间表。今天，“闲暇”进入农村的生活，这将会重新给予星期天一种特有的价值，星期天不再只是不劳动和社会交往的日子，它还成为

^① 很多地区性的研究，特别是地理学家的研究，都含有对农业劳动日历的分析。

人们进行消遣活动的日子。这种观察对于男子特别是青年来说是恰如其分的，对于妇女来说，其真实性就差得多了：她们的家务活经常是很繁重的，要准备丰盛的饭菜，要做积累下的并被视作休息的杂活（例如缝缝补补），可能还要参加弥撒和帮男人干活。然而，她们也同样认为，星期天是不同的，因为它明显地标出一周的节奏。

尽管存在着这种外表上的规律性（每周6天加星期日），星期并不是一个不变的单位，因为它是由“天”组成的，“天”是根据太阳日的长短和完成工作的多少而具有根本变化的时间单位。人们在冬天睡觉的时间比在夏天长得多，特别是夏天的紧张劳动和冬天的相对闲暇形成了鲜明对照。过去，晚上在田野里劳动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希腊的谚语，“白昼起床时瞥了一眼黑夜干的活，顿时哈哈大笑”。今天，太阳的起落不再是人们一天当中在室外活动的限定时期，由于有了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照明灯，室外活动时间可以延长到深夜。同样，在室内，当人们处在需要节省拥有的少量照明材料的年代里，只有微弱的火光可以使人们在冬天漫长的晚上聊天、编筐、做木鞋或剥栗子。现在，无论在冬天还是夏天，电可以使人们在牲口棚和住宅里从事一切室内劳动。这样，技术的进步拉长了夏天的长白昼，但未能使冬天短白昼的活动增加，从而加深了白昼节奏的自然的和传统的不均等。

此外，这种节奏既不是有规律的，也不是可预见的。因为劳动受大气条件的支配。根据天气情况，今年秋季的一天有别于往年秋季的一天，就像它有别于冬季的一天或夏季的一天一样；如果土地的情况允许，季节提前，农业劳动者驾驶拖拉机收割的时间会比他通常在夏天驾驶拖拉机收割的时间更长；与此相反，如果天气使他无法下地劳动，他就只好

修整树木或修理农具。同一个月、同一个季节中的一天在这一年可能代表着16个小时的耕作劳动，而在翌年，则可能代表着6小时或者8小时的杂活和照料牲畜的劳动。

尽管一天的长短非常容易变化，但它仍是一个时间“单位”，因为它被包含在两个夜晚之间。对于这个总是容易变化的量值单位，我们应深入地研究其模棱两可的根本特征。对它进一步地细分，大概会有助于我们的研究。在很多地区，冬天的一天被一分为二，而夏天的一天被一分为四：夜晚隔10小时和白天隔4小时小吃一次是夏天的一种习惯，目的在于分割过长的白昼。在那些每个半天通常由农庄的活和地里的活两部分组成的地区，一天的时间被吃饭分隔成4部分，并以午餐为中轴形成对称的活动：照料牲畜，小吃，在田地里劳动；午餐，在田地里劳动，小吃，照料牲畜。这些细分的部分是根据时期的不同而变化的，并且从属于白昼的时间单位，因为后者根据季节和劳动情况给予细分的部分以量值。

对于妇女来说^①，早晨和晚上的差别更为明显。除了夏天的早晨需要帮助男人下田干活，妇女在早晨总是干一些日常的和不变的家务活：喂牲畜、伺候孩子上学、收拾房间和做饭。相反，下午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由时间”，因为它可以被用来从事那些每天有点变化的一周一次的工作：洗衣服、烫衣服，等等。而且，时间表是可以被调整的，这使妇女感到有了选择，因而也就感到了一种“自由”。虽然一周的秩序很少被破坏，但洗衣服、烫衣服、修整菜园花园、照料畜群，这些都给日常的时间表带来一种多样性。M·T·德拉利维叶

^① M·T·德拉利维叶，1961年；吉拉尔和巴斯蒂德，1959年。

认为，妇女们对这种多样性非常敏感。

根据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 (IFOP) 在农村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①，女子比男子更感到受时间的影响，而在城市，情况却完全相反。事实上，女性的劳动更繁多、更受限制、更服从于使一天的每个时刻都带有节拍的那些有时限的事情：丈夫要咖啡喝，孩子应准时去上学，饭应当在需要的时候准备好，餐具应当在做别的事之前洗刷完，孩子放学回家，等等。而且，可以说，妇女在农村中似乎不像男人那么与外部世界隔绝，男人们的注意力完全被地里的劳动占据。因此，妇女与“城市的”时间有更多的联系，这是很自然的。

这种简略的分析足以表明，支配着多种耕作者家庭生活的那种时间节奏是复杂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更为专门化的农业。葡萄种植者大概生活在一种“线性的”时间中，更接近城市的时间；相反，对于牲畜饲养者，特别是守护畜群的人，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每天晚上把羊群赶回羊圈的放羊人生活在什么样的时间中呢？

随着机械化的到来，技术的和城市的时间最终闯入了农业劳动，并带来了时间的新单位。时间的新单位最初是伴随脱粒承包人而来的，后者要求按小时收费。很快，拥有机械的农业劳动者帮助邻居耕地也要求按小时收费。现在的青年人都关心自己拖拉机和收割机的效益，他们拿着小本子认真地记下这些机械的工作小时和所消耗的燃料量。由相等的单位组成的抽象时间第一次干预农业劳动；它逐步地改变了由越来越繁多的工作组成的时间刻度。一种时间取代另一种时间的过程通过很多容易被测量的指数反映出来，让社会学家

^① 《民意测验汇编》，1953年。

能够非常清楚地观察到，但是，还没有进行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调查。

在乡村生活中已经存在着钟表时间：每个农户都为自己的厨房里有一个长摆锤的挂钟而自豪，大多数农业劳动者都有手表。根据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的调查^①，1953年，47%的农业劳动者身上不带表（全部人口中，34%的人身上不带表）。在日常生活中，这些记时工具是用来指示一天的进展，而不是精确地确定一项活动的具体时刻、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作为外部文明的见证人，他们只是在与这个文明接触的时机和需要“准时”的时候才用表来“报时”：打发孩子上学，避免误了火车或公共汽车，参加某个会议，等等。在这后一种情况，如果开会的时间是由邻居或家乡的人确定的，每个人都知道没有必要准点到达。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特别是青年人，都希望那些不断增多的会议准时进行，以便“不耽误时间”，这是显示从农民的时间向技术人员的时间过渡的迹象之一。过去，由于交通工具速度慢，人们到镇上去需要一天或半天的时间；在乡政府、合作社或学校，会议要等大家到齐以后才开始。人们利用外出顺便干别的事情和与某些人聊天。现在，人们开摩托车或汽车去开会，以便能在会议开始时到达，如果工作紧张，会后马上离开。在1950年，对于从法国村庄转到美国村庄的乡村调查员来说^②，这种差别是惊人的；今天在每个法国村庄都可以观察到这种差别。

然而，不应当从这一分析中得出结论说，过去那种“浮

^① 《民意测验汇编》，1953年。

^② 孟德拉斯，1953年，第135页。

动的和沉睡的”^①、不精确的和缓慢的时间没有任何价值。如果说地中海人、特别是希腊人“消磨时光”，那么同样，墨西哥的农民总是准备把他们今天能够不做事放到明天去做。相反，大多数法国农民不容许浪费时间。时间与劳动的体验是如此的紧密相连，以致于时间的浪费就等于劳动的浪费，把今天可以做的事情推迟到明天是懒惰的行为。这两个例子足以说明，满足于对两种极端的类型进行简单的对比是多么的危险：在每一种文明中，时间的概念都是与价值体系和日常生活结构相联系的。在法国，应当逐个地区地进行调查，以便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地区迅速地接受了技术人员时间的某些成分，而另一些地区则对这种时间表现得非常无动于衷。

* * *

心理学家们从他们的角度指出了在时间表象和空间表象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密切的关系^②。在农业劳动中，这两个方面的联系特别明显。古代的面积测量方法证明了这种联系：儒纳尔(journal，即古代土地面积单位，与日志、日报同一词多义——译注)相当于一人一天能耕种的面积。同样人们经常在估计距离时使用时间：到村庄去要步行两小时的路程，或者，坐车要行不到1小时的路程。奇怪的是，现代技术的引进使得这种习惯延续下来，因为劳动承包人是按照拖拉机或收割脱粒机的工作小时来计算的，而不以耕种或收割的公顷数来计算。

空间如果不以劳动时间来测量的话，就是以完成的劳动量来测量，例如以使用的种子量来测量：塞泰雷(古时土地面

① 费布沃，1942年，第426页。

② 福莱斯，1953年；皮亚杰，1946年。

积单位，同时又是古时谷物容量单位，约合150~300升——译注）相当于用一塞泰雷种子播种的面积。而且，今天熟悉公制度量的农民习惯于参照自己的劳动经验来估价他的土地的面积：“这牧场约有1公顷，因为我施了200升的肥”。

由此可见，空间和时间一样，也不被视为可以借助通用单位进行无限分割的抽象面积：它始终是一种真实的、具体的，可以通过劳动的反复体验来感知的广延。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不同的村庄，儒纳尔和塞泰雷会因耕作方法、土地质量以及耕种习惯而有所变化：在一天的时间里，人们使用摆杆步犁、牛犁或锹所耕种的土地在量上是不同的；而且，在硬土或软土上，用步犁耕的地在面积上也是不同的；最后，在一些地区，人们种得较密（1公顷用1公担多种子），而在另一些地区，人们种得较稀。

在有的情况下，空间是用时间来测量的，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空间是用劳动量来测量，在还有的情况下，时间本身用劳动来测量：根据一定地区农业劳动者的经验，日常生活的这三个“维度”之间存在着一些逻辑的和真实的关系。这似乎已是确定的事实：劳动是主要的测量工具，一般来说，是它赋予时间和空间以其自身的价值。

我们在这儿碰到与工厂里的劳动安排存在着的一个根本区别，在工厂里，任意规定的作息表支配着劳动时间的开始和结束，这些时间被划分为不变的单位：小时，分钟，8小时1天，其间穿插着午餐和车间休息。在田地里则相反，作息时间表受需要完成的劳动的支配，根据劳动的进程、天气的情况甚至可能是劳动者的疲劳状况，作息表始终是可以变动的。当农业劳动者是经营主时，他就是时间的主人：他自己确定他的作息表和劳动节奏。

这种自由受到大气情况和需要完成的劳动的制约，而且选择并非每天都是自觉的和合理的。前一天晚上开始的一项劳动必须在次日接着干，根据自然和固有习惯确定的秩序，各项劳动自然地前后相继：每年，这片饲料草地在另一片饲料草地之后收割，无须估计草的成熟程度，因为“人们总是这样做”。开始收获、收割饲料草和播种经常都是一种群体行为。

过去，在处于共同生活状态的地区，劳动鼓号的时间是由全体村民确定的，全体农业劳动者在同一天进入牧场、麦田或休闲田。今天，这些集体的规则不再被遵守了，但有时已有的习惯通过数代人延续下来。在很多村庄，人们仍然看到，收割的人不用协商，就在同一天割麦。有时集体性的竞争也产生同样的结果：宜人的季节一开始，各家庭之间就重新展开真正的竞争，“应该干活最多的那一家”，走在别人的前面，如果落后了，就会被人指责为懒汉。这样几乎总是如此，每年有一个家庭带头开始每项劳动，从而决定了整个村庄的日程表。这个牵头人的角色可能是他的田地情况赋予他的，因为他的田地比别人的成熟得早，也可能是他的社会地位赋予他的，因为他的社会地位使他成为村庄生活中“公正判断”标准：“马尔丁一家今天早晨已把打捆机推出来了。如果我们不很快收割完牧草，我们就耽误了。”

这样，在很长的时期里，特别是在劳动紧张的时候，经营者虽然是自己时间表的主人，但实际上却要服从习惯的安排，他对这种安排的服从是很刻板的，就好像他并非是自己时间表的主人一样。相反，在不太紧张或相对闲散的时候，农业劳动者又深切地感到他自己选择的自由。为了不闲着，他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喂养牲畜和把它们身体洗刷干净，可以

悠然自得地仔细拾掇家具的把柄或修理他的四轮大车。他可以去整修树木、修剪篱笆或疏通水沟。每天上午的劳动是雷同的，下午的劳动则有一些变化和有一定的选择，我们在谈及妇女的日常时间表时已经指出过这种交替的劳动形式。劳动极度紧张的“硬时间”与可以自由、放松的“软时间”交替出现，这无疑是农业劳动者所体验的时间节奏的特征之一。

劳动者对于时间的感受在“硬”时期和“软”时期肯定是很不同的，但心理学家们没有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如果真的像心理学家们指出的那样，一切因素只要会促使增加或减少明显变化的数目，都会延长或缩短表象时间^①，那么，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设：夏天的重活不像冬天的各种杂活那样持续那么长的时间。所有关于冬天漫长的看法都可以证实这个假定，虽然这些看法显然也表达了无生气的季节引起的无精打采的感觉。正像巴斯拉尔说的：“当人们感到时间太长的時候，才能发现时间的长度。”但是，还必须把对阶段的整体时间感觉和在劳动自身过程中的时间感觉区别开来。干重活的阶段可能会显得较短，虽然在这个时期人们会感到劳动持续的时间很长。

正因为对农业劳动者来说，劳动和闲暇之间、生产和消费之间都不存在明显的差别，所以时间才会有如此不同的频度。在收获季节1天的16小时就是他们参加紧张的生产劳动的16小时，相反，用来修理家具或修剪篱笆的时间可以被视为“积极的”消遣，就像工人下班后在家里修修弄弄或整理花园。但如劈柴这样一些劳动，究竟是“生产性劳动”还是与消费和家庭生活相联系的活动呢？当农业经营者在晚上认真阅

^① 福莱斯，1953年，见第216页及以下各页。

读技术周报以便改进技术，或仔细阅读日报以便弄清政府的农业政策时，他是像工人或雇员一样地读报吗？或者相反，他是一个在深明底细的情况下为了作出决策而了解情况的经营主？

用测量车间劳动或办公室工作的方法和范畴来测量农业劳动是不行的，为了说明这样做是多么的徒劳，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在这方面，农业劳动者的状况更接近的是自由职业者或脑力劳动者，而不是雇员和工人。我们已经指出，技术人员的时间愈来愈深入地渗入农业生活中的某些工作，但它在那儿永远不会扮演它在工业中所扮演的角色。

* * *

工厂车间里的劳动结构建立在四个根本要素之上：一是工厂的等级制，在这种制度中，组织者和指挥者并不是执行者；二是非常细致的劳动分工；三是“技术人员的”时间，它被视为一种抽象的和无形的量，可以被分成很小的实用单位；最后是比较统一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工具。

分和秒是计时员用来计算必要时间的时间单位。控制着劳动的不仅仅是钟表的分针，而且还有精密计时的秒针。不过，我们已经看到，时间单位刚刚开始进入农业生活。人们在农场里劳动可以既不带表也不带钟，不管怎样，真正用的只是小时的指针。因此，不事先告诉农业劳动者分和秒的价值，就很难科学地组织起他们的劳动。科学安排农业劳动研究所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农业劳动进行测时，但他们的计算结果只对雇有很多专业人员的“工业化”大企业有用，或对那些从中寻找分析准则的经济学家有用。

为了使劳动的科学安排和测定时间具有意义，应当改变时间、空间和劳动的整个关联系统：要使时间的界限不再受

劳动的规定，而是相反。甚至在今天，人们也不能要求一个农业经营者过分详细地记录下他的劳动和过分精确地记录下他度过的时间。所有的记录都是针对一些具体的操作，如耕地花费的时间，种马铃薯花费的时间，而不是针对操作的全部时间：准备，行路，在田地里从事实际劳动的各个阶段。当然，最进步的青年农业劳动者拿着本子忠实地记录下他们的日常活动，但这是为了“合理地”使用机器，而不是为了使他们的劳动“合理化”。这种时间核算对需要费用的（分期偿还贷款、燃料，等等）机器是有益的，但对“什么都不花费”的人力劳动和靠腿行进的拉车牲口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用处。

牲畜的节奏曾是农业劳动的一个约束条件。公牛和母牛的行动都是非常缓慢的。只要在大多数劳动中工具劳动不被机械化劳动所取代，那么人的节奏将依然是最重要的节奏。然而，在管理方面进行的调查表明，平均来看，近2/3的劳动仍然是用工具完成的。最后，虽然有重复的可能，但仍须强调，时间在夏天和在冬天并不具有同样的价值。J·松巴德洛威和F·莫望注意到：“冬天有很多空闲的时间，甚至太多了，以致于人们用一些效用令人怀疑的劳动来打发日子，在缺乏有组织的消遣的情况下，人们慢腾腾地干活，以便消磨时间。这样，人们采用了一种似乎不再适应我们时代需要的劳动节奏。”^①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人们会理解，最具有现代化观念的青年农业劳动者重视拖拉机的工作计时，但他们不关心对自己的动作进行计时。

此外，即便是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也会感到非常的失望。经济学家们也承认，他们制定的规范都是暂时性的，这

^① 松巴德洛威和莫望，1954年，第59页。

主要是由于劳动条件很容易变化。与工厂里的工人不同，农业劳动者不是在一个人工的、合理组织的空间里为了最佳的劳动效益而劳动。完全相反，他使用的是一个本质上多变的自然空间，这个空间是“非理性的”，要受到反复无常的气候影响。如果经过5天的日照，土壤的表层就会变得很硬，以致于在同一块田地里，给甜菜除草的人的效率会降低一半，土地的形式对效率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同样的面积里，当田地的长度4倍于宽度时，耕地的时间会减少1/3以上。农民很清楚地知道，翻耕地角和掉转牛犁是要耽误时间的，他们一直倾向于把自己的田地延长成带状，特别是在牛犁是传统工具的地区。地势和土质的重要性也不次于田地的形状和大小。最后，工具、机器和耕作方法是随地区而变化的，直到今天，它们的标准化程度仍然很低。

这些不同的因素根据经营的规模以不同的方式重新组合。较大规模的经营具有更多的田地和更好的机械工具，经济学家们在这面积累了很多资料。在夏托林盆地，种1公顷马铃薯，在8公顷的经营规模中，需要864工时，而在25公顷的经营规模中，只需要685工时；然而，种植马铃薯的耕作几乎完全是人工劳动（只有15%的工时是机器劳动）。对于1/3以上的劳动由机器完成的1公顷小麦来说，差别自然更大了：在小规模经营中，种植需要158工时，而在较大规模的经营中，只需要88工时^①。这样，在类似的条件下根据经营的规模，劳动的时间会翻1倍，虽然这些都是指小型家庭经营。

农业劳动条件的变化无常是惊人的，我们应当注意到海

^① 松巴德洛威和莫望，第52~53页。

此而造成的困难，但这些困难从理论上说并不是无法克服的。进行更多的观察可以掌握到更多的变量，现代的计算机可以轻而易举地处理这些数据。因此，制定大量各种各样的准则表，使它们足以适用于一切情况，这不是不可能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准则对经营者的用处是什么：向他证明他在这种或那种活动中花费的时间太多了？为了干得更快，他可以或者加快劳动节奏，消除无用时间，或者调整工场，简化行为方式。

在工厂里，定额的计算和劳动节奏的加快造成雇主和工人之间经常发生争讼。时间的减少对于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与管理相适应的工人数量和工人们在1小时中完成的工作量会使管理工作成倍地增加。在农村中则相反，由于雇主和工人是同一个人，节奏的加快如果使“劳动者”过于劳苦，那对“雇主”来说似乎也没有什么益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赢利情况是不会因此而改变的。而且，由于劳动分工远没有工厂那么细，农业劳动者在1小时中要相继完成不同的工作，因此每个人的每项活动都必须按照一系列的准则进行，而不是很多人按照一项准则大量地重复进行同一项工作。最后，在夏天加快节奏越是有益，在冬天闲得无事时加快节奏就越显得不合时宜。然而，怎么能够想象出根据季节和工作的忙碌情况而变化的准则呢？那将不再成其为准则了。

与此相反，实验表明，在几乎所有的农庄，通过更合理地治理各种“车间”，人们可以减少耽误的时间和简化劳动。通过减少小块土地的数量和使土地更靠近农庄，土地改造有时可以赢得大量的时间；不幸的是，如果不触及土地结构和家庭经营的自主权，这样做在通常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对农庄建筑物和庭院的治理常常无需过多的花费就能够实现，

可赢得相当可观的时间，特别是在饲养业经营中。此外，很多农业劳动者通过简化自己的行为方式也可以节省力气。但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时间的节奏、时间的准则和必要时间，而在于对劳动条件的治理或教给劳动者较好的习惯。

换句话说，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房屋和才干的农业劳动者经常会对改造这房屋和增进这才干感兴趣。为了实现这一点，他必须求助于建筑师和培训教师，但肯定不会去求助贝多的测时员[贝多(1888~1944年)是法国工程师，曾制订过一个适用于各种劳动的劳动时间测量系统——译注]。

我们在这里涉及到农业职业的一个根本特点。在家庭经营中，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纪律是从现有的自然条件中产生的，劳动者根据这些条件制定劳动纪律，并用这种纪律来约束自己。为自己制定纪律，并服从这一纪律，这种能力是农业劳动者在家庭经营中所需要的基本素质。J·松巴德洛威和F·莫望通过细致观察得出结论说：“40岁以上的小耕作者看起来与劳动的一切合理化几乎是格格不入的：他宁愿一天多工作两个小时，也不愿用纪律来约束自己和从一天要从事的不同活动中节省几分钟。”

要农民在劳动细节上遵守纪律会使他们感到困难和厌恶，但农民的干劲所决定的总体劳动的纪律会补偿这一点：在农民看来，最高的价值是劳动，劳动热情就是最大的赞扬。M·西拜德曾一再指出，对于一个真正的农民来说，“勇敢”就是勤劳。这样以来，脱离劳动者对劳动进行的分析就几乎没有意义了，纯粹关于合理化、计量和时间的分析只是指出，对于农业劳动者来说，劳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干劲的问题：如果他劳动得很多，他就能博得自尊和别人的尊重。农业劳动者正是从这些关系上来看待他的劳动，前面的所有分析都

是要强调指出这种“非理性”认识方法的“合理性”。

在企业式管理中，农业劳动者从类似于工厂雇主的角度向自己提出时间的问题，不过与工厂雇主仍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他要服从他几乎无法控制的自然节奏。这种比较虽然具有启发性，但出于同一原因，这种比较和农业劳动与工业劳动之间的比较一样，也是不正确的。

对于研究过家庭经营中劳动问题的经济学家来说，关键的问题是要如何保证空闲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一方面要增加低峰时期的可实现的劳动，另一方面要减少高峰时期的劳动。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把可延期的劳动与不可延期的劳动区别开来；他们的所有努力都是针对后者的。出于同样的忧虑，农业劳动者作出的反应是过量地购买机械设备。饲草入仓机每年只使用几天，它可能永远不会赚回本钱；但这并不重要，只要它可以使饲草及时入仓，不耽误饲草收获。如果需要的话，这又一次告诉我们，从经济上说，在家庭经营中，时间在1年所有日子中的价值是不同的。由此可见，制定一个年度劳动程序表是极为困难的，但这是经营管理的必要条件。

Dr·克雷赫和随后的C·勒布尔^①建议农业劳动者遵循他们古老的习惯，并通过把他们所说的“季节”改称为“劳动集合”来改进这些习惯。所谓“劳动集合”是年度的细分部分，它既要考虑到为了完成某项劳动时植物生长周期所容许的天数，也要考虑到在此期间农业经营中可以自由支配的劳动天数；这些细分的部分包括各种种植业和饲养业的所有劳动，

^① 勒布尔，1957年。

“劳动集合”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在德国，人们可以区分出6个根据最重要的劳动确定的集合：

1. 春播，冬季中耕作物的收获；
2. 维护需经常除草松土的作物，收获牧草；
3. 收获早熟谷物；
4. 收获晚熟谷物；
5. 收获需经常除草松土的作物；
6. 秋末劳动。

很清楚，法国的每个地区都需要对集合的界限作特殊的规定。根据克雷赫“相对于旨在对农业劳动进行分别研究的旧方法来说，集合系统体现了一种重要的简化，同时也更为准确，因为它更忠实地反映了实践的条件”。除了在农业劳动者的身旁研究他们当前的实践，没有其它确定这些集合的方法。众多的观察记录可以使我们在分析中分解一个季节，区分开可延期的劳动和不可延期的劳动；然后，根据气象条件和劳动标准，确定集合的界限和精确的内容，从而重组集合。

人们颇受启示地观察到，在经过长期的摸索之后，农业劳动的科学安排终于放弃了对工业劳动科学结构的模仿，重新采用农民自己安排劳动的方式。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农业劳动的科学安排不再关心从事劳动的农业劳动者，而是打算帮助经营主管理好他的劳动力资源。实际上，管理的改进可以带来生产的增长或改善，因而也就带来收益的增加，人们不能指望劳动节奏的加快会带来这样的结果，正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

经济学家们建议杰出的农业管理人预先测算自己的劳力需要，但这种测算受到自然生长周期的复杂情况的限制，而只

要农业革命的进步还未达到有效地控制生物过程的水平，农业生产就仍然要严格服从自然生长周期。用经过严格计算的饲料喂养关在笼子里的雏鸡，人们在 8 周的时间里就可把它们催成可食鸡，而用“农妇的”方法则需要 3 个月。但这种例子是特殊的。秋季播种的小麦在次年的夏天收获，这就像是赫西俄德的时间（赫西俄德是古希腊公元前 8 世纪诗人，代表作长诗《农作与日子》介绍了许多农事知识——译注），而且，人们不能缩短母牛和雌羊的妊娠期。受季节的限制，植物生长周期是不变的；一个品种几乎并不比别的品种成熟得更早。

相反，人们可以变动牲畜的生长周期，例如，在相应的时候把公羊放进羊群，就可在所希望的时期得到小羊羔，或者冬天给鸡棚提供光照和加温，就可以使母鸡在 12 月份也下蛋。人们可以给出生三四天的小猪断奶，以便使母猪能够再次交配，使它的妊娠功能不停地被运用。但同样的是，农业劳动者具有很少的自由来组织他的各种生产的周期，以便把需要完成的全部劳动尽可能平均地分配到年度的不同时期。他越是需要考虑市场的情况，他的行动自由就越少，而市场总是给予 12 月份的鸡蛋更好的价格，就像给予一切时鲜果菜更好的价格一样。

年度周期或更短的周期都是很重要的，但也应重视更长的周期。奶牛从生下来到成熟需要 3 年，奶羊需要两年。植物的年度生长周期实际上是多年周期，因为这些周期一般都并入轮作系统；3 年轮作大概仍是最普通的，但饲草的种植使轮作经常延长到 5 ~ 7 年。

此外，收获的不平均使人们无法估计一块田地里一种经营的收获情况，甚至对 2 块或 3 块田地也无法估计；只有估

计10年的平均收益才是有意义的。我们不要忘记佃农的租约是9年：等于3个3年轮作。农学家对佃租的重要谴责之一，就是9年的时间不足以使农民具有肥田的期望：要想使土地得到它所需要的一切照料，必须使佃农具有长期的考虑。

最后，树木的生产期至少30年，在肉食鸡的8周生长期和这30年之间，农业生产周期显示出惊人的多样性。农业生产周期具有无限多样的组合形式，其间的选择是棘手的，但对于经营的收益来说，这又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由此可见，在农业劳动者担任自己资源的组织者角色时，年度和年度细分的部分是他最熟悉的时间单位，而当他考虑自己企业的管理时，是以数年或年度序列为单位的。然而，我们已指出过，当他作为劳动者的时候，小时单位对他来说只有很小的意义。因此，他是生活在一种非常漫长的和变化很小的时间中。

贝尔诺和布朗卡曾对他们在努维尔村的发现感到非常震惊，那里农民的时间和工人的时间是完全对立的，农民的时间是久远的、连续的，而工人的是短暂的、间断的：“对于工人来说，劳动是以小时为单位来计时，以天数来计算，以更半月拿一次报酬。但对于所有的乡下人来说，特别是对于佃农来说，劳动是以年为单位来计时的。”^①

在一定范围内，人们可以确信，代(30~40年)是农业生活的主要时间维度，因为家庭财产从一代传递到另一代是家庭父亲的出色管理得到最终评价的最后时刻：他能使所有的孩子安家立业并传递给其中一个孩子一份完整的或扩大了

^① 贝尔诺和布朗卡，1953年，第328页。

产业吗？过去，毫无疑问，这是最主要的忧虑。今天，技术进步和经济形势发展得太快，这种30年的周期已部分地成为幻想。但今天的农业劳动者仍习惯于在这类传统的时间框架中考虑问题。在调查者看来，在非洲，“我们几乎无法像一个生活期望低于我们的人那样来看待现在、过去和将来之间的关系”^①。对于一个柏柏尔的农民来说，动词只有两种时态：完成过去时和未完成过去时，前者表示过去时间，后者表示现在将来时间。将来只是相对于现在而存在。人们可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但一切预测都是无用的，甚至是无意义的和不可能的^②。

代的相继曾是乡村社会的基本节奏，它使时间的连续性具有意义，这种时间的连续性是由连续不断的更新构成的。我们已用大量事例表明，无论是天、季节、年度或代，所有这些时间单位都是一些前后相继的、纠缠在一起的，总是以同一面目重复出现的“整体”。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无疑会把时间看作在本质上是循环的。用形象的语言说，田野的永恒秩序是由事物的永恒轮回构成的。

技术变革和经济变革的导入打破了这种秩序，时间开始呈现出线性的征象。儿子将不再完全重复他父亲在同一时期所做的事情。父亲在临终的时候将会感到，留下的家庭经营是处在进步当中的，因而是未完成的；而在过去，他离去时已经“完成了循环”，“结束了他的时代”，留给儿子做的只是接班而已。由进步导入的这种新的线性时间观反过来又促进了变化和进步。这种时间呈现方式的转变与正在进行的技术革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细致的研究不能忽略对这些联系的

① 库蒂，1966年，第5页。

② 布尔迪厄，1963年，第60~64页。

揭示。

然而，农业劳动者大概仍然比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工人更为深刻地感受到时间的连续性。贝尔诺和布朗卡曾强调指出：“过去、现在、将来贯穿于家庭和家产。”所谓家庭，就是由与自己的父亲结合在一起的遗产继承人所构成的序列。“对于工人来说，过去和将来的时间停止得更快，他常常并不熟悉自己的父亲。”^①在农业劳动者看来，将来只是现在和过去的延续，而在工人们看来，父亲的过去常常完全不同于真实的现在，未来是为孩子编造的幻想，是人们期望孩子能够达到的、但并不想知道他如何达到的“境况”：他们从现在的“事实”的层面过渡到未来的“想象”的层面，但观念中向往的生活与现实中真实的生活存在着距离，这个距离显示了农民完全陌生的时间的间断性。当农民在自己的农庄里梦想进步时，这种进步已经进入当前的现实了。

家庭或个人传记作为时间的测量手段是很重要的，这也是农民经验的典型特征。农民倾向于在推定一个外部事件的时间时与他个人的生活事件或家庭的记忆相对比：“人们在我初领圣体那年建立了合作社”。这种倾向显然促进了时间的人格化，并促使人们通过实践经验来感知时间，而不是把时间想象成一种抽象的度量。

家庭记忆得到了集体记忆的补充，从而使一个乡村群体的共同记忆能够回溯到多少有些遥远的过去。贝尔诺和布朗卡以非常形象的方式介绍了努维尔村人的历史观。除了历史的时间之外，还存在着反映在套话之中的不真实的时间：这是“在过去1800年”发生的，或者“当耶稣——基督是乡村警

^① 贝尔诺和布朗卡，1953年，第321~358页。

察的时候”。历史时间从高卢人开始，在此之前海水覆盖着所有地方。在高卢人之后，出现了国王，随后是法国大革命、1870年的战争、铁路(1875年)、玻璃的安装(1880年)、1900年、最后是1914年的世界大战，对于成年人来说，世界大战是个人记忆的起点。以上的罗列表明，努维尔村所特有的集体记忆可回溯到1870年，在此之前，人们主要依赖的是模糊的书本记忆。

人们会很容易地找到一些地区，那里的集体记忆几乎没有超出老年人们的生活记忆，特别是在博恩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在那里，上个世纪在记忆中已不再存在了，被丢弃在过去的迷雾中。在其它的地区则相反，人们谈论法国大革命就像谈论成为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昨天的记忆。在索洛涅地区和旺代地区，朱安党的叛乱或国家财产的拍卖仍然是并入了现时的新近往事；每个家庭对那个时代的态度仍然是划分其所属阶层的依据。如果能制订一种调查方法，测量一下法国各种乡村社会多少有些遥远的集体记忆，那会是很有启发性的。

* * *

这些关于传统农民生活中时间、空间和劳动之间的关系
的看法，足以说明经济理性不能像它适用于工业那样适用于
农业。抽象的、不变的、可分的和可倍增的单位在这儿是很
少存在的。人们仍处在“差不多的宇宙”里，而不是处在精确
的宇宙里^①。我们不太清楚抽象性如何能够在将来的一天征服
由土地、气候、植物、动物和人组成的所有具体性。

对这些具体性的深刻认识造就出有经验的农民，在他们

① 考依列，1962年。

看来，没有两块相同的土地和两头完全一样的牛。此外，劳动不是任何外部纪律强迫进行的，支配着劳动的是劳动者的意识。可以说，“土地感”和“勇气”在传统的农民看来是基本的职业素质。对于由成队的大型机械耕作的大面积平整粮田，人们可以像工厂车间一样来进行分析和管理的，但对于多种生产的家庭经营却不能这样做。

这大概可以说明，为什么法国、苏联或美国通过国家规划来组织粮食生产是不费力的，而饲养业、奶类和肉类实行计划生产后仍停止不前。畜牧学家在生理机制和生物机制的控制方面取得如此迅速的进步，以致在今天进行畜禽的大量生产已成为可能的了。但是，如同植物生产中的情况一样，这种“工业化”会使家庭的经营结构再次遭到怀疑，而这种结构是上个世纪的技术进步留给我们的。

第三章

家庭和经营

在我们的工业化世界里，家庭多种经营是一种类型独特的生产模式，它向其它领域中经济活动的组织原则提出挑战。这方面的所有研究兴趣都是来源于这样的对比：它可以说是以烘托的方式或从相反的方面揭示了一个社会的根本特征，它在这个社会属于异族，但它可能会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个社会。传统的农业既不存在劳动分工，也不存在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以及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分离。

家庭和企业是重叠的：家长同时也就是企业主。而且，他之所以是一方，是因为他是另一方，这种区别本身纯粹是理性上的区别，而不是对现实本来面貌的分析。在大多数活动中，农民同时兼任两者，他的职业和家庭生活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的每个家庭成员同时也是劳动的伙伴：父亲往往掌握着经营的领导权，即便不是这样，他也依然是人们尊敬的或可以接受的顾问；妇女忙于她份内的事，同时参加很多男人的劳动；孩子们每时每刻都在充当艺徒和助手，劳动根据性别和年龄由习惯来安排^①，而不是根据劳动者的才能由生产结构来安排。

^① 参见瓦拉亚克，1942年。

儿子的地位特别能够说明问题。他们的父亲在教给他们职业技能时既是作为父亲，又是作为学徒的师傅，以致孩子们从来就不知道一个训斥、一条建议或一种做事的方法究竟是属于日常生活的领域，还是属于职业生活的领域。父亲的权威的合理性既是由他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由他的职业技能来确证的。青年农民无法从他的学徒过程中清楚地了解到什么是农业劳动者职业以及这个职业所包括的各项技术。所有这些都属于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从长辈那里和自己生来所处的境况中学会的。对他来说，做事的本领和处世之道是同一种经验：在他的孩提和少年生活中，耕作技术与家庭的田地联系在一起，像语言或礼节等其它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技术”一样，耕作技术是在田地里学到的，并纳入一种生活方式。一切使农民的农业活动脱离其它生活活动的努力都是违背现实的，混沌不分是这个现实的根本特性；应当分析和理解现实，而不是抹煞或简化现实。

如果说区分父亲的角色和农业劳动者的角色是不可能的，那后者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也是其它职业难以类比的。在多种生产的企业中，农业劳动者担负着所有的职责，而在其它职业中，这些职责是由许多专门人员分别担任，后者被组织在一个等级化的控制系统中。

对于过去的农民来说，只需要懂得使用锄和镰，懂得操作步犁或牛犁就够了。手工的灵巧和身体的吃苦耐劳是最重要的素质。对于今天的农业劳动者来说，这些素质仍然是首位的，因为他一半以上的工作还是体力劳动。然而，机器增多了，改进了，专门化了，给予人们新的工作：必须安排、修理、调试和操作这些机器。它们增加了劳动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但与此同时，由于它们要求具有新的技能和机械知

识，也使职业复杂化了。驾驶拖拉机、收割脱粒机或耙草打捆机等机械的技能变得至少与使用工具所需的力气和技巧一样重要。总之，农业劳动者始终是持锄的人，但他应同时成为机械师和拖拉机手。

只有一种技能失去了它的重要性：饲养、驯服和驾驭牛或马等拉车牲口的技巧。相反，对赢利牲畜禽的饲养变得越来越科学了。饲养者仍然需要照管畜群，在一种亲近的关系中了解这些牲畜，建立这种亲近的关系需要具有在长期的亲身体会中培育起来的特殊“同情心”。而且，今天他必须能够配制均衡的日需饲料，并在他感到自己缺乏经验和需要进行科学诊断时，懂得及时去请兽医。

要想成为一个“耕作帮工”，懂得使用工具和机器就够了，但这对一个农民来说则不够，因为他还需要熟悉土壤、作物和牲畜。土壤学、植物学和动物学可能都是用来表示各种农学必要知识的大字眼。农民过去只掌握了这些学问的一些基本知识，这是他从父亲那里和自己的劳动经验中得到的。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对土地和牲畜的“感觉”，这种“感觉”始终是必要的，但它应随着技术的发展变得更加科学和更加合理。农业培训越来越朝着改造这种传统经验的方向发展，并利用一些物理学、化学和解剖学等学科的知识为这种已有的经验奠定科学的基础。土壤、作物和畜禽是如此地变化多样，以致使农业劳动者不能满足于某些缺乏理论形态的操作手段。经过品种优选的作物和畜禽，较少具有广泛性，也更容易染上寄生虫和疾病。懂得在各种情况下和在各种时刻及时施肥和妥善处理不再是习惯或嗅觉的问题，而是知识的问题。人们常常不得不求助于技术人员，但在通常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应当成为他自己的技术员。此外，为了能够与兽医和

农业顾问对话，需要掌握一些科学概念。

如果家庭成员较多，或者产业规模相当大，需要雇佣一、二个受薪者，那“雇主”应当善于指挥，懂得给每个人分配工作，保持劳动的节奏，使下属遵守时间表和注意使劳动合乎质量地完成。总之，要成为一个出色的班头，不管他是父亲还是丈夫，他的工作都不会因此变得轻松。他大概可以指望儿子比“雇工”更具有自觉性，但儿子在思想和性格方面的独立性也更大。他们的亲近使劳动关系染上了感情的色彩。儿子是不取酬劳的伙伴和永久的学徒，父子之间的关系比有明确限定的工资雇佣关系更为复杂。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劳动的结构安排只不过是农民自愿用来约束自己的纪律，而让他的助手也接受这一纪律不是件简单的事。当然，劳动支配着时间表和节奏，但劳动的紧迫性和干活的方式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雇主”的工作是艰难的，为了使妻子、儿子和领薪雇工能够“尾随其后”，他拥有的只是人格的、家庭的或雇主的权威。

作为生产者和班头的农民也同时是卖者和买者。在传统村庄的社会生活里，集市和市场占重要的位置。荒谬的是，由于他们的活动既是社会性的，同时也是经济性的，所以说，农业经济越是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集市和市场的位置就越是重要。集市和市场是会见邻居、亲属和了解行情的场所。交易本身曾是一种具有严格规则的社会游戏，它使参加的每一方都施展出自己的精明和手腕。对于某些投机生意来说，特别是在牲口投机方面，懂到贱买贵卖至少和懂得生产技术同样重要，有些饲养者与其说是农业劳动者，不如说是牲口贩子。

今天，到农庄上来购货的批发商和向人们收购一切产品

的销售合作社逐渐地取代了集市。面对批发商，农业劳动者总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有着卖或不卖的自由。这种自由在过去比在今天更为真实。过去，农民若碰不到牲畜的好价钱，就牵着牛、羊回家，只要他不急需现金，他就可以根据行情见机出售，那时，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中，货币不是每天都要用的。现在，情况不同了，“手里必须总是握着钱包”。为了购买家庭和经营的必需品，农民必须出售东西，不管价格是好是坏。在农庄里，面对出价的批发商，他并不真正具有拒绝的自由。他不能确切地了解销路、流通渠道和行情，无法让许多购买者展开竞争，于是便处于劣势地位，必须接受人们向他提出的条件。

在合作社里，同样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可能性。不过，通过合作社的管理，一种新的商业化监督形式建立起来，合作社至少在名义上是掌握在所有的合作者手中。当然，大多数人信赖领导者的才能。但是，在理论上，农业劳动者——合作者仍是卖者和买者，就像他父亲在集市上同时是卖者和买者一样，更重要的是，合作社取代了过去的中间人和牲口贩子，并占据了他们的位置。

各种各样的合作社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者被吸引加入了合作社。然而，参与管理一个重要的合作社，即便仅仅是为了了解信息，但却需要一般农业劳动者目前还不具有的知识和时间^①。通过合作社，企业管理大大超出了传统农庄的范围。不过，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农业经营是“企业”，经营者是承包人。自由经济的模式就是依照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形象建立的，这形象无论在昨天还是今天都是不真

^① 在法国，关于这个问题没有进行任何专门研究，相反，在美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有很多关于该问题的研究。

实的。

我们在前面已指出，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多种经营系统中，农民几乎没有行动的选择，产业的经济管理和技术管理少得可怜：不要欠债，要有相当的积蓄，以便使孩子们能够成家立业，并在有机会的时候扩大地产。这更多地是涉及到家庭经济，而不是企业的经济管理。唯一可能的投资是购买土地，但人们购买土地时却一点也不考虑赚回本钱或增加收入。这只不过是资本从一种储存形式（货币、黄金、牲畜）转移到另一种被社会更加看重的储存形式。

今天，情况不同了，农民越来越成为经济代理人，他们根据自己的技术条件和预期的进款来选择做这种或那种投机买卖。农业劳动者在土地、房屋、机器、牲畜、肥料、种子等各方面进行投资，往往是利用贷款，他们预计这些投资将会赢利。经济学家和会计师心目中的经济核算通过一些迂回的和隐蔽的途径进入了农业经营，我们在后面将分析这些途径。农业劳动者不能再满足于作为“出色的家庭父亲”来管理农场，他应当作为考虑周密的企业家来管理农场。为在这方面帮助农业劳动者，农村经济中心和管理顾问大量涌现，同时农业核算技术也得到完善和普及。

机器和耕作技术越来越复杂，商品化变得更加重要，对此，农业劳动者必须保持控制能力。经济核算也进入企业管理：人们看到，农业劳动者的职业变得日益复杂和多样化，但劳动分工并没有减轻经营者的任何劳动负担。他们依然必须是无所不能的雅克师傅（原为莫里哀喜剧《吝啬鬼》中身兼厨师和马车夫的人物，现比喻打杂的或管家——译注）；既要灵巧地使用锄头和控制收割脱粒机，又要熟练地阅读合作社的小结和畜牧学的小册子。职业日益复杂的状况与传统混作

的要求明显地存在着矛盾。

不错，由于技术咨询、来料加工的劳动或商品化等方面的服务，人们终于使这种矛盾得到缓和，并减少了它的弊病。提供这些服务的行政组织、商业组织和合作组织大量增加：农业技术研究中心、农业资料使用合作社、管理中心、其它各种合作社，等等。但真正地解决问题还有待于经营的更进一步专业化。在此期间，农业劳动者在传统的要求和进步的经济技术要求之间摇摆不定，他们深深地感受到农业所面临的危机，因为农业在进入了商品经济和接受了科学技术的时候仍保留着过去的结构。

这种紧张状态由于农业劳动者自身的原因变得令人更加难以忍受，因为农业劳动者并不会像我们刚刚做的那样去分析和孤立地看待他的每个角色，相反，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把这些角色视为紧密结合的整体，因此，他们不可能把必然性与每个角色的要求以及与他本身相联系的期望区别开来。这就必然导致在对各种情况进行分析时出现混乱，把动机、动力和欲望混淆在一起。

* * *

这种混淆由于家庭和职业的重叠而达到了顶点。家庭和职业的重叠把一切职业角色纳入内涵更宽、波及面更广的家

如果他们不太愿意饲养牛，家庭应逐步转向种植业，不管市场条件如何。

几乎在所有的领域，生产的基本单位与消费的基本单位是分开的，而农业家庭经营却把它们合成一体，以致同一个人相继担任消费者的角色和生产者的角色，有时同期兼任二者。农妇把鸡蛋收集起来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同时也留下一些鸡蛋做午餐的蛋卷，她显然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很难区别消费贷款和投资贷款，这是不足为奇的。直到近几年，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借款就等于承认自己贫困和入不敷出，不管他的花费是买面包，还是买化肥或拖拉机，反正都一样。所有的金钱支出都是花费（在家庭主妇的心目中），只要可能，就应当节省这种花费。最具有理性的农业劳动者在管理自己的企业财政时，也无法完全摆脱这种观察方法，这是很正常的。此外，必须说明，他与城市家庭主妇犯了同样的混淆错误，后者在买洗衣机或冰柜时会考虑这是否是“赢利的投资”。

J·米洛对葡萄酒市场进行了长期的经济计量学研究，他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葡萄种植者的核算不是工业企业家的逻辑核算，而是消费者的简单核算，他们购买各种物品，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中介资料，都受到收入储备的支配和限制。”事实上，他大概是要表明，在生产要素（化肥、机械，等等）的购置和由上一年的收获所决定的购买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而葡萄酒的价格与这些购置之间的关联则要松散得多。同样，一项关于谷物生产的类似研究也证明，最有意义的关联总是建立在“N”年度的产量和“N + 1.”年度所涉及的生产要素的数量之间^①。不过，我们并不完全同意

^① 米洛，1961年，第354~359页。

米洛的看法，例如他认为，企业家-农民是巴甫洛夫笔下的人物，他对经济刺激作出反应，而“经济”企业家是笛卡儿笔下的人物，他服从于具有预见的理性。事实上，我们已经指出，这儿所涉及的并不是简单的反应，而是一种完全属于笛卡儿主义的理性，这种理性的直接目的属于社会的和精神的层次，而不是属于经济的层次。农民使韦伯的经典划分得到了说明和最好的研究领域^①。

总之，家庭的生存和延续依赖于经营的生存和延续，反之亦然。所以，在经营管理上，知道自己的一个孩子将会接班的家父与让所有的孩子在其它行业立足发展的家父是不同的；希望留一个儿子在家中的经营者会尽一切努力使儿子到了选择的年龄时就愿意留下来“继承家业”，也就是使家庭和经营延续下去。

在社会的一切活动和一切领域中，父亲的职业成就就会影响到家庭的地位和社会声望。但家庭经营把一切事物都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致于父亲的职业声望既来自于他的经营、土地、甚至房屋，也来自于他的技术才干和经济成就。他的“职业成就”，如果人们真的可以这样表达的话，那既是以家庭经营中生产资料的增加来衡量的，同时也是以家庭的生活水平来衡量的。我们在后面的一章中将证明，对传统的农民来说，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就是能够种好很大一片田地的一个大家庭的家长。换句话说，为了成为一个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必须成为富裕大户，因此也就必须能够处于村庄社会等级系统的上层，反之亦然。家庭声望和社会地位通常都属于令人操心的问题，这些操心直接推动经营者作出各项技术

^① 韦伯，1964年。

选择或经济选择。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分析农业劳动者在购买拖拉机时表现出的各种不同态度和使他动摇不定的各种推动力量。经济学家断言，小经营者的机械设备已经过剩了，而忧心忡忡的观察家则指责小经营者购买拖拉机是为了“体面”，据说，这就是为什么在远处就能看到的红色拖拉机要比其它颜色的拖拉机销路更好。或许真的是这样，不过问题绝不是这样简单，因为农民做出决定不是根据单独一个方面的考虑，比如赢利或赶时髦。

不知疲倦的劳动者扶着犁，赶着牛，踩着犁沟，日复一日地在田野里辛勤耕耘，他自然有理由期望拖拉机减轻他的劳苦，有了拖拉机，他在耕地时可以坐着，而且速度快二、三倍。如果人们愿意认真思索一下，农民的劳动占据了整个生活，那就会明白，农民使自己得到的并不仅仅是狭义上的“劳动条件的改善”，而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其他的劳动者都拥有很多闲暇时间，他们不会为自己的劳动“破费”。相反，对于农业劳动者来说，劳动和闲暇是混合在一起的，他自然会为自己的劳动支出一笔“非生产性”的费用，从而为日常生活带来一些新的风味。生产者与生活者是无法区别的，我们通过分析使二者的动机形成对比，但在现实中它们是混合在一起的和交相辉映的，连最细心的心理学家也不敢断言能把它分清。

此外，在紧张时期，农场的劳动安排不是件容易的事，在那儿劳动力已减少到一、二个人，短工是难以找到的。因此，对于农业劳动者来说，关键的是能够在紧张的时期加快劳动速度。虽然机器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用不上，但它仍然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使人们在关键的时候赢得时间。机器

取代了“不发达”农业中的季节性帮工。在“不发达”农业里，机器处于失业状态，或者花钱买来后却让它在一年的剩余时间里闲置着。在气候不稳定的时期，劳动完成得越快，收益则越大：能够及时地在好天气里抢收麦子，麦子的质量较高，损耗较少。在边缘状况中获得货币收益是难以估计的。某些年份，如果一部分收成由于缺乏足够的措施，有可能受到损害，那么，边际收益可能是很可观的。不过会计在进行年度经营核算时是很难考虑这种边际收益的。

最后，某些忧虑重重的技术人员担心拖拉机会造成令人遗憾的后果，特别是把土壤压得过实。但一般来说，农民认为，有了拖拉机，他们的劳动质量会更高，就像所有的工人都喜欢有干漂亮活的工具。总之，机器是一种既能省力，又能及时地和优质地完成劳动任务的工具，这是一种保险。它在某些年份可能显得价格昂贵，但在另一些年份却可能是很合算的。

如果说体力劳动者和技术人员在购买拖拉机方面都有发言权，那么对这种投资的收益作出最后判断的应当是企业主。这意味着企业主具有一种真正的“经济”意识，他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资本、收入、利息和分期还本，等等。当然，今天这些财会概念迅速地普及了，这主要是由于管理咨询的作用。几乎所有的农业劳动者都懂得，一台拖拉机应当每年工作一定数量的小时，这样才能证明它的购买是值得的。但这种表达问题的方式不像分期还本的计算那么精确和有意义；如果说农业劳动者满足于这种表达方式，这是因为这种方式可以使它们重新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问题，他要考虑的不是拖拉机能否相当快地分期还本，而仅仅是购买拖拉机是否“值得”。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和技术人员与企业主之间

的内心争论必然会变得对前者有利，因为后者悄悄地放弃了本该属于他们的纯粹经济理性。

这种争论由于家庭父亲的介入而变得对劳动者和技术人员更为有利，家庭父亲也有发言权，而且处于优势地位。家庭父亲的论据属于另一个层次，具有巨大的威力。儿子不再愿意老是“跟在牛屁股后面”，如果他不能像邻居那样有自己的拖拉机，他更喜欢离开家到城里去。一部可供操作和撵弄的机器会使他感到具有“现代特色”，感到没有落后于在街上或在城里当机械师的同学。既然他不考虑分期还本的问题，父亲又怎么向他解释这漂亮的机器可能会使经营破产呢？此外，农业经营从来不会像工业企业或商业企业那样破产。当一个债权人意外地扣押了他的债务人的经营财产时，他会激起愤慨和谴责，这说明他违反了习惯准则：农业信贷机构几乎从来不诉讼于这种极端的作法，在这方面，那些准备把这种事件变成丑闻的鼓动者们是意见一致的^①。

对于农业上的管理不善，几乎没有无法补救的经济惩罚。人们“在农业上缓慢地破产”，逐步陷入贫困和减少投资，但企业本身只有到经营者自己死去和他们泄气的儿子去寻找别的工作时才会彻底垮掉。这就是为什么在进行管理的时候，应当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家父，而不是作为一个内行的企业家。换句话说，必须首先考虑家庭的利益，如它的安全、它的延续、孩子的教育等等，经济的迫切需要必须从属于这些利益。

从长期来看，家庭的成就部分地表现为声望的提高：如在村庄的等级系统里上升了几级。不过，这种社会升迁对一

^① 多吉尔，1935年，第7页。

一个家庭父亲来说不是无所谓的事，如果他有一个待出嫁的女儿的话，这种社会升迁甚至会成为他的目标。过去，声望是以地产的面积和牲畜的头数来衡量的。今天，拖拉机是另一个决定性的标志，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在几年前就已经是声望的标志了。现在，随着拖拉机的普及，它的牌号、功率和服务年数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这些标记可以看出“日子过得不错”。如果人们想保持他们的社会地位或使其有所改善，那么就必須获得这些标记，甚至以收入的降低作为代价。说到底，谁不称赞想“体面地嫁出”闺女的父亲？但谁又会为此欠一身债去购买他无法赚回本钱的拖拉机呢？

让我们强调指出，农业劳动者同时作为劳动者和技术人员，他们与家庭父亲所使用的几乎是同样的语言。然而，依靠这种语言，经营主不能对社会经济形势作出清晰的、经过推理的分析，也不能作出符合经济运转要求的“理性”决定。

工业企业主先征求他的经理们（商业的、技术的、人事的，等等）的意见，然后根据他的财政能力独自作出最后的决策。在一个大企业中，他的决策对他的家庭不会有任何直接的影响。当工业企业隶属于一个家庭的时候，二者的命运休戚相关，但并非每项管理的决定都会影响家庭的生活。这就保证了担任企业家角色的“老板”具有决策的自主权，由于这个自主权，经济机制可以根据它固有的逻辑发挥作用。

农业中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当然，管理顾问们力图使自己的主顾的“经济”决策“理性化”，要求他们建立帐目。一旦建立了核算，农业劳动者虽说可自由地为了个人的和家庭的原因而牺牲经济的要求，但据说他们是在对动机具有清醒认识的情况下作出这种选择的。这真是会计师的幻想和虚假的理性。在家庭经营中，一切都同时既是社会的又是经济的，

购买拖拉机、冰柜或洗衣机是按照同样的思考步骤进行的，经济学家不可能在那儿使自己的观点独占鳌头。

拖拉机的例子为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提供了很好的说明。对任何别的管理“决策”，都可以进行同样的分析，也会得到相似的结论。农业劳动者，不管他们是不是“农民”，都不是特殊的人种，没有与众不同的“心灵”。只是他们处在与其它职业不同的境况中，这自然促使他们按其本来的样式行事。分析他们对贷款和金钱的态度、测定他们对帐目核算的抵制力量、寻求向他们灌输“经济的动机”，这些都暴露出在农业方面惊人的幼稚。在农业中，几乎所有在会计师看来陷入亏损的经营都继续兴旺发展。自身消费有其固有的逻辑和理性，经济学家在试图以自己的尺度来衡量它之前，应先对它进行分析，不要在还不理解它的时候就对它提出建议。

随着农业经营的专业化和向市场开放，生产者的角色将会不同于家长的角色，体力劳动较之管理劳动将居于次要地位，农业劳动者将会获得核算的知识和更多的经济意识。但是，这个在我们眼前迅速推进的演变是与经济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全面转变相辅而行的，它不可能通过对农业劳动者简单的“教育”来完成。

农业劳动者虽说是经营主，但他不是单独作出决定的。至于其他的家庭成员，直到现在，我们只是在谈到家长的“操心”时提到过，但他们常常也有自己的意见，有时他们会独自作出某些决定，通过他们的参与，至少可以造成对企业主有约束力的局面和角色分配状况。

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是传统农民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牛是由妇女负责照管还是由男人负责照管，妇女参加

不参加田里的劳动，这些都是揭示劳动分配情况的部分迹象，而劳动分配是理解经营安排的关键因素。在那些妇女同时担任家妇和农业助手的地区，她们几乎在所有的劳动中都是男人的“助手”，她们唯一由自己负责的就是家禽，她们对企业管理的影响与她们以妻子的身份对作为企业主的丈夫的影响混淆在一起。在别的地方情况则相反，男性的活动和女性的活动是截然分开的。

关于妇女在农业管理中的作用，我们没有任何精确的研究材料。此外，如果不考虑到每个家庭的个性和那些“夫妻间麻烦事”的不同特征，就很难在这方面得到有意义的结论。众所周知，有的农户是丈夫说了算，也有的农户是妻子说了算，妻子比丈夫管理得更好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帐目越来越经常地由妻子们来管理，这样她们就掌握了一个重要的管理工具。

在妻子的活动与丈夫的活动明确分开的情况下，已经有可能更好地考虑每个人的情况，实际上，可能会出现各自掌管自己的帐目的情况。J·戈拉维尔曾为莫莱特地区的一个家庭建立了这种分开的帐目^①。在很多地区，据说出售奶和家禽挣来的钱是由妻子掌管的，作为家庭生活的日常开销。其它的收入归丈夫掌管，用于经营的流动资金、“大的花费”和储蓄。这种作法的适用范围有多大还需核实，特别是需要确定家务和经营的区别。有时人们甚至可以把分析扩展得更远，看看是否每个农户实际上掩饰着两个并列的企业。

例如，在贝亚恩地区，在传统的耕作系统里，丈夫负责耕作和大牲畜，妻子饲养猪和家禽。一切收入都来自于动物

^① 戈拉维尔，1948年，第116页。

产品：奶和肉的收入属于丈夫，猪肉和家禽的收入属于妻子。这样两人平等地分担家庭消费和商品化产品的开支。玉米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丈夫生产出的玉米用来喂养猪和家禽，这种转移显然是没有帐目记录的。因此，测量两个“企业”的收益是不可能的。丈夫看不到他兑换成货币的玉米，妻子通过出售产品总是挣到足够的钱（或者按她的愿望来说还不够），但她是无偿地得到产品的主要原料的。合理的经济管理有必要设立两本分开的帐目，要考虑到两个“企业”之间的过户。不过，这两个“企业”的明显的经济自主权被表面上统一的家庭经营弄得模糊不清了。

在这个地区，这种区分是这样的明显，它在别的地方大概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人们常听到农民抱怨他们的妻子偷了他们放在粮仓里的谷物去喂家禽。一位提供信息的人甚至向我们保证，说他的妻子半夜起来去行窃。这个趣闻说明，如果需要的话，夫妻关系的状况与农场的经济管理具有一定的关系。

在父子之间，不再存在明确的劳动分配，对相互地位明确的习惯界定变得模糊不清了。大多数时间两个人一起劳动，他们的个性在一种经常性的竞争中相互对峙，要想分清儿子在竞争中对父亲决策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当然，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争得某种形式上的独立，这主要是由于各种组织的影响，他们在这些组织中发挥了作用。“基督教农业青年联盟”和“青年农业劳动者中心”给予他们新的观念、技术才能和关于农业经济的看法，这些促使他们与父亲不断地展开对话。父亲仍然是唯一的经营主，他具有最后的决策权和承担着所有责任，然而，如果他追随儿子，那最终儿子成了真正的经营主，相反，如果他顶住这种角色的转换，就可能造

成家庭中令人难以忍受的紧张局面。

由于变化加快了，关于父亲的财产转让给儿子的一切问题用新的词语提出来。在一些地区，根据传统惯例，父亲在生前分配财产，并把经营管理权转让给结了婚的儿子。在大多数地区，父亲直到临终的时候仍然是家庭和经营的唯一主人。他有时会感到被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超越了。由于习惯于使用牛，他自愿地把拖拉机让给儿子操纵。所有那些为了组织市场而围绕行业联合会和合作社出现的风潮在他看来都毫无价值。但头脑最清醒的父亲向青年人交了班：“我们已经在自己的时代做了我们认为应做的事情，现在，该有他们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这种自愿的退位仍是特殊的事例。在大多数情况下，新技术和经济困境会导致家庭角色的重新分配^①，父亲的作用会悄悄地减弱，母亲的作用会随之加强。对于在传统的自给自足体系中得到塑造的经营主来说，掌握经济核算和市场机制的奥秘是极为困难的：他学会了搞好生产，学会了在集市上尽量使自己不吃亏，但他没有学过根据销路来为自己的耕作系统确定方向。由于面对这些新的任务不知所措，他越来越把自己局限于已习惯了的任务：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

他越来越成为一个出力的人，把经营主的特权让给了妻子或儿子，但这必然会打破家庭的角色平衡。既然他的父亲权威是依赖于经营主的权威，那么一方的削弱便会带来另一方的削弱：如果一个农民不是一个有经验的农民，他怎么能成为一个全部意义上的父亲呢？他越来越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在耕田里，让妻子去负责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此外，正

^① 随后的一切分析都是以M·莫斯科维奇的研究为基础的，1960年和1961年。

像J·吉奥诺注意到的：“在我所描述的那些地区的农民社会里，有些妇女比男人们更加精明。”^①

母亲更加接近孩子和关心孩子们未来的问题，她感到需要理解这个越来越渗入到村庄经济社会生活中来的新世界。她也担任着自己传统的教育家角色，必须向孩子们解释世界，以便使他们“进入社会”。过去，她主要向他们传递宗教信仰、道德价值准则和礼节。今天，她力图向他们提供整个社会的面貌和社会经济运转的全景，以便使他们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闯荡和开辟自己的道路，不管他们是留在农场还是离家出走。家庭母亲具有的更大的“社会”本领补偿了农业劳动者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能力不足，父亲不再是一个中心人物，家庭转而服从母亲的权威。

如果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在农村过体面的生活不再存有希望，她会使他们的抱负转向其它的职业和其它的领域。那时，经营不是变得现代化了，而是越来越失去经济企业的特性，仅仅成为一种生存的和维持生活的手段。由此可见，一切管理上的经济担忧都服从于家庭的要求。孩子们的离开使农场便变为由退休者来经营，等待着它的前景是随父母们去世而消失。

这种最为经常发生的演变促进了乡村人口的外流，为集中经营提供了条件，并使拒绝外流的人得到好处。农民没有把自己固定在干粗活的角色中，实际上，他们能够接受现实摆在他们面前的新条件，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实现现代化、进行扩展和适应市场要求，变成有着进步意识的小企业家。如果他们与妻子合作经营，以便确保良好的管理，那么家庭和

^① 吉奥诺，1955年，第149页。

企业仍然完全混合在一起，不过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妻子是共同经营者，她的母亲角色事实上完全从属于她的经济角色。这种经营很像家庭夫妻店。

妇女常常力求把自己局限在主妇和家庭母亲的“女性”事务中，通过妇女杂志、收音机和电影等，整个“女权主义”的文明都引导她这样做。她期望像一个城市里的主妇，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管理家禽和帐目上，由此产生了经营和家庭之间的新区分：父亲生产，母亲消费，完全像城市人一样。

这种对农业经营的分析自然会引导人们去考虑，当农业经济学家、会计师和管理顾问们把家庭经营当作“企业”时，他们是否被经济理论和表面现象所欺骗。在人们试图弄清楚连结一定地区全部经营的那些集体关系时，疑虑就更多了。某个农村经济学家曾说过这样的俏皮话：“一个农业地区，就是指干同样蠢事的所有农业劳动者。”这实际上是暗示，农业劳动者不是独自作出他们的技术决策和经济决策的。

在一个受传统支配的乡村社会里，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人们甚至会怀疑个人选择的存在。每个人都遵守习俗，根据常规从事耕作。村庄是自给自足的，不管是丰年还是歉年，都向市场提供同样的产品。但今天，农民争得了土地的个人所有权，成为自家的主人，不必向任何人报帐，这些都成为小经营者的骄傲和渴望，然而，他们却不得不为在自己的职业同行中盛行的个人主义而哀叹。那么，怎么解释同一地区的大多数农业劳动者会作出相同的选择，而一旦把这些选择归并在一起，它们是如此地相似于一个集体的选择呢？具有约束力的一些结构和一些状况左右着这些决策，集体的机制规定了这些决策的方向。不幸的是，在此方面我们没有掌握

任何有意义的研究材料。

此外，决定性的经济选择是由“下层”的劳动者在基层作出的，这是农业从根本上不同于其它生产领域的又一个特点，它给一切经济预测和经济导向出了难题。事实上，目前在宏观决策和微观决策之间还没有一个中间层次，宏观决策是在巴黎由政治和行政的决策机构作出的，微观决策则是由200万农业经营者作出的。这大概说明了为什么唯独农业计划依然继续靠价格机制来实现，而不是像其它领域那样靠总量的规定来实现。在其它生产领域，中间决策层次是存在的，那里的企业主指挥着数千甚至上万工人的活动。

把农业这样一个重要生产领域的管理托付给200万完全独立的经营者的，这是有点儿荒谬的，因为这些经营者缺乏一切经济技能，他们所受的教育以中学毕业证书为限。一个中等程度的家庭经营大约有20万法郎的资本，它的经济和技术管理要比同等资本规模的商业企业或手工业企业不知更复杂和多样化多少倍，但后者却很少由不具备职业训练的“老板”管理。巴黎盆地或法国北部的一些大农场，资本可高达数百万法郎，但常常并不是掌握在经过更好的训练的经营者手中；这种情况虽然有限，但清楚地说明农业结构过时了。

当大多数农业劳动者仍遵循传统的思维方式时，只要有若干群专业化的、组织成行业联合会和合作社的生产者就可以勉强满足市场的需要。但是，如果人们想运用一些更为普遍的刺激因素，如所有的农业劳动者都多少感兴趣的价格，那么人们就再也不能无视那些在近10年留下印迹的集体热潮了（甜菜、玉米、苹果，等等）。实际上，放弃了常规的农民几乎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们只能追随昙花一现的“时髦”：如人们付出昂贵价钱的产品、机器、种子和“人们在谈论着

的”技术。

科技普及者和管理顾问们，如果他们本身就不熟悉情况，没有非常谨慎地确定方向，那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是指责那些心血来潮、并在大多数地区向所有的人同时建议同样的事情。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农业劳动者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窘境，他们明确地表示依然遵守习惯作法，因为他们不愿成为时髦的牺牲品。

要想使农业劳动者真正能够容许管理顾问参与他们的决策，往往必须使他们首先放弃常规陋习，从事某些具有风险的活动，如打破自己的隔绝状态，成为某个农业技术研究中心的成员，在那儿他们与邻居和技术人员一起讨论问题。在这些研究中心，由于技术人员是由农业劳动者来选择和付给报酬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技术人员已成为他充当顾问的那些家庭经营的组成部分，经营者可以真正地与他分担责任。

对于法国不同乡村社会中农业劳动者进行决策的集体机制，我们还缺乏精确的研究，所以只好满足于进行某些对比。历史学家们曾把影响法国东部村庄整个农业生活的集体约束与布列塔尼地区多疑的小佃农的个人主义加以对比，后者独自居住在祖传的土地中央，一条坎坷不平的小径从家门口通向外部世界。

在18世纪，农业革命打破了集体的束缚，使东部的农民获得了独立。这些农民由于倍受村庄共同体过分束缚之苦，所以更加渴望自主，而西部有着严重等级化的社会，仍保留着它的基本结构，这些结构继续压抑着屈从于权威的农民。因而，在今天，洛林地区的农民大概比旺代地区的农民更加不受群体的束缚。在山区，协作关系依然很富有生命

力。至今，西南部的农民一直抵制着一切形式的集体束缚。

我们掌握的一些观察记录表明，变化的缓慢进展已趋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规则化了。开始时一些人走在变化的前面，带头的几乎总是这一些人，另一些人跟在后面，追随他们的榜样，这种人为数最众，最后，总是有一些落后的人和对一切变化都无动于衷的人。实际上，全部变化的过程就像是由一部分单独的人为整个村庄或整个地区作出了决定。这个模式显然太粗糙和简单化了。不过，如果这个“范例”在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那人们会看到，把农业经营当作独立的“企业”，把经营者当作企业家，这些都是虚构，而不是现实。人们至少可以确信，从经济决策的角度看，构成独立单位的是农业劳动的小地区或群体，而不是农业家庭经营。为了使分析具有意义，还必须能够准确地划定这些地区和群体的范围界线。

从本质上说，直到现在这些集体机制仍然是潜在的。融化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表现它们的角色并不具有清醒的意识。行业联合会、合作社和农业技术研究中心的作用就是赋予这些机制某种组织的外形，使农民成为清醒的和负责的参加者。只要这些组织发展起来，地区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根据经济利益、职业教育水平和政治倾向，等等，同一地区的农业劳动者可以分散在许多组织中。随着这种趋向成为明显的定势，农业家庭经营将失去独立性，“企业”将成为一个经营小组，被合并进农业共同经营组织、农业技术研究中心、农业集体利益协会或合作社。如果这些组织实现了专业化，能够量才选用它们的负责人，农业生产就将越来越按照经济的和技术的准则来管理，而在传统的体系中，那些为群体作出决策的人之所以能这样做，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

而不是由于他们的能力：领导着地区的是掌握着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显要人物们，而不是那些经过良好训练、更具有解决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能力的农业劳动者。

这些思考表明，古典经济学和社会学提出问题的方法是多么难以适应对农业结构和农业机制的分析。经营者既不是雇主，也不是受薪者，因为他兼任二者，他的经营看起来似乎是处在竞争系统中的企业原型，但它既不是一个内在的统一体，也不是一个可以被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当作个体经济代理人分析的外在自治体：经营和家庭的混合不允许经济逻辑支配生产政策；决策权分散在基层劳动者手中又使一切生产导向的努力都成为冒险。

在社会学家一边，他们满脑子都是角色和地位的概念，但不太懂得怎样运用这些概念去分析农民社会。当他们描述经过习俗精确规定的复杂角色时，他们容易在人类学家理解的意义上使用词汇^①。相反，当他们试图弄清楚经营主的动机时，他们人为地分割复杂的现实，并借用了社会心理学家关于角色的概念^②。这说明，人们并不明确什么是最适合于理解处于变化中的农民社会的知识工具，因此社会学家必须慎重行事；因为，如果他研究更为传统的社会，他就变成了人类学家，如果他研究现代化的农业劳动者的组织，他自然对社会心理学感兴趣；不过，正是为了理解从一个方面向另一个方面的过渡，因而有必要使用同一规则的概念工具。

相反，在经济学家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了：目前的农业结构已被判定过时了。然而，这些结构却受到道德家和社会

① 林顿，1936年，纳代尔，1957年。

② 罗切布拉夫-斯本列，1962年。

空谈家的赞赏和狂热崇拜，他们被工业结构中人的处境吓坏了，成为人的独立和人的自由的激烈捍卫者。如果人们用来分析情境的那些概念本身包含了最终判断的意思，那它们也就包含了“预期理由”（逻辑学用语，又称“窃取论点”或“丐词”，是证明以本身尚待证明的判断作为论据的一种逻辑错误——译注），从而失去了科学内涵。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法律学家比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更准确地理解和分析了农业家庭经营的思想 and 深刻意义，并使其法典化^①。在工业立法和商业立法中，所有运用于企业的法规都是为了企业和经济生活的利益；而在乡村法律中，法规的制定一方面是为了经营者，另一方面是为了土地，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农业经营体却似乎不配得到同样的关切。

立法者希望能够确保土地得到良好的技术开发，他们使租约具有充分的期限，规定多种遗产特留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租约即将到期的佃农并没有耗尽地力的倾向。他们特别关切经营者和他的家庭，与我们的民法共同规则相反：他们期望能够确保经营者及其家庭的安全和延续性。佃农被确保能够在违反土地所有者意志的情况下保留农田。这样一来，所有者不再完全是自己财产的主人了，有经验的父亲给予与自己一道经营的继承人特殊的赠予，把家庭财产的主要部分转让给他，从而使他的兄弟姊妹吃亏。

一切在法学理论上支持这种立法的努力都旨在加强社会关切，减少经济上的操心。法律学家们似乎更为关切的是维持社会结构和保证社会阶层的稳定性，而不是创造条件促进农业产品和食物产品的赢利性生产。在这方面，他们大概比

^① 儒哥拉尔，1958年。

农业劳动者自己还要“农民”，农业劳动者虽仍忠实于他们的社会结构，但却渴望按照现代文明的经济规则和技术规则办事。

对杂交玉米这项革新以及伴随而来的决策和必然后果的分析，将会确切地说明生活逻辑和行为逻辑之间的冲突。通过一个例子和一个具体的决策，有可能剖析在前几章中描述的各种要素的规则和影响。特别是，人们将会看到，对时间和空间的抽象定量观念的缺乏是如何与角色的混淆以及对村庄社会的参与搅在一起，使得经济形势扑朔迷离，并使农业劳动者成为选择的主人：他的选择或是根据个人的道德标准，或是随大流赶时髦，但绝不是按照经济的核算进行的。

第四章

一项变革：杂交玉米

杂交玉米是在美国培育成功的，并为美国中西部的富庶做出了贡献。赫鲁晓夫曾使杂交玉米享有盛名，被人们称为杂交玉米的热情宣传家。二次大战后，杂交玉米被引进法国的西南部不久，它就适应了那里的气候，并使农民们相信它优于当地传统种植的一切玉米品种，特别是巴斯克地区的大粒橙色玉米。如果人们掌握了关于这两种玉米的精确统计数据，能够逐年、逐地区地跟踪分析杂交玉米的发展轨迹，那将会受到很大启发的。

熟悉巴斯克地区和贝亚恩省的农业的人，想必会提出若干假设，来解释为什么一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更为迅速地采用了新品种。据说，集中居住的地区比分散居住的地区更有利于新事物的传播。在集中居住的地区，人们日常都来往，大家“彼此挨在一起生活”，任何人的进步必然会吸引周围的邻居，而远离村庄独自住在农场中的耕作者，则几乎没有看到、比较和获得信息的机会。这就等于假定，邻居的经验是信息的主要来源，而邻居的成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论据。这还等于假定，信息的传递在大村庄里比在孤僻的小村和农场里更为迅速。不过，新事物的传播似乎是通过更为复杂的心理渠道进行的。我们在下比利牛斯省初步进行的检测

试验几乎没有得出什么结论性的东西；试验倒不如说是倾向于证明，分散居住的地区比集中居住的地区反应更加灵敏。单凭这一点显然不能说明问题，必须知道，这个呈现出的关联是否起因于另一个变量，特别是这些不同地区的耕作传统。

据说，政治与杂交玉米的传播也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杂交玉米对天主教徒比对共产党人更具有吸引力。我们将看到，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逻辑关系。不幸的是，一切把选举结果和宗教活动与采用杂交玉米的有关数据进行比较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一些“红色”地区很早就种植杂交玉米，而一些极正统的村庄却长时间地拒绝种植杂交玉米。显然，这种比较只有在个人的层面上进行、而不是在地理单位的层面上进行时才会得出有意义的结论。然而，这个比较让人感到，政治与杂交玉米的关系并不像某些地方观察员所说的那么直接和明显^①。

富裕的、满足于自己处境的地方比不太富裕的地方更难于发生变化。我们掌握的一切数据和个例都证实了这个假设。为了进行这项调查，我们选择了纳依河谷地区。这完全是因为，1960年时，它是贝亚恩省最晚放弃当地玉米的地区之一，因为当地玉米在那里的产量很高。如果人们掌握了充分的统计数据，能够大体地逐个乡镇或逐个地区地估出作物的产量和经营收入，那将可能弄清楚农业富庶与农业劳动者对变化和开放的态度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由于资料的缺乏和这种比较尝试的意义不大，所以必须重新在个人的层次上进行分析，同时，由于缺乏更全面掌握

① 作为这些评论依据的检测调查是 J·杜普莱斯完成的。

情况的手段，我们的分析仅限于J-C·帕波兹对纳依河谷地区100个农业劳动者进行的调查所提供的材料^①。

在农艺技术方面，杂交玉米取代地方玉米似乎是很容易的：两种玉米的耕作实际上是以同一方式进行的。杂交玉米应更早一些播种，行距更宽一些，不再需要打叶和打顶，它所需要的劳动量较少，但所产的青饲料也较少。最重要的区别是杂交玉米必须购买种子。因为种子是通过杂交培育出来的，需要施放大量的肥料（1公顷大约需要300个法国标准单位的肥料），再说，它更容易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和遭受虫害，需要喷打除莠剂和抗真菌剂。杂交玉米开始时比地方玉米长得慢，要求细心的农田护理，以免杂草丛生妨碍其生长。但只要措施得当，杂交玉米的收成一般比巴斯克大粒橙色玉米高一倍。

人们看到，这几项耕作改进措施是任何农业劳动者都可以做到的，种子、肥料和抗虫害药品的花费与增加的收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杂交玉米的优越性在技术人员和经济学家看来如此地显著，以致赫鲁晓夫对它的狂热推崇，比苏联农民、贝亚恩农民、甚至美国农民的犹豫不决更容易让人理解。

在美国衣阿华地区的一项社会学调查揭示，从首次推行杂交玉米以后10年，只有约3/4的农业劳动者种植了杂交玉米^②。事实上，从农业劳动者了解杂交玉米到决定采用它，其间平均要经过5年的时间。在衣阿华地区，每个农业劳动

^① 帕波兹，1960年，下文引号中的句子均引自谈话报告。对结果的解释极大得益于与N·莱特的多次讨论，他的提示对这里的研究和其它的研究是特别有益的，我向他表示深深地感谢。

^② 赫安和格罗斯，1943年。

者在作出决定之前，都希望先“自己”进行试验。我们将会看到，贝亚恩地区的农民较少具有个人主义的精神。但是，在下比利牛斯地区，集体决策的复杂机制要求大约同样的期限来普及杂交玉米。

如果对农业劳动者来说，一切事情都像对农艺学家来说那么简单，那么，在衣阿华、乌克兰和贝亚恩，普及杂交玉米所需的期限应当短得多。但是，农民和农艺学家看待问题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一个向我们提供情况的人证实了这一点。他惊呼道：“我说先生，他们会用这种玉米毁掉地方玉米的！”。一个在人们看来由于种植杂交玉米而增加了收入的农业劳动者怎么会相反地把杂交玉米视为致命的危险呢？需要弄清楚的正是这个矛盾。

* * *

到1959年，杂交玉米进入法国西南地区已有10年了，但在100个被询问的农业劳动者当中，有19人没有种植杂交玉米，其中10人从未种植过，9人种植过一、两年，然后放弃了，还有36人种植杂交玉米的面积不足1公顷；因此，一半以上的劳动者没有真正地接受这个新品种。最后，除了16人以外，其他人都同时还种植当地玉米，但种植面积一般比种植杂交玉米的面积要小：“我们继续种一点儿”（平均半公顷）。

同时种植两种玉米使比较变得很方便，这种对比是对杂交玉米有利的，本应迅速地导致地方玉米的淘汰。然而，情况完全不是如此。农业劳动者依然坚持连续多年同时种植两种玉米，虽然几乎所有的人（85%）都认为杂交玉米是高产的。因此，产量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说服论据。70%的农业劳动者认为，一方面杂交玉米需要过多的照管、劳动和各种费

玉米种植面积问卷统计表

单位：人

种植面积	地方玉米	杂交玉米
完全不种植	16	19
1公顷以下	58	36
1~2.5公顷	18	29
2.5公顷以上	7	15
	99	99

用，另一方面杂交玉米和地方玉米的效用不完全一样，特别是在用作家禽饲料方面。

杂交玉米一般是白色的，而大橙玉米是黄色的，在西南地区，漂亮的小鸡应是黄色的，特别是，据说用杂交玉米喂鹅养不出肥鹅肝。正像一位农妇说的，“如果我用杂交玉米喂鸡，两小时后它就饿了，又开始到处觅食，而地方玉米才能耐饥。”专家们认为，两种玉米的营养质量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但农妇们不会自己欺骗自己，她们知道，对于家禽、特别是对于鹅来说，只有用地方玉米喂养才能长得好。论及是，1959年，地方玉米在市场上每公担多卖200旧法郎。

耕种者在这一点上和农妇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也认为地方玉米比杂交玉米“更加漂亮”。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为了说服调查者，他们钻进粮仓拿出两种玉米棒子来比较：“瞧，这棒子很大，不错，但顶部没有长满，特别是，颗粒挨得这么紧，使它无法长圆，人们叫它们皱粒，而地方玉米棒子长得很满，粒儿是金黄色的，很饱满，这才是漂亮的棒子。”的确，地方玉米的外表要比杂交玉米更好看，人们可以理解，地方玉米会给予生产和收获更多的“美感”满足。而且，

它看起来的确可以说“更加健壮”。

这种美感上和营养上的优点，在农业劳动者看来是明显的和令人信服的。不过，虽然他们不情愿，但他们不得不承认，杂交玉米棒子更大，产量更高。不过，一些人仍在继续争论这个问题。在市场上，地方玉米是以公升为单位来称量的，而杂交玉米交给合作社出售是以公担为单位称量的，这种区别使人们得出前者比后者分量重的结论，并认为如果把测量的单位倒换过来，前者的重量会绰绰有余地超过后者。一些细心的人进行了试验，发现二者的重量只有极为微小的差别，但这并没有能够说服其他人。

另一个比较的方法是把两筐玉米棒子脱粒，人们不得不承认，一只桶里的玉米粒满得比另一只快。一些人进行了试验：杂交玉米一筐装87个棒子，可出17公斤玉米粒，而地方玉米一筐可装130个棒子，只出14公斤玉米粒。唯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比较方法，是把一公顷杂交玉米的收获和一公顷地方玉米的收获比较一下重量，但这是有难度的。另外，人们总是会寻思，二者的耕种过程是否都符合要求了？

在纳依平原，经过精心照料的巴斯克品种的玉米可以获得很好的收成（每公顷40公担），而种植不佳的杂交玉米几乎不可能有更高的产量，有时甚至更低。不过，被询问的农业劳动者有一半认为，从一种玉米改种另一种玉米，在耕作方法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有1/3的人认为需要施更多的肥料。实际上，正像一个农业劳动者所说的，为什么要“施肥让杂草猛长，然后又施除草剂”呢？平均起来看，农业劳动者似乎都不大按种植要求行事，所以他们的杂交玉米产量比地方玉米还高不了10公担，而按正常的情况来说，产量可以翻1倍。

在刚开始种植杂交玉米时，比较常常是不可能的，因为

很多农业劳动者只有邻居给的很少一点种子（一个农业劳动者甚至承认，“这种子是剩在我借来的播种机里的”），所以只好把杂交玉米种在菜园里；如果收成好的话，那时他会说，“在菜园里长得要比在大田里好”。一个提供情况的人甚至对我们说：“我带回了一粒种子，把它种在屋前，它什么也没长出来，让我说什么……”相反，另一些没有花钱就得到种子的农业劳动者不愿让这些种子糟塌了好田，结果他们把杂交玉米种在最差的田里。

因此，产量的论据并不是像它显示的那样令人信服。质量看来没有讨论的余地，数量是以不同的和可商榷的方式测量的。况且，作为新收入来源用以吸引农民的这种数量上的增加是以高价换来的。正如人们常说的：“这种玉米，必须先购买后收获。”而地方玉米需要付出的只是肥料和劳动。

由于预先不知道年景将是好还是坏，农民不愿冒险的危险，为不确定的结果花钱。此外，“先挣钱才能攒下钱”，“如果需要借农业贷款来买肥料，那不干”！

最后，杂交玉米种下后需要很长时间才出苗，农民在种植时付出了心血和各种必要的花费，所以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从刚出土的苗上看看自己努力的结果。如果苗出土慢，他会心神不安并遭到邻居的讥笑，因为邻居种的地方玉米“起动”得很快。头一个月，传统主义者轻易地获得胜利。挖苦话随之而来：“瞧你的玉米多么懒散！”革新者只能反驳道：“懒散的是你和你那些旧思想。”同时又期望着自己的玉米快点长，赶上别人的玉米。只是在多年之后，人们才会对杂交玉米有足够的信心，才会耐心等待着它赶上去，超过巴斯克品种的玉米。

许多小的细节也使事情复杂化了。例如，杂交玉米收获

得较晚，在所有的人都完成收获后革新者还没有收获，这时他可能会被视为懒惰，并听到诸如此类的风言风语：“他有思想，但是个拖拖拉拉的人。”有些人甚至认为，和地方玉米比起来，杂交玉米的田地是“令人伤感的”。

另外，归根到底，为什么要生产更多的玉米呢？这个在经济学家看来奇怪的问题对大多数农业劳动者来说却是很现实的。一个给我们提供情况的人证实了这一点：“如果用这杂交玉米可以多生产一头猪，我是愿意干的，但我老婆的活已经干不完了！”实际上，在传统的生产系统中，玉米主要用来饲养猪和家禽，人们很少出售，如果太多了的话，也就是去市场卖个百十公升。人们也与邻居交换种子。但这差不多就是出自经营的一切。然而，妇女无力喂养大量的猪和家禽，所以人们对拥有的额外部分的玉米使用起来要比实际需要的浪费。

对这个理由，人们会回答说，可以卖掉更多一些；或者回答说，可以减少玉米种植面积，把土地用来种别的作物，在十几公顷的经营规模中，省出半公顷地是很宝贵的。但那样必须改变轮作制。不管怎么说，既然人们一直在继续种植地方玉米来喂养家禽，那显然说明杂交玉米在经营中是“多余的”，尽管这看起来是如此荒谬。

我们在前面已强调指出，一种新的作物，只有当它并入耕作系统并改进和加强了这一系统时，它才会被接受。这个一般命题，似乎不适用于这里的特殊情况，因为人们保留着同一种作物，只是改变了品种。然而，尽管这个新品种有很多技术上和经济上的有利之处，只要它没有在系统中占据位置，它就是“多余的”。对农艺学家来说，杂交玉米可以使耕作集约化，因此，如果需要的话，它会逐步获得推广。相

反，在农业劳动者看来，只要玉米的传统用途没有改变，杂交玉米就不会在作物分布中获得位置，也不会在生产系统和商品化系统中获得位置。况且，2/3的农业劳动者在种植杂交玉米后一点也没有改变他们的习惯。

玉米利用情况问卷统计表

单位：人

没有回答	7
没有变化、出售量不到产品的 1/4	58
出售得更多一些	12
出售量占收获量一半以上	12
	89

但是，在100个农业劳动者当中，有66人承认，在1959年玉米的价格是“有利的”，只有19人不承认这一点。实际上那时玉米的价格是定得相当高的，这是为了鼓励农业劳动者生产足够的玉米来取代进口。但是，人们看到，这个对“产量较高”的玉米“有利的”价格并没有成为足以说服大多数农业劳动者的论据。他们只种植一点儿，但没有下决心利用它的优势，因为这样做必须变动他们的平衡的经营系统。

特别是，当地传统喂养的肥猪不再适合城市顾客的要求，销路不好。所以，在1959年用销路好的玉米喂肥猪是不合算的。只有最具有进步意识的农业劳动者进行过这种核算，才减少了他们的生猪饲养量。

生产系统的这种单一的和有限的变化是违背它的“精神”的，因为人们所出售的，不是需要付出劳动和心血的“终极”动物产品——肥猪，而是“未加工的”植物原产品——玉米。而且，这玉米不仅没有转化成肉类，甚至没有去皮、脱粒、晒干，因为产销合作社直接收购玉米棒子。一个名符其实的

农业劳动者，应当是自己职业的专家，掌握着一个非常复杂的生产系统的技巧，懂得技术的价值，对他来说，玉米的直接出售标志着系统的明显退化和对自身才能的否定，因为这才能从此变得没有用处了。人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到，一只膘肥体壮的猪，作为长期精心照料的结果，是它的饲养者值得自豪的；而玉米，即便是很好看，却不是一件“作品”，不会为它的“创造者”在技巧上和经验上带来同样的荣耀。从这种意义上和纯粹的技术角度上看，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杂交玉米“扼杀了”贝亚恩地区的农业。

如果涉及的问题仅仅是把位置让给一个可以赚钱的新品种，那我们在前面所提出的论据可以解释大多数农业劳动者的为难之处和犹豫不决，也说明了某些农业劳动者作出拒绝的原因。但是，杂交玉米首批种植者的经历向其他人表明，这种玉米很少是单独出现的，它的种植者往往在几年之后不得不引入其它需要较大花费的技术革新。总之，杂交玉米是一系列变革的先行者。

生产杂交玉米只有在较大批量地出售时才具有意义，因此，种植面积必须比以前大。地方玉米和杂交玉米在耕种方法上的区别是很小的。然而，在有效的除草剂制作成功之前，必须反复地进行中耕以便除去杂草。如果人们没有额外的劳动力，又没有拖拉机的帮助，那么耕种两公顷以上的田地是困难的。在我们所提问的52个机械化农业劳动者中，有43人是在采用了杂交玉米之后购买拖拉机的，而那些没有采用杂交玉米的人都还没有实现机械化耕作。

我们不能说杂交玉米的引进是购买拖拉机的原因，但从年代上来看，两种现象经常是前后相随的，如果玉米的销售

收入的增加使得农业劳动者有能力购买拖拉机，那么这种相随现象就会在技术上被证明是合理的，而且在资金上也得到了解释。不过有一些农业劳动者的步骤是相反的，他们先经常是利用贷款来使自己实现机械化，然后再选择种植杂交玉米，可能是为了还债。在这两种情况下，拖拉机都花费了金钱和增加了种植能力，因此，也就促进了杂交玉米的扩展。

这种扩展自然会导致额外地购买机械设备。正规的播种方法促进了生长，方便了拖拉机的中耕。更大的收获不能再靠手工剥棒子皮和在粮仓里晾干。多年种植杂交玉米的人比其他入更广泛地使用脱皮机、烘干机、播种机和施肥机。这些机器有的大大超过了家庭经营的能力和需要，特别是玉米收获机(或玉蜀黍摘穗机)，只有在大面积收获的情况下才会是合算的。如果人们不愿意无益地额外负担设备费用，那就必须和邻居合买，或者参加一个合作组：在首批种植杂交玉米的农业劳动者中，有一半的人与邻居联合购买了脱皮机。

杂交玉米一旦进入了作物系统，为了分期偿付投资贷款，最大限度地实行集约耕作是有利的，但这会导致改变轮作系统。旧的轮作制给予小麦重要的地位，牧场占据着最好的土地，特别是在比利牛斯山激流的沿岸平原上，情况更是如此。人们对饲草几乎不进行耕作，任其自然地生长。慢慢地，小麦的微薄产量促使农业劳动者减少了小麦播种面积，增加了玉米播种面积。1公顷小麦的产量一般是25公担，而1公顷杂交玉米的产量可以高达66至80公担，不过在我们去调查的时候，这两种谷物的出售价格是一样的。因此，如果人们以玉米取代小麦，1公顷田地的收入就会翻一番至翻两番。

翻耕牧场，在多年种植玉米之后暂时种上饲草，从而使

牧场进入轮作制，这也会提高草料的产量。在比利牛斯山激流的沿岸平原上，首批冒险翻耕牧场的人曾引起公愤：把一代代土地所有者觊觎已久的牧场化为田地，在上面种植本可以在其它地里生长的玉米，这几乎是亵渎圣物。在首次试验的10年之后，这仍然是最棘手的和最有争议的技术问题之一。一个与我们谈论这个问题的农业劳动者否决了这种荒谬的作法：“怎么，让我翻耕牧场以便随后再重新种上饲草？”

牛的饲养者从这种集约化中得到好处：牛犊的生产慢慢地让位于牛奶的生产，随着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牛奶很容易出售。这样，整个耕作系统发生变化，走向很容易商品化的大众性生产：玉米和奶。看到这一变动，农民犹豫不决了。他不无理由地感到，采用杂交玉米会使他卷入一系列无法控制和无法逃避的困境中去。他将不得不变成一个现代农业劳动者，重新向最为确定的观念和价值提出质疑。

此外，冒险进行尝试的人作出的表率并没有很大吸引力。据说，这种本应使他们发财的玉米结果只给他们添加了新的花费，迫使他们负债。况且，正像人们所说：“贷款买东西是不好的。”因为随后“人们就成了借贷的仆人”。当然，这些投资在较长的时期内可能是赢利的。这是一场关于未来的打赌，对于根据过去和现在作出判断的人来说，打这种赌似乎是不太合算的。

除了机器、化肥、新轮作制和负债，杂交玉米还使农业顾问进入农场。很多人认为：“顾问，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农场帮工。”过去，每个农民都知道怎样种植玉米，他常常看到父亲和邻居种玉米。有些更为精巧或拥有更肥沃的土地的人可以获得更好的收成，但所有的人都遵循已经得到证明的有益习惯。与此相反，技术上更为复杂的杂交玉米却要

求重新学习如何种植，并要小心翼翼地遵循技术人员的告诫。

然而，这些技术人员在技术上似乎并不太令人信服，他们在这一年告诉人们做的事与他们上一年告诉人们的相反，以致使人们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道应当相信谁。起初，当播种机还未普及的时候，为了实行正规的播种方法，农业顾问说要按梅花形种植，用一根小棒确定间距，就像人们过去种地方玉米时那样。看到“革新者”重操祖辈的种植方式，邻居们感到十分好笑。新玉米用老方法种植，这成了逗乐的好话题。随后，根据播种机、拖拉机和工具的改进，行距和间距必须相应地加宽或缩小。同样，在开始的几年，技术人员告诫说要正好在播种之前耕地，随后，同一技术人员又说，最好在播种之前几个星期耕地。当然，这是有原因的：耕地可以使田地作物生长初期不生杂草，但当人们使用有效的西玛津除草剂时，让土壤在翻耕和播种之间透透气是有好处的。

技术人员有他们的理由，这些理由可能是正确的，但农民却无法再搞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约翰说人们让他这样做，保罗又说人们让他那样做：谁是正确的？什么样的技术员是最好的？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农民很愿意接受一个完全经过证实了的、由某个值得信赖的人提出的新习惯，但信赖谁呢？此外，某些技术人员会掌握不好分寸，从而严重地妨害了他们所捍卫的事业。在一次会上，一个技术员断言：“你们不知道利用你们的土地。”这句话传遍了全村，谈论这件小事的人作出结论说：“我们不需要这种江湖医生，我们自己会给自己出主意的。”

还有更为严重的后果。如果农业劳动者无法再依赖经过

检验的良好习惯，那他就必须信任农业技术人员，以便知道如何行事。而且，如果技术经常地改进，内行的农业劳动者就必须不断地期待从技术顾问那里得到引进新事物、从事改进和进行变革的建议。这样一来，他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了，他永远需要一个师傅来向他传授知识。这种由进步所强加的技术监护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创造了一种令人回想起童年和学校的心理环境。传授陈规的父亲已经不在，但他找到了一个新父亲，他不再被称其为成年人了。他认为已结束了的学徒生活变成终身的生活了。正像许多提供情况的人自豪地向我们宣称的那样：“我不是接受别人建议的人。”或者：“我不需要被人指挥，他告诉我的一切我都知道”。此外，所有的人都认为，“教给我们种地的绝不应当是这样一位先生！”让我们再次指出，人们更喜欢的是一个听从指挥的帮工，而不是一个提建议的技术员。

最后，我们已经说过，在纳依地区，杂交玉米只有以出售为生产目的，并且当其出售量远远超过当地市场需求量时，它才具有种植的价值。那时，就必须把玉米销售给波城附近的比利叶尔产销合作社。该合作社是由玉米种植者联合会建立和组织的；这是法国农业的杰作之一，它曾吸引赫鲁晓夫到波城参观。为了给自己的成员省去各种麻烦，产销合作社配备了在收获结束后直接到农场收购棒子的货车，棒子不需要晒干和脱粒。这么多的细心关切真让人感到不安。普通的生产者没有十分坚定的“合作”意识。人们对他们解释得很清楚，比利叶尔的那些大粮仓是为他们准备的，但他们几乎不相信，他们感到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小生产者，而面对着的是他们无法控制的大企业，这大企业是否具有诚意，决定着他们的兴旺和破产。如果明天产销合作社的货车不来了，

如果合作社降低了价格，小农又有什么救援措施呢？

自给自足使农民不必依赖权势人士，从而确保了农民令人羡慕的独立性。但种植了新玉米后，他们模糊地或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独立性丧失了。那些宣扬这种玉米、领导着这些联合会和合作社的人，难道不属于那种长期的历史经验告诫他们要当心的权势人物吗？不合群的独立性是贝亚恩地区的农民、也是其它地方的农民最大的骄傲。人们想以杂交玉米拯救他们，但却很可能毁掉他们身上最独特的东西。

人们看到，杂交玉米推广人运用的“合理”论据遭到了农业劳动者同样合理的反驳。每一方都处在自己的宇宙中，有自己的关于动机和价值的心理世界和社会天地。推广者只看到每一细小变化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带来的好处，却没有深刻地体会到变化所带来的使农业劳动者感到不安的最终结果。更容易影响农业劳动者的是他们的整个生活体系，而不是细小的进步。然而，尽管有这些反对和这些不安，尽管其它的事物比我们将在后面所叙述的事情更具有扩散力，杂交玉米在法国的整个西南地区和纳依平原推广开来了，因为在1958年，在那里80%的农业劳动者种植了杂交玉米。

早在战前，有人就曾试图把一种意大利的玉米新品种引进法国南部。教师们向年轻人进行了宣传，分发给他们种子、肥料和使用说明。1934年，在世界玉米会议于波城召开之际，曾举行过一个展览会，人们可以很方便地把意大利玉米与当地玉米加以对比。但几年以后，大家又都重新种植地方品种。这次试验告诉农业劳动者，世上存在着其它品种的玉米，在某些方面要优于地方玉米，但同时也使他们更加坚信，地方玉米是最佳的和最适合于当地条件的玉米。

来自美国的杂交玉米在大战刚结束时就传入了西南地区，直到1950年前夕，农业服务机构和职业组织才进行了相应的推广运动。1951年，一群农业领导人、地方联合会主席和进步的农业劳动者到美国进行实习。愿意种植新品种的农业劳动者得到分配的津贴、种子和肥料。1952年，举办了一项集体活动。如果在一个村庄里有10名农业劳动者自愿地进行3年的实验，他们便可以得到津贴和贷款，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同意严格地采用杂交玉米所需要的一切新技术。到第三年，人们延长了津贴和贷款，鼓励农业劳动者暂时地种植牧草。有一些津贴，特别是实物津贴(如播种机)是给予合作组的，用以鼓励他们共同劳动和对比得到的实验结果。

从这个时期起，严格按规则行事的农业劳动者的实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他们往往联合购买农业机械，特别是玉米摘穗机，甚至组建了灌溉合作组。这些小组成为其他农业劳动者的样板，地方部门专为后者组织了参观和示范表演。同时，使1954年成立的比利叶尔产销合作社增产的产品得以销售出去。

与这种集中的和直接的活动相配合，各种职业新闻周刊还进行了文字宣传，其中较突出的是农业管理局出版的《田野》周刊。调查的结果表明，最早种植杂交玉米的农业劳动者自然也最为普遍地阅读技术杂志和小册子。但人们无法说明，阅读这些杂志在何种程度上起到了激励他们采用杂交玉米的作用，或者采用杂交玉米在什么程度上使他们相信，阅读这些杂志是有益的。对杂交玉米推广会议的看法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在最先种植杂交玉米的农业劳动者中，62%的人认为，这些会议对于促使他们进行实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30%的人看法相反；在最后的三年里采用杂交玉米的人

阅读杂志和采用杂交玉米问卷统计表

	采用杂交玉米者			未采用杂交玉米者
	1952年 及以前	1953年至 1955年	1956年至 1958年	
阅读杂志者	81%	55%	40%	21%
不阅读者	19%	33%	60%	74%
未回答者		12%		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当中，这个比例颠倒过来了。有关产品交易会和产品展览会的回答，比例的分布情况也是一样的。

推广会议和采用杂交玉米问卷统计表

	采用杂交玉米者			未采用杂交玉米者
	1952年 及以前	1953年至 1955年	1956年至 1958年	
参加会议者	62%	39%	30%	26%
未参加者	30%	61%	68%	74%
未回答者	8%		2%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相反，随着杂交玉米的普及，杂交玉米田差不多到处可见，关于这方面的谈论也变得更为经常，这样，与农业劳动者的交谈和观察邻居的田地就自然变得重要多了。最先采用杂交玉米的农业劳动者还记得他们曾去其它村观看示范田。

在1953至1955年作出选择的农业劳动者会认为，他们作出决定时并没有观看杂交玉米田。1956年以后不同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在邻近或其它的田里看到杂交玉米。对于是否受交谈的影响的问题，回答的比例分布基本上是相同的：在1953至1955年作出选择的人比其他人(50%，而不是70%)更少感到他们的决定受到交谈的影响。

美国的调查曾强调指出，每个农业劳动者在最后作出决定之前，都愿意进行个人的实验。在贝亚恩地区，耕种面积一般都非常小，以致很难知道哪一块是实验田和哪一块是“正常”作物田，因此，在这方面也要靠农业劳动者的记忆和“感觉”，正像我们可以预料到的，在最先采用杂交玉米的人当中，有3/4的人说做过实验，而在刚刚决定种植杂交玉米的人当中，则只有40%的人回答做过实验。不要忘记，在没有采用杂交玉米的人当中，有一半说做过实验，但随后也放弃了。

杂交玉米采用日期问卷统计表 单位：人

1952年或以前	13
1953年至1955年	18
1956年至1958年	49
未采用杂交玉米者	19
合 计	99

这个统计表清楚地表明，先行者们的尝试经过多年才普及开，使其他人信服了。在最初的试验之后，人们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推广运动，但杂交玉米仍需在许多农业劳动者对它进行5~6年的实际检验后，才最

终被大多数农业劳动者所接受。这个检验期限过去后，大多数农业劳动者在1957~1958年同时作出采用杂交玉米的决定。随后，连最无动于衷的人也无法再独自处于时代的潮流之外了；正像其中一个人向我们所说的：“他妈的，我必须相信它，这杂交玉米！”

家庭中的父子关系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更为细致的范例研究必须考虑到这种关系。在贝亚恩地区的农民家庭里，父亲保留着十分明显的家长型权威，比别的地区更为突出的是，儿子在父亲在场的时候显得微不足道。特别是在陌生人面前，儿子应当默默无语。只有父亲才是经营和家庭的“负责人”，他也常常认为，“年轻人有时可以有点离奇的想法，但当涉及到收获时，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年轻人是科技推广运动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基督教农业青年联合会的成员，他们参加会议总是支持新事物。但让青年人去向老年人介绍新事物，这往往并不是一个使老年人接受新事物的好方法。有时推广运动的年轻鼓动者与他们的父亲有争执，无法在自己的家里实现他们向别人夸耀的事情。许多年轻的经营商指出：“如果我是独自一人的话，我会更早地种植杂交玉米”，或者“在父亲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在一次交谈中，一位年轻人向调查者说，他将不再种地方玉米，这时在旁边静听着的母亲忍不住恐慌地说：“你这样想？”调查的结果证实，年轻人比他们的长辈更加赞成采用杂交玉米。

一个经营家庭没有孩子常常是经营主不关心改进生产的原因：“当人们没有孩子时，对自己的发展是不在乎的”，而“有一家子人的经营主则会力求繁荣兴旺”。一位父亲这样为自己辩护：“我知道杂交玉米的产量较高，又需要很多肥料；我是赞成种杂交玉米的，但我老了；如果我有儿子，我会劝

他们去干的，但就自己来说，我不愿太疲劳了。”另一位父亲承认，他之所以采用了杂交玉米是因为“儿子说要这样做”。一个儿子说：“对父亲来说，开始时是很难接受的，但随后在结果面前……”此外，似乎经常是父母对饲养业更感兴趣，而年轻人在作物收成好的情况下更喜欢种植业，因为种植业具有较少的约束性。

如果人们考虑到经营的面积，将会使分析更为精确，但我们掌握的数据非常有限，以致于只能提出一些感受。我们提问了一些有着5公顷以上耕地的农业劳动者，他们按以下的格局分布在有效农业面积(S, A, U)的各个类别中，有效农业面积在农村经济学家那里是指适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可耕地、一直长草的土地、可植树种菜的耕田。所有土地经营规模在15公顷以上的农户都采用了杂交玉米，但采用的时

采访经营户有效农业面积问卷统计表 单位：人

6.5公顷 以下	6.5~9.4 公顷	9.5~12.4 公顷	12.5~15.4 公顷	15.5公顷 以上
25	24	25	14	11

间多少晚一些。相反，土地经营规模在12~15公顷的农户很多都是在1952年之前进行实验的。最晚采用杂交玉米的是土地经营规模在6~9公顷的农户。所有的小经营者（6公顷以下）都追随中等经营者的动向，有些甚至属于最先采用杂交玉米的那批农业劳动者，在1952年之前就进行了实验。

从革新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类别都处于特殊的地位，具有以下的特点：

——最小的经营者和“次大经营者”（有12~15公顷有效农业面积）由于处境最困难，所以都是最先寻求新事物的。

——最小的经营者试种杂交玉米是为了使土地发挥最大的效益，加强自给自足的生产系统，有时他们进行的小实验取得了成功，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把实验继续下去。

——“次大经营者”感到，要想在市场经济中生存下去，他们必须走在先进的最前列，迅速地装备和扩展自己；他们经常地阅读技术刊物和参加技术会议，也最少在作出决定之前进行实验。

——相反，中等经营者和大经营者会静观事物的变化。“中等偏下经营者”(6~12公顷)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危急处境，他们丧失了一切对前途的关注。

作为假设，建立一个扩散模式来概括地说明每个类别的作用和集体机制的动力是可能的。开拓者树立的典范和杂交玉米的推广运动最初受到了嘲笑，但随后引起所有农业劳动者的兴趣。接着，一大批经营者在经济的和技术的论据面前完全信服，作出了决定，从而带动起大多数农业劳动者，追随他们的首先是“次大经营者”，继而是中等经营者和小经营者。“中等偏下经营者”落在最后面，似乎可以说根本不关心自己经营的发展。

经营者的信息渠道、实验和规模问卷统计表

	6.5公顷以下	6.5~9.4公顷	9.5~12.4公顷	12.5~15.4公顷	15.5公顷以上
阅读技术杂志者	44%	20%	44%	71%	45%
参加技术会议者	48%	16%	36%	51%	36%
观看邻近实验田者	36%	83%	56%	35%	54%
进行实验者	60%	43%	63%	42%	72%

一个中等的土地所有者主动地描述了这种机制：“如果是小经营者进行实验，我不理睬他；如果是个中等经营者进行实验，我要考虑一下；如果是个大经营者进行实验，我信赖他！”一个小农也证实了这个假设：“我已进行了4年的实验，但我没有大胆地投入种植；今年，一个大经营者开始实验了，我将全力投入。”大经营者都是在权衡利弊之后作出自己的决定的，而小经营者依靠对别人的信任作出决定。由此可见，小经营者是根据大经营者的状况和动机不自觉地作出决定的，但大经营者的状况与他们的自身状况有很大不同。此外，小经营者经常表现出怨恨，不管这怨恨是否合理：“大经营者没有全部告诉我们。”“他们曾说不应这样做”，“他们对我们这样说是为了蒙骗我们”。

只有通过社会测定和历史分析才能检验和完善这种扩散模式，这种模式很少能够这么简单地被观测到。必须确切地知道，谁和谁交谈，谁影响了谁，谁观看了谁的田地，等等。在这类村庄里，一个提供情况的人可能会把这几个农业劳动者划为一伙“互相无话不谈的人”，把那二十几个农业劳动者划为“听众”，而把另外的十几个农业劳动者划为“从来见不到影”的人。

杂交玉米的引进在小经营者和大经营者中带来明显不同的变化。在有10公顷以下的经营者中，50人当中只有8人放弃了地方玉米。两种玉米平均每一种占 $1/6$ 的有效农业面积，两种共占 $1/3$ 有效农业面积，这明显地超过了其它作物的平均种植面积。只有一部分农业劳动者表示出售的玉米比以前多。对更多的人来说，杂交玉米的引进是以某种方式补充了地方玉米，使得可以增加猪和家禽的饲养量。杂交玉米巩固了自给自足的生产系统，这样后者可以持续一个时期，特别

是如果家庭具有非农附加收入、从而可以用货币购买必要物品的话，情况更是如此。2/3的农业劳动者没有拖拉机：购买了拖拉机的农业劳动者处境微妙，因为人们看不出他们怎么能够分期付款购买拖拉机的贷款，除非是他们能有额外的农业收入来偿付。

在有12公顷以上的经营者中，玉米的种植面积很少超过1/4的有效农业面积，在有15公顷以上的经营者中，玉米面积甚至降到占有效农业面积的1/6。然而，杂交玉米的种植面积比地方玉米的面积多2~3倍，差不多有一半的农业劳动者表示比以前出售更多的杂交玉米，这突出表现在具有12~15公顷耕地的农户中。每25个农业劳动者当中，有8人放弃了地方品种，这些人似乎也多半是具有12~15公顷耕地的农户，他们明显地放弃自给自足的传统体系，追随更大的经营者（15公顷以上）走向市场，这些更大的经营者在杂交玉米引进之前就已经选定了市场这个新方向。

这样人们清楚地看到，杂交玉米几乎像所有的技术革新一样，将会划分出一条分界线，一边是采用杂交玉米并且从中获益的人，另一边是拒绝采用的或采用之后只是暂时地改善了经济困境的人，或由于进行轻率的投资加剧了经济困境的人。例如，一个有5公顷耕地的农业劳动者刚刚买了拖拉机，却声称没有足够的钱来买种植杂交玉米所必需的种子和肥料。现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机会已过去了：传统作物的收入减少了，玉米的价格降低了，“起步”和进行必要的投资越来越困难了。

总之，杂交玉米的普及所带来的变化表明，农业劳动者有一种正确的预感，他们感觉到这不简单地是用另一个品种来替换另一个品种的问题，他们面临的是在自给自足的传统

农民经济和以市场为目的的大众化生产之间作出根本的选择。在新事物面前犹豫不决的人，或在接受新事物的同时想把新事物并入传统体系而不改变这一体系的人，都模糊地意识到，杂交玉米最终只是一个信号和一种手段，他们实际上面对着的是一个新的社会和一个新的经济体系。不幸的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拒绝新事物的一切努力都无法拯救他们，相反却使他们最终走上末路。

因此，可以再次理直气壮地说，杂交玉米扼杀了地方农业，如果人们把地方农业理解为农业的和村庄的传统社会的话。因为它扼杀了小农，随之也就扼杀了整个社会分层系统和社会生活方式。过去的贝亚恩村庄正在消亡，村民们知道这一点，一个向我们提供情况的人作了预告：“照这样下去，10年之后，将不再有小农了。”

一个表面看来是十分温和的技术变化，其间接结果却可能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它的出现必然伴随着嘈杂之声和神话般的虚构，带来由于它的导入而加剧了的农业劳动者内心深处的焦虑以及社会的和政治的紧张局面。我们在前面已指出了革新者在技术方面会碰到的实际困难，但我们也可以编一大本人们关于杂交玉米所说的蠢话。

一些人毫无顾忌地断言，用杂交玉米“不能把猪喂肥，因为它瘪得光剩下皮”，更有甚者，“它会给猪带来瘟疫”。另一些人还认为杂交玉米“破坏了土地”。贝亚恩地区的农民凭着想象力过分夸张杂交机制的作用，认为杂交玉米田可能会使邻近的地方玉米田串种，并为此表示担忧：“在我看来，这事以后将会引起争讼的。”

有的人甚至认为，杂交玉米需要这么精心的照料，令人

难以信赖，因为很显然，“人造的玩意总是人造的”，“它将会得病的，并会随后传染地方玉米”，或者还说，“人们将会使地方玉米退化的”。不管怎样，这是种时髦，它会过时的，就像一切时髦一样，特别是像战前的意大利玉米。人们还经常地听到农业劳动者说：“走着瞧，以后还得重新种植地方玉米”。那么，没有必要采用杂交玉米随后又放弃它：“时髦，我们瞧不上这个。”

这样，就确立了一种有时表现为敌对的比较，一边是人们给予认同的地方玉米，另一边是城市的甚至是美国的“带眼镜的先生”带来的玉米。

的确，我们说过，人们曾去美国寻求这种玉米，人们通常称它是“美国玉米”。不过，直到现在，贝亚恩地区的农民从美国那边得到的只是灾难：葡萄根瘤蚜虫害和马铃薯甲虫。这种记忆和这些经验使得他们认为，美国玉米会带来流行病或其它一些隐秘的病害。

杂交玉米没有巴斯克大粒橙色玉米那样的丰满外表和强壮模样；它气色不好，就像城里的人一样。它是娇弱的，因为它要在很长时间才出苗，还会受到杂草的危害，人们还要施很多肥料帮它生长。长期以来，很多人就说：“人们当然也可以把为美国玉米所做的一切，给予自己的玉米，他们将会看到自己的玉米生长得更好”。

有些人希望不管他人说美国玉米怎样，要自信美国玉米并不比巴斯克玉米“更加高级”和“更加优良”。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他们开始进行反实验和逆向实验。他们像种植地方玉米那样种植杂交玉米，结果收成是糟糕的，明显地低于当地玉米的收成。于是，他们得到了证据：巴斯克玉米比美国玉米“更加优良”。某些人甚至把科学思想推向极端，试验像种

植杂交玉米那样来种植巴斯克玉米，给它施更多的化肥。后果同样是非常糟糕的：长得太高的玉米秆倒伏下来，玉米棒子也没有长得更大。“实验者”一点也没有想过，每一种玉米都应按它所要求的那样去对待它。与这种“相对主义”截然相反，“实验者”得出的结论是，化肥对地方玉米是有害的，所以它在本质上就是“坏的”，因而也不应该给杂交玉米施化肥，因为坏的东西不会造成好的结果。

被推到荒谬地步的逆向试验造成一种扩散得更广的看法：这外来的玉米要想最终落脚必须适应当地的环境。有些人认为，杂交玉米永远不会真正地适应环境：“你去找棵朱朗松葡萄种在这儿看看，它不会长，玉米也是一回事”。另一个具有较少悲观色彩的人说：“我没有施肥料，因为必须使它适应当地的环境”。这等于是想让杂交玉米接受折磨、锻炼和过渡的仪式：“杂交玉米应当在与巴斯克玉米同样的条件下经受考验”。换句话说，应当是它服从于我们的耕作习惯和乡土条件，而不应当是我们为了“这位需要特别照顾的小先生”来改变自己的习惯。总之，一个向我们提供情况的人以一种确定的和无可辩驳的口气说出了这些观点的隐蔽论据：“地方玉米是这里的玉米，而美国玉米来自美国。”人们怎么能容忍在贝亚恩地区美国玉米比贝亚恩玉米更高贵？这难道不是荒谬的事和对贝亚恩人的侮辱吗？

这种道学家的善恶二元论还夹杂着对植物的拟人化，后者一方面可以促使对“我们的”玉米具有相当强烈的心理认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混淆了道德的价值系统和技术的、经济的评价系统。在论证之初，人们仿效技术人员和科学普及者的评价方法，运用一些人们希望尽可能“符合理性的”“经验”，这些“经验”旨在检验真正的“假设”。而随后人们却用

道德价值的术语来陈述这些假设：即存在着好和坏、善和恶。于是，对“经验”的解释只能是为了有利于善：它显示和揭穿了看起来比善更诱人的恶。

技术的和经济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产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在这个层次上，这个体系对贝亚恩地区的农业劳动者来说是陌生的。在他们看来，数量不是一种价值和一种令人满意的论据。一个农业劳动者不无遗憾地说：“如果这不是一个数量问题的话，我就对杂交玉米不再存有疑虑了。”然而，技术人员和经济学家的决定性论据恰恰是数量。农业劳动者常常很容易讨论技术方面的问题，但似乎很少讨论金钱的和经济的事情，然而后者通常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可以录下农业劳动者关于杂交玉米的交谈，一些迹象会使人们认识到，说服他们的关键论据应针对种植的技术细节和道德的、家庭的以及社会的整体背景，也就是说，应针对困难、麻烦和危险。

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归根结底，不管表面看起来怎样，贝亚恩地区的农民是出于经济的动机作出决定的，因为有一天他们会感到，是事物的发展迫使他们作出决定。但是，对于贝亚恩地区的农民文明来说，谈论金钱和财政管理大概是不适宜的。在这种文明中，谈话的艺术达到较高的程度^①，有些论题适合于讲话，而涉及别的论题是不礼貌的，因为那些论题带有私人的和隐秘的色彩，可能会暴露属于私人领域的一些个人的情感和状况。如果这种解释是成立的，那么由此可知，农业劳动者从来不谈论他们作出决定的真实理由，这些理由只是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相反，他们展开讨论的

^① 莱福布沃，1965年，第150页。

整个话题充满一般的看法和技术的细节。

在这种情感反应的层次上，只要再往前跨越一步，争论就会染上政治色彩。在贝亚恩地区，这一步跨越得更加轻松，因为那里的政治生活十分活跃，而且由于巧合，当极左派发动反对使法国美国化和“马歇尔化”的攻势时，美国玉米也开始惹出问题。共产党的一些活跃人士不失时机地提出，杂交玉米应和里奇威（Ridgewag，美国将军，朝鲜战争中接替麦克阿瑟任“联合国军总司令”——译注）一起滚回老家去。如果这玉米在来自天主教运动的青年农业劳动者中找到最热情的宣传者，它就更容易被卷进地方政治角逐，极左派展开反对它的运动就完全是正常的了。

这样，那些“社会进步”的最积极辩护人却打着“民族独立”的旗号反对技术进步和经济进步。总之，通过一种奇特的逻辑轮回，他们的形象染上了捍卫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的和等级制的农民社会的反动色彩。这个悖论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是表象的，之所以还说它是真实的，是因为我们已指出，杂交玉米使小农走向无产阶级化，使资本主义体系进入贝亚恩地区的农业。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阐述农民状况的矛盾和找出适合于农民状况的行为准则是有些困难的。

此外，必须承认，贝亚恩地区农业组织的政治史和联合会史必然会促使农业劳动者寻找杂交玉米背后的政治后果和隐秘企图。战前，下比利牛斯省的农业联合会运动是由个性很强的M·德·莱斯塔比领导的，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造就了整整一代青年活动分子，今天这些人在省城和巴黎担任着领导职务。特别是，莱斯塔比的思想继承人成为玉

米种植者联合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比利叶尔产销合作社的创建人之一。自大战以来，基督教青年农业劳动者联合会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管人们是表示承认还是感到遗憾，一个农业劳动者可以不无理由地认为，在一切涉及到农业进步、特别是杂交玉米的问题上，政治网络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至于教会，它也毫不迟疑地与技术进步和经济成就结盟。一个布道神甫会像列举事实一样断言：“没有和我们站在一边的，都是些要破产的小经营者。”教会在巴斯克地区特别强大，100年来，那儿一直是一个敌对的边邻地区。因此，一个有成见的人可能会很自然地议论起“神甫们的玉米”。况且，如果是小经营者，当他意识到自己无法追随现代化的潮流，已注定在短期内就会垮掉，那杂交玉米和它的引进者就自然成了他诅咒的对象。这样，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出的假设就非常合乎逻辑地得到说明。根据这一假设，共产党人是反对种植杂交玉米的，而天主教徒是赞成的，这个假设没有用已掌握的材料进行验证，但它作为神话也是有价值的，它在美国玉米挑起的大辩论中发挥着作用。

如果不参照各个省的和整个法国的政治史，农业组织的历史就无法得到解释，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看到这一点。农民从经验中懂得，过去那些要为他们服务的人都存有一些政治隐秘企图，那些人期望借助于提供的服务来获得某种影响。农民很自然地认为，人们来向他们宣传杂交玉米的好处，向他们提出建议甚至提供津贴，把卡车一直开到他们家门口来购买他们收获的粮食，这里面肯定有有些什么个人利益。人们花这么大的力气不会没有理由或出于纯粹的奉献精神。这么多的关切，背后一定掩饰着什么，肯定要某个人在某个时候表示“感激”的。对战前的政治生活几乎没有记忆的年轻

人较少猜疑，因为他们认为，在今天，经济和技术与政治已不是那么密切相关。但他们的长辈很自然地倾向于从现在的事物中寻找他们过去的经验。归根到底，谁能说他们没有理由呢？

“政治”的危险并不仅仅存在于意识形态方面和选举方面。农业劳动者已变得越来越依赖于技术顾问和合作社以及行业联合会的领导人，对于他们来说，“政治”的危险表现在更直接的方面。一个向我们提供情况的人用这样的话表示出他的不安：“我们不得不收集资料，我们不再能自由地按我们的意愿思考问题”。一切丧失自由的危险，尽管是十分微小的危险，都会使农民非常不安，因为他们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赢得了自由。

在村庄本身中，这些农业变革使部分机构和势力得以施展影响。为了得到农业信贷银行营业所的贷款，申请卷宗要由区董事会研究，董事会里的成员都是农业大户，过去正是他们的父亲把钱借给处在贫困之中的农民。现在他们用“国家的钱”而不是自己的钱放贷款，他们代表着始终控制着村庄贷款的同一家族。在过去，请求人们借钱给你，就等于承认你自己入不敷出，是耻辱的。年老的父亲看到儿子贷款，脑海里就会重新浮现不堪回首的往事，即便这贷款是用于象征着进步和致富的投资，因为必须总是向同一类人恳求帮助。此外，为了说明申请借款的理由，必须解释自己的境况，把自己的经营状况暴露给陌生人：“一切都要申报，所有的村民立刻就都知道了你的家底”。

最后，在村庄里，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目的。最好的证据是，那些如此迷恋技术和如此轻视政治的年轻人却在1959年的市镇选举中提出了候选人名单，并在那些最具有现

代意识的村庄里“夺得了乡政府的大权”。如果说是杂交玉米给乡镇议会带来了变动，某些人的政治猜疑就不会像乍看起来那么出格了。众所周知，乡镇政府是整个政治生涯的垫脚石。这在各地都是同样的，如果人们不进行强烈地抵制，恐怕他们会控制全省的整个联合会生活、职业生活和政治生活。

* * *

一个作用有限的技术变革竟具有这样直接的政治反响，它再次证明，在乡村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紧密地相互依存的。我们已看到在技术方面，杂交玉米不仅仅会取代地方玉米，还会淘汰其它的谷物，因为它能使产量翻一番或翻两番，并使投资逐步收回本利。杂交玉米的推广者借助于这些论据鼓动农业劳动者放弃收成不好的小麦作物，激起了“真正的”农民的极大愤慨。其中的一员曾惊呼道：“那么告诉我，先生，农民不生产自己的面包还算是是什么农民？”由此揭示了一个根本的和全面的冲突，冲突的一方是传统的农民理想，即耕作是为了养活自己和确保经营与家庭的延续，冲突的另一方是生产者的利益，即寻求尽可能大量地生产价格最好的产品。小麦是“制作面包的谷物”，它还不如“人们喂畜禽”的玉米值钱，这在农民看来是令人愤慨的和违背道德准则的。因此，这后面肯定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理。

对作物的投资由于它所具有的风险，也与传统的观念发生了冲突。根据地方上的耕作习惯，人们把土地生产的部分东西以种子和肥料的形式还给土地。另外，人们给予土地一切有益的照料，盼望土地能根据气候条件奉献出可以称得上丰产的收获。这样，人们“预付的”只是他们的劳动和上年节省的产品：“我们使用我们拥有的东西，但我们不买东西”。与此相反，现在需要买种子、肥料和除草剂，这就等于下了一

个“赌注”，去等待人们永远没有把握得到的收益：“必须先付款，而人们不能肯定会把这钱收回来，这就像是国家彩票，我从不玩那玩意儿！”难道还有什么比彩票与土地更不相干的吗？把土地当作彩票，这真是亵渎圣物：一个真正农民的整个职业意识和道德意识都是与这种想法水火不融的。

挣钱当然是值得羡慕的，但数年来的通货膨胀加强了农民的价值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金钱不是一种可靠的价值。真正具有价值的只有土地，因此要想富起来必须种好田，而不是进行侥幸的投机，投机似乎会迅速地带来收益，但却没有前途。

另外，农民也企图“利用”玉米的有利价格。市场和集市上的价格是商人们制定的，不管这价格是好是坏，农民必须承受，就像承受变化无常的天气；农民几乎不可能再把畜禽带回农场，即使是他们不同意把价格压得太低。但农民从未想到要改变自己的耕作系统，因为他们期望下次集市的行情将会有所不同。他们按照规矩从事生产，竭尽全力进行出售。然而，这种并不好看、也不“按照规矩”种植的玉米却销路很好；所以说，决定采用这种玉米就意味着放弃生产者的意识，转而接受玩弄价格把戏的商人意识。“至于我，先生，我从未想进行投机”，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农民会感到愤慨，他认为自己是诚实的，因为他是生产者，而不是靠价格来赚钱却什么都不创造的商人。人们不能冒昧地说无商不奸，但他们内心里却这样想。此外，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诚实的农民可以在集市上不必诚实；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些足以表明，这种美国玉米会被视为道德堕落的危险，而建议种植这种玉米的技术员会被视为引诱人的恶魔。这些再次意味着，而且是在最为深刻的层次上意味着，这杂

交玉米有可能以恶毒的方式来扼杀农业劳动者，使他们腐败堕落和丧失道德贞操。

而且，如果说人们可以信赖这玉米的价格，那应当是能够靠此谋生和尽可能地卖更好的价钱。但在1959年，人们一般都承认，这玉米的价格已经过高了。那么，如果大家都开始种杂交玉米，“他们的产销合作社怎样处理这么多的玉米？”于是，价格将会降低，“我们将再次受骗上当”。这种担忧也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价格在1960年开始下降，但经济学家是按照他不可改变的逻辑来回答这种忧虑的：“在你们经营的全部土地上，只生产玉米，连续地种植玉米，不要轮作，有目前的肥料这是可能的，如果种上10至15公顷玉米，每亩收获70公担的话，以现在价格，你们就发大财了；要利用目前的价格所持续的时间，最大限度地投资，扩大你的经营规模，配备农业机械，等将来价格跌落的时候，你再转向别的生产”。但以下就是杂交玉米引导人们进入的那个系统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传统耕作系统全面解体，被单一耕作所取代，农民失去了独立和经济保障，变为投机家；冒险和道德沦丧。

如果农业劳动者接受的训练和获得的信息可以使他懂得和理解现代经济的基本机制，他就能够随着市场的变化行事和作出预测。过去，农业劳动者种植玉米是为了把猪和鹅养肥，然后卖给波城或其它地方的居民。他们可以观察到整个进程，并能够局部地控制这个进程。现在，他们必须额外生产出很多玉米，把原产品送到产销合作社。同时，法国很多原来不种植玉米的地区也开始种植。在博斯地区，玉米取代了甜菜，然而那里并没有贝亚恩地区那样的日照条件。产生疑问是可以理解的：“人们在巴黎要这么多玉米派什么用场？”

“据说要把玉米运到南斯拉夫去，那儿的人们缺少这个。”况且，“由于有共同市场，所以需要更多的玉米”。所有这些思索都显示出，面对大量的玉米，农业劳动者产生了一种恐惧，因为他们想象不出这些玉米运往何方和派何用处，同时也流露出生产者存有的焦虑，因为他感到自己对玉米的这种堆积也负有一份责任。

为了不放弃对价格和销路的全面控制，农业劳动者可以组成行业联合会和合作社。通过向当局施加影响，行业联合会可以使价格不会剧烈下跌。合作社贮存起超量的产品，寻找销路。但是，我们已说过，这些机构似乎经常与政权本身同样地令人不安，农业劳动者在这二者面前感到同样地束手无策。他们很少能把二者区别开来，如果他们怀着同样的敬畏把二者混淆在一起，那他们会由此很自然地认为，这杂交玉米是当局和管理机构对他们的事务进行干涉的一种新手段。他们甚至会最终作出这样的推理：“他们告诉我，种这种玉米可以挣更多的钱，这大概是想使我纳更多的税，因为现在人们成了收税官的佃农”。西班牙北部的纳瓦拉省总是希望保持与法国、巴黎及其行政官员的距离，人们特别羡慕它的自主^①。

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杂交玉米种植能手曾用一句简短而富有表现力的话概括了前面的整个过程：“这新玉米迫使老规矩反省”。在这句赞许的话之后，他立刻又补充了保留意见：“这些美国人，他们给我们带来了烦恼”。另一个人为其添加上推理的中间命题：“总是要干得更好！我们又不是在当苦役！”

^① 勒费布沃，1965年，第131页及其它一些地方。

最后一个发言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过去，人们生产的比现在少，但生活得更好，今天，你要像牲口一样地干活，为的却是供应另一类人”。并且，曾预言过贝亚恩地区农业将会死亡的人不愿意改口；他将此归罪于杂交玉米，但他没有看到，杂交玉米带来的整个技术文明从各个方面包围着农业文明，技术进步和经济进步的要求最终宣告了农业文明的必然消亡。如果说美国代表着这种新的文明的典范，那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贝亚恩人指责美国人“给他们带来了烦恼”。这是“别人”的和“他们”的新型化身，而法国人、特别是法国的乡下人总是指责“别人”和“他们”使其“不得安宁”^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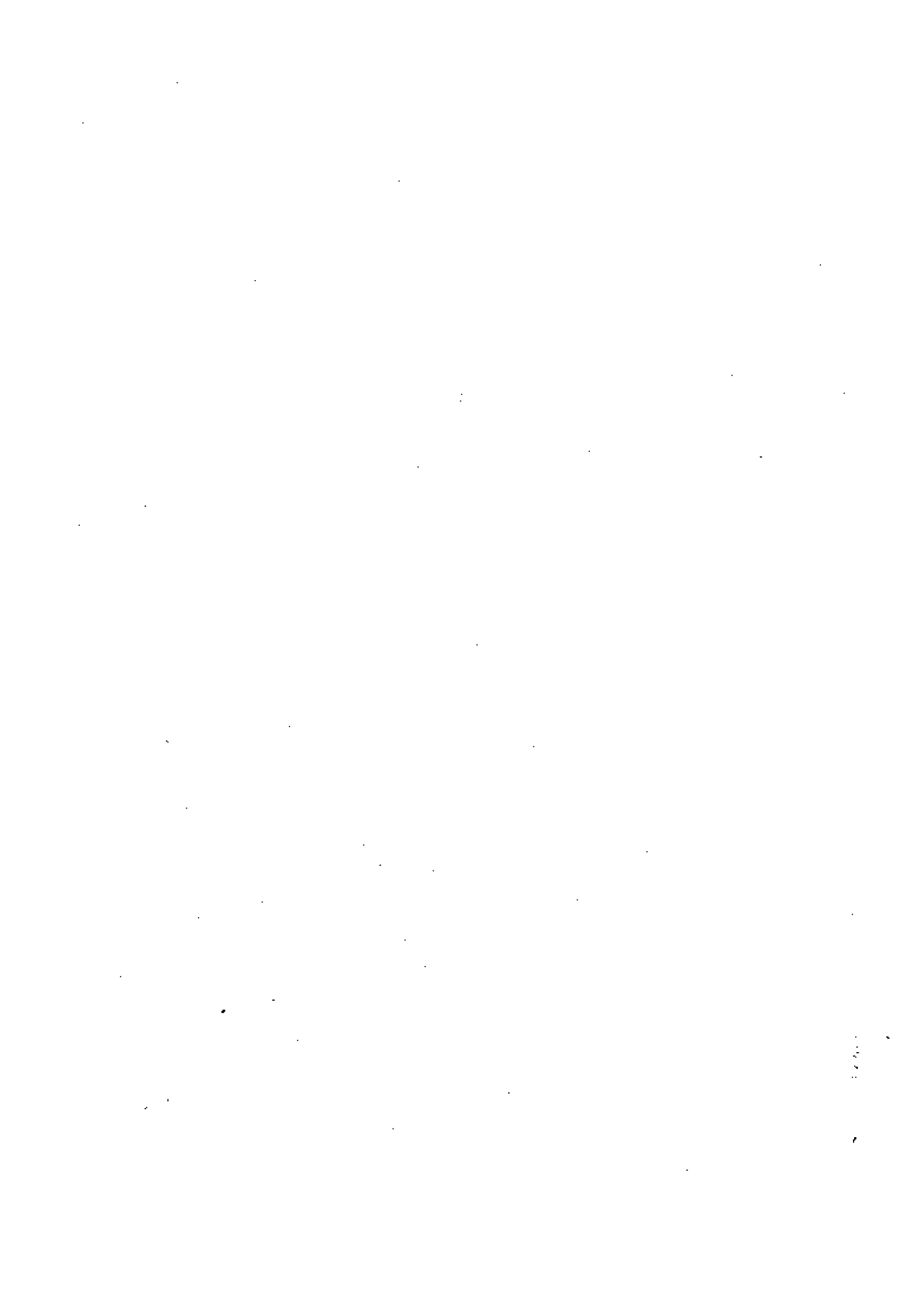
农民像很多其它法国人一样^②，看不到在常规和冒险之间有折衷的办法，因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市场把他们拖入冒险的路途，而他们不具有任何控制风险的信息手段和核算手段。往昔并不一定像人们所说的那么令人满意，但人们是沿着几代人踏出的道路前进，那儿的障碍、危险和坎坷都是熟悉的。现在不同了，必须“投入”，但人们不太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也不知道投入到哪里去，只好相信技术人员和农业领导人，可是这些人与“他们”的联系比与“我们”的联系更为密切。

农业劳动者在谈到杂交玉米时往往使用“投入”这个词，它很恰当地表达了农民内心深处的情感，农民在习惯的生活中享受着恬雅的宁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享受着生活那细浪般的微微波动，这波动使你兴奋，却不会使你移位恐慌。

① 维利，1957年，见第206页及以下各页；贝尔诺和布朗卡，1953年，第400~407页；莱特，195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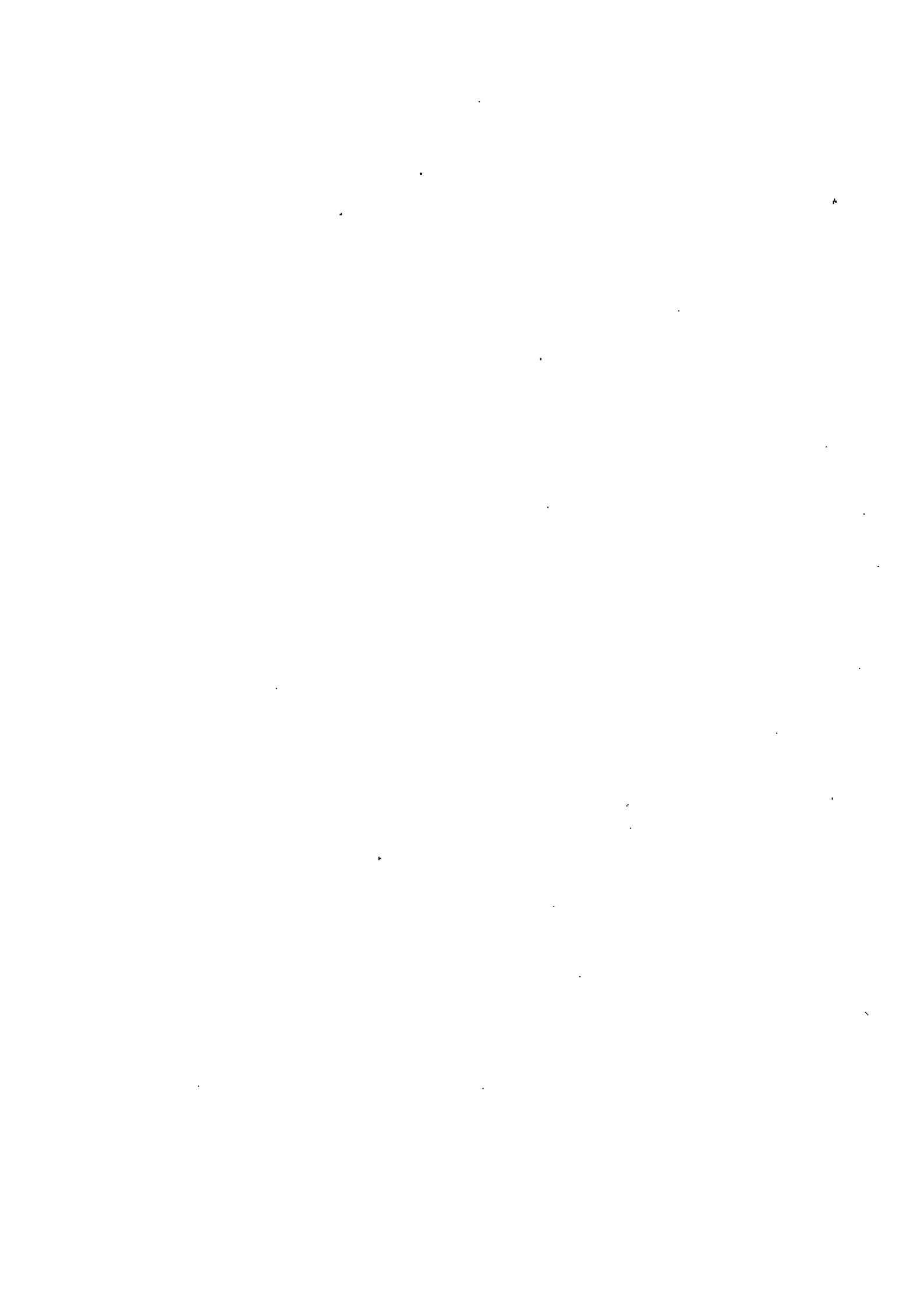
② 莱特，未标年代，第560~667页。

突然间，农民感到自己投入到剧烈的、令人疲惫不堪的大潮里，他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不能有任何保留，而最终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当跳水者第一次离开闲适、安全的沙滩、投入浩瀚无垠的大海时，他在波涛的永恒震荡之中，也会感到类似的焦虑不安。



第二部分

农业劳动者及其企业和社会



你们已使自己的生括依赖于货币，而货币是政府的产品，那你们为什么对依赖于政府感到奇怪呢？如果为了生存，你们除了自己本身之外还需要另外某个人，那为什么你们对别人控制着你们的生括感到奇怪？

J. 吉奥诺《1937年关于贫穷与和平写给农民的信》



第五章

企业家及其决策

法国当代农民是在传统社会的模子里塑造出来的，已习惯于缓慢的、常规的运行机制，但现在，他们突然投入到持续不断的技术变化和经济变化中，同时生活在两种相互矛盾的逻辑里。

一些人仍深深地依恋着传统的体系，他们在这个体系中长大成人，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这个体系才能说明人的生活意义。他们认为，如果人们靠土地来生活，就不能不懂得，自由自在、自产自食和尊重自然是道德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三个基本准则。既然传统社会结构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感到有理由继续遵守习惯，所以他们严厉地斥责年轻人和城里人的幻想。

相反，另外一些人，特别是受天主教行动团体的思潮熏陶的年轻人，决心自觉地按照现代经济的规则行事。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他们学习如何成为真正的企业家和怎样改进家庭农场的管理，他们甚至相信可以把家庭农场变成真正的企业：精确的核算使他们能够严格地按照经济形势和市场变化进行投资，从而提高他们的收益。不幸的是，由于企业往往过于狭小，以致于无法使投资赢利，投资在赚回本钱之前就已错过了时机，于是帐目上出现亏损。那么，何必呢？

所有这些变化不定大概说明了一个根本矛盾：一方面是由于农业的职业身份在形象上的降低造成了极度的悲观主义，另一方面是整个法国农业在进步和现代化方面作出引人注目的努力。我们在调查中询问了大多数农业劳动者，他们至少提到过一项他们在经营上所进行的改进。只有最年长的人不想使自己现代化。当然，这些改进往往是很小的，与其说它们体现了进步，不如说它们体现了维持现状的习惯，不过，它们证明，悲观主义还没达到令人厌倦和绝望的地步。对决策机制和经济意识的分析可以阐明这些观点，特别是可以为将来的研究开拓视野。

大多数农业劳动者意识到了传统世界的崩溃，但还不善于在现代世界中从事活动，他们的生活跨越两个世界，一方面被禁锢在旧的结构里，另一方面不断地受到“现代人”、进步和城市的吸引。时而，他们试着遵循新的逻辑，时而，他们又不得不返回到旧的逻辑，他们把新逻辑运用到按常规运行的领域，又用他们视为永恒的旧逻辑去解释新世界。这种存在于家庭的经营思想和现状中的逻辑冲突，支配着可以被称为农业推广的运动，或者更广泛地说，是控制着技术变革、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的传播。

农村经济学家们强调经济行为的“合理性”，并希望把这种“合理性”灌输给农民。一切与这种“合理性”相对立和不符合这种“合理性”的行为都似乎是“非理性的”。我们在前面曾强调过这一点，并说明了为何在农民看来，赢利的投资似乎是挥霍和富人的奢侈，而购买不赢利的拖拉机却成为他们无法抗拒的欲求。传统行为在传统宇宙中的“合理性”是不言自明的，人们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二者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很容易通过分析予以证明。但是，当相应的社会体系本身产生冲

突的时候，一些旧的因素仍旧非常活跃，而另一些旧的因素让位于新的因素，在这个时候说这些因素是合理的、那些因素是不合理的就没有把握了，因为人们没有进行断定的参照系。两种理性发生了冲突，根据人们的想象，经济的理性将战胜传统的理性。目前，农业劳动者正体验着这种冲突，最好是现在就立刻向他们提出理性的经济行为方式，并且不会朝令夕改。

* * *

社会学方面有大量的著作研究农业劳动者对变化的反应和态度。其中主要是一些北美学者的和受社会心理学影响的著作^①，这些著作集中分析了“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阐明他们的优点、缺陷、地位和社会角色。然而，由于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被事先假定为符合经济理性的，这样就不得不有一个“无才干的”农业劳动者与他们相对照，也就是说有一个平庸的、没有条理的、非理性的人物，一个借助于“心理维度”从反面构成的可怜家伙与他们相对照，而这种“心理维度”几乎总是带着负号，谁都不用为理解去操心，所以最终是不可理解的。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人去研究无才干的农业劳动者，来描绘出他们的正面特征，然后从这些特征的相反一极出发，从反面塑造一个“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来与他们进行比较：这将会是具有启发性的，而且功夫会不负有心人。

B·班夫纳蒂^②在研究温特斯维捷克（荷兰）的农民时用文明冲突的术语提出问题，但他同时又想“研究都市型文明对农业经营管理(……)和都市化过程的影响，在所有的现代国家，农业人口都广泛而又程度不同地经历着都市化的过

① 参阅两本观点清晰的著作：罗吉，1965年；利翁伯格，1962年。

② 班夫纳蒂，1961年。

程”(第XXV页)。从这些前提出发，他最终自然地得出结论说，进步农业劳动者的主要特征是向外部世界开放。这里的同语反复是明显的，进步是来自外部，但人们却必须转到外部那一边去欢迎它。这种简单化的结论影响了分析的价值。不过，在分析的过程中，班夫纳蒂强调了传统农民文明的“整体性”特征。他清楚地表明，为了转向现代体系，农民应当完全成为他个人行为的主人，这意味着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传统体系中的个人地位，也就是对传统体系提出质疑。

在试图勾勒出进步农业劳动者的画像时，他把这画像与传统农业劳动者的画像进行了对比。不过，他强调说，这两种画像“处在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两端，因此，区别是如此截然分明，而且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这也说明为何会感到这两个群体的活动和态度之间存在着严密而又和谐的对应关系”(第225页)。一切连续统一体，如果不是出自精确的技术构造，即使具有诱惑力，也是骗人的分析把戏。

美国的大多数研究^①，更是仅仅满足于列举那些最先采用新技术的农业劳动者的主要特征。在所有的个例中，最进步的农业劳动者都是接受了最好的职业培训和一般培训的人，他们更加年轻，耕种的面积在数量上明显地高于当地平均水平，他们从中获得的收益也更高，他们能阅读更多的农业报刊杂志，更经常地到城市里去积极地参加各种团体协会和组织的活动，不管是职业性的还是非职业性的。所有这些调查都表明，社会参与与进步思想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最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在联合会、合作社和其它农业组织中担任领导是正常的，但他们是否最积极地参加一般社会生活

① 这方面的书目可参见罗吉的著作，1962年。

这是难以预料的。另外，最容易接受技术进步的人也是能够最迅速地接受教会或学校等不同领域中的变革的人。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最具有现代意识的农业劳动者常常是政治上的和宗教上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对自己村庄的生活不感兴趣。要注意不要急于进行归纳概括，要避免搬用太平洋彼岸没有充分考虑到整体社会背景的结论。

在欧洲，关于农民的研究不多^①，而且都强调家庭境况和价值体系的重要性。一般来说，耕种着祖传的土地和从未离开过农场的农业劳动者，不像变换耕作土地的佃农或在某个时候获得了土地的所有者那么容易接受革新。一个人获得家庭经营指挥权的时候越是年轻（通过继承、购买或租佃），他就越是倾向于进行变革。几代人或几个结婚的兄弟姐妹住在一起的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不利于变化，特别是在父权依然不容置疑和由祖父母负责教育孩子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妇女能否成为变革的因素，要视情况而定，这完全依赖于家庭的结构和她们所起的作用。最进步的农业劳动者把经营的良好状况更多地归因于智力方面的因素（组织能力，理论知识），而其它的人则更强调情感方面的因素（日常生活的和谐，妻子和孩子在劳动中的合作……）。

研究进步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和状况，并与传统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和状况进行对比，这只是第一步，几乎还无法说明变革的传播机制。现代农业劳动者是某些通讯网络的终端，这些网络的中枢是生物学家或农艺学家的实验室、经济研究室和观察站以及决定重大经济政策的行政机关。地方农业顾问是这些网络的最后中继站，他们的基本职责是把科学技术

^① 孟德拉斯，1958年；班夫纳蒂，1961年；范登邦，1957年和1960年；威斯特马克，1954年；哈佩，1954年；约利维，1966年。

信息“翻译”成农业劳动者的语言，并使其适合于地方条件。但农业劳动者也还具有其它的信息来源：报刊书籍、广播、农用产品的广告和推销员以及各种会议，特别是与邻居和亲属的谈话。

我们掌握的调查资料表明^①，法国87%的农业劳动者收听广播，78%的农业劳动者阅读报纸。他们听广播主要是为了消遣和获得一般信息；看报除了想知道地方消息之外，主要想了解技术情报和关于行情变化的信息。然而，在他们看来，全国性的农业周报和月刊（法国农业报，费加罗农业杂志，等等）常常不太适合地方情况^②；正像一个农业劳动者说的：“这略微超出了我们的水平，这是按照全国的尺度，其中有大量关于绵羊的研究文章，但这与我们无关。”如果说农业劳动者是通过报刊和广播获得信息的，那么他们比别人更需要通过与同行的谈话来讨论、解释和评价获得的信息。集市和市场仍是见面和交谈的机会，但越来越失去它们的经济功能。一般来说，农业大户的意见是有权威性的；相反，传统显要人物（城堡主、公证人、教员，等等）似乎看不出重要性来了。

约有半数的农业劳动者认为，他们在购买设备之前主要依赖推销员或特许经销员来指导选择，只有15%的人说靠邻居指导选择，5%的人说依靠农业技术员。相反，有48%的人在购买之前已在邻居家看到了设备，其中有些人（4%）还与邻居就设备进行了交谈：他们从邻居家获得信息，但他们认为是自己作出决定的。最后，有3/4的人更相信人们告诉他们的事情，而不是他们阅读的东西。我们的试点调查证

① 《民意测验》，1964年。

② 拉布鲁斯，1958年。

实了这些全国民意测验的结果。

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将会使我们得到关于信息获得机制、评价机制和决策机制的更为详细的资料。因此，必须根据提出的技术类型和在有关地区中占主导的社会关系类型来作出一些区别。美国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①，在进行传统投机生产的技术方面，例如玉米的种植，农业劳动者更经常地提到受邻居和商人的影响；而当涉及到引进完全新型的技术时，例如建立常设牧场，似乎农业顾问、广播和报刊对农业劳动者的影响更大。在各种情况下，富裕的农业劳动者比其他人更多地求助于农业顾问、广播和报刊。

美国的另一项研究表明^②，在那些邻居之间交往较多和个人联系较为经常、密切的地方，与邻居的交谈（48%的人在回答中提到）比报刊、广播（25%）更为重要；而在邻居交往活动不太活跃的地方，前面的比例就颠倒了过来：28%和42%。此外，在邻居来往较少的地方，当人们在城市里或职业会议上碰到的离得较远的农业劳动者时，会很乐意与他们交谈，就像与近邻交谈一样，而在前一种地方则相反，交谈总是在邻居之间进行。因此，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信息传递系统：一种是基于邻居互识关系的信息传递系统，信息和影响是沿着传统的、个人的和整体的渠道传递；另一种是更加分化的社会的信息传递系统，大众传播手段具有更大的作用，组织和机构是一些比近邻关系更具有约束性的框框。农业顾问可以通过这两种信息传递系统起作用，在前面提到的两个个例中，农业顾问的影响被同样经常地提到。

① 维肯宁，1950年。

② 利翁伯格和阿辛格，1954年。

此外，默顿和拉扎兹弗尔德告诉我们^①，无论是在大城市的一个区，还是在一个小镇或一个乡村地区，这两种信息传递系统都是紧密地交错在一起的。由报刊、广播和电视传递来的信息，必须先通过交谈进行讨论、解释和评价，然后才能真正被理解并随后被运用。各种杂志上的大量广告向青年妇女们推出多种牌号的衬衣，但青年妇女们是在通过与邻居和朋友的交谈之后才作出选择的。

在这个集体“消化”的过程中^②，有影响的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些见多识广的人信息灵通，熟悉最优秀的期刊，但这些期刊也是更难阅读、价格更贵、技术性更强或更别致的，因此，人们主要是从他们那里得到信息。另外一些主要关切地方问题的人，具有更多的个人影响和道德影响，他们主要参与解决家庭问题和近邻关系的问题。此外，这两种人一般都被视为在某一个领域中有专长的人，人们很少就购买拖拉机、女儿出嫁或选举投票去征求同一个人的意见。

研究各种有影响的人，研究他们不同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将会取得丰富的成果，这对所有注意引导一个地区的发展或一种产品的消费市场的人，都大有益处。迷恋进步和新事物的改革者并非总是有人追随其后，一般来说，人们更容易接受传统主义者的意见，在传统主义者看来，所有的变革即便不是有害的，也是危险的。一切都依赖于当地的主导趋势：在农业劳动者都赞成变革的地区，人们去请教远远走在自己前面的进步农业劳动者；相反，在农业劳动者都蔑视变革的地区，人们主要是与具有声望和社会影响的人讨论，而这些人并不比他们具有更高的技术和管理才能。有影响的人

① 卡兹和拉扎兹弗尔德，1955年。

② 默顿，1965年，第295～321页。

走在一般人的前面，这是一个地区所具有的活力的象征和原动力。在落后的地区，大家都在或几乎都在一个水平线上，个人相互联系的机制促成了现状，由于进步而显得独特的人不能成为向导。在进步的地区，一部分人的领先和另一部分人模仿他们的努力确保了活力的存在，这两部分人之间的距离越大，变化的节奏就越快。

日常的观察和我们掌握的为数不多的细致调查材料表明，变革是通过一个集体的过程来实现的，这个过程更像是赶时髦和模仿，而不是凝聚了每个农业劳动者的推理计算^①。无论什么样的农业机械商都能说出，农业劳动者是在哪一年开始购买拖拉机和在哪一年（在5年、最多6年之间）几乎全都拥有了拖拉机的；随后是打捆机普及的时期，再后是收割脱粒机普及的时期，等等。家用设备也是一样：在几年之内，煤气灶就进入了一个地区的所有农户，然后依次是装修房间的时期，购买冰柜的时期，购买洗衣机的时期。每个地区都有它特有的序列、它自己的节奏和它引进“现代”物品及“现代”习惯的年表。可惜的是，除了菲尼斯太尔省南部的阿尔本克地区，我们在法国几乎没有掌握关于这个问题的系统研究材料。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新事物的被采用似乎要经过三个时期。起初是若干先行者对新事物进行几年的实验；随后是大多数人追随他们，这要么是由于新事物的益处使人们信服，要么是由于产生了某种需求；最后，最落后的人也决定采用新事物了。

当调查者询问人们为什么购买打捆机或煤气灶时，他总

① 参见塔德的著作，1927年。

是惊奇地听到这样的回答：“我们需要”，但他无法得到更多的确切说明和“合理”解释。然而，明显的事实是：农村中未得到满足的“需要”是无数的。在某些地区，住宅和家用设备还十分陈旧，10年前，几乎到处都是这样。而且，一个农户永远不会完全装备齐全：人们越是购买机器，就越是需要更加复杂的和更加昂贵的机器。在这些大量的需要中，一些最先进的农业劳动者可能作出有意识的选择，但大多数人是由于看到他们的邻居满足了这些需要而陆续感受到这些需要的。在一定时刻，某项购买或某项习惯会成为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些我们无法再生活下去。”正像约利维注意到的，“农民并不是为了解决一个自觉意识到的问题在专门研究了有关资料之后才作出合理的决定的，相反，他们是在看到会对他们有所帮助的机器发挥了作用时才意识到改进的可能性的。先行的经营者经常进行示范，这大概对机器、肥料和新型种子的质量提供了保证，并使得人们可以根据结果来作出判断。但更重要的是，正是这种示范才使人们意识到改进的可能性”。^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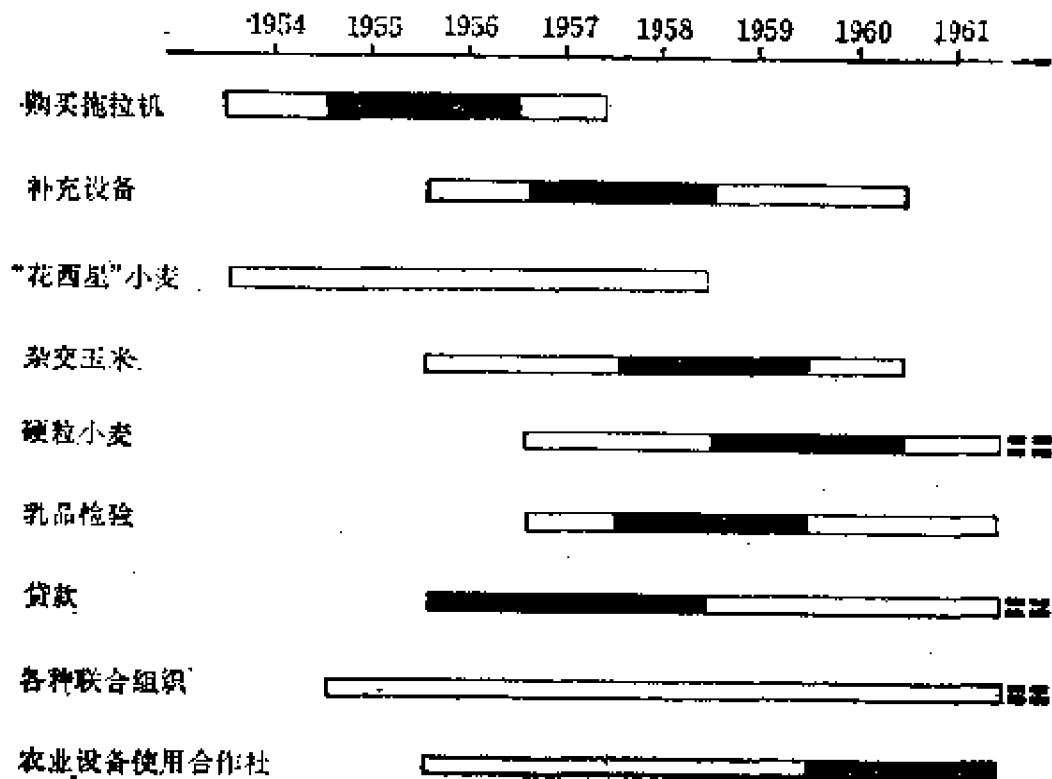
换句话说，需要本身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是同时产生的，为什么改进与怎样改进的区别对农业劳动者来说是陌生的。当人们询问他们的想法怎样产生的时候，他们的吞吞吐吐和犹豫不定比他们作出的回答更能说明问题，因为人们向他们提出了一个他们从未向自己提出过的问题。要验证这种图示必须进行一系列精确的分析；集体采纳新事物的过程肯定会因采纳的事物不同而有所区别：如一个类似农用机械或家用机械的技术产品，一项首先属于一种本领的生物学上的进步。

^① 约利维，1962年。

一个应当参加的团体和一种商业上的、财政上的或技术上的习惯做法。

在奥德省的一个多种经营的地区，C·拉诺制作了下面的这个年表，其中横条的白色部分标示着对新事物平均采纳的时期，黑色部分标示着加速采纳的时期。该表清楚地表明，购买拖拉机是使用贷款的第一步，它遵循我们在前面推述的过程。相反，协会和合作社到来得较迟，用了更多的时间才被人们接受。

奥德省一个地区的采用时期表



在我们对纳依地区进行抽样调查的100个农业劳动者的抽样中，7人在1949年试种过杂交玉米，16人在1957年仍没有采用，第一批采用杂交玉米的人是在1950年至1953年作出决定的，随后，在1954年和1955年，采用杂交玉米的速度放

慢了，到1956年和1957年，又重新加快了速度，前后总共用了15年的时间，杂交玉米才在几乎所有的农户中普及开兴。

研究农业技术进步的传播，研究具有现代意识的农业劳动者的特点，这都为推广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有利于社会学信息传递理论和变迁理论的深化，但几乎并没有向我们揭示农民所面临的困惑和矛盾，而力图按技术进步和经济理论的规则行事的农民目前正在这种困惑和矛盾中挣扎。我们已充分地看到，技术人员和经济学家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他们以怎样的信息手段传播他们的意见以及哪些人最容易出现接受这些意见。我们在前面几章中简略地描述了传统农民的状况和逻辑。那么，人们能否勾勒出传统农民对人们的建议的理解方式？这些建议对他们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首先，在农民心目中，“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到底是什么样子？人们总是要求或恳求他们模仿这种神秘人物。我们曾在4次调查中提出这个问题：“你认识一个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吗？请告诉我为什么这是一个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我们收集到的回答可以概括出三个主要特征：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具有成为这样的人的物质能力（土地、牲畜、机器、劳动力），他精心地从事大量的劳动，走向进步。这最后一个特点仅仅是问题的肯定形式而已，此外，这个特点多是在交谈开始时提出来的，如果是在主题不太明确的交谈中，它肯定不会被这么经常地提到。因此，应当谨慎地解释回答的分布情况。

大多数其它的回答都是些简单的描述：“他收到了一些效果”，或“这是个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因为他获得了丰收”。如果说这种回答的分布有一部分不是问卷的反映，那它却显

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的素质

	撒德高 地区 %	贡布莱 叶地区 %	纳依地区 %	莱昂地区 %
具有物质能力	30	55	36	23
辛勤劳动	35	45	17	43
使自己现代化	30	80	61	14
未回答或其他的回答	20	50	31	48
100名被提问者的答案数	115	230	145	128

示了农业劳动者、特别是贝亚恩省农业劳动者在现代化方面的卓越才智。与此相反，引人注目的是，有大约 1/3 的农业劳动者认为，如果不具备成为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的物质能力，就无法成为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

这种表面看来明摆着的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实际上，人们可能会以为，农业劳动者越是能够战胜更加艰难的环境，他就越是能干。在技术人员看来，如果小经营者通过非常“灵巧”的耕作和饲养，从三四公顷土地中获得了较高的总收入，而邻居由于保留着传统的耕作系统，虽有 20 多公顷土地却获得了同样的收入，那么这个小经营者与他的邻居相比，就可以说是更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但在农民看来，情况正好相反，更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是这位邻居，而小经营者则像是获得暂时成功的走钢丝的人一样，是注定会失败的，他试图使出全身解数来摆脱困境，却无法长期地战胜艰难的环境。要想成为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必须具有这样做的物质能力。如果我们在调查中记录下那些被提到的“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的名字，毫无疑问他们几乎都是经营“大户”。

经济学家们证明，当耕作面积低于一定规模时，要想在

赢利的前提下管理好经营要困难得多。1956年，J·松巴德洛威在沙都林盆地发现，根据耕作面积，经济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一个小农很能干，那他可以在小面积里获得好收入，然而，如果耕作面积不到15公顷，“中等的”农业劳动者就得不到足以养活家庭的产量。1964年，松巴德洛威的一个学生在同一地区运用同样的方法重新进行了同样的调查，调查的结论是，耕作面积的最低限提高到21公顷，也就是说在8年的时间里提高了50%^①。L·马拉西在对很多簿记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之后，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当经营面积增加时……经济效益和收益率也随之提高（一直到某一界限），劳动者的生产率、收入和生活水平也相应提高”。^②因此，经济学家和农民是一致的：要想成为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必须有相应的物质能力。换句话说，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就是那些能够成为这样的人的人，或者说，成为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是专供富人们享受的奢侈。

还需要指出这个看法的辩解作用吗？结论明显地摆在了面前：如果我们自己不是一个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这是因为我不能这样。实际上，对大多数被提问的农业劳动者来说，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是他人，或者是一种刻板的单一形象，但绝不是我。交谈的处境也自然地促使农业劳动者作出这样的反应，特别是农业劳动者会力图向调查者提供他们认为是调查者想要得到的形象；调查者自身预设的期望具有重要的影响。更为深入的调查大概可以概括出每个农业劳动者为自己确定的典范。

在对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的传统写照中，具有物质能力

① 松巴德洛威和莫望，1954年，以及通话联系。

② 马拉西，1958年，第287页。

常常与劳动的干劲和热情同时并存。对4次调查的共同数据所作的因径分析证明，这两种回答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必然联系。说某位邻居“不抱怨自己的辛苦”，这是一种高度的赞扬。一位被提问者在概括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说：“有些人不劳动，而另外一些人则从事大量的劳动，”很多农业劳动者在结束谈话时都这样说。而且，如果这样一位辛苦劳动的大经营者“家里有一些能干活的太孩子”，他就真正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他具有大量的土地、牲畜和劳动力。

与这种形象相对照，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的“进步”形象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评价方式。人们不再是根据物质能力和精神素质来评定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而是根据结果和个人技能：“他获得了好的结果、好的产量”，此外，“他顺应进步的潮流”，“他使用化肥”；这意味着他“学习”，搜集信息，阅读报刊，参加会议；总之，“他在劳动中动脑子”，“他比别人会计算”。在因径分析中，这些特点之间的联系比传统特点之间的联系具有更强的相关性。因此，现代主义者的形象更具有逻辑的一贯性，但也可能更加刻板，而传统主义者的形象则更经常地染上现代特点。

朗格多克地区酿造葡萄酒的葡萄种植者是单一耕作者，他们的情况十分不同于其他的农业劳动者。对他们来说，产品几乎全部依赖于劳动和技能，因此，毫不奇怪的是，67%的人认为有才干的葡萄种植者是懂得辛勤劳动的人，只有9%的人认为是具有高产葡萄园的人和5%的人认为是酿造优质葡萄酒的人。

十分明显，一般来说，要想成为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小经营者主要强调必须具有相应的物质能力，而大经营者更

加注重个人的素质,无论是传统型的素质还是现代型的素质。J·马欧在对布列塔尼省南部地区进行调查时,不要求人们描述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的形象,而只要求人们举一个例子,他发现小经营者愿意列举比别的人干得稍好一点的某个近邻;中等的农业经营者则在更大的区域范围里选择他们的典范;而在大经营者中,一些人列举出本省管理优良的经营商,另一些人则认为在布列塔尼省没有杰出的经营者,要到较远的地区去找样板,例如到博斯地区。显然,他们这样说的意思是他们自己属于布列塔尼最优秀的农业劳动者。总之,对于一个农业经营者来说,不管其经营的规模大小,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总是、或几乎总是比自己经营规模大的农业劳动者;更小的农业经营者只可能是“应付得不错的小伙计”。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农业劳动者,特别是小经营者,都强调增加经营面积的必要性,这看来是很自然的。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当问到“你认为自己的经营规模是正好,太大或太小”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明,在4个地区中,有3个地区的大多数农业劳动者认为他们的经营规模足够大或太

你认为自己的经营规模正好、太大或太小?

	撒德高地区 %	贡布莱叶地区 %	纳依地区 %	莱昂地区 %
正好	55	59	46	34
太小	29	30	46	65
太大	6	8	6	1
不知道	10	3	2	0
总计	100	100	100	100

大。不要忘记，在畜牧地区贡布莱叶，中等的农业经营者具有15~20公顷土地，而在其它3个地区，中等经营者具有10~15公顷土地。

当人们问到：“需要多少公顷土地才能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值得使用拖拉机？”回答中提到的要求相对来说都不太高。

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和使用拖拉机共需要多少公顷土地？

	撒德高地区		贡布莱叶地区		纳依地区		莱昂地区	
	%	%	%	%	%	%	%	
	拖拉 机	家庭 生活	拖拉 机	家庭 生活	拖拉 机	家庭 生活	拖拉 机	家庭 生活
10公顷以下	2	3	0	0	13	7	21	33
10~15公顷	10	32	32	33	45	46	40	33
15~20公顷	25	31	30	31	16	23	24	21
20~30公顷	50	24	24	25	23	22	9	5
30公顷以上	5	2	11	8	0	0	5	2
未回答	8	8	3	3	3	2	1	4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差不多是以同样的格局分布的，这就意味着，在正常的情况下，可以维持家庭生活的经营规模一般也都使用拖拉机。事实上，因径分析证明，这种联系的相关是很强的：家庭、经营和拖拉机一般来说是同时并存的，没有拖拉机的农业经营不是真正的经营。除了贡布莱叶地区，大多数农业劳动者满足于不足15公顷的土地，在4个地区中，平均来说，他们的期望是比他们目前的情况多几公顷土地，这也证实了前面所说的结果。同样，约有半数的葡

萄种植者认为，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必须生产5~7万公升葡萄酒，这个产量约相当于申报产量的中位数。

如果人们询问农业劳动者为什么认为他们自己的经营规模足够大或太大了，他们会简单地回答说，这样他们的“劳动已经够多了”，人们“无法再找到劳动力”或他们无力耕种更多的土地。对一部分回答来说，回答者的年龄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荒谬的答案：上了年纪的人满足于自己的现状，没有能力再增加自己的劳动负担。农业劳动者们感到，他们陷入自己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为了成为更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也就是更好地谋生，必须拥有更多的土地，但为了耕种更多的土地，必须有更多的劳动力。这个矛盾也说明，在关于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的传统描述中，家庭劳动力是个重要的因素。

为了打破这个恶循环，以便在不增加劳动力的情况下增加耕作面积，人们可以改变耕作系统，或者购买劳动效率更高的机器。最后，在相同的土地面积上，人们可以借助于化肥、合理喂料以及对种子和牲畜的品种优选来进行集约化的种植和饲养，从而增加产量。但是，人们清楚地看到，除了购买机器之外，这些解决的办法都不太符合传统农民的习惯做法。在传统农民看来，耕作系统是既定条件，是从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自然法则，要改变它是冒险的。至于“生物学上的进步”，除了现在众所周知的化肥使用，要懂得、理解和运用是非常困难的，就是连化肥也常常使用不当。

M·约利维对贡布莱叶地区最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评价可以适用于法国的所有农业劳动者：“最传统的农民仍将耕作系统视为不可更改的既定条件……他们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已实现了机械化，使用了更多的肥料和获得了更好的收

成……。他们中的一个人继续进行传统的混作：他抱怨这是当地农业固有的限制，在他看来，唯一可能的改进途径似乎就是提高产量……。相反，较少传统思想的农民不仅认为生产谷物是愚蠢的，而且还懂得，要想能够赢利，一切作物都必须转化为动物产品……。他们不仅远没有降低自己的潜力，屈服于被严格规定的自然使命，而且增加了自己的潜力，采用了灵活的耕作系统，这使他们可以在广阔的动物生产领域根据价格的变化来从事经营。”

农业不再仅仅是一种生产的艺术，也是对市场需求的一种适应。当农业劳动者不再把自己仅仅看作生产者，并开始考虑自己的产销路时，他的整个世界都改变了。种地养家的农民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农业生产者具有完全不同的视野。目前，农业劳动者的生活包含着两种互相矛盾的逻辑，他们自然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角色是生产而不是销售。因此，如果他们的产品销路不好，那是别人的错，而不是他们的错。

当然，在这一点上，葡萄种植者具有各种不同的态度。他们中的一半人认为，好年头是酒的销路好的年头；1/4的人认为，好年头是产酒多的年头；只有20%的人认为，好年头是酒的质量好的年头。因此，葡萄种植者同时作为葡萄酒生产者，他首先关心的是他从自己的产品中获得的收入。此外，他感到这产品一旦卖出之后就脱离了他的控制：他不知道“这产品到哪里去”，也几乎丝毫不了解消费者以及他们的需要和欲望。

根据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的民意测验^①，71%的农业劳

^① 吉洛和斯比册，1965年；约利维，1966年。

动者认为，他们的经营状况良好。根据当地通常的标准，他们自认为相当有才干，另有9%的农业劳动者认为自己很有才干。如果人们问他们能采取些什么措施来增加自己的经营收入，有半数的人连什么建议也提不出来；20%的人认为应提高他们的产品的销售价格或仅仅是应当手中有钱；24%的人考虑到各种技术改进措施（合并土地、购买设备、使用化肥），但言下之意是必须有做这些事情所需的资金。只有几个人想到要改变耕作系统。大多数农业劳动者认为，如果他们自己没有购买设备的资金，那他们的境况是不可能由他们自己来改变的，这资金只能来自国家对农业价格和工业价格的干预。

这样，希望获得发展但又不愿动摇整个传统经营系统的人就必须购买拖拉机和其它机器设备。拖拉机“补充了”传统经营系统，但没有改变它。一旦有了拖拉机，就可以扩展生产，在不改变经营系统的条件下变成“更大”的经营者，并最终在村庄的职业等级系统中得到升迁。

相反，如果人们不能得到其它的土地，那么没有充分利用的拖拉机就会带来昂贵花费。如果拖拉机不是用“攒下的钱”购买的，那就必须分期偿付贷款，这样就有可能使经营者陷入贫困，有时陷入破产，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起步的时候。机械投资必须是能够赢利的和分期偿付的，投资的逻辑伴随拖拉机进入了农户，迫使农业劳动者变成企业家或者走向灭亡。因此，政府部门和农业信贷银行近期的政策是通过宣传和贷款，鼓励农业劳动者实现机械化，促使经济核算进入经营管理和加快乡村人口的外流。

很多农民多少意识到购买拖拉机是个悲剧性的选择：因为拖拉机会在一定的時候使他們陷入絕境，於是他們只在自

己具有财力的情况下才购买拖拉机，以免陷入绝境。为了“使自己拥有拖拉机”，他们要先具有足够的积蓄，而不是像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或像经济学家建议他们做的那样，去考虑投资的赢利性。我们在前面已指出了他们的超经济的动机的“合理性”，人们在这里看到，他们的财政行为也同样是合乎理性的。相反，为了购买不能获益的拖拉机而向农业信贷银行贷款的农业劳动者才是“不合乎理性的”：他们冒投资的风险，似乎是指望幻想中增加的收入能够偿还借贷和付清利息，那么按照逻辑他们就应当懂得，这里涉及的是一种费用大于收益的消费借贷，必须用其它的收入偿还，而不能用这种“虚假”投资的生产收入偿还。农民在倾听技术人员和银行家的“经济”推论时总是满腹疑虑，不断摇头，但这是有正当理由的；他们之所以不信任这类贷款是因为人们总是说不清究竟资助的是花费还是投资。

根据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的民意测验，28%的农业劳动者声称他们有书面帐目。如果人们愿意承认，一切问卷以及问题本身都会促使人们作出肯定式的回答，那么人们也可以认为，大约有1/5或1/4的农业劳动者“进行记帐”。但是，如何确切地理解“记帐”的含义呢？约有1/10的农业劳动者只进行简单的簿记。通过簿记进行经营管理的农业劳动者懂得什么是可以赢利的生产，什么是会亏损的生产，知道他们的劳动和资本的报酬以及他们的利润额或亏损额；但这类人是少有的。此外，不能不看到，对一个家庭农场的簿记结果，不能按其表面的数字去理解，否则怎样解释那些声称“赔本”的农场多年来一直购买设备、使自己现代化，并且还能维持家庭生活，有时还生活得很好呢？J.居依瑟尼研究了传统的管理方法和这些方法的知识工具，他的研究使人们可以解释

这种矛盾：应当建立关于农民的经济行为的整体理论，并把他们的经济行为与会计师的经济行为进行对比。

由于缺乏预见性的核算，在家庭农场的管理中，显然一切都是既不清楚也没有保障的。农业劳动者只能以从邻居中选择的例证为基础，根据印象、判断和评价进行自己的决策。当他回答说有15公顷土地就可以维持生活或有这样的耕作面积拖拉机就能够获利时，他是根据他期望略有改善的个人状况和周围看起来“过得不错”的农业劳动者的状况作出判断的。然而，为了判断他是否“真的过得不错”，以什么作为标准呢？某个人拥有崭新的拖拉机，但他的妻子在家里却使用不上自来水，在地里又“累得要命”；另一个人生活得挺好，女儿穿得雅致漂亮，还装修房舍，但据说他已债台高筑；在另一家，有一个儿子在工厂里工作，拖拉机大概是用他的工资购买的。那么，谁富谁穷？谁生活得差谁生活得好？谁购买了大量的土地和设备，谁没有购买？谁懂得销售谁不会销售？……人们可以列举一系列这类的“标准”，但都是不确切的和会引起争议的，想使这些“标准”协调一致是不可能的。每一种情况都有其特殊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技能，每人都按自己的打算处理事务。

不过，十分明显的是，大经营者都更加富有，生活得更好，看起来“的确混得不错”，同时还能使自己的经营与房舍现代化和供孩子们上学。人们可以模仿他们而不冒任何风险。这虽是显而易见的，却是地地道道骗人的，因为大经营者从其定义上来说就意味着处在不同于中等经营者和小经营者的状况中。前者的经营体系是不同的，他们的管理要服从另外的要求，因为他们的销售量更大，货币收入更多，自身消费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另一方面，如果说小农场的经营平

衡很容易被邻居观察到的话，那么大农场由于更为复杂，要想观察到它的经营平衡情况就困难得多了。邻居看到一些迹象，就用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它的。因此，小经营者很自然地倾向于去模仿象征着大经营者的声望的一些东西，而实际上他们应当努力弄清楚大经营者的总体平衡情况，以此作为借鉴，以便以新的眼光来审视他个人的总体状况。

模仿比自己更大的经营者，这是农村技术进步传播的根本机制，它引导一些小经营者落入可悲的境地，因为他们所模仿的是大经营者最符合“进步”的主体形象的行为（如购买拖拉机），而不是去模仿自己力所能及的最有效的措施（化学肥料和人工授精）。根据农业推广者的表达方式，“力学的进步”比“生物学的进步”传播得更快，他们往往为此感到愤慨，因为“生物学的进步”需要更少的投资，一些农村信用社就能够资助，对小经营者来说更容易获益。但是，对这种现象的产生，农业推广者本身也有部分的责任，因为他们也曾促使人们把进步和实现了机械化的大经营者视为一体，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他们使人们相信，机械化的大经营者就是现代思想的唯一典范，因此，他们为促进生物学的进步所作的努力就显得不那么令人信服。此外，由于生物学上的进步更难操作，所以也就更难有效地进行解释和提出建议。

拖拉机再次成为给人印象最深的例子，小经营者购买拖拉机来耕种他的七八公顷土地，因为在某个时候，要想成为真正的农业劳动者，“必须拥有拖拉机”。拖拉机是农民使用的第一种机械设备，但它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因为它的价格昂贵，人们要“攒出购买拖拉机的钱”，如果它放在货棚下不用，就会贬值，赚不回本钱。如果人们没有足够的钱同时购买必要的附属设备（犁、牵引索、销棒，等等），拖拉机就只

能拖旧马车、双轮双铧犁或割草机。这样，它只是代替牲口挽具起到牵引的作用，而不是牵引和带动一些大功率的和完善的工具，并为这些工具提供运转所需的动力。换句话说，它的使用没有按照它固有的逻辑，而是根据前机械化的旧逻辑。

自来水的情况也是如此，当人们安装上水龙头、却仍借助惯用的水桶和喷壶来蓄水时，运输的劳苦是减少了，但自来水新的潜在功能并没有被发挥出来，因为必须继续节约用水，而那些新的潜在功能是以水的浪费为基础的。反过来说，在一个只有一些蓄水池、而且每年夏天都会干涸的农场购买洗衣机是更为荒唐的行为。像一切技术变革一样，拖拉机、自来水或洗衣机都不是可添加在旧系统里的孤立物品。它们周围有一整套相应的物品和行为方式，没有这些，它们只是现代思想的象征，而不是真正的现代化。正像M.莫斯克维奇所写的那样：“表面的变化只不过是变化的表象，是为了保持与周围现实的联系但不在整体上改变现实作出的努力(……)。总体的现代化提供一些具体的进步方法来解决变化必然带来的问题，而象征性的现代化只是揭示一些矛盾。”^①

有时也会有行为方式出现在相应的设备之前的情况。天主教行动组织和家政教育学校通过他们的报纸和会议大大地增加了女性报刊的影响，10年以来，农村中有大量的人阅读女性报刊。年轻的乡下人发现了个人卫生和家庭清洁的美德，这种美德在某些地区还是非常缺乏的。应该沐浴，给孩子洗澡，窗子上应有干净的窗帘。谁不为这种进展感到高兴

^① 莫斯克维奇，1960年，第72页。

呢？不幸的是，在只有一些蓄水池或一口处在1公里之外的水井的农场，必须节约用水或花费很大的劲用火车运水。此外，农妇们除了这些盥洗工作和洗涤劳动，还有无数的家务活和农活，她们的确费尽了力气，希望既能是完成日常劳动任务的农业劳动者（挤奶，饲养猪和家禽，且不说还有农田里的活），同时又是家庭母亲和主妇，就像根据《风尚小回声报》或《我的村庄》宣扬的高尚道德准则所塑造的典型。

进一步列举出那些希望自己现代化的农民所表现出的一些“不符合逻辑”的行为是很容易的，总是会有离奇的例子来说明各种个例：农业技术员和一切农村观察员都会谈到一些饶有风趣的和具有说明意义的例子。这些无条理的举止表面看来是自相矛盾的，但在表象后面，却经常表现为一种有其固有逻辑的步骤，这种步骤是对处境作出的反应，虽然有时显得笨拙，但常常很适合于处境，真正没有条理的和错综复杂的是处境本身。除了技术经济管理和传统习惯做法之外，还存在着其它一些不那么“纯粹”的和非常直截了当的措施，这些措施更适合于现在变化不定的过渡时期。

先让我们排除前面提到的“象征性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很容易被说明，它的唯一规则就是社会模仿。它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一般情况下，它和严格遵循常规是并存的现象；但是，它也可能引导走向进步和现代化，因而在变化的过程中起着作用。我们在前面已把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的传统形象与他的进步形象进行了对比。这并不是说有才干的传统农业劳动者不会在自己的经营中引进一些改进措施，完全相反，实际上既有传统的进步，也有现代的进步。

传统的道路在于增加物质能力，辛苦地劳动，省吃俭

用，使耕作系统适应价格的变化而不改变系统本身，根据节省的钱而不是根据本来的收入从事经营。从这个角度看，似乎最适当的改进就是增加物质能力和资本：购买土地、设备和牲畜，整修房屋，如果能力允许的话，附带地配置上家庭设备。大经营者和小经营者，年轻人和老年人，他们都进行这样的改进，我们将看到，虽然改进的规模是不同的，但所有的人都沿着这条传统的道路向前走，其中既有想成为大经营者的小经营者，也有实现了现代化但没改变自己的习惯行为方式的大经营者。

进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以怀疑整个生产系统和管理系统为前提。它可以导致与前面相同的改进，但这些改进并入了一种更普遍的“政策”，特别是与管理的监督相配合。这条道路的主要步骤是：进行初步的簿记，参加农业组织，关心耕作系统的改进，同时根据市场的需要进一步推进某项生产或引进新的生产。农业劳动者变成了企业家，使自己具备了某些成为企业家所需的物质能力，不再仅仅是根据自己的生产资料，而是根据自己的产品销路来管理企业。

在对我们的4次调查所进行的因径分析中，为了区别“传统现代化”和“进步现代化”，我们使用了适合于各个地区的不同标准。首先应注意到，每一种现代化都与农业劳动者所处的状况具有相关性很强的联系，这些农业劳动者既包括具有较大经营规模、很多家庭人口和购置了拖拉机的人，也包括想以某种方式变得更加现代化的年轻人。将要继承家业的儿子留在家中会促使农业劳动者走向现代化，特别是走向进步的现代化。相反，这两种现代化都与土地的利用方式没有联系，在我们调查的4个地区中，大多数农业劳动者实际上同时经营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和他们租佃的土地，不存在

全部经营土地都来自租佃的地地道道的佃农。正像人们所预料到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农业劳动者比一般的农民消息更加灵通，他们更经常地收听广播和阅读报纸。此外，进步的农业劳动者在两个方面与传统的农业劳动者有明显的区别：他们更经常地走出农场到附近的城市里去，他们当中认识农业技术人员的人要多得多。这些接触对于他们确定方向似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农业劳动者低估了使拖拉机能够赢利所必需的土地面积，具有现代意识的农业劳动者在这一点上与其他人没有区别。与此相反，进步的农业劳动者中有更多的人不害怕农业发生危机。然而，如果危机到来，价格下跌，他们会重新采取与大多数人一样的看法，认为没有出路，必须勒紧裤带，或者放弃农场。传统的现代主义者是悲观的，他们惧怕危机，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可以自己可以摆脱困境，因为他们有良好的机械设备，而且国家为了帮助他们将不得不进行干预。

换句话说，冒经济风险的人意识到，如果发生危机，他们的赌注就不会投中，而其它的人认为，如果人们在农业中运用“帮助你自己，国家会帮助你”的原则，总是能够摆脱困境的。某些人依靠游行示威来迫使国家实行这一原则。这是他们的逻辑，如果问他们为了改进农业当地应该做些什么，传统的农业劳动者会说，没有国家的资助，将会一事无成。先进的农业劳动者不那么信赖国家，他们认为技术和个人的努力是决定的因素。最后，正像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在他们关于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的形象中，传统农民强调的是道德素质，进步农民强调的是职业素质。

通过在莱昂地区进行的调查，我们可以概括出农业劳动

者的态度与他们的经济结果之间存在的联系。实际上，这次调查是在L. 马拉西指导下由J. 马代克和国家农业研究院乡村经济实验室以及农村社会学研究组联合进行的，在调查中，对每一种经营的帐目分析都配有简要的社会心理学问卷。帐目分析使得可以根据经营的收益情况把经营划分为5个类别：

1. A类包括所有可以赢利的经营(占样本的18%)：一旦劳动和资本按照核算的标准得到酬报，经营者就可获得利润。

2. B类是经济上可以平衡但没有利润的经营(11%)：经营者的收入相当于他的工资和他的地租。

3. C类是一些从事高度集约化农业的经营者(14%)：他们每公顷土地的单位面积收益很高，但每个劳动力的收益较低。换句话说，他们投入大量的劳动，以便使他们的土地获得最大的收益，但这些劳动没有得到相应的酬报。用农村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总产品(P_b)与有效农业面积(SAU)之比相对来说大于总产品与人力劳动量单位(U_{Th})之比： $P_b/SAU > P_b/U_{Th}$ ①。

4. 与此相反，D类是从事粗放农业的经营者(10%)，他们的劳动力的平均产量较高，但每公顷的单位面积的产量较低： $P_b/SAU < P_b/U_{Th}$ 。

C类和D类从经济核算上来看都不是“赢利的”：有一部分没有得到相应的酬报，或者是土地，或者是劳动力。

5. E类的经营无论以公顷的单位面积计算还是以劳动力计算都得到很差的结果。这个类别包括了约半数的经营

① 若想知道农业会计学对这些定义的表达，请参见松巴德洛威和普瓦特文的著作，1957年。

者(47%)。

应当说明的是，获得较好经营效果的农业劳动者比一般水平的农业劳动者既不年轻，也不年老；相反，耕作面积与经营结果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约有半数获得利润的经营者(A类)耕种了9~11公顷土地(占A类的42%，占全部样本的25%)，1/3经济平衡的经营者(B类)拥有12~14公顷土地(占B类的35%，占全部样本的15%)，粗放经营的农业劳动者主要经营大农场(15~32公顷土地)；E类的经营者分布在各种规模的经营中。E类的经营结果是可观的：它表明，在这个类别里，与人们经常所说的相反，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并不是比其他人更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

大经营者由于实行粗放经营很容易获得人均高收入，他们得益于自己的经营规模。但是，最精巧的管理是存在于中等的，更恰当地说是存在于一般的经营规模中。想依靠十几公顷土地生存下去的农业劳动者必须是优秀的管理人。关心进步的农业劳动者更多地不是在大经营者中，而是在次一级的经营者中。我们的所有调查以及班夫纳蒂的调查都证实了这个结论。过于简单化地说，大经营者不需要进行努力，小经营者无法作出努力，“中等偏小的”经营者进行努力也是徒劳的；而“中等偏大的”经营者的努力可以使他们摆脱困境，赶上大经营者中的大多数人。我们已指出过，技术变革的传播是从大经营者开始的，鉴于此，人们可以理解，对大经营者有益的变革，也是或将对“中等偏大的”经营者有好处的，然而却可能使那些在土地规模临界线以下的农业劳动者破产，后者应当寻找独特的解决办法。不幸的是，我们要再次指出，没有任何人帮助他们，而且除了个别的例外，他们没有能力创造和完善他们自己的解决办法。

“墨守成规”的农业劳动者(E类)不如其他人信息灵通,这是很正常的:他们较少听广播,较少阅读农业报纸,不经常去当地的小城市(朗德诺、朗节维体和莫尔莱),较少与农业技术员联系;不过,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看自己的日报。“最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A类)明显地比其他人信息更加灵通,更经常地外出和听广播,特别是他们中有2/3的人熟悉农业技术员,而在全部农业劳动者中,这个比例是1/3。

“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A类和B类)认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改造土地(小块土地合并、疏通道路、消除陡坡和障碍)和改变耕作系统。他们认为,他们更加缺乏的是土地,而不是机械设备、房舍和劳动力。与此相反,“最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A类)如果手中有钱的话,会继续购买机械设备。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并非孤立存在的:在他们看来,土地的面积和结构是最迫切的问题,也是最难解决的,因为几乎没有土地可卖了,小块土地的合并不可能明天就实现,但只要有可能使用的资金,总是可以购买设备的。感到自己经营规模太小的人在从事高度集约化经营的农业劳动者(C类)中最多(80%),其次是在“最有才干的”经营者(A类)中较多(占70%,在总样本中平均占65%)。

约有半数的农业劳动者认为,有15公顷土地使用拖拉机就是合算的,就可以维持家庭生活。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在这一点上和其他人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又一次看到,农业劳动者作出这种估计所依据的是当地的一般经济状况,而不是他们个人的期望。对自身来说,人们可以具有更高的奢望,但当人们对整体进行评价时,略高于当时中等水平的经营规模似乎是令人满意的典范。

奇怪的是,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A类和B类)是最经常

求助于国家来解决当地农业问题的人；大概正像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他们感到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剩下的事情应由别的方面来帮助完成。正像人们可以预料到的那样，他们心目中的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是具有职业才能的人，而不是具有传统价值的人。此外，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悲观，如果不是更加悲观的话（特别是B类）。像其他人一样，他们也打算在发生农业危机的时候放弃农业。与这种普遍的悲观主义相反，最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A类）比其他的人更希望自己的儿子留下来继续务农（占A类的44%，占样本的31%），并希望使自己的儿子一直学习到18岁（占A类的20%，占样本的8%）。

* * *

许多作者（特别是约利维和班夫纳蒂）已经为墨守常规的农业劳动者、现代农业劳动者和进步农业劳动者勾勒出典型画像，他们力图以此使分析变得多样化、精细和明确；可惜的是，从特殊的个例出发建立的类型学说可能很难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因子分析可以建立起这样一种系统的理论。由于我们的调查不是为这种目的而设计的。所以提供不了足够的数据来建立一种类型理论，我们的调查仅仅可以使人们辨别出一些特征。随后为此目的进行新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概括出的那些特征进行组合，就会建立起一种真正的类型理论。

1. 第一个因子可以使人们辨别出墨守常规的小经营者的主要特征，这些小经营者常常实行象征性的现代化，他们可能会因此而破产，这一点他们是知道的。他们声称自己的经营规模太小，不能维持家庭生活，不能使用拖拉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购买拖拉机。他们消息不灵通、不读报、不认识

农业技术员。如果他们所害怕的危机到来，他们找不到摆脱困境的解决办法。他们的儿子16岁就不再上学了。这个因子与传统的现代化没有任何的联系，因为我们的调查问卷不能把传统的现代化与象征性的现代化区别开来，相反，这个因子与缺乏进步的现代化有着明显的联系。

2. 颠倒这个因子，舍去一些不相容性，人们就可以概括出进步的大经营者的特征：信息灵通，希望自己的孩子念书，他们的企业规模（土地和设备）和管理才能使他们具有摆脱困境的信心，即便是在危机的情况下也是这样。

3. 第二个因子指出了不满足的大经营者的形象特征：他们的经营规模明显地大于平均规模，但他们却觉得太小。因此，他们的耕作系统多半是粗放型的。他们认为，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和购买拖拉机，必须拥有远大于当地平均规模的耕作面积。奇怪的是，这个因子与现代主义、悲观主义以及信息程度等特征没有联系。这些“大经营者”可能会感到不满足，因为他们是墨守常规的人，他们实行象征性的或传统的现代化，但也可能不实行。他们懂得，要想走这些不同的道路，他们必须拥有较大的耕作面积。如果他们是进步主义者，他们的管理方法向他们表明，进步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他们越是沿着进步的道路向前走，就越是隐约地看到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的实现都需要土地和资金。正是这一发现使他们总是感到不满足。

4. 颠倒这个因子，人们可以描述感到自己过于富有的小经营者的特征。他们拥有不足10公顷的土地，他们感到自己的经营规模太大，认为即便是更小的经营规模也可以购置拖拉机。他们多半是上了年纪的人。

5. 第三个因子可以使人们描述出一种相似类型的人：墨

守常规的和感到满足的小经营者。

6. 在这第三个因子的反面，是大多数为前途而忧虑的中等经营者。他们意识到必须具有更多的土地才能摆脱困境和使用拖拉机，但他们却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他们面对自己必须接受的新形势，感到束手无策，他们一切都指望国家来帮助，很少指望个人和集体的努力。

如果每项调查都能提供关于经营的经济收益、家庭的非农业收入和参加农业组织的数据，这六个类别本来还可以进一步细分。

家庭中其它收入来源的存在扭曲了农业家庭经营中的一切核算方法的规则：自身消费成了优先的目的，投资的收本还利不再是带有强制性的了。有些从事双重就业活动的人甚至是城市里的富佬，他们每年都要补偿自己农业地产的亏损，为的只是得到占有地产和管理地产以及到那儿去度假的乐趣。他们的经营逻辑与打发女儿到附近工厂里“挣点钱”的小经营者的逻辑没有什么区别。农业的和非农业的兼营活动在各种形式下不断增加，从而满足了现实的某些需要。经济学家对这些经营的管理状况进行分析将是有益的。对于我们在这儿探索的问题，分别的研究是必要的，因为这样人们大概可以发现各种类型的农业劳动者，有最墨守常规的农民，也有准确地知道自己的盈亏总额的企业家。

参加农业组织和相信各种形式的集体活动的效用，无疑是今天法国农业中的一个进步主义的特征。然而，呼吁国家干预、相信有组织的行动、进行技术现代化的努力、精巧地管理经济，这些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不是矛盾的：有些农业劳动者是精明的技术员和管理人，他们依靠各种组织来销售自己的产品并得到指导，不过他们认为，没有国家的帮助，

他们的一切个人努力和集体努力都是徒劳的，而国家的帮助要通过集体行动来获得。另一些农业劳动者什么都指望国家，认为国家应解决他们的一切问题。个人主义者认为，心眼最多的人总是可以摆脱困境，国家和组织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益的。也有一些不信赖国家的人，他们指望农业组织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指望集体的行动能确保他们的利益不受到国家的侵害。最后，我们将会看到，对农业和农业状况普遍存在的悲观主义与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与参加农业组织及集体行动很容易是相容不悖的。

让我们假定，已经实现的或计划实现的改进、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的形象以及管理的类型，这些是确定现代化类型的标准，而且这些标准可以在传统和进步的两极之间形成一个单独的方面。再从我们的分析中舍去墨守常规的农业劳动者，不管他们实行不实行象征性的现代化。我们已经看到年龄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农业之外的收入属于一种不同的逻辑和一种不同的分析的范围。最后，假定我们掌握着评价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正确标准，那么，6个方面就可以建立一个类型系统：

1. 企业规模(不仅仅是土地的面积)；
2. 经济收益；
3. 传统的或进步的现代化；
4. 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
5. 参加组织及集体活动；
6. 求助于国家。

* * *

对农业劳动者的状况、态度和行为进行分类所作出的努力，导致了这样的结论：归根结底，农业劳动者的个人状况

与他们的态度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年龄对变化倾向的影响比人们所说的要小得多；“无才干的”农业劳动者分布在各种类别的经营中。如果说传统的现代主义者往往是大经营者，进步的现代主义者往往是中等偏大的经营者，这是因为在可以支配的资金和可能发生变化的类型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此外，某些态度和估计几乎是全部农业劳动者的共同态度和共同估计：他们都是悲观主义者，而且都一致认为，略高于当地平均水平的土地经营规模就足以维持家庭生活，就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购置拖拉机。拥有5公顷或30公顷土地，年龄30岁或70岁，是土地所有者或佃农；农民状况的这种多样性并不妨碍他们对事物具有同样的看法，也不会促使他们采取一些确定的态度和行为。这个人挣到了钱，使自己走向现代化并制定了一些规划，而那个人继续艰难地生活着。处境是给予的和变化的，“心态”是集体的和大家共有的，个人可以按他的打算行事。换句话说，这三个社会生活区域相互之间都是比较独立的，重要的是能够测量出在各种社会背景下它们之间的自由度。

这个结论是会让人感到惊奇的。技术人员和熟悉农民的人通常都倾向于指责农业劳动者墨守常规、固执、看不到技术给他们提供的可能性和不懂得适应消费者要求。此外，他们羡慕现代主义者的想象力、首创精神和勇气，他们认为现代主义者总是年轻人，而且经常是大经营者。不管对不对，社会学家拒绝维护和接受这样一种令人精神上十分满足的结论。

毫无疑问，在农村互识的社会集体中，存在着一些固定不变的共同态度，这是每个人都有的态度，而且是以同样的方式来表达的：我们在导论中就已提出这个假说。技术一经

济的状况并不像农业劳动者和经济学家说的那么具有约束性，这在目前的动荡时期看起来是正常的，因为在这种时期，各种各样的尝试根据时机的不同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相反，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的多样性无法用每个农业劳动者的个人才能来说明，这一点与一切社会科学的知识背道而驰，并促使人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处境只是关于经营的一些情况，不过，在作出结论之前，必须详细地描述每个经营者的社会地位，如家庭在村庄中的传统地位、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传统地位、在政治-宗教派别中的传统地位以及相对于当地社会-政治权力的传统地位；所有这些都应当弄清楚。此外，必须研究社会集体中的联系网络以及经营者和他的家庭在这些网络中的地位。最后，还应当了解个体的自身历史，并把它放到共同体的历史中进行分析。村庄和地区是否经历过重大的政治变化和农业变化？人们是否建立了农业机构？政治的或宗教的活动是否对青年人具有重要的影响？是否有一些给村庄和地区打下印迹的人物？

仅仅把农业劳动者作为个人来进行分析会完全扭曲人们的看法。虽然互识社会已被广泛地摧毁了，但它仍然极大地影响着个体的行为，以致人们不能在分析中把个体与他所处的社会分隔开来。当然，我们的研究结果证明，现在，个体在这个社会中具有很大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恰恰是只有与团体、习惯和束缚相联系才能被理解，因为它必然以某种方式与这些团体、习惯和束缚保持着协调一致。可惜的是，没有任何关于信息网、影响网以及村庄中个体相互关系的动力学的精确研究。然而，法国农村近期的全部历史都是以这种个体和群体的沸腾活力为基础的。必须对法国村庄农业进步的社

会史进行一系列非常细致的研究，才能够理解战争和沦陷的影响、天主教运动的影响以及杰出人物的作用，等等。

自然条件、技术习惯和现有的机构决定着农业劳动者对一切事物的观察方式。农业劳动者正是以这些作为参照来评价事物，评价自身，决定继续遵循常规或对常规提出质疑。是大经营者还是小经营者，拥有的土地很多还是很少，这在根本上说都是相对的：一切都依邻居的情况而定。我们已经说过，拖拉机的“效益”或“必要性”是相对的。因此，如果对个体来说，由于一些人懂得利用农业结构，从而使这个结构看起来并不像农业劳动者所说的那么具有束缚性，那么这个结构却紧紧地禁锢着一个地区的农业劳动者的整体运动。一个地区并不会因为某个农业劳动者或某个农业劳动者的群体想出了某种成功的解决办法，它的问题就会因此而得到解决。

集体的解决办法与个体的解决办法有本质的不同。难道还需要举例说明吗？如果土地的面积是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一些人的成功就必然是建立在其他很多人的衰落的基础上。有时，集体的解决办法和个体的解决办法几乎是吻合的，特别是在生产者接受了共同的纪律以便大量出售标准化产品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表明，这种理论上的吻合，在处境各异的农业劳动者看来，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圣波德莱昂地区在蓟菜上出现的麻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每个农业劳动者都是参照其他人来确定自己的位置的，因而对每件事情的特殊性特别地敏感。他所作出的“估计”是墨守常规的，是传统主义的或是进步主义的，这完全是根据他自己的情况和他自己的特有定义。这样每一种考虑都有它的根据和特有的合理性，既不能和别的考虑聚合在

一起，也不能归并入其他的考虑，虽然大家都生活在同样的土地结构中，具有同样的总体态度。事实上，正是在这个共同的体系中，每个人为自己作出考虑，然而，共同的体系会迫使人们接受它的逻辑，从而使个人的计划能够聚合在一起。

另外，归根结底，从长远来看，谁是正确的呢？遵循农民的传统典范的墨守常规者感到在走向破产，他们将此归咎于时运不佳和权贵的阴险恶毒，并督促自己的儿子学会一门职业。传统的现代主义者进行投资，“使劲地攒钱”，以便在日子变得更艰难时度过难关，他们很清楚“他们的”政治家不会让生活变得无法忍受。进步主义者弄清了经济系统的功能，但他们不能控制这个系统，他们作出一些冒险的选择，创立新的团体，去适应需求的变化，但如果他们走错一步或者竞争规则在他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被扭曲，那么他们就有破产的危险。对各个农业劳动者来说，这三种“策略”哪一种最好呢？

每个农业劳动者在作出风险选择时，既不知道农业形势将来的变化，也不知道本地区和本国其他农业劳动者作出的风险选择，因此他也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否适当。这样，农业计划生产的整个问题就从农业劳动者的角度提了出来。他们应当每人自己作出决策，但人们并没有向他们清楚地说明国家的重大决策，而且中间层次的组织也没有作出可以指导他们的一些决策。由于缺乏对农业问题更加根本的和总体的解决办法，因而只能期望，农业市场的安排、耕作合同的制订和合作机构的加强今后会有助于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者虽然处在艰难的条件下，而且几乎没有确定方向的手段，但他们表现出一种企业精神，一种经济意识，一种想象力和一种非凡的、令人钦佩的勇气。

第六章

农业劳动者的职业和状况

“我要是有一项职业，将比当农民好多了。”我们在调查中经常听到农民这样说^①。这种遗憾概括出农民的“地位”和其它职业的地位之间的根本差别。长期以来，所有农民状况的观察员都强调这种差别^②，我们在前面谈到角色的混淆时也曾提到这种差别。在农村，人们生来就是农民，并且一直是农民。他们不是变为农民的：如果人们是农民，就没有职业。

农民是一种存在，是对自我的一种整体的和静态的规定，而其它的职业是人们获得的和占有的“所有物”。农民“拥有的”或占有的东西是他的田地，他的继承物，就像别的人“拥有”职业，“具有”一种才能。人们可以是有才干的农民或平庸的农民，可以经营得不错或者较差。经营就像职业一样，可以发挥个人的才能，不管这个才能是天生的还是获得的。一个能干的和个性很强的人，或者有一个可以得到自我实现的“好”职业，或者悲叹处境从各方面束缚了自己。一个“有才干”的农民或者从事着足以使他施展全身本事的经营，或者相反，他在不毛之地上苦苦地耕作狭小的面积。当然，

^① 孟德拉斯，1958年，第75页。

^② 马斯贝乔尔，1946年。

正是土地的经营造就有才干的或无才干的农业劳动者：在开发良好的农场上做一个有才干的经营者是更加容易的。

此外，我们已说过，互识社会促使它的成员始终不渝地遵守自己的地位为自己确定的行为规则。因此，对农民来说，自在是第一位的绝对要求，而变异（成为其事物或其人）是不寻常的、危险的，甚至是应受到道德谴责的。贝尔诺和布朗卡在努维尔村注意到了这一点：“变异的自觉观念是没有的。有的是存在的观念。例如，人们不说‘某某先生有知识，因为他用功’，而是说‘某某先生有知识，因为他有文凭’。在其他人士看来，批评所针对的是那些得到了什么的人，而不是针对那些已经具有了什么的人。镇长有一辆前轴驱动汽车是正常的，但当小学教员有自己的小汽车时，有些人就觉得他‘太富了’。”^①与此相对称，一位悲观的小经营者说：“我已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落到这种地步，只好这样了。”在对待变化的问题上，这种看法已经初步形成了，它说明农业劳动者不能像其他劳动者那样来看待自己的职业活动。

从这个根本的差别中派生出许多其它的差别。人们是以有组织的和理性的方式学会从事职业的。这种获得的能力可以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完善。相反，由于农民没有学习某种职业，现有的职业在他看来是与自己“同生同灭”的，所以他感到所有的缺陷都是个人的一种不公正的待遇。一切为成为更有才干的农民所做出的努力都是一种自身的努力，而不是人们获得新知识或新才干。既然农民熟悉他的土地，懂得耕作，于是缺陷只能是来自实施不力、延误、疏忽、劳动不足或干得不好，总之，是一种个人自律上的缺陷。

^① 贝尔诺和布朗卡，1953年，第180页。

所有这些都可用一个词来概括：干劲。有才干的农民是有干劲的。干劲在这里是劳动热情和自律的同义词，这和战士的英勇毫不相干。传统的农民文明就是建立在这种干劲的基础上，而现代农业是工程师的作品，从本质上说是“创造性”的。过去，技术才能与道德素质相比是无关紧要的。今天，与此相反，智力、技巧都比力量更重要。过去合乎道德的农民不抱怨劳苦，而现代农业劳动者则依靠智力和机器免除了劳苦。

没有选择是整个农民生活的特点，这在生活开始的时候特别明显，因为农业劳动者的职业从来就不是选择的。当然，一些农业劳动者感到他们本可以离开土地，他们是“自愿地”留下来，但是，必须说明，在真的出现“得到一项职业”的可能性时，为了“继续当农民”而拒绝这种可能性，这种事几乎是没有的。儿子留在他父亲的家中，因为必须有个孩子留在家中和父母在一起。在我们询问的农业劳动者当中，很多人在听到我们问起促使他们“留下来”的原因时感到愤慨：对他们来说，这问题从未被公开地提出过，提这个问题是有点不正常的。根据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的调查，61%的农业劳动者说他们从未想过离开土地；考虑过离开土地的几乎总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然而，显而易见，那些留下来的人是考虑过这个问题的。还必须知道，在那些离开的人当中，有很多人本是愿意继续当农民的。

近几年农村人口迅速外流，在这样的时期，那些离开的人当中很少有人学会了一门职业的：除非是他们抓住了出现的机会或者是凭一时冲动离开的，否则他们离开农场主要是由于农场刚刚能够维持他们父母的生活，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生存的希望。在农业劳动者的儿子们当中，“学会了一门

职业”的人和在学校里学农业专业的人一样稀少，根据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的测验，约有2/3的农业劳动者认为他们要改变职业会有很大的困难^①。他们的处境是“给予”他们的，在他们看来，这处境具有极大的束缚力，致使他们几乎从未考虑过要离开这一处境。

A·勒维斯克在他关于人口迁移的研究^②中清楚地表明，那些与自己的农场和家乡联系最紧密的人都是小经营者，他们的物质能力最有限，因此也就最倾向于离开只有极少的东西使他们留恋的土地。然而，正是这极少的东西迫使他们进行疲惫不堪的劳动，从而使他们没有闲暇来考虑其它的出路，此外，这极少的东西还不足以成为他们离开的理由。它可以使他们日复一日地生存下去，对他们来说，它代表着一种安全，除此之外，他们只看到冒险。习惯和社会结构对另外一些人的束缚小一些，但是他们同样没有理由离开土地，他们的家庭世代代在那里生活，虽然生活不太好，但有保障。

因为没有选择，人们留下来了；因为父母在这里，必须留在他们身边顶替接班。一旦过了30岁，要离开就更加困难了；人们在物质上和情感上越发与经营的土地“联系”在一起。正像一个农业劳动者所说的：“熟悉自己的土地，对土地进行经营，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人们越是熟悉他的土地，就越是依恋它。”一个农业劳动者这样概述了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人们在这儿长大成人，在这儿谋生，对这儿也就满足了，再说，为什么干别的呢……而且，归根结底，离开这儿是令人伤心的。”

^① 约利维，1966年。

^② 勒维斯克，1958年。

M·费列在这方面如此地评价他的调查结果：“当人们问一些农业劳动者为什么他们留在土地上和为什么‘别的人’留在土地上时，他们对别人的评论更强调的是命运；迫使其他人留在土地上的往往是惰性和无能；‘我’感到其他人比我缺少活力和选择的能力。人们可以想一想，难道不正是农业劳动者在谈论其他一些人的时候，最清晰地和最坦率地分析了他自己的处境吗？”换句话说，他抱有一种适用于自己的选择幻想，一心想要在调查者面前说出这种幻想，以便使自己对此确立自信，并使调查者也相信。

而且，就像在一切职业中那样，不管这职业是不是人们选择的，人们在经过一个不安的时期之后接受了他的职业，继而对它适应了，并对它产生了爱好，这个不安的时期在工业中表现为职业的不固定，在农业中表现为离开的欲望或对技术变革的渴望。几乎所有考虑过离开土地的农业劳动者都是在20岁之前产生这个念头的。当然，这机制是双重的，因为要对土地产生爱好，必须是出生在那儿，但爱好也是和年龄并进的：

必须具有爱好	69
不知道	7
必须生在哪儿	69
不知道	7
人们越老越依恋土地	54
不知道	22
回答数	76

起初，经营者“是自己的主人”这一点使选择的缺乏得到

补偿。但农业劳动者的“自由”在这儿仍蕴含着矛盾^①。如果说他以自己是主人和没有老板为荣，那他也为自己是职业的奴隶而感到遗憾，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从来都不是自由的。实际上，选择的可能性在农业中和在大多数其他职业活动中并非是等同的。农业劳动者与工厂里的工人和办公室里的雇员形成的对比特别鲜明，对于工人和雇员，人们可以说他们“选择”了自己的职业，但一旦作出选择，他们就不再有劳动生活的自主权。

除了要遵守大自然的要求，农民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自由地安排劳动的，我们在前面已指出了这一点。有些要求和工厂或办公室里的作息时间表具有同样的约束性，如果不是具有更大的约束性的话。例如，必须完成早晨和晚上的挤奶工作。但是，这种限制是自然强加的，直接受到这种限制的劳动者在安排自己的活动时总是能够考虑个人的要求。相反，工人和雇员都不会直接地感受到劳动的根本限制，对他们来说，这种限制由于等级系统而变成间接的了。劳动的规则在他们看来最多也就是按照雇主的意愿制定的。此外，他们很难感受到雇主面临的和通过等级系统传递给他们的限制，因为这些限制往往受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的支配，而且归根结底，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看起来也会是人为的和由权贵们炮制的。工厂或办公室里的劳动守则具有农业劳动所没有的或然性特点，在农业劳动中，劳动者是根据自然的直接要求确定自己的行为。相反，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当农业劳动者作为经营主去反抗“国家”、“政策”或“价格”时，他就感受到了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的或然性。

^① 米洛，1962年。

“不必服从雇主”或“不必受人监视”，这是农业劳动者的自豪，他们往往把工厂里的工人比作农业上的帮工。工人的从属地位使农民感到如果当了工人就不可能“是一个男人”，甚至会像是一个儿子，这儿子由于没有可以继承的父亲，因而没有任何将来成为自己的主人的希望。但同时，农业劳动者也渴望得到工人在下班时走出工厂后享受的自由和稳定的工资。“痛苦的是像奴隶一样，从没有假期，从没有星期天”，或者，“在周末领到薪金并且自由自在，那是多么美好呵”！

农业劳动者很少看到劳动中没有自由与劳动外拥有自由之间的联系；他没有想象到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在他们看来，前者是可恶的、可鄙的和不能接受的，而后者是令人渴望的。因此，他们想得到两头的好处，既要依然是自己的主人，又想有固定的作息时间表和有保障的工资，这在我们的社会体系中显然是不可能的。作息时间表要想是固定的，就必须是被某个人规定的。只有一些单一耕作者，可以做到限制自己的劳动时间，例如朗格多克地区的葡萄种植者或巴黎盆地的谷物种植者。但是，我们的分析重点是从事家庭混作的小经营者，他们无法逃避非专业化生产者所面临的矛盾：他们是自己的时间的主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时间，但他们从未摆脱自己的时间的束缚。只有其它的生产结构才可以摆脱这些矛盾。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固定的工资是农民妒忌“受薪者”的另一个原因。然而，在我们的社会系统中，人们能够想象既不放弃企业主的地位又领取固定的工资吗？在这儿，矛盾是如此的明显，以致大多数农业劳动者都意识到了这个矛盾：他们的工资就是农产品的价格，特别是由政府规定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维护“自己的工资”，例如，要求国家提高小麦或牛奶的

价格。但是，从事多种经营的小农所生产的小麦主要是供自身消费而不是供出售，而对于肉类和水果，他们不能照同样规则行事。今天，传统的农业联合会运动和年轻的联合会会员在这个冲突中形成截然相反的两派，前者捍卫价格是为了保护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后者则希望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则办事，要求政府给予农业进行投资和改造结构的物质能力。前者把农业经营者看作是劳动者，认为他的等量劳动应当得到等量的工资；后者则把农业经营者视为企业主，认为他不仅要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还要使自己的资本得到酬报和取得成就，也就是说，要获得利润和发展自己的企业。

像对待工业问题那样来对待农业问题，必然会陷入一些无法解决的矛盾或得出一些被自然的社会进化过程远远超越了的解决方法。必须改造结构本身才能使农业从现在的前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新的形式，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实行“资本主义的”过渡经济。在此之前，农业劳动者要用他们的领导人向他们提出的概念来考虑自己的问题，即使是他们感到这些概念不完全适合于自己的境况，但是他们的职业精神状态会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

对于农业劳动者来说，土地同时是指农田、农业职业和所有的农业劳动者。他们很少在自己的工作这个意义上对自己的职业作出评价。如果人们要求他们详细地分析本来意义上的职业，他们会谈一些实施“条件”（土地、家庭等等），而不是谈活动本身，如劳动和劳动者必须具有的素质。

反之亦然，农业职业首先是指土地、自然和大自然中的露天乡村生活。几乎在一切有关职业的交谈中，纯净的空气都是一个老话题：“这里的空气是有益于健康的”，而在城市

里，“人们喘不过气来，空气也是不干净的”。难道还需要强调这种话题的道德含义吗？城市对于道德生活是有害的，人们在那儿呼吸的空气在损害了身体的同时也污染了心理。孩子们最好是吃干净的食物和在十分和睦的家庭里长大，这样他们具有较少挥霍的机会，冒更小的危险。人们在城市里不像是自己的家，一切似乎都在威胁着你。

然而，农村的生活有一些明显的不便之处。呼吸纯净的空气要以经受变化无常的气候为条件。一般来说，在那种坐落于坎坷小径尽头的农场或小村庄里，生活太孤独了；有时情况也会相反，人们从来就是不孤独的，因为在村庄的狭小社会里，没有真正的独立生活。在布列塔尼地区波卡热一带分散的农场中和在波斯地区的村庄里，孤独和缺少自主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人们孤独地生活着，但互识社会又从各方面束缚着你。尽管如此，最糟糕的似乎还是城市里的人群，在那儿人们谁也不认识。

农民把城市社会视为匿名社会，他们很少认识到，正是由于这种不知其名才有可能具有某种相对于他人的独立和选择自由。他们要么抱怨生活孤独，要么抱怨过于拥挤。在我们所提问的朗格多克地区的葡萄种植者中，有87%的人说他们不喜欢住在城市里。在贝热德鲁西戎地区，农民的愿望是以下面的形式分布的：

喜欢住在城市	5
喜欢单独地生活	26
喜欢住在农村但不孤独	45
	<hr/>
	76

约有2/3的人希望住在离小城镇不远的地方，以便既能得到城市的方便，又能避免孤独的环境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上造成的不便。那5个选择城市的人都不到40岁。

生活孤独的人之所以希望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其主要原因是靠近自己的农田：“一个世代务农的农民喜欢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中间。”不过，大多数农业劳动者感到这种孤独是乡村生活和农业职业的一个主要缺陷。吉洛和斯比册认为，这种孤独在心理和情感上造成一些深沉的反响：“所有那些一连串的、细小的不满可以说在一种心理孤独的和被舍弃的普遍情感中得到滋长；引水方式的落后，公共道路的失修(……)，当农业劳动者抱怨人口减少、青年出走和房舍遭弃等现象时，经常提及这种心理上的孤独感和这种悲伤的感受，在无所事事和生活无聊的漫长冬季，这种感受愈加强烈，令人痛苦难挨。”

热爱自己的职业，热爱农村和土地，这是乡村文学和农民传统思想观念的主题之一^①。我们并不想在这儿去分析这种思想观念，也不想去探索它在何种程度上为农民所共有和它是如何在目前的变革过程中变化的。我们的调查和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的调查都可以说明，农业劳动者从自己的职业中获得极大的满足。看到丰收在望、照料健壮的牲口、生活在大自然当中、成为自己的主人、共同分担各种劳动、担负着从播种到收获或从饲草直到挤奶的整个生产周期的工作，这些同样都是农业劳动者感到非常满足的原因。例如，众所周知，有些人喜爱种植作物，而另一些人熟悉牲口的脾性并喜爱喂养它们。当巴黎盆地或其它地方的农业劳动者完全放弃饲养业以便专门种植谷物时，当小经营者以拖拉机取代了自己的马车或牛车时，他们的整个劳动安排和他们的一切工

^① 阿尔朗，1941年；巴戎，1945年。

作都改变了，而且通常是减轻了，但他们内心深处和情感上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对这些问题迄今还没有任何研究。

劳动如此变化多样的职业是很少有的，但人们谈论这职业时总是像谈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①。对岗位分解、劳动满足和提高劳动价值的研究还只是在工业中进行过，我们没有掌握任何在农业上类似的研究材料。事实上，农民不太喜欢对这些问题表达自己的见解。他们感到“应当什么都干”。我们已经看到，对他们来说，耕作系统不能根据价格的波动和市场的要求进行变动，因此，不能因为每个人的兴趣和偏爱而对耕作系统产生怀疑。

劳动属于本分、自我约束和干劲的范畴。农民似乎担心，对这个必要的绝对要求产生疑问会从根本上动摇自己的生活。当调查者问一个劳动者：“如果你有6个月完全空闲的时间，你做些什么？”那个农业劳动者愤慨地说：“在这儿，我们劳动，我们不能休息！”休息是不符合道德要求的。同样，说“我喜欢”或“不喜欢”某项劳动是把娱乐和消费的范畴与责任和生产的范畴混淆在一起了。再者，农业劳动者是自己来规定自身的劳动纪律的，如果考虑自己爱好，那这种自我约束的整个逻辑就被打乱了。而对工人来说，职业角色是明显地与其他人分开的，劳动纪律是等级系统规定的，他考虑“自己在劳动中有没有乐趣”即使会影响他的情绪，那至少不会影响他的劳动。农民则不同，因为在他看来，劳动完全依赖于干劲和对自我的约束，所以考虑乐趣的问题是不正常的。

如果农业劳动者想评论和估价自己的劳动，他们必须求助于道德之外的衡量尺度。经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衡量尺

① 阿尔道，1944年。

度，告诉他们什么赢利，什么不赢利。在通过核算确定成本之前，农业劳动者懂得哪种作物报酬好，哪种作物无利可图。尽管如此，还是应当二者都经营，因为我们已说过，由于耕作系统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应当什么都干”，不必事先提问。当农民的簿记精细到足以测量出每项劳动应当获得的报酬时，农业劳动者就可以放弃一切劳动都绝对必要的观念，考虑一下他喜欢哪些劳动，讨厌哪些劳动，因为要想挣钱他就要强制自己去从事第二类劳动。乐趣和报酬可以被放在天平的两个称盘上，人们在哪边放的筹码重，天平就往哪边倾斜。但乐趣和道德要求却不能这样衡量，因为道德要求是绝对的，在道德上不能权衡得失。

这种对劳动的清教徒式的态度是以对职业的类似观念为基础的。农业劳动者往往说：“种地是最辛苦的了”。这样一来，他们就自以为选择了或至少是接受了“最辛苦的”工作，并以此为荣，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勇敢的人和任劳任怨的人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按照这种观点，那些离开土地的人是选择了安逸的生活，用军人的话说就是“贪生怕死”，或至少是开小差：难道人们不是说他们“逃离了土地”去寻求城市里的快乐、安逸还有风险吗？反过来，他们中的某个人会叙述他怎样依赖苦干的精神和坚持不懈“战胜了贫困”^①。

从我们的调查以及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的调查中，人们看到农民和城市人的一些重要的对比特征显示出来，这些特征和农业劳动者所想象的一样。一边是缺乏教育，言谈举止笨拙，衣衫破旧灰暗，像布尔迪厄所描述的“被乡土化了的农民”^②，另一边是受过教育的城市人，举止优雅，说话头头是

^① 诺尔，1944年。

^② 布尔迪厄，1962年。

道，总是轻松自如、生活安逸。尽管这种对比是肤浅的和刻板的，但它对农民的态度有影响，助长了他们的社会“自卑情结”。

但是，精神上的优越感立刻成为这种自卑的补偿。城市人太轻浮和太浅薄，以致无法让人信赖。他们至少是不老实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人造的虚伪环境中，依仗狡黠和弄虚作假取得成功，而农业劳动者“面对的是天气、季节、土地、作物和牲畜等自然力量，无法弄虚作假”。对人和政府弄虚作假是正常的，无论在现代社会还是在农民社会，这都是处世规则的一部分。在交纳社会保险金和税金时作弊是习惯作法，不会遭到谴责；同样，在集市上，老实人会被人欺骗，而机敏的人懂得欺骗那些想愚弄他的人，并会因此受到尊敬和羡慕。但农民的狡黠和城市人的弄虚作假都无法蒙骗自然，因此，生活在自然之外的和完全人造的虚假环境中的城市人，只能是个作弊者，就像是生活在集市上的牲口贩子，他从来碰不上毫无弹性的自然。

总之，这种人们喜爱的艰苦职业需要并塑造了高尚的道德品行，但人们是否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事这种职业呢？当人们询问农业劳动者对自己孩子的打算和要求时，得到的是一些包含着矛盾的回答。几乎所有的农业劳动者都一致认为，最好是有一份职业，而不要呆在农村里种田，但很多人希望至少有一个儿子继续从事农业经营。很少有农民会毫不犹豫地预言他的经营将要消失，或明确地说：“儿子将做他想做的事情，但不要当农民，要选择一门职业”。条件和反应是根据地区而有所不同的。在布列塔尼地区，由于人口过多，人口的外流是必要的。在阿尔萨斯地区，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在当工人的同时保留自己的农场。在贡布莱叶地区，生活是艰苦

的，但不缺少土地。在贝亚恩地区，农业具有新的发展潜力，但经营规模太小，城市生活完全进入村庄。然而，在这4个地区和其他地区一样，大多数农业劳动者希望他们的女儿离开土地，但他们经常希望留下一个儿子务农。

对孩子们的前途的期望

	莱昂		贝亚恩		贡布莱叶
	男孩	女孩	男孩	女孩	男孩
留下务农	33	13	47	13	30
离开土地	24	29	11	28	17
孩子有职业	43	58	42	59	53

注：在撒德高地区没有提问这个问题。

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的调查证实了这些结果：40%的农业劳动者希望他们的儿子成为农业劳动者，只有13%的母亲希望她们的女儿嫁给耕作者。经营主期望看到他们的事业后继有人，而父母期望他们的女儿离开土地：这个矛盾特别显示出农业劳动者对自身条件的双重观念。而且，有时同一个人，一方面哀叹农村人口外流使青年人都走了或使劳动力变得稀少，另一方面又希望他的儿子从事其它的职业。

人们认为，男子从事农业劳动者的“职业”是可以接受的，而女子是断然不可再当农民的。习惯的作法与这种态度是一致的，因为人们更为经常地让女孩而不是让男孩“继续上学”。人们打算让一些女孩留下务农往往是用来招婿，以便填补儿子的空缺。在很多农业地区，人口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些材料，表明那儿男子的数量比女子多。

在这个问题上，只有更加深入的调查才能弄清楚，在何等程度上，那些希望有一个继承人的农业劳动者会“强迫”

自己的儿子务农，以便维持“家业”，或者相反，他们会认为农民的职业可以使男子感到满足，但他们无法想象女子能够忍受农民的生活。换句话说，农业劳动者是否把他们的个人愿望投射到了女儿的身上，认为可以对女儿的前程产生幻想，但却不容许自己对自身和对儿子产生同样的幻想呢？有意识地去考虑自杀的问题是不正常的，即使是职业的自杀和通过中间人的自杀。

这些观测促使人们去研究妇女在农村人口外流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只是提问了男子，妇女也许更容易期望让儿子离开农村，或者年轻的姑娘更容易期望自己的男朋友离开农村。人们常说，订婚的姑娘都要求自己的未婚夫许下离开家庭农场的诺言。当孩子的职业方向确定得较早并事先进行培训准备时，在指导男孩向非农职业发展方面，母亲的影响大概比父亲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实际上，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母亲越来越担负起与外部世界联系的责任，而父亲则把自己的角色局限在狭义上的农业劳动。

农业劳动者对于预定接班的儿子，一般都不抱有学业上的奢望。中学毕业后，男孩就留在家里学习函授课程（这是付给家庭津贴的条件），但仅此而已。在我们的4项调查中，只有不到1/4的农业劳动者打算让他们的男孩中学毕业后继续上学或接受职业教育：中学毕业后的进修课程，冬季学校，家庭培训所。如果男孩接触的仅仅是父母，那下一代人会与上一代人十分相象。就像上个世纪的显贵人士们那样，农业劳动者仍然担心“学业太长会使孩子脱离农业”。他们意识到正在发生的动荡，但他们认为，人们并不是在学校里就可以学会处理这种新情况。总之，农业劳动者不相信农业会成

为被选择和被学会的职业，农业的状况将始终是儿子继承父亲。

农民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是非常出名的，以致成了人们开玩笑的话题。人们往往说，从未见过对自己的收成感到满足的耕作者。D·哈列维指出，农民本性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焦虑不安。他引用吉约明的话说：“过去的老农民总是怀有恐惧”^①。然而，这种对未来的恐惧和对悲观主义的确认却伴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从而使农民不断地重复同一行为，以便确保生活的持续和土地的丰产。今天，同一矛盾仍然存在着，一方面是对农业前景表现出的不安，另一方面是希望看到有一个儿子能确保家业后继有人。

此外，农业劳动者敏锐地感到，与其它社会阶层的“富足”和“资产阶级化”相比，他们的状况正在逐步恶化，一代不如一代。显然，并非所有的人都在走向贫困化和无产阶级化，特别是那些懂得使自己现代化和及时投资的人，情况更非如此，但后者本身也同样感到与其他阶层的人相比落后了。“我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劳动技术，我继承了他，像他那样耕种农田，但是，我不如他生活得好：他可以送我去上学，直到念完中学，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让儿子也做到这一点；您瞧，先生，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奥德省一个多种经营者的这种看法代表了很多农业劳动者的思考方式。

71%的农业劳动者认为，他们的经营情况良好，84%的农业劳动者表示喜欢自己的职业，但有61%的人认为，农业的情况不妙。在关于各种职业的声望和收入的等级栏里，几

^① 吉约明，1942年；哈列维，1935年。

乎所有的农业劳动者都把农业职业列在倒数第二，刚好排在工业非技术工人的前面。此外，他们感到自己在国家中受到冷落：45%的人认为，农业劳动者面临的困难要比其它法国人多得多，38%的人认为，他们交付的税款相对来说多于他们应付的份额，而且他们不像其它社会阶层那样可以得益于一些收入的转移形式(公用事业、社会保险，等等)。

总之，像奥德省的多种经营者一样，他们对“自己的”农业感到满意，但不满意总体的“农业”。他们强烈地感到一种不公平，并对这种不公平进行了下面这样的分析：

问题：你感到农民的状况首先在哪些地方的确是不公平的？其次呢？

	首先 提到 %	其次 提到 %	合计 %
与付出的劳动相比，农业劳动者未挣到足够的钱	62	19	81
他们可能会破产	13	45	58
他们不得不一直劳动到死	6	11	47
他们从不能度假	8	33	36
人们不承认他们在国家中应有的地位	6	25	31
如果他们想改变职业，很多人只能当非技术工人	2	25	27
农村的生活是不舒适的	1	12	13

这个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农民劳动一辈子也没有假期，他们破产后可能会沦为苦工，但他们的辛苦和风险都未像他们应当得到的那样受到酬报和承认。

另外，如果人们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农业的困境，

回答中提到的原因如下：

农业的困境应归因于：	首先 (%)	其次 (%)	合计 (%)
农产品价格低	41	30	71
农用工业产品价格过高	13	47	60
政府缺乏关心	9	30	39
市场组织得不好	8	26	34
外国产品的竞争	4	21	25
近年收成不好	9	13	22
生产安排得不好	2	17	19
过小的经营体太多	4	12	16

总之，农业的一切不幸都是由于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利和没有组织好国内市场及国际市场，恶劣的气候和农业结构也是致使已竭尽全力的农业劳动者生活艰难的个中原因。

事实上，农业劳动者学会了“认真地干活”，他们继续遵守着那些曾确保父母的生活安定甚至社会声望的劳动规则：他们认为应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得到报偿。他们感到自己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他们的劳动很出色。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正常的酬报，因此“世界”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换句话说是不合情理的。在他们眼里，这种用道德术语对处境进行的分析是非常严密的，充分地说明了他们目前的困难。提出补救的方法在于政府进行干预，否则的话，就有可能使人们把错误推给一些替罪羊。如果说世界和其他人都是不公正的和道德的，而我们是忠实于自己的责任的，那么所有的困难就只能归因于他们，而不是我们。这种态度很容易被视作为人们通常所说的农民的社会自卑感。由于感到没有在社会中得到充分的“重视”，他们以一种道德优越感进行补

偿，认为自己具有一些其他人不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

L·维利对普罗旺斯地区的一个村庄进行了值得赞赏的研究，他在作出结论时自问，为什么“毕拉恩村的人在与外界其他人进行交往时有点发疯了？”他暗示说，这可能是由于“明哲”和“处世之道”在村庄生活中的盛行^①。贝尔诺和布朗卡在研究努维尔村时就已经强调过村庄里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被集中表现在这样的叫喊中：“让他们不要用他们那些瞎编的东西来打搅我们”^②。L·维利对这种根本的对立进行了评论：“来自外部的他们在村庄里就像是天气，是必须接受的必然性，因为‘事物就是这样’。当人们能够抱怨天气和他们时，人们会感到更舒适一些”。^③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处在天气和他们之间，因为人们对它们无能为力。他们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我们遭受了苦难。不过，在贝尔诺和布朗尔所下的定义中，他们是城市、工人、中间人……特别是政府，总之，是那些“使我们生活得不好的人”。这样，绕了一圈，技术的和经济的绝对要求可归咎于其他人了。

农业劳动者很少仅限于作出这种自我辩解性的反应。他们同时还意识到，技术变革、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是他们必须承认和考虑的现实。但他们缺乏经济分析的眼光，无法理解他们面临的新的迫切要求，他们倾向于把这种新的适应视为一种困难，或许是视为必要的困难，但毕竟是视为一种困难。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前面的道德分析与他们对世界发展的分析协调起来，后一种分析虽说是现实的但却是模糊的和

① 维利，1957年，第339页。

② 贝尔诺和布朗尔，1953年，第107页。

③ 维利，1957年，第209页。

不确切的。在最年轻的农业劳动者当中，有些人把新的条件看作是一些机会，这些机会可以使准备承担新的责任的人获得远大的前途。维利注意到，“不必对所有这些抱怨都过于认真，那样是幼稚的，但对这些抱怨一无所知也同样是幼稚的”。

农民不可能信赖本应使他们摆脱困难和得到公平对待的国家，因为正是这个国家成了他们的抱怨的替罪羊，成了其他人的化身和困难的化身。“缺乏农业政策”是大多数人用来解释农业劳动者的困境的老话题。政治往往受到蔑视，政治家往往不能得到信赖。这些人考虑的是他们的个人利益，而不是农民的利益，他们用一些花言巧语来掩饰自己的无所事事。1957年秋，在我们的一次调查中，农民往往把他们的农业危机与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危机联系起来。在共产党影响很大的乡镇里，农民以非常具有攻击性的激烈言词来表达看法。“他们对我们实行古怪的政策……总是如此！”“法国现在的情况很糟，我不知道怎样才会结束这种状况。”“人们可以用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花的钱为我们修条公路。”“政府什么都要拿去，他们将会夺走我们的土地，像卖掉阿尔及利亚一样卖掉这些土地。”“德国人借钱给我们，这是耻辱，是下贱。”换句话说，如果农业的形势不好，那就是法国的整个形势都不好，是象征和代表着社会与政权的罪恶和不道德。

荒谬的是，这种不信任并不妨碍向国家求助；要求国家给予帮助是最经常提到的解决地方农业问题的办法。在阿尔萨斯地区和贡布莱叶地区，几乎所有的农业劳动者（90%至95%）都要求国家以某种形式进行干预：农业政策、价格上的支持、社会立法、信贷和津贴等等。在贝亚恩地区和莱昂地区，有不到半数的农业劳动者（39%和42%）作出同样的回

答，但他们往往要求进行一些改进，在他们头脑里，这些改进必须依靠政府的倡导和资助：引水，道路，土地改造。在贡布莱叶地区，也有约半数被提问的人要求进行这些改进。

那些描述过法国人“政治心态”的政治学家经常为国家勾勒出这样的形象：一方面国家无法令人信赖，另一方面人们又期望国家拿出一些办法来解决一切困难。在这儿，重要的是农业劳动者在其职业精神方面表现出的这些矛盾态度所造成的后果。这两种态度是互相补充和互相加强的：人们对国家的期望越大，就越是可能失望，并且，越是会把国家视为“不够格”的父亲，认为他没有为自己的孩子尽到应尽的义务。如果形势变得危急的话，国家就会成为承担一切责任和减轻农业劳动者内心不安的替罪羊，农业劳动者深信无法“独自摆脱困境”，因为“如果国家不支持我们，那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如果说国家只能让人失望的话，那农业劳动者是否会更为信赖自己的兄弟、其他农业劳动者和各种农业组织呢？这儿基本的态度仍是矛盾的。此外，在目前这些年代里，农业劳动者在这方面的态度变化很快，变化方式也是根据地区而有所不同的。从传统上看，农民往往哀叹“农民没有足够的团结”。当人们问农业劳动者是否会像工人那样进行罢工时，回答往往会令人觉得没有可能。例如对于一次送奶的罢工：“如果我不送奶，那邻居要是去送呢？”言下之意是我会被“愚弄”……事实上，在法国人的反应中，这种担忧是带有根本性的^①。

^① 莱特，1958年和未标日期。

直到目前，个人主义支配着整个农业生活。一个农业劳动者如果是更有才干的生产者和更善于在集市上讨价还价的人，他也就比邻居更善于“摆脱困境”。最为精干的人与他邻居的这些细小差别会使他拥有声望和经济成就：每个人的荣耀都蕴含在他和别人的区别之中，尽管这种区别很小。当人们从小就被培养从事这种竞争时，很难相信邻居不谋求成为“更狡黠的人”，也很难相信在目前的情况下集体的行动是改善所有人的状况和每个人状况的最好途径。1961年春天的示威表明^①，在法国的西部和南部，农村中相信集体行动可以改善现状的这种崭新态度有了进步。今天，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农业劳动者会集结起来进行请愿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准备为了长期的集体利益而牺牲眼前的个人利益。M·古夫耐克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必须求助于一些强制性的措施才能使圣波德莱昂地区种植时鲜蔬菜和水果的农业劳动者采取统一的行动，而且这些农业劳动者还是远远走在其它地区农业大众前面的。

实际上，各种农业组织（联合会，合作社，信用社，互助会）都有一段影响很深的政治经历，农民对它们总是半信半疑。当然，一般来说，人们承认“需要这些组织”，如果可能的话，人们不会错过利用这些组织的机会。本世纪初的那些行业联合会都应转变成卖小百货的商店，以便把它们的支持者重新聚集起来。当农业总联盟在战后分发胶靴和其它用品时，它的会员队伍发展得十分庞大。今天的猜况仍是如此，一项调查表明，对于土地整治和乡村建设协会的创建，农业劳动者的第一个反应是考虑谁将会控制协会和从中获

^① 塔维尼埃和孟德拉斯，1962年。

益。像全国青年农业劳动者中心这样富有活力的组织也逃避不了这种怀疑。所有为了一项事业或一个组织而到处奔波的领导人都会被怀疑有野心和有个人的或政治的企图。

葡萄种植者作为批量产品的生产者，其产品的销售完全依赖政府的决策和合作社的流通渠道，然而他们并不因此就会全都参加行业联合会或合作社：53%的人说参加了行业联合会，58%的人说参加了合作社。种植葡萄的大经营者自己造酒和出售，他们较少参加合作社，但有约3/4的人参加了行业联合会。种植葡萄的小经营者把造酒和出售的事都托付给合作社，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同时求助于行业联合会来维护他们的利益；1/3以上被提问的种植葡萄的小经营者说他们非常关心葡萄种植保护组织，约有1/4说他们完全不关心，种植葡萄的大经营者分别有半数和10%的人作出同样的回答。

在贝亚恩这样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地区，行业联合会使杂交玉米得到普及，合作社使全部产品的贮存和出售具备了良好的保障条件，但当人们问到谁最有力地保护了农业生产者的利益时，对这个“导向如此明确”问题，人们得到如下的回答：

未回答或不知道	26%
个人	14%
行业联合会	43%
农业劳动者自己	11%
其它	6%

“行业联合会”这个回答是含混的，并常常带有奉承的性质，当人们了解到某些团体和领导人工作积极主动且很有效率、尤其在合作社里是这样时，这种回答是令人感到奇怪的。

根据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最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调查，39%的农业劳动者说他们对行业联合会的作用感到满意，但33%的人没有加入行业联合会，只有33%的人认为他们所在地区的行业联合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此外，32%的农业劳动者说参加过示威活动。这数字看起来是可观的。当然，近10年来，设置路障、集会以及在省政府前面示威和聚众的这类活动增多了。有1/3的农业劳动者参加过一次这类活动，这表明请愿活动已经进入了农民的日常生活。相反，农业劳动者对于领导人和农业组织的情感似乎始终是非常混杂的。有2/3的农业劳动者认为他们的行业联合会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实际上这些组织在近10年明显地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显然是因为这种作用不是他们的作用。难道还需要由此得出结论，说农业组织及其领导人被列入了“他们”的行列，而对“他们”必须加以提防，即使“他们”有时是有用的吗？

当处境每况愈下的时候，农业劳动者隐约地看到什么样的摆脱困境的途径呢？大多数人所想到的只是“勒紧自己的裤带”或放弃如此艰苦的和徒劳无益的职业。当问到“如果价格下跌，你怎样摆脱困境？”我们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回答，这些回答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约有1/3或半数的农业劳动者（平均半数，如果加上未回答的数字的话）认为唯一的办法是顺从地和勇敢地忍受这种增加的不幸：“那将是破产”——“只有行乞了”——“必须度过难关，过穷苦的日子，少买东西”——“尽力坚持”。约有1/3的人打算“溜走”，卖掉土地，去别的地方寻找工作。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看到了增加产量和改变耕作系统的可能性。一些人断然拒绝考虑这样的可能性，他们认为价格已经低得不

在价格下跌时的打算

	撒德高 %	贡布莱叶 %	莱昂 %	贝亚恩 %
消极反应，没有解决办法	37	30	54	30
放弃农业	33	40	16	36
提高劳动生产率	12	7	4	17
其它和国家干预	8	16	19	10
未回答	10	7	7	7

能再低了，不管怎样，他们希望国家能支持他们。

年龄、经营规模和经济收益对回答的分布情况影响极小。在莱昂地区，我们可以测算出经营的收益，赢利的农业劳动者比其他人更多地考虑缩减开支：他们具有的资金余力不会使他们想到对不利的形势作出经济上或技术上的反应。他们有后退的余地，在荒年时期，他们依赖这余地可以比他们的不太“富裕”的邻居更好地生活下去。换句话说，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并没有使他们改变对自己职业的传统看法。相反，人们看到贝亚恩人比贡布莱叶人和布列塔尼人更少具有悲观思想，因为他们更多地依赖自身和外部干预来避免自己生活水平的降低。

* * *

由于农民既不信任其他的农业劳动者，也不信任他们的代表和权力机构，并且深信无法自己拯救自己，那他们自然容易产生普遍的悲观主义，把前途看得一片灰暗。当问到“农业会走向危机还是走向繁荣？或者保持现状？”时，我们得到如下的回答。（见下页表——译者注）

由于贝亚恩人把杂交玉米引入了自己的耕作系统，而且在我们进行调查的时期，杂交玉米销路很好，所以正像人们

农业的前景

	撒德高 %	贡布莱叶 %	莱昂 %	贝亚恩 %
走向危机	70	78	70	51
保持现状	15	12	14	18
走向繁荣	5	5	9	22
未回答	10	5	7	9

所预料的那样，他们比贡布莱叶人较少具有悲观情绪，后者几乎看不到有什么办法能够摆脱他们的地区所经受的危机。

在一个地区中，那些依靠“家底”作为退路和经营兴旺的人本应具有较好的精神状态，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在莱昂地区，具有收益的农业劳动者和其他人一样害怕危机，他们当中对农业的繁荣抱有信心的人也是占少数，只是比例比其它部分的人略高一些（是16%，而不是9%）。人们一般认为，青年人比他们的长辈对生活抱有更多的希望，大经营者理应感到他们比小经营者具有更强的走向未来的实力。我们对4个地区进行调查的结果证明，这种假设是没有根据的：回答几乎一点都没有因年龄和经营规模而有所变化。相反，在对罗讷河谷地区农民的土地恋进行的调查中，果树栽培者显然比多种经营者具有更好的精神状态。

这些不同的观察进一步证实了前面的看法，并导致了两个假定：这种在外来的调查者面前用语言确认的悲观主义是一种总体的和共同的老话题，虽然“所有的人”都接受和表现出这种悲观主义，但它却是比较肤浅的，而且会与实际行为发生矛盾。此外，由于这种悲观主义是集体性的，所以没有受到个人经济成就的影响，但它会受到耕作系统的改变和对市场开放的影响。如果这第二个假定能够得到证实，它就为

这样一种断定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农民的意识”（为了避免说“农民的灵魂”）不可能在农业经济变革之后长期存在下去，农业劳动者会越来越变得“像其他人一样”。

在此之前，农业劳动者如何看待他们经受的和惧怕的危机呢？在他们看来，缺乏资金显然是危机最直接的迹象：我们的调查和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的民意测验证明了这一点。过去，人们不花钱；人们挣钱和攒钱，因为钱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用”。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手里必须老是抓着钱袋”，但这钱袋几乎并不比以前满得更快。使自己现代化？成为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改进地方农业？送孩子去上学？对所有这些问题，人们总是这样回答说：“不错，但从哪儿得到钱呢？”求助于借贷只能使这种资金危机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因为借贷仍受到各种道德指责，债务无疑是贫穷的征兆，而且人们最终成了“债款的仆人”。面对这种不安，农业组织提出了进行工农业价格比较的口号，得到热烈的响应：农业劳动者很快把这一口号变为自己的呼声，以致于开展这种宣传后不到8个月，它就在我们与农民的交谈中成为突出的话题。

对金钱的新看法更进一步使缺钱成为令人烦恼的事。如果说父母过去没有钱照样是“幸福”的，那他们的孩子们觉得，生活不幸是有些令人苦恼的，因为缺钱花。众所周知，“并不是金钱创造幸福”，但为什么如果缺钱的话，人们就不再像父母那样幸福了呢？是人们变坏了吗？或者勿宁说是时运不好？再看，人们正是在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时候开始需要金钱的。为一种“毫无价值”的货币如此操心，这难道不是有点儿不正常吗？

最后，农业劳动者越是感到在整个国家中只有他们遭受了危机，这危机对他们的影响就越大。人们向他们提供大量

的论据，证明他们供养的城市是忘恩负义的，是靠牺牲他们的利益富起来的，从而进一步加重了他们出名的“自卑感”。他们是“国家的贱民”，是“被遗忘的无产者”^①，农业同南部非洲和印度一样是“不发达的”。而其他的社会阶层并没有需要靠自己的收入来提供资金的企业，其他人的花费越来越大，镇上和城市里的商店证明“其他人并不缺钱”。为什么只有农业劳动者缺钱呢？

在“花费”当中，区别开投资开支和消费开支是不可能的。购买了拖拉机的农业劳动者并没有感到自己富了起来，他只是发现自己有一些必须偿付的借据和妻子的日常生活用款更少了。而且在附近，并不要求使自己现代化的和继续过着自给自足生活的邻居却没有这些忧虑：他们几乎不用为汽油和肥料的价格操心，而且他们没有债务。如果说从长远来看，他们的经营注定会破产，那他们今天的生活并不更差，他们可以嘲讽选择进步的人所具有的奢望和烦恼，并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

青年人的出走是危机的第二个真实的迹象。所有的经营者都抱怨说，人们无法再找到劳动力，青年人都走了。一方面，他们理解青年人，赞成他们出走，我们已说过这一点，因为他们建议自己的女儿、在一定程度上也建议自己的儿子得到一门职业。另一方面，他们哀叹这种出走像是逃难和开小差，因此是危机的结果和征兆。经济学家把青年人的出走视为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必要条件，而他们却认为这是农业的死亡。事实上，对他们来说，农业首先是指农业劳动者和他们的家庭，把二者区分开来似乎是毫无意义的。土

^① 杜孟，1955年。

地、靠土地生活的人和这些人从土地上得到的产品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们无法想象既没有土地又没有人的农业生产。技术人员们在研究无土作物，这大概只需要很少的劳动力：在传统的农民眼里，这是一种世界末日的情景。

农业繁荣的最好迹象显然是众多农业劳动者的繁荣。假若农业繁荣的话，青年人就不会放弃农业了。荒芜的农场的景象立刻令人想起苦难和贫困，即便是周围的田地有邻居在耕耘。说农场的放弃是邻近农田繁荣的必要条件，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图像比推理的说服力要大得多，即便是推理具有充分的论据，当图像令人想起农业劳动者本身的悲剧和焦虑时，就更是如此：尽管他们不知疲倦地耕作，尽管他们为生存作出了努力，“进步”难道不是还会迫使他们或他们的儿子放弃祖业吗？而在这种情况下，辛勤地劳动、艰苦地努力和经受那么多的苦难又有什么用的呢？在贡布莱叶地区，这些问题被如此尖锐地提了出来。这些问题依然是压抑在农民内心深处的但却是根本性的焦虑，这是所有地区的普遍现象，即便是在起飞较快的贝亚恩地区和罗讷河谷地区，情况也是如此。

只有那些相信农业将走向现代化的青年人以其他人的失望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希望：正是因为邻居离家出走了，他们才得以耕种邻居的农田。他们竭尽全力与过去进行斗争，毫不迟延地在代表着昔日业绩的旧基石上大干起来。就他们而言，他们的成功掩饰了他们相信能够逃脱的悲剧。

* * *

对所有的农业劳动者来说，无论是年轻的或年老的、传统主义的或现代主义的，他们的职业和他们的使命就是生产。农民一向尽力设法使土地更加肥沃，努力增加、利用和改善

大自然的赐予。累累硕果是对人的劳苦的酬报。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生物学的和机械学的最新技术进步使人和土地的生产力增长了10倍，由此造成的过分富足对过去的农民来说成了灾难和前所未闻、无法想象的事情。农民所担忧的就像是王子所担忧的那样，不再是食品的缺乏，而是食品的过剩。

农业劳动者发现，光生产还不够，还必须出售。对于一个挥霍浪费的社会来说，他们的产品、希望和对他们的一切努力的酬报都可能是毫无价值的。这个悖论在他们看来似乎是无法理解的。他们看到，城市在扩展，城市人口在增加，同时农业劳动者的人数减少了，生产过剩变得更加可怕，越是看到这些，他们就越是感到难以理解。经济学家泰然地解释说，食品的需求具有很少的弹性，农业生产率有了惊人的提高，国际市场被扭曲了。但农民的愤慨并没有因此而减弱。

美国的研究告诉我们，所有的农业劳动者，即便是传统的农民，都同样怀有这种愤慨。在罗斯福的“新政”的农业计划中，有关保持地力的措施曾深受欢迎，因为那些措施在中西部农夫的思想观念中得到共鸣：有才干的耕作者应竭尽全力保持自己土地的肥沃。相反，管理生产的措施，特别是鼓励减少播种面积的补助金，虽然被接受了——谁会拒绝补助金呢？——但都是勉强的：限制生产，阻碍土地多产，这是一种褻渎行为^①。在法国朗格多克地区，76%的葡萄种植者表示，拔掉葡萄树（由于生产的管理促使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只有20%的人认为这样做有时是有益的。60%的葡萄种

^① 米耐，1949年。

植者感到，一旦葡萄酒成为制成品，再对产品进行蒸馏，就是对产品的一种否定或类似于一种损害，他们力图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这样做。但37%的葡萄种植者承认，这是一种“有时很有益”的损害。

实际上，农业依然是一种手工业，生产者与完全由他生产的产品形成一体，从播种或羊羔出生一直到收获或牲畜长得膘肥体壮，整个生产过程都由他自己完成，他的产品使他得到邻居和买主的称赞。而且，正是经过连续数年的增强地力和照料畜群他才达到这种完美的地步。因此，他的每个产品都是整个努力过程的结果，都是对他的经验、才干和劳动的证实。

此外，农业劳动者的产品不是普通的产品，他们实质上是高贵的产品。整个犹太基督教文明使面包、葡萄酒和羊羔神圣化了。一头健壮的牛，一个金黄色的玉米棒子，就像是手工业行会会员的杰作一样，总是独特的。当然，就消费者来说，他们消逝在大量的产品中，毫无独特之处，但对生产者来说，它们具有自己的个性。养活人类是农民理所当然的自豪，他们从中看到一种使命，即人类通过维持生活使造物主的作品得到延伸。农业主要产品的象征性和神圣化曾是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一，为了使青年农业劳动者相信土地职业的高尚，农业组织、特别是天主教农业组织重新提出这些论点，并将这些论点现代化了。最后，二次世界大战证明，工厂可以停止生产，但土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继续至少是勉强地维持着人类生活。

然而，市场和大众消费使农民独特而又神圣的产品变成普普通通的商品，而且变化无常的行情会使这商品丧失一切价值。桃子和西红柿太多了吗？它们都烂掉了，却找不到买

主。收获的粮食是像所有的农民所期望的那样充裕吗？国家应当想出把丰产的粮食销售出去的办法。因此，社会可能会毁掉农业劳动者培育的这些产品，而对作品的毁坏也就是对创造者的谋杀。

这种败坏道德的荒谬现象在葡萄种植业中可以得到典型的分析。如果说葡萄酒是精制的和神圣的产品，那它也是主要的大众食品之一。名贵产区和特殊年代装瓶的葡萄酒给葡萄酒酿造者带来荣耀，而供随意混合和蒸馏用的“劣酒”充斥于市场上。朗格多克地区的葡萄种植者为同时成为葡萄酒酿造者而感到自豪；他们认为葡萄的栽培是一种艺术；此外，他们还享有这种劳动所给予的很大的自由和一些闲暇时光；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特权和一切将他们与兼营种植业和饲养业的小农区别开来的东西。那些小农实际上是自己的牲畜的奴隶。他们也是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灌溉土地的观念，以便把土地转变成牧场，生产奶和肉类。最后，葡萄种植者生活得很好，而且他们几乎并不渴望城市的舒适：82%的人有小汽车，27%的人有洗衣机，33%的人有冰柜。此外，87%的人不想到城市里去生活：就像他们感到比农民优越一样，他们也感到比城市人优越。

这种优越的处境，他们把它归功于国家的关怀，而且他们是深知这一点的。当然，葡萄酒生产必须遵守的一切法律规章都是难以忍受的束缚，但这也是一种保护（见下页表——译者注）。最后，42%的葡萄种植者承认，“没有国家的帮助，我们无法摆脱困境或很难摆脱困境”。因此，说葡萄种植者真切地和模糊地感到自己受到保护，这似乎并不是夸张。

这种保护对于确保他们与市场打交道的安全是十分重要的，在市场上，强者为王的竞争规则冷酷无情地统治着一切，

葡萄酒的条例：

——实在是一件坏事	36
——这是一件必要的坏事	14
——这是一件带来一些不便的好事	33
——更确切地说是——一件好事	12
——未回答	5
	<hr/> 100

而且进口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葡萄大丰收，葡萄酒就无法销售出去，行情就会下跌。相反，如果葡萄收成不好，葡萄酒的价格就很高。最后，葡萄种植者在收成不好的年头获得的货币收入常常高于收成好的年头。同样，毫不奇怪，在50%的葡萄种植者看来，生产的“好年头”与其说是葡萄酒产量高的年头(30%)或酒的质量高的年头(20%)，不如说是葡萄酒销路好的年头。

葡萄种植者感到，他们生产的酒一旦卖出，就和他们没有关系了。如果问他们消费者如何评价他们的产品，有1/3的人拒绝正面回答，只是说“他们的葡萄酒和别人的产品完全混杂在一起了”，或者说他们“不知道他们生产的酒运到哪里去了”。他们的葡萄酒并没有被视为应当个别估价的特殊产品：大多数人认为，人们不能讨价还价，“价格已经确定”。当他们把自己的葡萄运到合作社去的时候，他们的产品就和他们脱离了关系，甚至在这产品存在之前就已经是这样了：他们生产出的只是材料。

人们看到，朗格多克地区的葡萄种植者是一种大众消费资料的小生产者，他们不像手工业者和传统的农民那样，对自己的产品怀有认同感和自豪：他们不再是最终产品的制作者，他们使自己的产品混合和消失在大批产品之中，完全像

是大海里的一滴水。由于不能再依赖自己的产品来为自己辩护和保护自己，葡萄种植者像工厂里的工人一样，转而为自己的才干感到自豪和共同保护自己已获得的权利。67%的回答表示，出色的葡萄种植者是懂得好好地劳动的人。葡萄种植者认为自己首先是劳动者，而耕作者，我们已说过，他们首先把自己视为经营主，认为只要有物质能力就可以获得成功。这些劳动者知道，他们较为令人满意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只有依靠国家的干预才能得到保障，而耕作者强烈地感到自己受到极为不公正的待遇。

这样，看来可以并不夸张地说，葡萄种植者保持着独立企业家的法律地位，他们的社会处境更接近于工人，而不是从事多种经营的农业劳动者：他们具有自己的生产器具（自己的葡萄树、工具和机器），但是，他们的产品摆脱了他们的控制，是他们的劳动证实这产品与他们的关系，他们是通过集体的行动来确保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因此，表面的一致掩盖着根本的差异，大概而不是轻率地认为，在很多方面，葡萄种植者象征着未来的农业生产者。

农业是一种非常艰苦的但却是人们所喜爱的和可以培育强烈的道德优越感的职业；农业的社会-经济状况是令人悲哀的，它的前景看起来是灰暗的，它找不到值得信赖的保护者；农业的生产刚刚超出农场的圈子，具有日益恶化的和被毁灭的危险；国家的农业补助金使劳动者落到行乞的地步，因为他们的劳动使他们得到的不是合理的工资，而是随意的施舍；这些足以说明并（大概也足以解释）为什么会产生不公正的感觉，为什么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会奇特地混淆在一起，这两点构成当代法国农业劳动者的精神状态的特征。

此外，这种精神状态随地区的不同也有很大的变化，变化之大可能超过在同一地区因人而发生的变化。我们已多次指出，乡村社会的集体意见是比较同质的。在法国农村近10年来经历的急剧变革中，有些地区相对来说仍然远离变革，另外一些地区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多数地区目前正经历着这种变化。从各种调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就男、女农业劳动者的精神状态来说，前两类地区明显地好于后一类地区。

只要传统体系保持着协调，农村的日常生活和劳动就可能是艰苦的，不过它们仍然具有自身的意义。另外，人们明白必须能够适应，人们期望技术能够减轻他们的劳苦。传统的逻辑始终支配和决定着每个行为和每项选择。M-T·德拉利维叶在他的调查中发现，在芒什省，妇女的生活要辛苦得多^①。由于经营的规模太小和不现代化，那里的妇女要参加一切农业劳动，还要承担养牛的活。尽管如此，她们仍然比较满足。同样，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的调查员曾在法国中部的马吉利德地区惊奇地发现，那儿的农民孤居在气候严酷的干旱高原上，他们的精神状态明显地好于其它地区的农民。

与此相反，当农业劳动者冒险作出现代化的抉择、决定按市场的经济规则办事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是“被卷入了”。他们产生了一些渴望和需求，并竭尽全力得到满足。人们有了经营核算，掌握了从自己的农业顾问和各种组织那儿得到的经济信息和技术信息，进而开始不断地去谋求减轻劳动负担的机器、提高产量的技术和价格更好的产品。这样做不会没有压力，也不会没有失败，道路是坎坷的，但前途总是有

① 德拉利维叶，1961年。

的。况且，人们是和邻居一起行进，是一个群体的组成部分。人们感到处在同行的前列。在妇女一边，她们力图完全献身于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她们像城市里的妇女一样，装备厨房，把屋子里擦得闪闪发亮，照看孩子和为自己缝制漂亮的围裙。当然，钱总是缺少的，必须不时地帮丈夫一把，但典范是明确的，人们是怀着极大的满足感来努力使自己符合于这种典范。德拉利维叶和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的调查员在洛泽尔地区的喀斯高原和奥热地区碰到过这种情况^①。

然而，在他们从事调查的其它一些地区，这些研究人员看到了更加低沉的精神状态和更加明显的不满足，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些地区中既有发展缓慢的地区，也有现代化进展快速的地区。这种适应的努力由于还未找到自身的动力和意义，于是引起了疑惑和焦虑，并导致人们去寻找一些替罪羊来转嫁不安和挫折的责任。在传统的村庄里，人们必须防备着“他们”，直截了当地要求“他们”不要来“打搅我们”。在现代的村庄里，人们力图了解“他们”，得到“他们”的支持。在其它所有的地方，“他们”都是些不怀好意的人，对我们存有歹心，应对我们的一切不幸负责。总之，引起焦虑和好斗性反应的是适应的努力和正在发生的变化，而不是处境本身。那么，实际上，评价、比较和判断的整套标准系统的规则都遭到了质疑。人们不知道谁获得成功，怎样获得成功和为什么获得成功，因为成功的典范和标准都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和矛盾的。人们最终扪心自问，成功本身是否具有意义？放弃这一切难道不是更好吗？

传统范畴及传统标准的规则变得不适用了，这是明显的

^① 吉洛和斯比册，1965年，第13页。

事实。但最令人不安的是，总体社会提出的规则也同样不适用了。农业劳动者当然不是雇主，因为他除了自己的家人一般不雇佣外来的劳动力。他更不是劳工，因为他不领取工资，他有自己的劳动资料。他不是企业主，因为他的家庭经营的确不是企业，可以经常处于收支亏损的状态而从不破产。他甚至没有可以使他受雇于别处的职业。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在现代社会中落脚安身，现代社会是按照他完全陌生的一些原则建立的，并把他和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小商人一起划为“独立劳动者”阶层，当然也还可以包括无业游民。这个残余的阶层带有否定性的特征，总是被单独地对待，因为人们从来就不知道怎样对待他们。然而，每个人都乐于在农民的身上辨认出独立自由人的原型，这种自由人是自己的主人，社会总是把他作为典范推荐给技术文明中的异化人、“陌生人”。新的政治机构和职业团体将会调合这些对立面，并可以使农业劳动者在进入工业社会的同时，并不失去自身状况的那种往往引起悲痛的独特性：人们能否对这些寄予期望呢？

第七章

国家中的农业劳动者

司汤达曾叙述过吕西安·勒文去“从事”卡尔瓦多斯省的选举，巴尔扎克曾描述过莫尔旺地区农民的政治生活，特别是绿色大帝一世小酒馆里的争论。托克维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他如何在1848年决定参加竞选后出发到他的家乡诺曼底地区去，以便让选民们了解自己。下面就是他的村庄的选举方式：“选举日的早晨，所有的选民……都在教堂前聚会，大家按照姓名的字母顺序组成两人一排的队伍……。当人们到达俯临托克维尔城的山丘上时，停下片刻；我知道人们期望我讲话。于是，我爬上一条壕沟的背壁，人们绕着我围成一圈，我讲了几句即时应景的话。我提醒这些诚实的人注意他们将行使的权利的严肃性和重要性；我叮嘱他们在我们到达镇上的时候，千万不要与那些可能试图欺骗他们的人攀谈和受其影响；要向前走不要分开，大家要聚集在一起，每个人呆在自己的队里，一直到投完票……。他们叫喊说他们会这样做，他们确实那样做了。所有的选票都是在同一个时刻投的，我有理由认为，这些选票几乎都是投给同一个候选人的。我自己投完票之后，立刻向他们告别，坐上汽车返回巴黎了。”^①

^① 托克维尔，1942年，第100~101页。

这段轶事大概相当真实地说明了在上个世纪的政治生活中为农民规定的角色：他们成为你所得到的或必须得到的选票的最重要的部分。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巴黎，人们都是通过“关心”农民赢得选民的。

每个新的政体、每个新的政治派别都力图通过为农民“办点事”在农村中扎下根^①。第二共和国为了造就共和派的农民精英阶层，首次建立了三级农业教育的完备体系，包括70个农场学校、4个地区学校和农学院。第二帝国很快放弃了这个计划，取消了农学院。它具有其它的“掌握”农村的手段。第三共和国重新采用了第二共和国的计划。这个“公爵的共和国”再次启用农学院，为农业劳动者的儿子们创建了应用学校，以便教育他们，使他们留在土地上，很快，共和党人接过了班，于1879年在省一级设立了“农业管理”的职位，随后又在区一级设立了这一职位。这是未来农业管理局的雏形。在一个有偏见的人看来，农业管理机构的历史只不过是第三共和国选举史的一个反映。同样，甘必大于1881年建立的农业部想必是一个“农民部”^②。

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说明，为什么农业组织的历史可以概括为城堡主和激进派-社会党议员的长期斗争史^③。为了保持自己的社会影响同时也是政治影响，保守派的贵族在1876年以后退出了政治生活，返回到自己的村庄，建立和推动“右派”的农业组织（总部设在巴黎雅典街）。他们的成功促

① 勒沃，1958年。

② 西拜德，1964年，同时参见福维和孟德拉斯的著作，1958年，第261~268页。

③ 福维和孟德拉斯，1958年，第231~252页；奥吉-拉利贝，1926年和1950年；怀特，1964年。

使那些想让政治进入村庄的共和党人创立一个平行的网络，这是由合作社、信用社和互助社组成的网络(总部设在巴黎圣日耳曼大街)，受到农业部津贴上的支持，他们的政敌拒绝接受这种津贴，认为这是一种与“妓女”的可耻的牵连。

对某些传记的研究可以使人们弄清楚各种类型的要人履历，这类履历表明，一些人是利用农业组织在政治上取得成就的，当然其具体途径根据派别、地区和人物而有所不同。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属于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成为某个全国联盟的理事，如合作社全国联盟或行业联合会全国联盟的理事)，可以有一个“职业”网作为自己的基础，唤起农业劳动者选民的信任。处在另一端的是在各种职业组织中积极活动的农业劳动者：他从地方行业联合会的主任成为合作社的理事，随后又成为理事长，担负起全省的领导责任，某一天在某个全国大会上，他被选入全国联盟的理事会。一般来说，这种完全职业性的道路不会走向政治；然而，只要被选为省议员或某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促使他参与政治，他就会去参加全国议会大选碰碰运气。“公民行动”的运动就曾是这样情况，那次运动在1951年使38名农业劳动者进入国会。

直到近期，职业领导人和政治代表人物几乎都是些显要人士、小城市的资产者或大所有者。事实上，小农很难离开自己经营的农场去参加大会或理事会的会议，即便是会期只有一天。如果会议是在村庄里、地区首府或最远在省会召开，他还可以在走之前和回来的时候给乳牛挤奶；但如果他要坐夜车去巴黎，那一切劳动就都落在妻子的身上。

此外，当讨论的问题是在乡镇、地区甚至省一级的层次上时，小农还感到得心应手：这些问题与一个农业企业的问题是类似的，他具有足够的日常经验，使他可以津津有味地

和从容地参加讨论。在全国的层次上情况就不同了，问题是抽象的，在场人物的势力难以估计，政治运行规则、活动方法和行为惯例都是农民所陌生的，农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到处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这是城市、权力、经济和国际事务的世界，而他是一个不信任权力的乡下人和一个农业技术员。他的外部世界是极为狭窄有限的，而他同别人使用的同一个词汇本身并不总是具有同样的含义。

在妻子、儿子或一些熟练农业劳动者的通力协助下，一些特别有天赋的人适应了这种新形势，成为全国的领导人。他们每周在巴黎度过好几天，每个周日都要在法国的某个地方主持大会或小型会议，他们甚至会被选入欧洲的和国际的机构。只要了解这一点就够了：同一个人可以同时是从事经营的所有者、乡镇长、地方合作社主任、省农业公会主席、数家省联盟的理事长、5个全国联盟的主席或副主席，数家全国协会的会长，许多委员会的成员，如现代化和装备计划高级委员会的成员、经济委员会的成员，最后，他还担负着一个国际组织的主席职务。这个兼职名单还是不完全的，但只要看看这个名单就可以想象出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相反，一个农业学校的毕业生，在巴黎郊外100公里的地方领导着一个拥有300公顷土地的农业企业，如果他是一个有才干的农业领导人，他就能够拿出一部分时间参加巴黎的活动。他不参加体力劳动，他的企业管理要求他对西方文明的社会-经济机制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他的职业与他的行业联合会活动没有多大的距离，而且，由于他的行业联合会活动经常致力于保护他的企业的两三种产品（如小麦、甜菜、油料作物），这一距离就进一步缩小了。

最后，在巴黎过冬的城堡主，可以在管理甚至经营自己

的土地的同时，从容地料理省一级的或全国的组织的事务。他的名气、关系和文化都减轻了他的工作难度。但这种人变得越来越稀少了。

这后两种人都需要第一种人，因为要想成为“法国农民的代言人”，必须具有“结满老茧的手”和“农民的心肠”。小农一旦登上巴黎的舞台，很可能被卷入权力的势力较量，从而慢慢地脱离了“自己的基础”。返回村庄后，他开始按照巴黎的规则而不再是按照周围存在的问题来看待事物。简言之，他既在巴黎感到局促不安，也不再属于村庄了。最有才干的人意识到这种规律，他们常常拒绝离开自己的土地去担负超出本省之外的领导职务。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农民并不总是派他们最有才干的精英去巴黎。

总部设在巴黎雅典街的农业组织，通过对共和党的拒绝或通过右派当时的意识形态倾向，表明它们是“不参与政治的”。这并不妨碍“农民的”领导人在外省和巴黎与政治家们取得密切的联系，这些政治家几乎全部属于同一阶层，即保守的资产者和贵族阶层。“农民的”领导人与这些政治家都是以同一些人和同一些组织网络为基础。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大街，那里的农业组织明确地承认参与政治，政治角色与职业角色更经常地被混淆在一起。奥吉-拉利贝开玩笑地说，一边是公爵和侯爵，另一边是部长和未来的部长。

这两个方面都涉及到一个小社会：一些家族和一些地区。沃盖家族、盖布里昂家族、罗凯尼家族、杜波尔家族等等，他们以两个堡垒为基地：拥有驻朗德诺办事处的布列塔尼地区和强大的里昂东南联盟。伯努瓦大家族^①，代表着激

^① 勒沃，1958年。

进的博斯地区，西南部的夏朗特家族中出现一些共和党的中坚分子。在一些地区，如北部地区，这两个派别在地方上和巴黎差不多是势均力敌的。右派的行业联合会取代了合作社的职能，而左派的合作社则发挥了职业保护的作用；直到1930年，每一派都有自己的信用社网络。

为了互相有所区别和掩盖真正的、即政治的分野，农业协作组织贴满各种各样的标签，这些标签既不符合这些组织的结构，也不符合它们的新会员的来源和它们的职能。一些名称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如联合会、同盟或联盟，总的、全国的或中央的，乡村的、农民的、农业劳动者的或耕作者的。行业联合会曾长期是真正的合作社（最引人注目的是脱粒联合会）；合作社的很大一部分活动致力于保护职业利益；专业组织作为根据1901年法令建立的单一协会是真正的雇主联合会；而信用社什么都管，甚至还关心乡村住宅的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属于同一“派别”的各种团体的理事会汇集了同一类的人，只有少数是例外的，理事会成员的选择与其说是通过选举，不如说是通过自行聘请。这种名称、职能和角色的混淆反映出一些使农民四分五裂的矛盾和敌对。

奇怪的是，村庄社团的某些特点也同样存在于巴黎农业社团中。角色的混淆使人们在选择负责人时可以根据他们的家庭关系和意识形态倾向，而不是根据他们的能力。一些联盟以及它们的“常设”领导人和受薪秘书都是这样组成的：儿子或女婿接替父亲，或者通过占据一个辅助的职位来加强父亲的权力。这些意识形态的、个人的和家庭的亲缘关系扩展到政府部门中，从而说明和证实了，“农业部”和各省农业管理局与巴黎的和各省的职业组织之间存在着共谋关系和敌对

关系。在团体和行政部门的背后，总是有一些家族、地区或政党，由于机构很多而人员很少，每个人都有许多职务，这种现象就进一步加剧了。当要取代一个当选者时，常常只能提出一个人供代表大会的与会者选举；这完全像在一个小乡镇里，由于候选人很少，乡镇议会必然是稳定的。

父亲们在去世之前会一直保持着他们在理事会里的职位，就像他们一直保持自己经营的领导权一样。因此，年轻人感到，在“父亲的”组织中并不是在自己的组织中，于是他们创立了新的组织。这样，每个组织都是一代人的作品：1880年的乡绅建立了行业联合会，1900年的激进派建立了合作社和互助社。1930年，在多吉尔、行会主义学说^①和早期天主教行动思潮的影响下，天主教青年农业劳动者创立了新的行业联合会（总部设在巴黎的金字塔街），比他们的先驱者更加关心产品和价格的保护：这是一种倡导议会道路和请愿活动的工团主义，农民同业公会的领导人和目前农业经营者联合会全国联盟的领导人就是在这一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我们将看到，在大战以后，新一代建立了一连串的团体，这些团体的宗旨是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帮助经营者。

一方面，一代又一代相继而来，他们一直受教会的影响，但具有一些完全不同的教义倾向、社会根源和思想抱负。另一方面，相反，代的接替变得更加困难了，本世纪初曾建立巴黎圣日耳曼大街基地的青年人在战后重新担任了他们的职位或把职位让给了自己的儿子，但新一代并未形成。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占据了一些职位，但既没有创立新的团体，也没更新老的团体。

^① 萨勒隆，1937年。

“年轻的”农业组织与“年老的”农业组织相对立，这种敌对常常夹带着政治的敌对。在一个古老的天主教组织占优势的地区，基督教农业青年联盟的年轻人自然会通过反抗他们的长辈、有时是剧烈地反抗来肯定自身，甚至与激进的和反教权的组织联盟。在别的地方，同样是这些年青人，由于只是与一些“左派”组织交锋，因而被抛到了右派一边。这样，同一运动的活动分子，虽受同一观念和同一抱负的推动，却不得不采取一些相互矛盾的立场，这是由当地政治角逐的格局所决定的。

在巴黎，以这种方式组建起一种类似于拥有白色群体和蓝色群体的农业村庄，后来又有红色群体加入（法国国旗是蓝、白、红三色旗，代表大革命时期的僧侣等级、贵族等级和第三等级，这里用三色喻指保守、中间和激进三种派别——译者），再后是“青年群体”，等等，他们在全国的范围内按照自己在地方的范围内所熟悉的规则进行活动。

* * *

在村庄里，农民对自己的显要人物的这种政治游戏也是熟悉的。他们可以觉察出派别亲缘关系的蛛丝马迹，但往往过于重视这种关系，而且还经常玩弄这种关系。正是这样，他们成了同谋，从而巩固了这种关系。但是，当人们从全国一级过渡到省一级或村庄一级时，政治冲突会根据地区、分层的类型和人们遇到的社会生活的类型而具有十分不同的意义。

只要想一下在布列塔尼、阿尔萨斯、普罗旺斯或加斯科尼这些地区的乡镇之间存在的差别，就足以明白无法进行任何概括。M·贝代尔解释说，在利穆赞地区他的村庄里，“有右派的马蹄铁匠，和左派的马蹄铁匠。前者为思想

正统的马匹钉蹄铁，后者为无宗教信仰的马匹钉蹄铁”。他得出结论说，“这倒不错，右派的犁不像左派的犁那样思考问题。正是这样使村庄免于无聊，正是这样使村庄保留了那么一点活跃……”^①，这样，在小镇上和村庄里，政治不就是仅仅成了一种消遣、一种为唤醒乡村生活而恣意维持的社会游戏了吗？这倒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在本世纪的转折点上，法国西南部各区的首府所在地会发生激烈的政治敌对。毫无生气的小作坊，很少一点租佃的田地，某些公务助理职务，这些使乡村资产者具有大量的闲暇时间，他们可以随时展开一场激烈的政治争吵和猛烈抨击对方。“外省的空想家”可以说是这种争斗的使者，这种争斗的动力是一些经济利益的冲突和一些社会势力的较量。

要想弄清楚这种争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升华作用”或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那是十分徒劳的。不过，其风格、竞争规则和用语必然会深深地打上这种意识形态的印记和带有游戏的特点，至少在西南部和南部地中海沿岸地区是这样。在布列塔尼地区和旺代省，严格的社会等级体系规定了更具有强制性的框框，使斗争更加尖锐和“不那么有趣”。J·约勒描述了那些他所说的“新来者”夺取乡镇政权的情况。这些“新来者”鼓动农民反对城堡主，后者被这种忘恩负义所刺痛，进行剧烈的抵抗^②。同样，塔博特叙述了莫萨布雷侯爵的乳品合作社与M·普鲁斯特的乳品合作社在马兹叶桑戈蒂地区进行的争夺战。普鲁斯特是一个“坚定的保守党人、热情的反教权主义者和渴望进步的人……”^③在某

① 贝代尔，1937年，第114页。

② 约勒，1909年。

③ 塔博特，1945年。

些具有平均主义传统的山区，对势力范围和家庭主顾的争夺使派别的敌对具有了更加微妙的和更加个人化的色彩，一些回忆录往往足以使人们弄清楚村庄的全局。而且，在各地，教会给予它的拥护者同样也给予它的敌对者一些矛盾的影响和一些变换的信条。

农村传统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稳定性是这种政治生活相对自治的必要条件：人们可以把政治当作“消遣”，并且不致于因此给农民的物质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农民的物质生活主要受自然变化的影响，而不是受市场变化的影响。但是在主要从事单一耕作的地区，情况并非如此。博斯地区从第二帝国末期开始就是小麦出售地区，这个地区把自己的选举行为与候选人的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农夫乌德干曾把选票投给他许诺会有最好的价格的人^①。不过，一个细心的观察员今天仍可根据亲属关系和主顾关系来分析博斯地区的村庄政治生活。同样，在埃罗省和奥德省，葡萄种植者引起的政治危机足以表明，一定类型的政治生活是和一定类型的乡村经济相联系的^②。必须积累大量的系统描述，以便尝试着建立一种理论来阐述村庄这种狭小互识社区中的政治生活，看看这种政治生活的某些特点自半个世纪以来是如何变化的。

这种理论无疑会使我们更好地分析全国层次上的政治角逐。事实上，某些角逐规则在村庄和在巴黎具有明显的一致之处。此外，大量的地方性角逐在巴黎的折射是个可获得丰富成果的分析题目。如果人们想到，农民同业公会曾受到盖布里昂的推动以及M·唐居伊-普里让曾是农业总联盟的创始人，人们显然会忍不住去分析一下菲尼斯太尔省北部的政治-

① 左拉：《土地》。

② 瓦尔耐，1960年。

农业敌对。同样，如果不参照朗德省的具体问题就无法完全解释关于租佃制和土地收益分成制的法令，不参照曼恩-卢瓦尔省的具体问题就不能完全解释毕萨尼法令（即城市和土地指导法令，该法案由法国60年代农业部长毕萨尼提出——译者）。每个运动、每个政党、每个派别都有一定的地区根基，这种根基使它们按照这个或这些地区的政治传统而带有自己特殊的色调。因此，巴黎的农业代表们自然会倾向于一方面在他们之间重建“法国理想村庄”的政治生活图式，另一方面把他们原来村庄的敌对关系和问题搬到巴黎来。

关于农民的基本价值，从极左派到极右派，所有的派别在思想上都有完全一致的看法。这种一致甚至可能是这些既是对手又是同谋的人进行争斗的条件，他们互相争吵，但彼此又非常了解。一位出色的观察员说，他们就“像两个过去的情人”。在阅读了职业报纸和代表大会报告之后，人们会毫不怀疑，农业官员与各种派别的代表在思想上也是一致的。如果说有时调子不一样的话，那主题是类似的，人们很容易开开玩笑，让一个莫托斯主义的（莫托斯是法国30~50年代的作家和政治家，是资产阶级最保守阶层的思想代表，倡导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译者）职业领导人说的话从一个共产党活动人士的口中飞出来。法国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农民意识形态，我们可以很快地概括出它的主要特征^①。此外，格利斯沃德所作的国际比较表明^②，这种意识形态是整个西方所共有的，甚至包括人们本以为已远离农民社会的美国。事实

① 下面的引语均摘自职业报纸和代表会议的报告，大多数是1954年和1955年的。

② 格利斯沃德，1948年。

上，对于我们整个文明来说，农民依然是人的原型，农业领导人很清楚这一点，并经常提醒人们注意。

没有必要重提维吉尔(公元前古罗马诗人，著有《农事诗》——译者)关于田野幸福的主题。就在20世纪，当农民为了离开不再能养活他们的土地而纷纷涌向城市时，人们在描写农民的文学作品中仍能找到同样的主题，一些段落夸耀乡村的恬静生活以及代表乡村特点的平衡与和谐，简言之，就是夸耀只有农民才能感受到的“幸福”。在论及一些确切的问题时，农业记者们提到这个主题时就像是不言而喻的和一致赞同的。例如，关于一次全国的耕地竞赛，人们写道：“在一切时代，正是耕地象征着农民对自己的土地最诚挚的依恋之情。”农民的幸福还来自于父母和子女之间存在着的温暖的家庭生活：“灵巧的和明亮的火苗在跳跃着。孩子们在做作业。家庭主妇在切削着大面包片。父亲疲倦地坐着……。从他停在孩子身上的眼光里可以看出，他感到心里是平静的，大地是温暖的。他的眼神流露出的温情似乎可以从父亲身上传递到儿子身上。”最后，他的幸福还来自他在村庄里的感受，人们“是完美的和纯净的”，到处都充满着“快活的情投意合和朝气蓬勃的精神”。

从这种人与自然的结合和这种处于传统社会结构里的生活中，产生了一种“长期积淀而成的”高度的明智：“法国的农民在自己宁静的田野中保持着清醒的和冷静的头脑，他们最重要的优点就是通情达理”。他们在现代生活的旋涡中依然是泰然从容。某些人指责他们“缓慢”，但这缓慢是“上千年以来了解”自然的生物节奏和“田野的永恒秩序”所得到的成果，田野的秩序永远不会服从于规划人员的理性秩序。

农民是属于永恒自然的人，因而他必定是守旧的人：“这

是土地条件的全部价值所在，这价值是一切强盛文明和伟大制度的基础。今天，需要的只是思考一下，以便保留它的精华部分”。“为了使现代农业劳动者依然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他必须继续考虑和支配自己的劳动，自由地管理自己的经营，参加一些基层社团，在这些社团中协作和团结仍发挥着作用……。但愿这种快速的变化不会毁掉人和土地在数百年中积累起来的人类财富的无价之本！”

未来总是不确定的、甚至令人不安的，而过去是令人放心的。一项对于应用词汇的研究大概可以说明，“过去”、“缓慢”、“继续”、“保持”等词汇一直都具有褒义的意思，而“未来”、“快速”、“新式”等词汇一般都有一种贬义的意思。对“数百年”、“积累”、“传统”、“依然”等词汇的使用在这方面也是很有说明意义的。工人认为自己的黄金时代在未来，而农民则认为自己的黄金时代在过去。想把自己的黄金时代建立在明天的青年人还只是特例。

这种对自然、农业劳动和农民生活的理想化造成了对农民、特别是对自己种田的小农的理想化。“长满老茧的手”和“农民粗犷的握手”这样的主题经常作为一种象征重复地出现，一方面象征着辛苦的农业耕作，另一方面象征着价值远高于一切理论知识的全部直接经验：“这些习惯于握犁柄的粗糙的手不善于握笔杆”。是农民的儿子或农民本身就类似于打上了入教的标记，只有这样才可以“考虑农民”和谈论土地的事情。那些同样具有这种信念但长着一双“白手”的人，会因此有一种自卑感，自以为必须对此表示歉意。高级官员们和政治家们从不忘记提醒人们注意“他们的农民式的依恋”，为的是表明“我们的全部过去使我们和你们的联系在一起”。“小农”的称号对所有的人都具有一种近似神秘的价值。

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类似工人救世说的农民救世说，但它的涵义是非常不同的：工人阶级建造着未来的世界，而农民是保持着永恒价值的优秀阶层，未来的世界将必然建立在这些永恒价值的基础上。

无论作者相信什么样的哲学，农民总是被视为国家最安全的政治基础。如果人们属于“右派”，人们会认为，农民“尊重等级制度，因为他们自己在家庭和农场里就像王子。”如果人们属于“左派”，他们会写道：“我们这儿的一个农场就是一个共有的企业……。管理这个微型社会与管理更大规模的共和国具有同样的问题。农民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是这个共同体的管理人，他们应当发挥一个公民的所有才能：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到为什么年长的人从农业中看到了一个自由人的非凡的能动性。”

此外，农民表现出鲜明的爱国精神。他们的保护者在理穷词尽的时候，会重新提起凡尔登战役的殉难者和死亡者，为的是说明提高小麦价格的理由。这些保护者并不感到这样做是令人不快的。1941年的大战对农民来说是重大的意外事件，它使巴莱斯的思想（M·巴莱斯是法国作家和政治家，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民族复仇精神和爱国精神——译者）在我们的农村中广泛传播。这种思想受到老战士运动的长期维护，它的影响仍然存在。从沙文主义到排外主义只有一步之遥，很快就可跨越。如果人们援引外国的农业作为典范，会立刻听到这样的回答：“人们硬说外国的耕作者干得更好，生产成本不像我们那么高，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这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必须反复说明的是，我们的农民能够干得和其他国家的农民同样的好，如果不是更好的话。”一切试图使沼泽地区接纳荷兰移民或使人烟稀少的地区接纳意大利移

民的努力，都碰到了来自各方的粗暴的敌意：农业行政部门，右派和左派的“职业人员”，我们农业的政治保护人，从共产党人到极右派。

农民是“高尚的法国人”，但这些杰出的公民“在国家中并没有得到他应有的地位”。难道他们不是代表着1/3的人口吗？难道不是他们通过自己的辛苦劳作养活了整个国家吗？但很遗憾的是：国家并不太感激他们；他们的收入是其他生产者的收入的一半，而“他们与其他人一样聪明”。因此，肯定是由于制度上有毛病或农业政策失当。

首先，农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和独特的世界，想把在其它领域运用的规则和框框应用在它的身上徒劳的。为什么政令和改革毫无用处？“因为人们想无视农民，想无视农业，而农业作为特殊的经济类别，有它的约束、它的风险、它的劳动条件和它与其它职业所不同的特殊需求。因为人们极力想把农民当作勤杂工、无名公民、万金油以及适合于什么都干的二流人物。因为人们拒绝承认农业职业的个性。”

农民们感到被欺骗了：“在1944~1945年，法国几乎发生了饥荒。我们的领导人惊慌失措，而且没有很强的对外购买力，于是只有求助于法国农业来确保国家的粮食供应。对于这些动员和召唤，农民回答‘到’，就像他们知道要这样做一样。人们把袖子卷得更高一点，生产上去了。但悲剧是，在他们履行自己的责任的时候，我们的负责人却几乎是袖手旁观，无所事事，我们的农民悲伤地发现了这个悲剧。”

对比是惊人的：一边是永存的农民具有的极乐至福，另一边是今天的法国农民发生的“悲剧”。今天的法国农民感到极为不公，人们对此可以理解：他们是国家的“贱民”，是现代世界中“被遗弃的无产者”。

怎样才能在国家中得到公正的地位呢？首先是团结起来。人们中存在着一种关于农民团结的神话，完全类似于工人团结的神话。这种团结过去只是表面上实现过：在两次大战的战争时期，在20年代全国农业协会联盟里，在维希农民同业公会和农业总联盟中，在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时候。然而，人们长期幻想把所有的农民联合在一个职业运动中或一个政党中，这个政党代表着国家的1/3，因此能够实现他们的意志。农业经营者联合会全国联盟有理由为实现了联合会的统一而感到骄傲，虽然大多数农民仍然不是联合会会员。

如果不是为了要求一项特惠权，怎样把葡萄种植者、啤酒花生产者和苹果生产者团结在一起呢？怎样使上卢瓦尔省一个马铃薯生产者与他的莫尔比昂省的竞争者的利益一致呢？最后，西南部自给自足的从事混作的小农，夏罗尔地区的畜牧人，朗格多克地区的葡萄种植者，巴黎盆地的家庭农场主，他们围绕着什么团结起来呢？

另外，十分明显，如果说小麦价格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确定的，为的是使混作的小经营者可以维持生活，那么经营条件的不平等则会使巴黎盆地的大经营者获得一种技术收益。因此，大经营者使小经营者继续处在一种尽可能过时的状况中对自己显然是有利的。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关于乡村人口外流、小家庭的经营保护以及什么传统农民的美妙生活的谈论就并不总是公正无私的。尤其是，把“法国农业”说成是一个利益一致的同质集团，自称是法国农业的唯一代言人，这显然是愚弄百姓。此外，这类代言人的数量和百姓之间众多的分歧也证明了他们

的骗局。

前面提供的一切引文有一个共同的和惊人的特点，就是道德主义的成见，它使一切对形势的客观分析变得模糊不清。所有关于农业前景的讨论都充满情感色彩和神话，被一些情感反应扭曲了。就像我们在前面各章所提出过的，是否可以说道德标准是农民评价任何一种状况所依据的首要标准呢？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会有一种技术上的和经济上的不适应持续地进行道德辩护，为什么会一再地声称问心无愧，却把人们遭受不幸的责任推给别人，而不是由自己或本来意义上的社会来承担。另外，由于农民深深地感受到了不应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他们要求“国家阁下”进行监护人式的和父亲式的干预，以便结束悲剧。这种要求时而像子女的请求，时而又像是哀求，继而又带有傲慢的和威胁的口气。

在农民对极乐至福的梦想和目前人们无法制止的悲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对于一个精神病理学家来说，这也是明显的社会不适应症状。而且，我们难道没有指出，在我们的城市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中，农民的状况是何等的含混和矛盾吗？农民对这个文明的态度和情感总是带有双重色彩，拒绝和接受完全混杂在一起。持续不断地表明自身的道德优越性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对自卑感的补偿。

这种不适应也表现在政治方面。农民在政治上不知道与谁联盟：他们拒绝接受工人的状况，但却试图模仿工人的斗争方式和自卫方法；他们作为企业主露面，但又与工业企业主的利益相对立；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雇员和小商人具有同样的思想观念，但又咒骂这些社会寄生虫是靠损害他们的利益来生活。

法西斯占领时期年龄在15~20岁之间的一代农业劳动者

对政治生活的形式有些鄙视。这类政治生活曾使他们的前辈激情昂扬，但似乎不再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父亲们认为“政治挂帅”，儿子们宣布“经济第一”。农业精英阶层在态度上的这种突然逆转，是很容易找到原因的。

自1930年以来，各种天主教行动组织，特别是基督教农业青年联合会，极为成功地完成了一项普及教育的事业。到1944年，这项事业开始有了收获。这项教育起初是以精神问题和传教卫道为中心，随后逐步扩展到乡村社会的一切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的问题，这是因为这项事业的倡导者所关心的是培养能够“承担自身环境的一切问题”并能在农业机构中肩负起责任的骨干分子。

另外，法西斯的占领使农民处于完全陌生的境况中。农民的价值受到政府的赞扬，“农民元帅”（这儿是影射当时法国傀儡政府首脑贝当——译者）就是这种价值的化身。大家一致认为，农业同业公会“代表着一种理论上的重要努力，它的影响仍然能够被感受到”。事实上，它实现了以前关于农民团结的神话：由于当时的形势，参加农民同业公会实际上是带有强制性的，所有的农业劳动者差不多都参加了。很多地方上的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是从那儿出徒的，今天他们仍然很活跃。

大战中被俘的人有机会观察德国的农业和把德国的农业与法国的农业进行比较，一旦他们返回自己的农场，就可以从这种比较中得到一些有益的指导。最后，由于社会的匮乏，乡下人的食物比城市人充足，这使他们得到一种相对的宽裕，从而促使农业劳动者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他们的住宅。一些人在注视着这些有利的变化的同时，也在为其后果担心：“由于买不到任何对耕作有用的东西，农民安于

舒适宽裕的生活，任凭自己大手大脚地花钱。”这样，一些新的需求从贫困中产生出来。

到大战结束的时候，各种条件积聚在一起促使农村发生了根本变革。大多数农业劳动者初次感受到“现代世界”，他们要求顺利地进入这个世界。希望自己构筑未来的青年人对变革和现代主义表现出特殊的渴望。这不仅表现在技术方面，而且表现在日常生活上和社会生活上：青年人希望“为行而知”，他们急于摒弃一切旧的政治争吵，就像摒弃“不赢利的生意”。要注意到，这个经济词汇被运用到了政治上，这本身就具有很说明意义。造成这种反应的部分原因是感到政治经常被显要人物用来操纵和愚弄农民，但它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动因。

* * *

在大多数机构中，领导职位却被一些普遍较为年老的人所占据：大战结束时，农村乡镇议员的平均年龄是相当高的，而且，在农业组织（合作社、信用社，等等）的理事会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占据理事职位的仍是那些在约半个世纪以前怀着青春热情创建这些组织的人。特别是，新技术的培训和关于经济生活运行的信息激发了青年人的全部活动，吸引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他们的父亲曾继承了家庭的职业技能；相反，如果他们想成为现代农业劳动者，就必须参加培训，通过听课和阅读学到一切。正是为了满足这一需要，基督教农业青年联合会和乡村家庭运动组织建立起全套的教学体系，出版了各种程度不同的教材。

近15年来，在农业劳动者身边，有两个新的机构取得了成就：农业技术研究中心和家庭乡村培训所。农业技术研究中心类似于一些合作研究室，通常是以一个农业工程师为中

心联合起10多个农业劳动者，它拒绝进行一切教派的和政治的活动。他们的会议完全用来讨论技术问题和管理工作，都是真正的研究会议。农业技术研究中心的10 000~15 000名成员代表了农业劳动者的精英阶层。他们一般都非常年轻，往往是天主教行动组织培养出来的，所以农业技术研究中心有一半以上的成员是“天主教徒”。此外，有10多人是新教徒，还有10多人是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原因是受到小学教师们的挑动。至于其他的人，常常是受到过去的天主教活动分子的影响。

家庭乡村培训所是由农业劳动者主办的培训中心，它把学生集合在一起进行3周的培训，1周学习理论课程，另外2周时间学生在父母家的农场里劳动，做“作业”。家庭乡村培训所约有300个，共集结了30 000男女青少年，分布在一些严格遵守教规的地区，在那儿它们常常是一种天主教的教育形式。在不太遵守教规的地区，它们往往是由天主教行动组织的活动分子倡导创办的。

这两个新机构的产生并非是孤立的现象。创办时间比农业技术研究中心更晚的机构有管理和乡村经济培训中心，它的部分活动具有同样的意图，经常招收同样的受训人员。在政府一边，农业部建立了实验区和示范户。有些忧心忡忡的人认为，这是选举形势的一些反映。但是，技术的和经济的事实打消了对逆向演化的政治忧虑：过去的农业组织在正常地发展，而且，令人奇怪的是，由于它的发展必然带来自身的变化，因而与基督教农业青年联合会的发展成为并行不悖的了。

最后，近几年来，一些劳动者终于对家庭经营的传统结构产生了疑问。为了建立更大规模的合作经营，他们把土地

合并在一起，从而使劳动、土地和人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专业化。这就是农业共同经营组织，对它的法律地位最近已做出完备的法律规定。

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新的机构和组织与它们的先驱截然不同，推动它们发展的是青年农业劳动者，而不是显要人士或公务人员（小学教员或农业行政部门的工程师）。一次真正的换班正在进行，传统的乡村精英阶层被纯粹的农业上的精英阶层接替。而且，这些青年农业劳动者几乎全都是在天主教行动思潮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今天，他们面前实际上已没有任何对手；激进派很快年老了，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都不善于培养现代农业劳动者的精英分子。正如基督教农业青年联合会的一个指导神甫所说的：“在省里，所有取得成就的青年人都和我们站在一起，其他那些濒于破产的人投共产党的票！”

共产党在选举中得票最多的省份也是农业现代化最慢的省份，如克勒兹省。在谈到杂交玉米的推广时我们曾暗示过这一点：技术上的保守主义似乎可以和政治上的进步主义和睦相处，技术革命好像并不会引起政治革命。这是很容易得到解释的。由于小农完全丧失了追上进步的希望和拒绝离开自己的土地，所以他们只能把拯救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政治干预上。这大概说明了，为什么尽管有很多地区的农业劳动者把选票投给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但由这两个政党的活动分子所领导的农业组织却寥寥无几。《土地报》的传播以及家庭农业经营筹划和保卫运动在当前日益增长的影响，标志着极左派在农业上的作用重新获得加强。但是，5年前，像G·怀特这样一个出色的外国观察员却费了很大力气才重新找到他在10年以前研究过的“红色村庄”。^①

^① 怀特，1964年。

教会与技术 and 经济成就的联盟蕴含着一些危险，必定会给教会带来一些神学的和“政治的”问题。事实上，如果说天主教行动组织的第一代人，即处在两次大战之间的一代人，主要关心的是进步和精神上的影响，那战后的一代人首先寻求的是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在他们最杰出的代表当中，曾有一人毫不犹豫地表明，他在基督教农业青年联合会中积极活动，因为他必须得到“解脱”，但不是通过宗教信仰。很多人与其说是关心自身社会中人的问题的天主教活动分子，不如说是具有某种宗教归属的乡村活动分子。人们可以考虑一下，这是否是他们起初拒绝触及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带来的结果。

基督教农业青年联合会的聚会、例会、培训班和代表大会都是在一种注重实际的和理性的气氛中进行的。人们在讨论中很少求助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据或情感方面的论据，人们谈论的是数字、事实、效益、发展的可能性、销路、欧洲共同市场的竞争，等等。在观察员看来，这与传统的农民大会和农民宴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传统的聚会中，情感论据和道德论据压倒了理性论据，即使在经济争论中也是这样。

这种分析似乎导致了这样的结论：随着青年一代肩负起新的责任，农民对政治和意识形态越来越不感兴趣了。然而矛盾的是，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事实上，青年一代早已意识到，技术进步与土地结构和法律结构发生了冲突，经济上的成功受到市场机制和经济权力的决策的制约。此外，如果合作社不能把生产的优良产品以较好的价格推销出去，那农业技术研究中心的一切最辉煌的技术成就全都会化为泡影。然而，我们已说过，掌握着合作化的大权的往往是激进派的“有

胡子的人”或小乡绅式的大所有者：必须试图建立新的合作社或尽力夺取老合作社的权力吗？这是一个经济策略问题，但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农业信用社也同样存在着这个问题，因为新的经营管理需要投资贷款。

此外，如果乡村道路仍是难以通行的坑洼泥土路，购买拖拉机和胶轮拖车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些人曾着手建立道路改善合作社，以便购买必要的设备（碎石机、推土机，等等）；可是，使乡镇议会通过一个决定和获得省议会的一笔补助金难道不是更简单吗？但这意味着在那儿要有代表他们利益的议员席位，可能的话还要成为多数派。在纯粹的农业乡镇，乡镇议会负责集体地解决农业劳动者的某些共同问题，无须建立新的合作社，这看来似乎是正常的；而在有一个商业的和行政的市镇占主要地位的乡镇，人们不清楚为什么农业劳动者在乡镇议会里是少数派，而在人口中他们占大多数。直到目前，一切选举都是通过政治角逐和个人争夺来进行的，为什么今后不能按照一项具体的行动计划来进行选举呢？这样，通过他们在立场上的一种奇怪的逻辑轮回，那些最热心提倡不问政治和“技术第一”的人就会在年纪还不太老的时候重新在候选人名单上名列前茅；在1959年的市镇、乡镇选举中，很多乡镇政府的大权转到青年人手中。

这个“逻辑”在巴黎与在村庄里一样，也是有效的。在约12年的时间里，信奉天主教的青年领导人致力于了解世界（经济机制、权力冲突，等等）和向他们的中坚分子解释这个世界。这种长期的教育使他们形成了一种系统的看法。在这儿对其进行阐述太费笔墨了，但我们可以指出它的那些主要特征。

即使他们有时会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态度，但他们实际上

坚信，必须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则行事和在经济上取得成功，换句话说，农业必须是赢利的。这是经济学家、圣多明我（13世纪宗教布道者，以苦修和贫寒著名，现在是劝诫和说教的象征，他的教派被称作多明我会或布道兄弟会——译者）的弟子和法律学院的教授教给他们的。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他们的社会出身，他们自然非常重视农业家庭经营的形式。有了这两个前提，他们的整套见解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赢利要求增加经营面积，于是人们接受了乡村人口外流；可以赢利的投资是经济上成功的先决条件，但在农村，投资的赢利只有在国家的帮助下才能实现，因此，农业政策不应再追求扶持农业价值，而是相反，应当使“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能够进行投资；最后，现代技术要求实现大规模的统一耕作，但只有打破土地结构、特别是土地个人所有的原则才能建立起大面积的耕作单位，因为租佃和小块土地归并都无法既保证经营者的稳定又使经营得到发展。

这种态度与前面描述的农民意识存在着根本的和全面的冲突，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实际上，这是“世界观”的冲突：一些人认为，道德和哲学的原则必须支配行动，现实应服从观念；另一些人则认为，境况制约着行动，应当“为行而知”。这两种态度蕴涵着两种哲学和两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它们是两代人的风格，但很容易确定它们最终与哪些社会群体以及哪些经济利益相联系。

人们会禁不住地确认，归根结底，这种代际冲突是一种文明冲突。事实上，撇开一些细枝末节，右派、中间派和左派都支持过传统的学说；谁又能说新的学说是右派的或是左派的？“新左派”以为在农村中找到了民众基础，因为他们正在与某些巴黎的农业领导人谈论财产所有权的废除。人民共

和运动党大概得到了选举中的大多数选票，但它有改变自身性质的危险，因为它想再次集结所有那些为它提供优秀高级管理人员的“高贵的先生们”。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很容易使人们从这种注重经济成就的学说中看到一种新富农的意识：出身低微的儿子想成为财大气粗的富人，但却不顾那些没有使自己现代化的人的死活。然而，有谁曾见过左派的富农？

我们可以进行一种有趣的比较，一边是基督教农业青年联合会的思想体系，也就是1900年博斯地区激进派的思想体系，另一边是R·雷蒙描述的“富兰克林的”（富兰克林是美国18世纪政治家，修改过《独立宣言》，其重农主义思想对法国影响很大——译者）思想体系^①。如果这种比较可以作出结论，那它会使人们看到，经济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在历史、经济和哲学等不同领域引起了一些相似的思想反应。

如果说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并不是政治派别的冲突，那从这个词的全部含义上说，它也具有同样的政治性，因为它是意识形态的，而且它提出的一些问题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乡村人口外流使法国社会的“平衡”受到质疑，并在竞选的某些拥护者当中造成分裂。取消价格扶持会减少某些现代化大生产者的差别收益，从而改变农业组织中的力量均衡。最后，财产所有权（还需要提醒这一点吗？）是“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之一”。

青年一代创建了肩负技术使命的新团体，他们在天主教行动思潮的影响下成长起来，总是与传统的组织格格不入。

^① 雷蒙，1960年。

实际上，应当注意，只要他们的父亲在世，农业经营者的儿子就没有任何独立的社会存在：由于他们不是受薪者，所以在经营者联合会和合作社或信用社中都没有地位。如果说他们不是在法律上，那他们至少在事实上成为法律权利的让渡人。

为了补救这种可悲的状况，基督教农业青年联合会过去的全国领导人掌握了全国青年农业劳动者中心的控制权，他们把这个中心转变成真正由青年农业经营者和经营者的儿子组成的联合会^①。他们组建了一些省联盟，而且，农业经营者联合会全国联盟的章程在1957年进行了重大修改，从而使他们在全国联盟的领导层中具有了突出的位置。这样，冲突以某种方式“制度化”了，并且全国青年农业劳动者中心的两名领导人进入了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这说明冲突得到正式的确认。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被选进省和全国各种组织的理事会，在1958年的选举中，他们的代表被选进国民议会。这样，他们初步懂得了“职业”角逐和政治角逐的奥秘，在“走向政治”之前，他们小心谨慎地观察他们长辈的举止。

农业经营者联合会全国联盟起初热情地欢迎第五共和国^②，虽然戴高乐主义令人想起很多关于解放和农业总联盟的不愉快的事情。但很快，面对政府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和农业政策，这种欢迎转变成公开的反对：在1961年1月的事件和亚眠地区的殴斗发生后，农业经营者联合会全国联盟发动了呼吁提前召开国民议会大会的运动，但遭到了共和国

① 塔维尼埃，1962年。

② 同上。

总统的否决。在内行的观察家看来，很明显，农业劳动者合理的不满情绪被一些领导人用于纯粹属于“政治的”目的，这些领导人坚持旧的争吵，在阿尔及利亚的农业劳动者有紧密的联系。

面对这种公开的反对，政府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农业“对话者”，当然在全国青年劳动者中心找到了。由于这些青年人与总理府的专员以及计划总署的专家们具有共同的语言，所以对话就变得更加容易。奇怪的是，由此导致，农业部的命运紧步农业劳动者联合会全国联盟的后尘，它们二者都被抽到拟定决策的圈子外边。这表明，一种几乎持续了1个世纪的斗争在何种程度上使它们建立了互补关系，因此也是休戚相关的。从角逐规则改变的时候起，这些既是对手又是同谋的敌对兄弟就无法再留在前台了，他们必须让位给新的主角。但这种似乎正在进行的换班还远没有完成，它的最终完成必须等到农业部自身挤满新一代官员的时候……。

那时，表面装作极为蔑视政治的青年人将完全赢得角逐的胜利：他们在巴黎掌握了政治权力，就像他们在自己的村庄里一样。在此之前，农业劳动者会受到非常妥善的保护：农业经营者联合会全国联盟每年都争取到更有利的价格，全国青年农业劳动者中心在制订一项长期策略的基本原则，这将使他们在未来避免过去在策略上的游移不定，而且，制订欧洲农业政策的需要使形势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

阴谋、谈判和施加压力，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策划的，会在国家的高层委员会以及领导人或部长的办公室里继续进行，而且人们会利用群众的示威。资深的年长者更喜欢的是施加威胁而不是煽动农民。战前，多吉尔曾组织过农民

示威^①，坐落在巴黎金字塔街的那些联合会越来越频繁地召开各种大会。农业劳动者想模仿工人进行罢工，但对一个经营主来说，罢工的结果是含混不清的：如果他不出售自己的产品，他有遭到巨大损失的危险，而农民总是担心邻居不跟随大家一起参加罢工运动，因为他坚信“农民身上的个人主义太强了”。

1961年发生的设置路障事件和暴力示威是些很新近的现象^②，这表明，在农村中，青年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革命，国家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以新的形式呈现。表面上，这些示威似乎仅仅是农民起义的一种新形式。占据莫尔列专区政府和烧毁蓬拉贝专区选举投票箱的布列塔尼农民，可能会被人们视为1789年的农民起义者和城堡焚烧者的直接继承人。1954年的设置路障事件，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一次农民起义，如果人们把农民起义理解为农民剧烈地反抗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的运动，农民接受这种权威的时间实在太久了，这种接受是不情愿的，但也是消极的；反抗暴露了难以忍受的处境，但并没有可向当局提出的备用方案和改革方案。用他们的代表的话来说，农民在1954年想给予政府一个“警告”，让全体法国人注意他们的问题。

1961年，布列塔尼地区的农民就是以此作为起点的。但他们面对的是一种确切的具体情况，如果他们自己没有完备的解决方案，他们也不相信他们抗议的当局能帮上他们的忙。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所期望的事情和不期望的事情，他们的最具有自觉意识的领导人甚至有一些要提出的具体议案。最有力的证据是，1960年发生莴菜危机时，他们曾呼吁D·巴

① 罗叶，1958年。

② 塔维尼埃和孟德拉斯，1958年。

莱尔先生和E·莱克赖尔先生等一些“技术顾问”帮助他们。有谁曾见过农民起义者的周围聚集着技术顾问？再者，这些运动远远地超过了运动发生地区的范围，吸引了一些自身状况和自身问题与菲尼斯太尔省的农民有很大不同的农业劳动者。

特别是，这些示威所反映的并不是注定走向贫困化和无产阶级化的小农的忧虑。相反，这些示威是进步农业劳动者的不安所造成的，他们进行了投资，但担心这些投资无法赢利：这是经济发展造成的危机，而不是贫困导致的危机，这就是为什么不太熟悉情况的观察员会以讽刺的口吻谈到“带有理学博士头衔的农民起义者”。

菲尼斯太尔省的那些地方联合会组织了引人注目的“分区控制”运动，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动员起一个地区的所有农业劳动者：盖布里昂伯爵的农业联合会和M·唐居伊-普利让的佃农联合会所进行的长期教育被一些青年领导人所利用，这些青年领导人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的时候学会了“革命战争”的方法。多么令人瞩目的结合！这个因菲尼斯太尔省的蓟菜和土豆危机而自发产生的示威运动迅速地波及到整个布列塔尼地区，随后几乎波及到法国的所有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西南部、南部地中海沿岸地区和罗纳河谷地区。这一次，农民看来似乎很顺利地联合起来。

自大约1年以来，农业组织的全国领导人（年轻的和年长的）与政府进行着彬彬有礼的对话，但对话有时也因虚假的破裂而中断，他们认为这些“自发的”示威运动对于谈判的继续进行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和有妨碍的。直到那时，他们一直能够迎合和集中农民的不满，以便随后以此作为对抗政府的武器。但是，按照菲尼斯太尔省青年领导人的看法，所有

这些巴黎人的空谈拖延了这么久，但没有为他们解决任何问题。在他们看来，暴力更能解决问题：占据专区政府，烧掉选举投票箱，设障碍阻塞交通，破坏主张一体化的企业家的工厂，这些都会迫使“巴黎人”作出反应。

我们已指出过，农民因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较差的生活条件而感到自卑，但为了保证这样的生活条件，他们还要不懈地劳动，在经济和技术的适应方面作出巨大的努力。近几年来，在研究农业问题的圈子里，人们已习惯于谈论法国农业的不发达。通过报纸、政治网络、职业网络和宗教网络，这些“科学”的分析以惊人的速度在农民活动分子中传播（至少在他们的言谈上是这样）。这样，有一天，农民发觉他们是不发达的，——这会导致他们通过造反来要求为他们制订一项“君士坦丁计划”（君士坦丁是阿尔及利亚的城市，这儿是指对不发达地方的援助计划——译者）。

菲尼斯太尔省的青年领导人和其他青年领导人一样，接受了一些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这使他们以过于简单的方式来看待了一个复杂社会的运行。蓟菜事件的经验使他们坚信自己的看法，并加强了他们对直接介入的信心。由于只关心自己的生产和现代化的问题，他们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整个国家市场中的相对地位。同样，有趋向表明，他们一般不超出本地区的范围去考虑法国其它地区的问题和其它国家的问题。他们对政治的蔑视使他们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去看待社会。奇怪的是，这种社会经济观与推动着巴黎某些压力集团的负责人的观念具有一些相似的特点，无论这些压力集团是农业的还是工业的。

例如，人们对土地所有制曾进行过无数次的争论。对这些争论的一项研究毫无疑问地表明，土地一直被仅仅视为一

个生产要素，从未被视为一个具有多种用途的空间，更没有被视为一个投机的和投资的对象。

为了不受政治的蒙骗，青年一代拒绝支持传统的政治派别。但目前，在国家总的政治背景中，他们还没有找到其他能够表达他们的利益和问题的代言人。此外，他们助长了自身中的一些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派别倾向，这些倾向是变化多样的，有时是互相矛盾的，常常没有明确的内涵。当人们考查一个领导人的确切立场时，人们不能急于作出判断，而且，最具有变革意识的领导人并不总是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或他自己以为的那样。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人，终于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代表自己的省份参加国民议会或推动一个全国组织。但愿他们加强自身的政治修养，不要仅仅成为一个职业组织和一个地区的代言人，或一个去夺取权力的新的精英阶层。

在上个世纪，农民占选民的大多数，他们依靠自己的政治当选者来保护自己。每个议员和参议员都有一些农业劳动者的选民，在国民议会、特别是在参议院，乡村地区的代表占明显的压倒优势。每年，在讨论农业部的预算时，每个派别和几乎每个议员都有机会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农民拥护者的关切。关于农业的重要决定是根据选举的、道德的和总体政策的考虑作出的政治决定。因此，农民具有正当的理由认为，他们的利益在巴黎受到很好的保护。在追溯已往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很可能会坚决地谴责梅里纳^①（曾任法国农业部长，倡导农业保护主义和返回土地——译者）所代表的第三共和国的农业政策，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从乡下村庄的最

① 奥吉-拉利贝，1950年；吉尔维、塞沃兰和维叶，1964年。

底层直到“巴黎的农业村庄”和国民议会，整个法国曾几乎一致拥护这个政策。

这大概说明了，为什么在法国从没有全国规模的土地大党：那些称为土地的或农民的政党，其根基只局限在一二个地区，它们只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政治方针。事实上，所有的政党都曾具有一些农民选民，都曾代表过农民。关于选举的研究表明，农业劳动者的选票分布在所有的政治派别，但中间派和右派的吸引力要更强一些。

农民选民的选票分布(1954年1月2日的选举)
(按照投票的百分比)

	农业劳动者	全体选民
共产党	17.5	26
社会党	14	15.5
左派(激进派等)	14	11
人民共和运动党	12.5	11
温和派	20.5	4
社会共和党	3.5	15.5
保卫商人及手工业者利益联盟	14.5	11.5
极右派和其他	3.5	1.5
	100	100

在目前的情况下，人们很难知道，农业变革是否会使农业选民重新集结起来，或者农民选票是否会依然分散在所有的政治派别中，只是通过多少起到压力集团的作用的职业组织间接地施加影响。毫无疑问的是，所有这些动荡使农业劳动者、特别是使农业精英阶层成为大多数政党试图引诱的后备群体。

此外，农业劳动者在乡村社会中的比例不断缩小，其他

社会阶层逐步在农村中占据一定的地位。这种转变会对农村居民的政治态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农业劳动者的政治态度看起来与其他阶层没有根本的区别，那人们就可以假定只会有很小的变化。相反，如果整个乡村社会发生了变革，那就不仅是政治态度，而且全部政治生活都将具有新的形式。例如，把工厂设置在农村所带来的问题是，对一些新到达一个地区的工人和当上工人后仍居住在自己村庄里的农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最后，离开自己的村庄去城里工作的人对他们到达的地方也会产生影响。了解他们的政治态度的演变是很有意思的。

人们可以假定不存在农民“阶级”，这说明了为什么没有任何代表农民“阶级”的政党。然而，有些农民代表由于对工人代表的成功留下深刻的印象，试着谈论他们按自己的意愿命名的农民阶级，并努力使它凝结成一个清晰的概念。奇怪的是，在最积极地作出这种努力的人当中，有些是天主教徒，但这是违反宗教教义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越来越不适合于理解以复杂的分层和剧烈的社会流动为特点的社会以及各种各样的群体冲突。想在现在尽一切力量去建立农民阶级是非常过时的作法。

当然，社会对比变得模糊不清了，农民状况的独特性变得越来越明显，但与此同时，经济利益的冲突加剧了。一个农民占人口50%的国家和一个农业劳动者占人口10%的国家有本质的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乡村阶层及乡村问题的影响支配着整个社会，我们已说过，所有的政治代表都是“乡村的”，虽然他们一般都不是农民。在第二种情况下，农业劳动者只是许多生产者群体中的一个群体，他们自然倾向于模仿其它群体组织自己的政治行动；对政治人物的各种压

力，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多少有点粗暴的群众运动。最重要的是，要使公众舆论和领导人注意到农业问题，如果可能的话，要使他们以同情的眼光看待农业问题。

青年领导人特别注重职业集团对国会和政府的影响力，而较少关心其直接的政治体现，这大概是有道理的。在第五共和国的体制下，团体的运行机制与他们本来的意识形态倾向对他们具有同样的推动作用。他们设计了一些改革方案和法案，在这方面，他们和农业部及农业部长具有一致的看法，农业部长成为他们在政府和国会中最好的代言人。细致地分析农业补充法的制定和表决过程以及关于土地整治和乡村建设协会的立法过程，会使人们弄清楚这种机制^①。

在这种影响力的角逐中，农业劳动者较之其它群体具有一些优势。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这虽然削弱了他们在经济决策和讨价还价中的地位，但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影响的可能性，因为差不多所有的政治代表都有一些农业劳动者作为他们的拥护者。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对每个候选人来说，农业劳动者的选票常常是使他获得成功的必要帮助。于是，农业劳动者被特别地看重，他们可以通过抬高身价来获得一些利益。在另外的情况下则相反，这种边缘地位会使他们成为无关紧要的部分。在这一点上进行一些国际比较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另外，农民仍体现着某些最重要的道德价值，家庭经营符合企业自由和经济独立的理想，在大自然中的农业劳动者对城市人保持着一种巨大的情感威力。因此，农业劳动者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中掌握着重要的武器和论据，他们总是能够

^① 利马莱和塔维尼埃，1963年。

激发起一些可以证明他们的主张的深厚情感。在美国、法国和瑞士这样一些如此不同的国家中，他们都享有经济保护，一些相似的学说证明这种经济保护是合乎情理的。而且，很多人认为，人们应该帮助农民，就像人们应该帮助年老的父母一样：难道不是所有的城市人差不多都是乡村的儿子和“村庄的城市闺女”吗？经济学家们发表了这种学说的新版本，认为工业体系的逻辑统治着现代经济，不利于农业生产；因此，保护和支持农业是合理的，特别是根据著名的“均等”原则。

过去，农业政策的目标和最高要求主要是在社会方面。粮食的价格使一些政府感到不安，它们为处在农村最低层的人担心，这些人与其说是生产者，勿宁说是消费者。今天，农业价格受到一些矛盾的影响。农业生产者认为价格被不合理地压低了，而工业界人士（雇主和工人）则希望农业价格与国际上的价格保持一致。只有各种各样的国家补贴才能克服这个矛盾。在实行计划经济（不管是否具有权威）的国家和拒绝接受计划经济的国家，存在着差不多同样的问题。在世界各地，国家都对农业进行干预，但是，在国家制定计划的时候，农业计划与其它领域的计划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制定的。无论是何种情况，在制定农业政策的时候，社会的、道德的和政治的理由一般比经济理性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一个国家当中，这样做可能是合理的。然而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冲突不能根据最高价值来解决，而且，那些揭露世界上营养不良的现象和饥饿现象的人总像是些没有办法左右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今后，农业政策上的决策大概将按照经济的要求、而不再按照政治的和道德的要求来制定。如果这种倾向得到证

实，那将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它会给农业劳动者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以及整个国家造成一些后果：对于充满自由经济思想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高级官员和农业领导人来说，农业的工业化成为唯一可以设想的目标。不过，经过再三权衡，与陈旧的政治语言和道德语言相比，经济语言似乎更不适合于理解乡村经济以及农业特有的束缚。只要一种适合的语言还没有设计出来，改革在现实中遇到阻力就会不断地给各国当权者造成一些难题。

最后，人们可以考虑一下，农业发展的逻辑是否同样适用于所有的国家，无论它们具有怎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政治制度。工业社会取代传统社会的道路是不同的，但问题的基本已知条件到处都是一样的。

结 论

可能的未来

技术的限制和自然的束缚越来越变得有弹性了，但在 19 世纪的农学家看来，它们曾是如此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人们无法再继续否认，在多种生产的企业和越来越复杂的农业技术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农业再也无法逃避某种形式的劳动分工。多种生产的企业，无论是农民的和家庭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和“工业化的”，从本质上说都是对上个世纪农艺技术要求的社会反映；不过，这些要求在我们的时代已不再有同样的强制力量^①。

18 世纪的农业革命旨在利用某些技术和某些新的植物，但它更重要的变革是把种植业和养殖业结合在一个统一的生产系统中。休闲田的取消和人工饲料的出现使得可以“补全”轮作，人们不再把畜群视为作物的敌人。以前，牲畜必须到用作牧场的和无法耕种的土地上或到乱草丛和休闲田里去觅食。现在作物越来越成为饲料的主要来源，从而提高了牲畜的饲养量；牲畜的增加继而提供了更多的可以增加地力和产量的厩肥。近来对化肥的使用巩固了这个系统。

^① 以上的想法极大地得益于与 D·R·贝格曼、L·马拉西、G·塞维拉克和 S·维凯姆的讨论。一些经济学家也作出类似的预测。参见吉尔威、塞沃兰和维叶的著作，1964 年。

有经验的农业劳动者最关心的是达到动物生产和植物生产的合理平衡，最大限度地保持土地的肥沃，把土地奉献给收获的东西以肥料和腐殖土的形式还给土地。土地的肥沃是长期精巧护理的结果，人们可以对它进行估价评论，但无法精确地测量。立法者在确定乡村土地租约的规章时，特别关心的就是避免耗尽地力。

农民的经营方式不再是农业系统强加的了，它通过精心地保持各种饲养业和种植业之间的平衡来保护土地的肥沃。从现在起，农艺学的技术和核算方法取代了经验和才干。肥料的改进使得可以单独从事一种生产：可以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种植玉米，无须进行轮作和饲养牲畜。这样，在上个世纪，技术进步导致耕作系统走向完美的整体化；而在今天，为了达到专业化和批量生产的优势，技术进步又使人们可以打破这个系统。复杂的轮作取消了土地的休闲，土地化学和土地生物学又使轮作无利可图了。奇怪的是，这种进步在农民看来却像是一种倒退，因为他们的一切技能和知识都是为了认识和保持土壤以及它的肥沃：对他们来说，精巧的单一耕作似乎是返回到了他们祖先的简单化农业。

对于生物学和农艺学的进步将会带来的后果，专家们意见不一，分成对立的两派。某位杰出的农艺学家预见，未来将会出现无土农业，他还打算用几千公顷温室来养活整个法国。他强调说，作为植物生长根本机制的光合作用在实验室里可得到50%的效益，在露天耕作中可有1%的效益，而在法国的全部土地上，效益只有1%。此外，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也将带来惊人的进步成果。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自然机制不会这么容易地被彻底降服，对腐植土的重视依然是农业最主要的束缚。

在某些情况下，运用农艺学的和核算的测定手段，在保持轮作的同时把每块轮作田区分开，可以使一些要求得到调和。例如，为了大规模地科学种植玉米，需要大量的机械设备和高超的技能。意识到这种专业化的必要性，经营者集中了一切必要的设备：播种机、农药喷洒机、灌溉系统、玉米拾穗机、玉米脱粒机、干燥机，等等。他每年租种上一年种植过谷物的土地。土壤的分析可以使他精确地确定土地租价，知道施什么样的肥料，并科学地预见在“正常”的气候条件下他可以获得的产量。这样，他事先掌握了进行成本预算的一切核算数据。为了租种新的土地，他每年都放弃他利用了的土地。这种经营方式既不妨碍发挥传统轮作的优势，又遵守了劳动分工的要求，后者是耕作的科学化和经济化所必需的。

这个例子说明，土地已不再是一切农业经营的必要基础。实际上，经济的发展使土地的价值越来越小，相对于机械设备和农业劳动者的技能来说，土地变成一种不太重要的生产资料。农艺学家们往往说，不再有劣质的土地，只有没有才干的农业劳动者，因为他不懂得利用土地。但经营者们知道，土地在过去代表着经营资本的主要部分，可现在土地一般仅仅能够代表不到一半的经营资本。

法国北部和巴黎盆地是土地肥沃的小麦种植区。在那儿，经营者常常并不认识他耕作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只有公证人认识。公证人把数十处地产合并成一个连成一片的经营场地。这些地产的所有者都是当地农民世家的后裔，他们今天已迁居到城市、巴黎和其它地方去了。公证人根据地图来确定租给经营者的地块，并负责把地租在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对农业劳动者来说，耕种这块土地或那块土地关

系不大，因为经营的主要构成部分是技能、机器设备、牲畜和银行存款。

对于传统的农民来说，土地所有权是社会声望的象征，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家业，也就是家庭延续的保障。自由租田者、包税制租田者或分成制租田者总是担心不能续订租约。最近的一些法律措施使他们获得部分保障，并使他们在所有者愿意卖掉土地时具有优先购买权。但这些法规完全无法预防今天成为农业劳动者重负的主要风险：经济的风险。

所有经营者的主要问题不再是保持土地的所有权或经营权，而是要知道，他的企业是注定和他一起死亡还是在他去世后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今天，为买下农场曾罄其所有的小佃农看到自己的儿子因丧失了现代化的希望而离开了农场。而同一个小佃农，如果没有买这个农场，他本来可以把积蓄投资到机器和牲畜上，这将使他可以在别的地方租下更大面积的土地，他的儿子将会留在那里。这样，他的企业，如果不是说“他的农场”，将继续生存下去；而他的儿子，尽管不能再像自己的父亲那样当“农民”，将至少依然是农业劳动者。

从今以后，农业企业的保障和生存由销售市场来决定，将来更是如此。因此，想使儿子安身立业的父亲，如果有远见的话，应当为儿子赢得一批买主，而不是为他们购买土地。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如果农业仍然是掌握在独立生产者手中，那它越来越像小商业和自由职业：掌握着销售市场和资本的农业劳动者不必居住在土地宽裕的地区。对于农业劳动者正像对于商人一样，他的经营“基础”将是他的企业，而不是他的“不动产”。

从长期来看，随着技术的改进，土地将失去它所扮演的

具有特殊地位的生产角色，重新成为土壤、空间面积、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农业将集中在最肥沃的土地上和经济位置最有利的地区。因此，根据经济的合理逻辑，在目前因人口稠密仍在为一小块土地进行过时的竞争的地区，更应当降低土地的价格。农业人口的大量外流会重新造成一种更加平衡的状况。

从短期来看，目前的土地价格上涨趋向会持续下去。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继续赋予土地一种不同寻常的价值。对法国人来说，土地是特殊的资本，是最可靠的“投资”，它带来最大的情感满足。因此，土地仍然具有一种庇护价值。而且，它是投机的对象，在某些城市化的地区，土地空间引起建筑者、度假者和乡下的城市人之间的竞争。将来和过去一样，农业劳动者购买土地所花的钱可能远远超过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所具有的价值。

这样，家庭多种经营的复杂而又完善的结构从各个方面出现裂口，再也无法长期抗拒劳动分工。在一切生产领域，劳动分工都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在多种生产的小经营和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的农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前者需要人们什么都干，什么都懂，而后者则不然。意识到这个矛盾，农业劳动者把他们的卖者和买者的职责托付给了合作社，并委托互助保险公司负责自己的保险；当机械设备使他们负担过重的时候，他们组建了农业设备使用合作社；为了在新技术方面占有优势，他们联合起来成立农业技术研究中心；最后，由于核算成为优质管理的条件，管理中心诞生了。今天，有些农业劳动者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成立了农业共同经营集团。他们把土地合在一起，改造成一些更大规模的经营单位，每项生产都组成由一个农业劳动者负责的工场。

这样，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打破了“农民的个人主义”，为新的进步创造了条件。

今天，决定着企业特征的是联合收割脱粒机或电力挤奶设备。未来的生产者掌握着这些机械设备，对自己的土地不在乎，他将专门从事一种自己熟悉技术和市场的交易。他与务农的祖父不再有任何共同之处。他的祖父与自己的土地的关系就像是与一个年老专横的妻子的关系，而且，他的祖父是从祖辈那里接过了耕作系统和学会了精巧细致的劳动本领。过去，要想了解土地和很好地耕作土地，必须出生在农村；将来，要想选择农业劳动者的职业，必须上学和拥有资本。

把传统的经营群体重新组合成一些专门负责一个生产阶段的工场，这很容易设计出其雏形。假设有10个放牧和产乳的家庭经营单位，每家有15公顷土地和15头奶牛，它们就可以被重新组合成一个拥有150公顷土地的草料生产工场和一个有200或250头奶牛的牛奶生产工场，这是使用目前的挤奶机可以达到的最大规模。旧的经营体中的那20个有着多种职能的劳动者将被6个专业生产者取代（2人负责草料生产，4人负责牛奶生产），但后者应得到技术部门和商业部门的帮助，这些帮助应相当于一二名技术员的作用。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牛奶的产量大概会提高1倍，成本会明显地降低；但10个农民家庭所需要的所有粮食的生产以及用于饲养拖车牲畜或收益很少的赢利牲畜的全部饲料粮的生产将不复存在，即不再生产谷物、禽类和蔬菜……

对各种农业产品和农业生产的每个阶段都可以拟定类似的重组方案。收割脱粒机决定着谷物生产工场的规模；灭真菌机决定着水果生产工场的规模，等等。农艺学家和经济学

家可以为法国制定一个关于工场的真正的“规划”，说明工场的相互关系、分布、生产和劳动力的情况等。目前的大量设想和丰富经验可以提供有益的说明和参考。

如果生产的每个“农业”阶段是在一个专业工场里完成，那人们可以设想把生产的加工、包装和运输等“非农业”阶段托付给其它同样类型的工场。这样，整个生产周期过程在由一些工场组成的流水线上完成，这些工场相互间通过销售和供货合同联系在一起。

农业和非农业将变得很难区别，因为某些典型的农业工场将不再需要土地。例如，牛奶场更像是一个把草料转化为牛奶的车间，而不是像一个传统的农场牛栏。牛奶场为了靠近销售市场（乳品厂和城市市场）而远离货源（牧草场）可能是有利的，而且，我们可能将看到在城市郊区建起奶牛饲养场。因此，必须把“土地”工场和其他的工场区别开来，对于前者来说，土地是重要的生产因素。除了这个区别之外，将不再存在与工业相对的农业。就像是在原始农业中一样，这将涉及到一个从自然直到制成品的食品生产周期。

当然，在农民刚刚实现了他的最大抱负——成为自己的祖传地产的主人的时候，宣告农民经营的死亡是令人悲痛的。但是，凭什么要迫使农业劳动者继续生活在过时的生产结构中呢？这种结构使他们无法得到劳动分工的好处，注定要走向贫困。只有一种隐含的温情主义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这方面因循守旧的思想会占据上风，而这种温情主义是由于一些强大的蛊惑人心的宣传所致的。

此外，不能过高估计传统农民的决策自由和决策权力，它们都是表面的而非真实的。当然，在原则上，农民是按照

自己的意愿自由地掌握经营的方向。但是，传统的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使他几乎没有选择，他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是遵循惯例的。然而，境况在不断地更新。当习惯不再向他提供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时，由于他对技术和经济机制的无知，他在选择的时候只好相信不负责任的技术人员的看法，接受新潮的诱惑或模仿和他一样缺乏技能的邻居。意识到踏上这种没有向导且前景莫测的新征途所冒的风险，他常常宁可脱离习惯的常规道路，而常规道路又会引导他走向不可避免的消亡。然而，如果说他不像看起来那么自由，那么他至少具有主观的自由和潜在的自由。

最后，在我们的社会中，农民的独特性在于他担负着生产者、生产资料持有者和企业家的混合角色。很多人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持这种角色未分的状态，他们认为这是平衡的要素，是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尤其是，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农业领导人都有一致的看法，不管他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是右派的还是左派的，是天主教的还是世俗的。传统的组织捍卫家庭经营正是为了维持这种角色未分的状态。

青年人想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的也正是这种状态。新一代农民令人羡慕的热情和活力被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来捍卫这项事业。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捍卫是徒劳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实际上，为了使劳动者保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保持一部分企业家的特殊权力，特别是决策的权力，人们可以设想出不同于家庭经营的法律结构和社会结构。

在上个世纪，无产者除了双手一无所有，但由于他们的劳动和工业主的资本，手工制造业实现了工业化。今天，农

业的情况相反，劳动者手中持有资本，为了成为未来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它必须运用这张重要的王牌。

立法者有义务来制订可以适用于这种特殊情况的新的法律结构，以便使大多数农业劳动者不致于沦为无产者。事实上，我们刚刚描述的这种图示如果看起来是受一些技术的和经济的要求所支配，那它也可以体现在完全不同的法律结构和社会结构中。社会学家的职责是指出科学进步和大众市场的要求，尽可能清楚地标示出人的自由、道德家的观点和政治家的意志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出现的断裂点，并拟定出符合他的意愿的和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即便是最带有空想色彩的方案。

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可以模仿工业的历程，买下农民的经营资产，把许多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场组建成一个统一的企业。如果土地价格没有被过分地高估，如果食品的价格适当，那企业将是能够赢利的。一些特别具有天赋的农民，如果在了解底细的情况下愿意冒险进行经过周密考虑的现代化，那他们也可以走同样的道路。他们的成功将会促使他们的大多数邻居走向衰亡。一些从前独立的农民将会变成受薪者，其他的人将转向别的职业。这种很多人所期待的新型农业企业大概会遇到一些类似于工业中存在的社会问题，而且，一切生产结构都将按照同一个模式建立。

与此相反，每个专门从事一种生产的工场，不管是使用土地的还是不使用土地的，都可以建成一个独立的小企业，它的劳动者的人数将很少超过10人。这种企业可以是独立的手工业类型的，由一个雇主和他的几个伙计组成；或者相反，也可以是由好几个从前的“农民”组成的合作社，这些“农民”每人都以自己的农场作为入股的股金。在这两种情况中，这

些生产单位都太小，以致无法享有真正的独立。它们应当与其他的生产单位联系在一起，共同处于一个更大的“横向”或“纵向”组织。让我们用前面描述过的例子来说明：草料生产工场可以和牛奶生产工场签定供料合同，后者又与成品工场（奶酪厂、乳品厂、奶粉制造厂，等等）签订类似的合同。但草料生产工场相互间也可以协作，从而组成一个草料生产联合体，或者把草料生产工场与其它作物生产工场联系起来，这可能更为有利。

根据整个社会中的经济要求、法律界限和主导思想体系，人们可以设想和实行某种法律的和社会的组织形式：如美国中西部的“家庭”农场，布列塔尼地区一个村庄里的“小组农业”，巴黎盆地的大型粮食生产企业，意大利土地改革中在家禽生产方面并入合作经营网的“工业”一体化组织，还有乌克兰的集体农庄，以色列的莫沙夫和基布兹（Moshav和Kibbutz属希伯来语，是以色列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组织——译者），中国的人民公社，伊朗的“合作社”，突尼斯的生产统一体，等等。这又一次说明，无论社会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不能对这些解决方案进行选择。应当由政治家和道德家来决定他们认为最佳的社会形式，由法学家运用精巧的、公正的和有预见性的法律来使这种最佳社会形式适应社会环境，由行政部门的主管官员来保证这些法律的实行。

一旦人们从工场的法律地位过渡到工场之间的联系，就必须注意在实力不等的合同签订人之间制订有关权利关系的规章。所有过去有关农村租约的立法和最近有关租金的法规所关心的都只是这一点。如果说我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力量是自由地发挥作用，那工业主以及持有资本和技能的农业大经营者就可以强制人们接受他们的法则，并迫使

小经营者作出选择：要么离开土地出走，要么成为受薪者，要么成为家庭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几年来的投资和为自己的现代化作出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其结果将只是延迟一项变革性社会创造的到来，而不是促进这个创造的实现。

已在美国非常稳固的各种一体化的和“耕作合同”的形式也开始在法国传播开来。生产肉食鸡的工业主或合作社与“农业劳动者”签订一个合同，他们向“农业劳动者”提供刚破壳一天的鸡雏和必要的饲料，有时甚至提供饲养的工具（被称为“套具”的各种鸡笼子），在几个星期之后，向“农业劳动者”“购买”肉食鸡。这样，他们使一种很古老的家庭劳动形式重新出现了。这种家庭劳动形式自中世纪起在纺织业方面被广泛采用，在很多农村地区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那时几乎每个农场中都有一个纺织作坊。在这种体制中，农业劳动者尽管在表面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他失去了一切自主权，成为真正的计件劳动受薪者：他只提供自己的劳动，鸡的出售价格只是一种变相的工资形式，他的劳动时间已暗中由合同确定了。

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生产者可以组成联合会，与作为买主的工业主或合作社商讨真正的共同协议的条款。这种方法已由加拿大的农业劳动者成功地试验过了。如果在合同签订者中有一些合作社，那么，属于当事双方的那些生产者能够看到，两种意见之间的讨价还价将是有益的。

在这样的系统中，由共同的和互惠的合同联系起来的一些工场系列将构成逐个产品的生产组织。不能再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考虑，更不能从与工业相对的农业角度来考虑，应当从食物产品和生产分支的角度来考虑。每个分支形成一个

等级机构系统，最上面是确定总体目标的全国层次或欧洲层次，最下面是初级生产的工场，中间是生产和加工工场的地区联盟或地方联盟。这样，人们可以把牛奶生产视为从草料生产一直到罐装奶粉的统一过程，牛奶场和乳品厂只是许多生产阶段中的中间阶段，考虑它们究竟是属于农业还是属于工业显然是没有意义的。

在法国的计划体系中，农业是唯一没有中间决策层次的重要部门，政府、农业部和计划总署直接与 200 万农业企业家相联系，后者同时也是基层劳动者。可以想象一下以同样方式管理的汽车生产：雷诺、白茹、雪铁龙、西门卡等汽车制造厂的工人，难道他们是每人为自己制定生产政策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价格是传递国家宏观决策并使其多样化的唯一机制。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在没有受到政治压力的阻碍时，这种机制运行得比较顺利，有时甚至“过于”顺利了：甜菜价格的上涨使这种作物的生产迅速扩展，但生产过剩紧步其后。同样，人为地提高玉米价格可以很快使法国不再是玉米进口国。但是，这种价格的调整促使较不适宜种植这种作物的地区（例如波斯地区）也把这种作物并入自己的轮作系统，从而与气候对这种作物特别有利的地区（如西南地区）产生竞争。这种竞争一旦使产品变得充裕，价格就会随之降低，其结果对于两个地区将是更加惨痛的，一个地区认为自己适宜于种植这种作物而不能得到相应的收益，另一个地区则想使最近投入的资金能够分期还本，不致于有较大的损失。如果制定一项具有地区性决策措施的政策，同时不要过分地提高价格，并从一开始就促使地区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那将会避免这些冲突。

在生产的每个阶段和每个组织中，农业劳动者都将在决

策层里具有显著的地位。有些组织大概会完全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因为他们已经控制了一个由合作化和信用社组成的广泛网络。此外，他们创立了一些咨询机构和经济研究机构，如“管理中心”和“乡村经济中心”，这些机构通过自身的发展和调整，将会从“农业”生产者的角度来研究问题和制定决策。

在经济市场上，“农业”生产者在讨价还价中处于很弱的地位^①；他们所出售的一些产品，其生产是很不稳定的和难以预料的，其消费是没有弹性的，而且这些产品通常保管得不好，难以贮存。再者，他们处于生产周转过程的起点，这种地位使他们很少具有讨价还价的可能。最后，他们非常分散，意见分歧很大，经济影响力很弱。为了使他们的这种薄弱的地位得到补偿，必须使他们在生产组织中具有牢固的和可靠的决策权力，让他们负责一些重要的工作，通过采取一些措施使他们有能力直接地或通过中间人制定决策。特别是，当建立了由工场的互惠合同或共同协议构成的系统时，政治仲裁应当有利于最受传统“农业”束缚之苦的合同签订者。

农业劳动者将不再像他们在自给自足的多种生产时代那样，是自家的主人，他们将部分地失去一个独立的小生产者在大众市场上具有的那种个人自由的外貌。但是，通过真正地 and 共同地参与那些实际上直接决定着他们的命运的总的决策，他们将会重新获得失去的独立。目前，国家的宏观决策常常是根据政治标准作出的。在决定牛奶或小麦的价格时，政治的需要比经济的需要起到更大的作用。农业劳动者并不抱怨这一点，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用自己政治上的强大

① 拉提尔，1956年，弗里塞利，1960年。

补偿了自己经济上的软弱。他们的分散削弱了他们在市场上的地位，但却加强了他们在国会中的地位。他们作为生产者失去的东西可以被作为消费者的他们很容易地挽回：他们要求最优惠价格，这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收入。因此，根据社会的、道德的和政治的理由来作出经济决策，这最终是公平的。

然而，农民在巴黎的政治代表和职业代表并不总是农业小经营者的以及他们的实际问题的忠实代言人，因此，乡村地区的政治代表过多并不像人们所预料的那么有利于农业劳动者。有时，各政党和各派别之间的政治角逐甚至会就现状达成默契，阻止通过一切全国性的决议，就像在科学普及和教育问题上发生过的情况一样。相反，在省一级的机构中，农民的利益得到真正的体现，但在目前，省一级的机构几乎没有决策的权力。随着农业占用的劳动力逐步减少，农业将会失去它在政治代表方面的优势。特别是，人们在决定农业政策时，越来越要接受经济的逻辑，如果生产的农业阶段并入一些完整的生产周转过程，就更是如此。因此，那些想给予农业劳动者真正的共同决策权的人们，应当把建立地方的和地区的决策中枢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决策权是自由的现代形式。

为了抵御工业主和农业企业主的强大资本实力，农业劳动者应当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政治力量以及公共权力（资本主义国家有关政府、国家的说法——译者）的干预。只有公共权力才能使欧洲农业共同市场所起的作用对他们有利，例如不再促使土地价格继续上涨。在法国，只有国家才能左右像利比斯企业那样的跨国公司。近些年来，似乎很容易碰到抉择的关口。然而，尽管农业劳动者在自己的地区或省里非

常富有革新精神，但他们从政府和国会那里争取到的只是一些保全措施。不过，时间刻不容缓，事情很快就会见分晓。

农业职业人口的大量外流是这种变革的条件和结果，不管这种变革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形式。这种预见在今天看来是正常的，但仅仅在10年前，它还引起纷纷议论。当初冒险提出这种预见的人曾被视为灾难预言家，在农业界没有人倾听他的意见，不过这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在过去，虽然根据经济学家的看法，农业人口外流是农业进步的条件，但事实上，这种人口外流为该地区的衰落准备了条件。社会变得僵化了，农业固守着自身的习惯，农民在回首逝去的往昔，而不是考虑未来的可能性。近10年来，情况完全不同了，新一代的青年农业劳动者对经济的未来抱有信心，认为与土地打交道的职业是高尚的。他们利用邻居离开农村的机会扩展和装备自己，并组织起来。因此，他们认为这种农村人口外流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有益的。他们要求使农村人口外流成为有组织的行为。

经济学家们预见，约20年以后，法国就业人口将达到约1400万。假设农业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的5%~6%，那将有100万农业劳动者，也就是说，与今天相比，农业劳动者将减少2/3。我们在前面谈到10个畜牧经营家庭的组合形式时所进行的计算得出差不多同样的比例：6个劳动者取代了20个劳动者。对其他生产的同样计算大概会得出类似的数字……

在今后的20年中，在农业人口不太稠密的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以及在农业劳动者的平均年龄很高的地区，例如中部地区，农业劳动者数量的减少将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准

备继续从事农业经营的青年人常常还占不到现有经营者的1/3。相反，那些人口非常密集的地区，如布列塔尼地区和旺代省，将经受非常痛苦的危机，重要的是必须尽可能地减轻它们的痛苦。

劳动者数量的减少和土地的集中将要求大量的投资，以便改造和装备企业。具有现代意识的农业劳动者希望这些资金来自工业领域和商业领域。农业资本是否仍能够还本盈利是令人怀疑的。人们还可以考虑一下，这种资本的形态转化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在经济上看是否合理。另外，从全国经济的角度上看，如果把这些投资运用到其它的领域，听凭农业的演化以慢得多的速度向前推进，让农业自己来资助这个新的“现代化”，就像它曾资助过以前的现代化一样，这样是否更加谨慎一些。只要为农业完成任务提供方便就够了，这可以通过提供一些补贴、进行一些法律改革以及配备一些技术人员和商业人员来实现。这样一来，在就业方面，农业劳动者将会有更多的机会把他们的命运继续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不管怎样，目前的演变将会持续下去，农村中的农业劳动者将越来越少，因为农业就业人口比乡村人口减少得更快。就像一个世纪以前的情况一样，大多数乡下人将由非农业劳动者组成。这个断言似乎是矛盾的，因为我们一个世纪以来就习惯于把“乡村”和“农业”以及“乡村的”和“农业的”当作同义词使用。但是，这种近代的习惯只不过是第一次农村人口外流的反映，那次外流导致非农业人口离开农村（手工业者、食利地产业主、“财产管理人”、散工，等等）。镇和小城市的复兴以及村庄的被遗弃就是这种潮流的明显标志。在乡村导游者看来：一个新的乡村社会正在形成。

直到现在,所涉及的只是组织成赢利工场的生产性农业。然而,不管经济学家们怎么说,人们有一定的理由认为,一种“边缘的”、生计的、消遣的或奢侈的农业将依然存在。一些高档奢侈食品只能用手工的和农民的方法来制作:鹅肝、名葡萄酒、各种奶酪、“农家”鸡。在人们向我们保证将会到来的物品充裕的社会里,这些美味的和供炫耀的食品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买主;已经有一些巴黎饭店和特供商店专门出售传统作物产品(未施化肥)和“在泥土地上用谷物”饲养的畜禽产品。

农村历来有许多除从事主业之外兼种小块土地的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乡村工业掌握在织布农民手中;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小城市的资产者,除了他们的公职、官爵和小手工制造业之外,也拥有农业地产。

今天,在很多地区,工人-农民越来越多。那儿的工厂派客车到方圆50多公里开外的地方“收集”农民,接送他们上下班。关于这种兼业活动的前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只是一种过渡状态,它使农民可以享有工业的工资,同时又不放弃土地的安全;他们还以为,在正常的情况下,工人-农民会变成工人,从而放弃自己的农场,满足于仅仅拥有菜园和一些家禽。然而,不仅城市化的过程和农业人口外流还远没有结束,而且这些“过渡”的形式在它们产生的条件消失之后可能会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挥新的作用。如果工厂或办公室的工作时间明显地缩短,工人和雇员可能会保留他们祖传的地产,把耕作当作消遣,同时也是为了提供自食产品,甚至可能会出售给邻居一点牛奶、水果、蔬菜、鸡蛋和小鸡。

在城市人一边,他们将会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去寻找自己

的乡村住宅。为了补偿开支，他们会安排一些边缘性的小生产，如水果或家禽。这种生产成本可能是相当高的，但他们却可以“逐步收回”投入的资本，而且其产品有一定的用途，不过同时也会激起农业劳动者对这些糟蹋职业的“小兼业者”的恼火。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以致引起了一位农业部长的注意。此外，在农村里的城市人每周两天或每年数月向邻近的农民购买食品，这样就促使边缘性生产继续生存下去。最后，即便是他们没有园丁和守门人，他们毕竟需要各种各样的服务，这会帮助很多人找到生活的出路。

这些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乡村生活方式，尽管看起来似乎是边缘性的，但并不因此就是过渡性的。我们相信，将来它们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乡下人”，并将带来相当可观的一笔经济收入。与这些小“农业杂工”的不平等的竞争相反，真正的生产者寻求保护自己农业生产者的地位，希望能够成为唯一有权力接受政府的帮助和签定合同的人。但人们永远不会阻止任何人把10多个鸡蛋卖给邻居。

希望在一个严密的和有效率的生产体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明确的任务，这只是技术官僚的幻想。生产越是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就越是会导致产生一些附属性职业、一些不适应者以及一些闲暇的和退休后的时间。众所周知，打零工和黑工重新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此外，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以消费为轴心，而不是以生产为轴心，这使一些新的服务行业应运而生。总之，随着“工业社会”的理性化程度不断提高，随着富足的、浪费的社会到来，将会产生一种由非生产性消费者或劳动者-消费者组成的“反社会”，一大群活着的人将不从事真正的劳动，不管怎样说不从事生产。

有些人无法在肉体上或心理上并入过于理性化的和过于

组织化的社会，对所有这些人，也必须给他们留下生存的空间。如果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按照工业社会的要求生活，那他们可以在乡村生活中找到正常的避难所。他们或许是受不了纪律约束、不合作理性化工作的人，但也可能是到大自然中去寻找宁静与灵感的艺术家和手艺人。所有这些都较难被经济学家们考虑到，但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将来足以充满整个“反社会”，并使这个社会具有自己的情调。城市人在闲暇之时或在垂暮之年到乡村里来寻求的正是这种情调。

对于退休人员 and 可以从社会迁移中得到好处的人来说，生活在乡村的小农场上也是有利的。小农场可以使他们在闲暇时间或晚年有事可做，同时也使他们得到某种利益和一些补充收入。

人们总是习惯于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考虑农村的问题和土地的问题，并且或多或少都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然而大自然大概首先是一个生活的区域。就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乡下人常常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如果谷物的价格使政府感到非常不安，需要的并不是像今天那样去提高谷物价格，以便使价格对生产者有利，而是相反，需要避免价格上涨，避免谷物的价格使作为消费者的乡村最低阶层陷入饥荒。想使这种不知道靠什么生活的乞丐群体复活，这显然是违背常理的。但是，山区居民在冬天外出到城里干活谋生，夏天又返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他们与大领主以及享受地租的资产者具有同样的季节性活动周期。

在富足的社会，会重新出现这种交替的生活方式，不管这种交替是以年度、季节还是以星期为周期。这是难以理解的吗？奥吉-拉利贝曾担心法国乡村会变得“类似大城市的郊区”。实际上，法国农村既不会成为城市郊区，也不会成为

美国人所说的“没有农场的乡村地区”，而是成为乡村住宅区。那里既充满了无所事事的人，也充满着终日操劳却收入微薄的人。后者将不会让大自然变成一片荒芜：若以反用语来描述的话，那将是“没有农业的农场”。英国为这种新型的生活和新型的乡村从业活动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实例。我们应当尽力从消费者的角度、而不是我们习惯了的生产者角度来思考将来的社会，而且，应当承认，很多的乡村地区将是食品的消费地区而不是食品的生产地区。

乡村住宅区、生产性农业、生活性或消遣性农业，这些方面的发展将会使人们遗弃某些用作粗放牧场的地区。然而这些地区的面积可能将比人们今天想象的不知要大多少倍。有些人认为，应当通过补助金的办法使这些地区保持一定的农业人口，并认为这些农民是唯一能够保持和维护自然景色的人。瑞士对自己的山区就采取了这种办法。另一些人则认为，由护林员和饲养牲畜的人来承担维护自然景致的职责将是更为经济和更为有效的，这里究竟指的是国家园林和国有森林还是装饰性农业和供民俗学研究的农民呢？用这些术语列举出选择，似乎也就是作出了选择。

实际上，自然景致似乎并不需要真正的乡村社会来保持自己的原状。这种十分普遍的看法大概产生于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社会的“腐蚀”不可避免地导致土地的侵蚀。很多国家的例子、特别是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实例告诉人们，大自然的侵蚀常常是农业劳动者和畜禽饲养者促成的，美国大西部的生态平衡就是被劳动者打破的。在市场农业中，森林看护人十分珍惜的林业和牧业的平衡不可能再是农民的经验 and 明智的产物；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一个微妙的技术问题。

在这些地区，道路往往崎岖难行，但景致壮观，旅游业的发展把越来越多的人吸引到这里来。由于旅游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它可以确保自然景致受到保护。城市人的消遣不应当成为农业的负担。如果这些城市人喜欢布满绿色篱笆和白色牛群的葱郁原野上漫步，那就应当由他们来支付这种景色的“费用”，就像他们支付海滨浴场和冬季滑雪场的“费用”一样。除了一些对逝去的农业文明充满伤感和怀旧之情的人之外，我们可以打赌说，将很少有人会捐资保护这种装饰性农业；只会有一些穿着化装服的“真正”农民变成豪华旅馆的马夫和侍者，就像北美卡罗拉多河大峡谷的那伙鹤人（美国西部的印第安人——译者）。在一些有利于从事兼业活动的地区，把农业和旅游业结合起来，靠这两项收入来养活那儿的人口和社会，这当然是可能的。然而，在目前，想以旅游业来“拯救”农业常常使前者成为后者的负担。

另外，处在这些非农业地区的工厂和城市将会把它们住宅区向周围的自然区域扩展。但是，这将是一种宽松的城市住宅区的扩展，而不是我们在前面描述的那种新型乡村社会的发展。最后，或许有必要说明，这些不同的类型将并入过去遗留下来的生态结构，同时吸收法国各个地区的社会传统，从而融合成复杂的现实状况。即使阿尔萨斯地区、旺代省、佩里戈尔地区和朗格多克地区所接受的是同一个模式，阿尔萨斯地区大村庄里的幽默和活力与朗格多克地区的温文尔雅将具有完全不同的情调，佩里戈尔地区的乡村与旺代省的乡村也不会是一模一样。

应当从这种假设出发，来制订乡村治理的规划。对于乡村治理，虽然人们谈论得很多，但并没有进行必要的研究。

必须逐个地区地制订治理规划，同时要考虑到住宅区的传统分布和传统的土地风光。后者是实用美术的杰作，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存其中最珍贵的部分。

对土地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往往是必要的。然而，急于求成是无益的：在建立土地格局之前，最好先缓慢地实现生产的专业化和组成工场，因为土地格局可能会抑制未来的发展。当技术的进步使人们隐约看到了无土农业的前景或者土地只剩下它的经济功能时，继续鼓励农民购买土地和进行复杂的立法就不再符合现实的要求了，那些复杂的立法将会在实行之前就过时了。在一切土地组合形式都受到质疑的时候，试图确定经营的最佳规模和选择小块土地合并这种永远完不成的任务，这看起来像过时了的修修补补的工作。

在居住分散的地区，许多偏僻的农场将会日趋衰败，许多小村庄最后只剩下一户。在居住集中的地区，村庄将成为只有几个农户的小村，农业在那儿将成为唯一的从业活动。与此相反，镇和小城市的人口将会增加。随着这种趋势，教士和小学教员会集中到成为当地社会生活唯一中心的政府所在地或中心村庄。

农业工场的各种地方化形式既有利也有弊，利弊相互平衡。为分散布局辩护的人宣扬说，工场的建筑物处在地域的中心，这对于日常的劳动显然是有利的；然而，居住集中的布局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发育。这个问题在德国已被提出来了，但没有得到解决。荷兰围海造田的实验说明，由最有才能的技术人员和社会学家最精心制订的各种方案却被当地的居民挫败了，居民们抱怨人们强加给他们的布局，并随意地改变这种布局。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在法国，区域性的习惯将会压倒“社会学家”和劳动组织者的论证。

无论是集结成村庄还是分散在田野上，500到600个农业工场将会形成一个“星群”，在它的中央是拥有4 000到6 000居民的镇或中心村庄。这些居民向“星群”的全部人口提供必要的商业服务、行政服务和文化服务。全部人口约有几万人，包括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工场的数量将会是很多的，镇上的人口将会是稠密的，整体区域将会是广阔的。当然，根据地貌、住宅区的类型、耕作的集约程度和专业化程度，工场的众多、人口的稠密和区域的广阔在程度上或多或少也是有所区别的。

蔬菜种植业和果树栽培业促使农村走向真正的“城市化”。在那些将会出现很多无土作业的工场的地区，可以肯定地说，工场将会组成市镇，“平原地区”将不会再有众多的农业劳动者；谷物和草料的机械化种植只需要很少的劳动者和较短的年度生产周期。加拿大西部的小麦生产者居住在城市里，并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过冬，人们不太理解为什么他们的法国同行就应该居住在自己的田地上。此外，粗放型饲养业将会造成一些规模很大的经营单位。

与一种普遍的看法相反，在一定的区域中，最低程度的人口密集并不是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由于通讯手段和交通工具得到大大地改进，人们可以生活在距社会生活中心二三十公里的地方，并且不会像居住在偏僻的坑洼小径尽头的布列塔尼农民那样感到孤独，尽管后者离自己的村庄还不到1公里。电话、收音机和小汽车打破了孤独，征服了空间距离。然而，为了维持一种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当众多和相当多样的人口：估计人口有1万人似乎就足够了，但其中依靠农业生活的人应在1/3以下。其余的2/3人口包括行政管理人員、商人、教师、农业技术员、自由职业者和退休人

员，等等。

人们看到，一个新的乡村资产者阶层诞生了，这个新兴阶层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将会使专区首府和地方首府所在地的生活富有生气。他们将建立起一种与周围的农业生产者以及大城市的居民共同遵循的生活方式。电视和电唱机将取代钢琴。声望的角逐再次使讽刺兴起，并给日常生活带来风趣。各种协会将不断地增多。就青年人来说，舞会比运动场或文化俱乐部普及得更快，但这三项活动都将是深受青年人喜爱的大众活动。

政府机关、商店、学校、教堂、联合会和合作社等都将设立在镇上。由于劳动者不得不很经常地到镇上来，因而也将参加这种社会生活。不管他们在那儿是否有自己的住宅和工场，他们将“属于城市里的人”。最后，某些加工农产品或草料的“农业”工场和修理“工业”产品的“工业”工场将会使一些“工业”工人得到某种有报酬的工作。如果他们所在的工场具有同样的法律-社会结构和被纳入同样的生产过程的话，那这些“工业”工人与农业生产者将不会有什么大的区别。

过去，小城市的市民被深深地融入他们所在的地区，大部分人不得不接受农民的文化系统。将来则会相反，小城市将成为复杂的城市网络的最后中继站，并以含有好几个中等城市的区域性大城市为中心。最近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小城市和中等城市比大城市发展得更快。通过这个城市网络，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和某些人所说的“大众”文化将会广泛传播。

互识的社会、角色的混淆、低水平的劳动分工和高度的自身消费，这就是传统农业文明的根本特征，这些特征的消失已经带来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图式的根本变化。这些变化将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直到重新组成新的体系和新的

图式。

进一步加剧劳动分工和角色分化将从根本上改变劳动纪律。建立作息时间表的需要和建立更短的生产周期的迫切要求将会为劳动者的日常从业活动确立一些规则和惩罚标准。劳动者将不再仅仅依赖于自己的良心、干劲和牢固的劳动观念，家庭父亲的道德观念将不再是劳动者进行评价的主要依据和经营者从事管理的标准。劳动的道德要求也同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对农业劳动者的心态和人格已经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农民家庭与城市家庭连接在一起，以新的方式在父母之间分配职业角色和教育角色：或者是父亲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体力劳动，把管理者的责任和父亲的权威让给母亲；或者是父亲与母亲一起劳动，以便把企业管理好。企业的成功将取决于他们的企业精神和智慧，而不再依赖于继承的家业。

青少年选择农业劳动者的职业越来越像选择其它的职业一样。他们将在学校里而不再是在父亲的身边学会这一职业。乡下的孩子往返于学校和“现代”家庭之间；他们的成长环境将会类似于城市的青少年。此外，他们与城市的青少年受同样的青少年文化的影响，具有同样的“伙伴世界”。由于他们具有共同的“偶像”和阅读同样的报纸，他们也将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和相同的理想。今天的青年农业劳动者与他的父亲的差别要大于他的父亲与自己18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的、甚至古代的祖先的差别。赫西俄德和芝诺芬，维吉尔和科伦麦尔，他们描述的生活方式、乡村经济和人的类型与塞尔、勒普莱尔或吉奥诺所描述的属于同一种类。

19世纪的农民村庄向总体社会和“大众”文明开放了。社会关系不再仅仅是直接的个人关系，功能性的关系增多了，

而且机构摆脱了人情：在一个有1万居民的行政区域中，乡镇政府的秘书不会再是邻居或老同学，而是多少有点知名的行政官员，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你，把你当作居民来对待。

这种变化的对立面显然也将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可能的选择，但社会关系将不再仅仅受控于亲属关系和近邻关系：人们将可以选择自己的朋友和劳动伙伴，住得最近的邻居将不再是某些劳动的方便助手。人们将根据社会地位以及思想和感情上的亲近关系来进行选择。农业技术研究中心已经预兆了这种新的关系：这些中心通常联合起一些从事类似的经营的农业劳动者，而不是联合起同一个村庄的邻居，这些农业劳动者对经济的和社会的未来具有相同的观念，并且也常常是属于同样的政治团体或宗教团体。我们敢肯定地说，前面预见的那些工场之间的联盟关系和合同关系也将会是同样的情形。社会控制将更少通过个人的相互影响来进行，而是更进一步依赖于总体社会树立的和强加的指导形象和价值标准。

然而，空间的束缚将继续起作用。较之城市，近邻关系肯定依然是一个更关键的组织要素。此外，松散住宅区的扩展大概会导致在人口稠密区重新给予空间距离更重要的价值，并使一些相对自治的城市区域富有生气。在乡村社会走向城市化的时候，城市生活却变得更加“乡村化”。

但是，认为乡村社会和乡下人将来会变得和大城市的情况一样，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幻想。每个乡村社会都是根据自己的创造力来“实现现代化”，同时也获得了一些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抹去了过去的独特性。需要走过的路途和遵循的运行机制与过去的独特性趋于形成的共同形象具有同

样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缺乏研究和资料，所以无法展开多样性的分析。

此外，前面的一切论证促使人们认为，农业劳动者和农村居民在某种意义上说将依然是有别于城市人的。但这些区别将不再表现为两种在原则上相互矛盾的文明，而将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个性特点的区别。一般来说，正是这些区别使同一社会和同一文明中的群体成员各自具有自己的特征。某些人认为农业劳动者正在获得阶级意识，而且他们在帮助农民劳动者做到这一点，为的是看到形成真正的“农民阶级”。这是一个双重的错误，因为，一方面农民是即将消亡的群体，另一方面，在目前发展着的工业社会中，阶级对立越来越不重要了。

农业生产者既不是一些并列的自治小社会（如马克思所说的“一个布袋里的马铃薯”），也不是一个阶级。他们仅仅是许多职业群体中的一个群体；但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和自身的利益。他们是独立的生产者，以生物材料作为劳动对象；他们分散在乡村，与自然打交道；他们委托一些高层合作机构代行自己的一部分决策权。他们大概将会非常接近于某些统计理论上所说的“中间群体”：这是一些新的中等阶层，汇集了受薪的高级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和某些商人。

粗略地描述推动这个群体的思想观念是很容易的；在某些想发挥先锋作用的机关报刊上，这种思想观念已经得到清晰地和幼稚地表述。对生物的天然状态的热情赞扬，对经济独立的深厚情感，对“农民”传统的宗教式的崇拜，这些将会促成一种坚定的信念，即认为以养活人类为宗旨的职业——且不说是使命——是高尚的。由于一切都染上了技术主义的和经济主义的色彩，这将是一种谋求参与和进步的思想观

念。那些对今天的青年农民的革命精神感到担忧或表示赞赏的人将很快就会放心或失望。

此外，社会角色更加明显的分化将会导致价值体系进一步走向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在政治生活中大概表现为道德的和政治的争论将会减少，而经济的和技术的争论将会增加。思想观念本身也将更加明显地区别于道德。换句话说，农业劳动者将更少倾向于把自己的经济困境归因于政府的恶意和社会制度的不公，他们将寻找这种困境的经济原因，并竭力去解除自己的困境，特别是运用他们的政治影响。这样，道德将在各个层面失去它的工具性的作用。

但是，某些人会说，我们的传统农民怎么会这样突然地产生脱胎换骨的变化、由垂暮之人转变为新人呢？如果你们宣告的灾变会突然发生，那农民的精神在灾变之后依然会绵延不息。只要打开报纸就足以排除这种异议：人们在报纸上谈论的都是现代农业青年、示威游行和代表大会；在这些活动中，一种关于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的语言取代了就在几年前还流行的政治语言和道德语言。

在这方面，我们的调查可以提供证明：如果人们改变了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只需要几年的时间，那几的精神状态就会随之发生变化。人们会吃惊地看到，一些在传统的经济社会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农民可以自如地在现代体系中驰骋，只要具有某些先决条件：特别是要迅速地确立新的体系的协调，并使这种协调成为可见的和可以理解的。青年农业劳动者用不了多久就会获得一些“经济的动机”，只要这些动机具有某种意义，属于一套协调的经济规则的组成部分，而这些经济规则可以使他们隐约地看到美好的未来和成功的前景。

带着一种惊人的可靠直觉，青年农业劳动者创建了一些

全新的和完全适合于现代条件的机构：农业技术研究中心，农业集体利益协会，经营集团，等等。但是，当他们在家庭、农业经营和村庄的废墟上重建新的社会的时候，也就为农民的最后残存者敲响了丧钟，这些残存者将不会在他们这一代人之后继续存在。

这样，农民将在他们的伴随下自行地消失。

但没有农民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的世界呢？

跋^①

二十年之后

是否应当给这本书的书名打个问号呢？

《农民的终结？》，这样带着点迟疑，也更为审慎。然而，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本书是一个文明的死亡证明书，这个文明在生存了10个世纪之后死去了。它是科学的诊断，而不是思辩的发问。20年之后，结局证明我是有道理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法国目睹了一个千年文明的消失，这文明是它自身的组成部分。然而，即使在今天，特别是在那些亲手造成了这一结果的人中间，如高级官员、政治家、农业领导人，很多人拒绝承认这一明显的事实，就像是他们在一具尸体的床边不适宜地告诉亲属说：“嘘！他睡着了。”

当然，还有一些为我们提供着充裕的食品和引起反响的农业劳动者，虽然他们的数量仅为30年前的1/3。当然，乡村居民始终是那么众多，或几乎是这样，而且正像我们看到的，乡村社会获得了惊人的复兴。但这两者都不再是农民：这个对于理解今天的社会至关重要的论点太伤害我们的同情心了，以致我们的分析难以让人确信。^②

^① 本书初版于1964年，“跋”是1984年再版时加的。

^② 我在《农民社会：农民理论的基础知识》一书中详细论证了这个论点，科兰出版社，巴黎，1976年，第235页。

推动农业现代化和经营集中化的使者和主角们不愿意让人们说，是他们的政策导致了农民的消亡。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本书成为一些互相矛盾的指责的靶子。在一些人看来，这本书所辩护的是农业的工业化、小农的死亡、具有现代意识的农业大经营者的胜利和农民家庭的解体。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我是农民的陈旧价值的怀旧歌手。宣告农民的终结在读者中引起怀旧伤感：尽管作者努力做到像他自己希望的那样“科学”，但他永远无法控制他在读者中激起的感情共鸣。农民社会像整个社会一样，对权势者和达官贵人是和蔼可亲的，而对地位低微的人和穷人则是冷酷无情的。这本书并不是最先把乡村生活和农民价值理想化的，但这种理想化在此书之后传播开来。

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对于农民和乡村的态度突然地转变了：曾经成为过时的遗迹的农民，在年轻人眼里成了智慧和学问的典范。生活在农村或小城市是3/4的法国人的期望。这种观念上的大转变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信仰危机。以前，对农业和乡村感兴趣的几乎只有“右派的”显要人物和观察家，但近15年来，“左派的”人士也开始感兴趣了，其中既有活动分子也有研究者。《法国乡村史》^①的第四卷就是他们的一种宣言书，它是长期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许多争论的产物。一些人仍坚持忠实于一种正统的看法，这种看法自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表明，农业必须工业化，而另一些人则恢复到本世纪初俄国民粹主义者的立场。柴雅诺夫又复活了，普列布拉仁斯基和考茨基的书被再版，一些马克

^① G·杜比：《法国乡村史》，G·杜比和A·瓦隆主编，第四卷：《从1914年至今》，M·吉韦、M·约利维和Y·达维尼埃合著，瑟叶出版社，巴黎，1978年，第688页。

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兴趣浓厚地重读一些被遗忘了的农民主义的著作：农民经济的逻辑突然显得和工业经济的逻辑一样具有“理性”。作为公开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些讨论中和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同事们的持续合作中，我发现了对自己某些论点的证实和对自己还不清楚的一些方面的解释。特别是他们的激烈批评迫使我向前迈进和准确地陈述我的分析。

农业政策遇到一些越来越尖锐的难题，与此同时，各种社会展望学家也在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例如维代尔(Vedel)委员会，它的关于农业前景的报告引起激烈的反响，使作者们吃了一惊，因为他们认为它只是陈述了一些十分明显的事实。这些明显的事实曾引起纷纷议论，然而他们所有的预见几乎都已实现了。

20年来，我们对农村社会的认识大大深化了。每个学科的研究者都成倍增加：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口学家进行了交流。研究在积累着，首先当然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农村社会学研究组的工作，但也有很多其他研究小组的工作，如他们开展了异常激烈的争论，这些都表明我们的认识在深化，也说明1967年的著作今天已有了历史局限性。

20年过去了，因为关于“可能的未来”的研究是在1963年进行的，该项研究成为人们刚刚读过的结论的基础。我似乎感到，这个结论偏重社会内容的第二部分比它偏重技术与经济内容的第一部分更准确地预告了发生的事情。我在第一部分中过多地受农学界同事的影响，社会学家的亲身体会则显得比农艺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推论更为可靠。此外，从那时以来，全国农艺研究所由其所长亲自执笔，进行了认真的反省。让我们再次指出：“社会学家的角色在于着重指出技术进步和

经济市场的要求，同时尽可能明确地标示出断裂点，在那里，人的自由、道德家的评论和政治家的意志可以发挥作用；并且，应根据技术经济的要求拟定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哪怕是最具有空想色彩的办法。”请允许我在这里提请大家注意本书结论所概括的那些趋向，我似乎感到，那些趋向都已成为现实。

——农业人口的外流仍在继续，同时乡村人口的外流却放缓了。1975年以后，流动方向发生逆转，人们看到有些乡村地区的人口重新增加了，当然并非都是这样，因为有些地区的人口继续减少。

——通讯和交通的发展改变了乡村社会的规模：中等规模的标准从方圆1~3公里过渡到10~30公里。与此相随的还有结构的变化：构造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不再是地界和辖区，而是通讯和影响网络，作为这些网络中心的城镇和小城市被并入乡村系统。

——由于小经营体和特大的经营体减少，农业上是清一色的中等规模的经营体。在这种同质化实现之后，农业重新趋于多样化，分化成一些越来越专门从事手工艺经营和新式农民经营的营利企业。与此同时，自身消费的回复得到证实，而物物交换和黑工的发展，即所有今天人们称为地下经济的那些现象，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回复。

——与经济学家的预言和农业领导人的意志相反，一些从事多种就业活动的家庭经营成倍地增加，已经占据了所有经营的一半左右，并分散在所有的地区。

——乡村社会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因为农业劳动者本身是多样化的，农业劳动者在乡村社会中成为少数，工人为数众多，第三部门人员（指非直接生产部门人员，如商业、服

务业、银行等部门人员——译者)经常占大多数。闲暇时间和退休时间的延长引起城里人向乡村和小城市迁移,这种迁移可能是每周一次的,也可能是季节性和终身的,由此造成了第二住宅的大量增加。

——机关、公用事业部门以及商业都集中在镇和小城市里,从而加强了它们与村庄和农村的相互依赖。

——所有这些趋势因地方观念和“在家乡生活”的意愿而得到加强,导致社会结构的再次地方化:地方社区和小区团体的创议能力增加了。

——现在,乡下人享有城市的一切物质条件和舒适,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城市化了。这种生活差距的消除是在70年代完成的^①。作为逆流,一些异型的生活形式出现了。

这些可预见的演化差不多都是像人们曾预料的那样展开。如果人们现在想把这些演化分成等次,找出20年来最强烈震动乡村世界的那些转变,我可以列举出4个:地方社会生活的惊人复兴,家庭-经营统一体的分裂,随之产生的多种兼业活动的各种新形式,最后是负责配备农业领导层的机构拥有了权威。总而言之,我是想为一项乡村发展政策拟定一篇辩护词。

乡村社会的惊人复兴

这本书缺少一章来描写村民社会,因为当时缺乏研究,不可能写出来。自那以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乡村社会学研究小组对分散在不同地区的约15个村庄进行了一系列比较调

^① 法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农民》,第一卷:《社会比较的要点》,法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文集,序列E, no46/47, 1977年4月,第438页。

查，对其中有些村庄持续研究了15或20年^①。其他一些研究是近年来在小城市中进行的，这是按照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社会、文化变化持续观察”的课题计划进行的^②。最后，由于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地方考察的次数迅速增加。今天，资料是如此众多，值得写一本巨著。下面我们列出这些资料最突出的特点。

1975年的人口普查已经表明，乡村人口的数量不再下降。1982年的普查告诉我们，乡村人口开始回升，而且回升的速度明显地比法国人口的其他部分快。与此同时，农业劳动者的数量继续下降，但下降幅度很小。这些使乡村人口和农业人口之间已经引起人们注意的分离进一步强化：农业劳动者在农村不再是大多数了。如果扣除农业劳动者的人数，今天的乡镇工人(49%)比城市地区的工人(39%)还要多。

统计学家都是些按习惯办事的人，他们不愿改变自己的定义和界限，因为否则的话，所有的比较都会变得非常困难。因此，他们继续把2000人以下的居民点定为乡村的界限，然而这个界限今天已经过时了。在上个世纪，一个2000人的小镇是一个真正的小城市，与附近的村庄有严格的区别。城市不管多么小，市区里面没有农民，只有工人、手工艺者、商

① 请主要参阅：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乡村社会学研究小组：《法国乡村社区》，共两卷，科兰出版社，巴黎。第一卷：《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M·约利维和H·孟德拉斯主编，1971年，第224页。第二卷：《农民社会或村庄阶级斗争：农民理论的基础知识》，M·约利维主编，1974年，第272页。

——H·拉马什等合著：《农民、妇女和公民——洛林地区一个村庄里的权力斗争》，H·孟德拉斯撰序，阿克特苏德出版社，1980年，第215页。

② 《社会、文化变迁持续观察课题文集》，共18卷，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出版，巴黎，1982~1983年。

人、雇员和资产者。相反，在村庄里，只有农民以及是农民身份的手工艺人和乡绅。而今天，由于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帮助，乡村社会改变了规模，城市和乡村的不断互相影响使一个15 000居民的小城市完全变为乡村，而一个30 000居民的中等城市则成了真正的城市。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社会、文化变化持续观察”课题计划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小城市的社会与村民社会和乡村社会具有同样的结构。不能再戴着上个世纪的眼镜来观察乡村世界，应把乡村的界限定在10 000和20 000居民之间的某个数字。如果在30年前就这样做了，那么所有关于乡村人口外流的讨论就会大大失去它们的意义。

当然，法国的城市化已进行了30年，但它仍然具有浓厚的乡村色彩，比其他工业国家要乡村化得多。下面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的现象：由于法国总人口从4 200万发展到5 400万；所以城市人口可以在乡村人口没有显著下降的情况下比扩大的乡村人口增长得更快。今天，人口流动的方向逆转了，不仅农村人口外流停止了，而且乡村人口又多起来。从1975年至1982年，乡村人口的增长速度（7%）比总人口的增长速度（3.3%）要快，城市人口增长几乎停滞了（1.5%）。从一个很长的时期来看，稳定性的作用是惊人的：今天，扩大的乡村人口约有250万人，这也是18世纪末乡村人口的数字。

如果我们离开统计数据来看看法国的地图，对稳定性的看法会得到证实。今天的小城市大多数在两个世纪以前就存在，大约有十几个小城市扩大了，超过了30 000居民的界限，这个界限不久前还在市镇选举中用来区别市政府和乡镇政府的投票方式。旧制度（指法国1789年前的王朝——译者）的辖区首府都变成了19世纪的专区政府；某些专区政府在1924年被取消了专区区长，但所有的专区政府依然是些小城市和当

地的中心。近十几年来通过领土整治发现的一些“地方”，如果需要的话，只是加强了这个数百年的历史形成的地域区域网络。

人口普查也证明，在人口继续减少的乡村地区和人口重新增加的乡村地区之间，区别越来越大。这个使负责领土整治的人员十分担忧的现象在我看来是自然的和健康的。

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我都看不出，人口稀少的地区与其它地区为邻究竟会有什么灾难。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在山区和林区怎样生活。我们应当像欧洲中部和加拿大那样^①，重新找到一种在树林中生活的艺术。

10年来，一切似乎都改变了：村庄现代化了，人又多起来。在某些季节，城市人大量涌到乡下来，如果城市离得相当近的话，他们有时甚至会在乡下定居。退休的人又返回来了。一个拥有20户人家和若干处第二住宅的村庄可能只有二、三户是经营农业的。这样，乡村重新变成一个生活的场所，就像它同样是一个农业生产的场所。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镇和小城市的建设在1970年至1980年之间特别活跃：在此期间，这些地方的建筑施工工地增加了10%，而同期全国的平均数降低了8%。

最后，今天的乡下人享有城市生活的一切舒适：统计数据表明，在巴黎人、城市人、郊区人、小城市居民和乡下人之间，已经不像20年前那样具有系统的差别。所有的家庭都配备有浴室、现代化厨房、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和小汽车。在所有这些方面，农业劳动者和乡村居民从1970年起就追上了城市人，在其他一些方面，他们保留着优势（住宅的

^① 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我的《乡村乌托邦国家游记》，阿克特苏德出版社，1979年，第162页。

面积)或获得了优势(冰柜)。乡村的孩子去上学都有客车接送,在小学和中学里,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一起上课。

“社会、文化变化持续观察”课题计划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在小城市、村庄和乡村里,社会关系(通讯网络、影响网络、权力网络)、团体角色和商业顾客都具有同样的结构,它们把小城市、村庄和乡村连接成一个大网,这个大网的中心枢纽在小城市里。与此相对照,对中等城市、郊区和大城市居民区的研究则表明,那里的社会是以十分不同的方式来管理的。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在50万名市镇议员中,90%是乡村居民。最多的时候,在一个村庄里,每个亲族都在市镇议会中有一个代表,亲族网直接与政治拥护者的网络连接起来。在小城市里,结构也是同样的:每个人都被卷入在市议会里有代表的一个网络中,协会迅速增多,成为扩大这些网络并把它们连接起来的手段。在大城市,情况完全不同,议员不被人了解,协会的成员主要是些属于中层阶级的人。因此,在居民不足10 000人的社区中,市民们绝大多数都表示对行政机构十分满意,而在居民多于30 000人的城市,市民们大多数都很不满意,这就不足为奇了。只要看看乡村世界和小城市中的公证人和宪警这两种关键人物就足够了:这两者都非常熟悉他们区域中的每一块地方、每一座房子和每一户人家。当居民超过20 000人时,公证人就改变了角色,他们不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许多人联合起来,专业化了,有很多助手。在大城市,城市警察与宪警相竞争,甚至使宪警的作用缩小到只是管理军籍簿而已。

一切将乡镇再次集中的努力都失败了,这有力地说明,乡村社区重新获得了罕见的生命力。尽管出现了乡村人口外流,尽管有了汽车和电话,法国32 000个乡村市镇始终有自

己的乡镇政府和乡镇议会。而意大利只有3 600个市镇政府，英国把他们的教区重新集中为郡。人们制定过各种把乡镇集中为辖有地区的市镇的计划，但从未提出要像英国和比利时那样去强迫乡镇再次集结。乡镇的合法性在法国的民主精神中是如此牢固，以致从未有人想动用国会和国家的合法性去反对它。最集中化的国家也是最尊重乡镇自治的。这种对社区的尊重显示出明智。

在20年以前，乡镇似乎失去了一切活力。近10年以来，在每个乡镇，甚至是那些最小的乡镇，一种新的社会生命力从各个方面萌发出来。每个周六或周日，这个或那个乡镇会组织舞会、摩托车越野赛、烤全羊宴、旧货集市等。因此，年轻人总是能够在方圆15公里之内找到跳舞、观看演出和参加欢庆活动的地方。与流行的观念相反，今天，在乡村和小城市比在大城市特别是郊区玩乐得更好。村庄完全破裂了，被并入一个既非城市又非乡村而是两者兼之的地方社会。城市的年轻人去参加村庄的舞会和到偏僻乡村的唱片俱乐部参加娱乐活动。城里人每个周末都出外散步，去参加欢庆活动、观看演出或“去农场”购买蛋、禽、蜂蜜和酒。在一周当中，农业劳动者不断到镇上或小城市去，或者是去参加某个聚会，或者是去农业信贷银行，或者是到汽车修理部或五金商店购买某个零配件，妇女们则去设在小城市或大城市边缘的“大商场”（营业面积在400平方米以上，食品和生活用品齐全的自选商场——译者）采购。其实这些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对地方小商业造成了威胁，因为乡村居民平时去“大商场”的次数比城市人明显地少。

乡镇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时期之后，重新

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以事实证明，人们无法将乡镇融入一个辖有地区的市镇。某些人对此感到奇怪。一个乡镇议员只代表200名居民，这在目前不是少得令人可笑吗？经验证明这并不可笑。只要在乡镇选举的时候到一个村庄里去生活些日子，就会相信，那里发生了一些对它的居民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村庄像在自己给自己演戏，人们列出问题，评价领导人，重新排列派别和小集团、亲族和支持者，重新确认意识形态的反对派和利益冲突。一句话，它在生活。应当帮助它生活，而不是以傲慢的态度去对待它。

村庄通过它的生活满足了我们大众社会中一个极重要的需求。在我们这个大众社会里，个人很难确定自身的个性，不再有服装、习俗、阶级和信仰的区别来使个人通过与他人的对照感受自我的存在。甚至性别和年龄的差异也模糊了，女子想表现得像个男子，成人想表现得像个小伙子，每个人都在努力抹去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特征。在村庄和小城市里，情况却相反，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的邻居是谁，了解每个见过或认识的人的立场，人们可以具有自我，并在与其他人一起生活的同时知道他们的区别。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那么多的城市人重新返回到村庄里，住进老家的住宅或一幢人们建筑或修复的但又每个周日都不停地修修弄弄的房屋。孩子们可在这住宅里辨识自身，寻到祖根或化为祖根。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法国社会的这个奇特的矛盾在任何其它国家中都看不到：乡村在生活方式上完全城市化了，但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仍然如此之大，以致于城市人一有可能就从城市溜走，以便到乡村和小城市里去重新找回城市的乐趣，仿佛只有这一点才赋予生活一种意义。社会学家们还未能

给予这种乡村化一种新的定义，但他们正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家庭和经营的分离

在今天看来，本书的第三章大概是最过时的了，这既是由于社会的发展，也是由于研究的进步。所有的分析都把家庭和经营当作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认为这个整体的配合和统一是受经营的逻辑支配的。这确实曾是农民家庭的结构，农艺学家们至今还是这样设想。然而，现在应当把家庭和经营明确地区别开来，改变前景，并从家庭的角度来考虑这个前景。由于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近来的工作，这已经成为可能的了。这些工作告诉我们应从三个方面来看待家庭：家庭群体、亲族关系和生活周期。这些方面揭示了法国各地家庭结构的各种类型。联合家庭是真正的家庭共同体，它在法国中央高原的北部和西部曾广泛存在；它是在19世纪消失的。在主干家庭中，只有一对夫妇与祖父母同住，其他孩子或是独身或是离家结婚，都放弃了遗产中他们可以合法继承的部分。配偶家庭中有父亲、母亲和子女，这是法国北半部最普遍的家庭形式，一般会导致遗产的平均分配，当然也是变化多样的：即使人们把土地所有权传给了后代，这个所有权照样会常常被设想为不可转让的^①。

家庭模式的这种多样性通过一些对比鲜明的区域性思维习惯一代代传下去。主干家庭就其原则来说是不平等的：成年人低于老年人，孩子低于成年人，年幼的低于年长的，女子低于男子^②。这种等级关系的教育在鲁埃尔格地区使人们

^① M·塞戈伦，《家庭社会学》，科兰出版社，巴黎，第198页。

^② E·克拉维利和P·拉斐逊：《荒谬的婚姻——吉沃丹地区的暴力和亲族关系（18和19世纪）》，哈舍特出版社，巴黎，1983年，第365页。

尊重权威，而在阿马涅克地区，一切权威都是难以忍受的，这大概是因为教会和显要人物在这两个地方扮演的角色不同。联合家庭自一个世纪以来的消失可能会解释选民的向左转和上维埃纳省、克勒兹省以及波旁内地区的反教权主义^①。东部和西部的配偶家庭是不同的。在东部，配偶家庭与一个共同生活且极其平等的村民集体结合在一起；而在西部，每个家庭都封闭在自己的农场里，服从于神甫和城堡主的绝对权威。男子和女子之间的关系也是各有不同的，是以不同的方式构成：在鲁埃尔格地区和热沃当地区的落后村庄，布列塔尼式的母权制反对女子的屈从；而在洛林地区，工作的完全分离确保了女子的独立和权威^②。

借助近期的研究，我们不断地重新发现这种难以置信的多样化。在家业管理、夫妻关系、儿童教育、亲属关系和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等各个方面，这种多样化一代代传下去。然而，家庭组织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以致于人们今天无法再辨识在昨天还是明显的事物。因为农业经营由于现代化而从根本上得以改变，朝着一种人们认为是“规范”的一般模式发展，而这种模式的出现只是近期的事情。这个历史假象形成，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于农艺学家们对于多种生产的“农民家庭经营”总是存在着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看法，并在最近30年使这种看法上升为一种模式，即所谓两个人力劳动量单位的经营，甚至试图为每个小农业区都确定这种经营的最佳规模。60年代的整个农业政策都是建立在这个家庭多种经营的理想模式上。在这种家庭经营中，家庭细胞和经营之间是

① E·托德：《第三行星——家庭结构和意识形态体系》，法国大学出版社，巴黎，1983年，第252页。

② 参见H·拉马什的著作（上文引过）。

完全重合的：所有的家庭成员在农场中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这曾经是基督教青年农业劳动者联合会的空谈家们的理想，他们认为这是彻底实现了自己的反资本主义的理想和从人格主义的天主教教义中汲取思想的家庭主义道德。1960年，立法者把他们的理想转化为法律，法国所有的农场都被鼓励越来越朝着以两个农业劳动者为中心的家庭化方向转变：丈夫和妻子，或者父亲和儿子。20年之后，这种技术专家的视角完全失掉了自己的目标，人们不得不承认立法者的设想以失败而告终。

在这种模式中，丈夫是经营主，而妻子，或许还有一个被指定继承家业的儿子，则是“家庭助手”。这就是说，妻子或儿子既没有法律地位，甚至没有受薪者的法律地位，也没有任何的自主，因为经营管理像在企业里一样，变得越来越统一，并要求在投资、贷款、开支等方面作出各种各样的决策。以前，每个人的工作都是明确规定的和不变的；妻子出售她的饲养获得的产品，并决定着销售价格。今天，当她不做家务活时，她只是丈夫的一个“助手”。此外，由于社会的整体进化带来妇女地位的改变和青年人更早地独立，农业劳动者的妻子和孩子合乎情理地感到他们失去了自主性，与其它职业家庭中的妻子和孩子相比，他们有受到刁难的感觉。但是，并未因此而产生一个可以与全国青年农业劳动者中心相比的妇女联合会运动。妇女们逃避这种完全附属的地位所运用的手段只是拒绝与农业劳动者结婚。很多农业劳动者都是单身：1979年，农业人口中男性和女性的比例是110：100。

在一本新出的精辟著作中，A·巴兹^①详细分析了农业

^① A·巴兹：《家庭、劳动和农业》，经济出版社，巴黎，1982年，第189页。

劳动妇女为了改变处境而考虑处境时所陷入的种种矛盾。她们不愿再充当随时可以帮助丈夫的“临时凑数的角色”。她们希望完成更被看重的、有明确限定的、因此是自主的工作，如管帐或者负责一个具有相应收入的生产场所。她们没有意识到，这曾经常常是她们祖母的境况。这一立场的最终逻辑结果是承认妇女是共同经营者，或者通过组成一个夫妻合作组的办法给予这种夫妻劳动场所的并置状况一种法律形式：农业共同经营组织。不幸的是，从法律上说，夫妻间的共同经营组织是不可能的，而在父子间是可能的，这可说是我们立法“机器”的好样板。

过去，女经营主都是清一色的代司夫职的寡妇。今天，一些妇女担任了农业经营主，她们通常是高级职员或自由职业者的妻子。这种情况还不太普遍，但农业劳动者的妻子从事农业经营之外某种职业的情况急剧地增多。农业劳动者的女儿们不再愿嫁给农业劳动者，怕的是处于她们的母亲的地位；相反，一个从事某项职业的青年女子对嫁给一个农业劳动者并不反感，只要后者同意她保留她的职业。农业劳动者的妻子从事农业经营之外某项职业的人数所占的百分比从1970年的13%提高到1980年的20%。一般情况下，她们从事第三部门的工作，工时常常较少或具有弹性，如在教学和医疗部门工作。她们使那些“无职业”的农业劳动妇女感到羡慕，后者想在经营中为自己确定一种体现个人作用的劳动。这种情况对农业来说完全是新事物，它类似于城市家庭，在那里夫妻双方都有独立于对方的职业。

只要出外工作的是丈夫，家庭就不会有深刻的变化。工人-农民到工厂去，他用从那儿挣到的钱来使自己的经营现代化和养活他的家庭，他继续担负农场的领导和最主要的

劳动，他的妻子尽最大努力协助他。男性和女性的角色规定丝毫没有改变。相反，一旦是妻子出外工作，关于角色的规定和角色之间的关系就被动摇了。在传统型的小经营家庭中，妻子挣回来的钱用以维系经营和养活家庭。妻子一回到农场，就开始做家务活和助丈夫一臂之力；她处在过去的工人-农民的状况中。相反，在一个大经营家庭中，妻子下班返回后，如同一个高级职员妻子。她的工资和农业收入相等，可以用来养活家庭。她可以选择不同的活动（管理花园、管帐……），也可以对经营不闻不问。在这后一种情况下，她对丈夫的从业活动并不比一个工程师的妻子知道得更多，也就是限于丈夫对她所说的事情。人们今天遇到的情况是，正是家庭经营拒绝妇女的参与。在农业共同经营组织中（父子间或两个兄弟间的），当一个男子结婚后，他的妻子找不到发挥自己作用的位置，她必须去别的地方寻找工作。这些妇女产生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疑问：我保留自己的职业是因为我喜欢它吗？抑或是为了挣钱？这恰恰是城市里的妇女婚后提出的问题。

妇女通过出外工作摧毁了家庭经营观念本身，而我们的整个农业观、农学家们的一切思考、一些职业组织和所有的农业政策都是建立在这个观念的基础上。不管人们愿意与否，妻子就是家庭，由于她有了一项职业，于是造成经营和家庭的分离，人们突然不再谈论家庭经营，而是谈论农业劳动者了。

孩子们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儿子作为家庭助手并不拿工资。当他还是少年或者还年轻的时候，他可以接受这种状况；当他获得自己的独立性时，他就要提出责难；而当他结了婚有了孩子的时候，他的处境就变得难以忍受了。在过

去，他的处境是正常的，因为全家人在一起吃住。当然，在继承财产时，留在农场的子女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他在农场成年累月地工作，却必须和已经离家的兄弟姐妹平分遗产。为了纠正这种不公，立法者在1938年提出了延期工资的概念，给予留在家里的遗产继承人一种继承上的债权。这就在家庭共同体中导入了一种商品关系的法则，并承认一个孩子的地位就像一个具有某些权利的劳动者；他不再是完全处在法律之外的了。这个初步措施几乎没有产生什么作用。随后，全国青年农业劳动者中心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仍未完全达到他们的目的。儿子是希望自己成为共同经营者。为了创立一些生产合作社，农业共同经营组织这种法律形式得到完善，但这种形式被转而用来组建父子间或兄弟间的种种协作组织。

此外，留在家庭中的未婚子女越来越经常地从事非农业工作。他们生活在父母家中，经常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交给父母，并在繁忙的时候帮家里一把，但他们不再是农业劳动者。然而，在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和当他们自己的子女到了能出外工作的年龄时，他们可能会重新成为农业劳动者。所以，对于那些唯一的货币收入是父亲的工资随后是儿子的工资的家庭来说，农业经营保证了它们的继续存在。

为了帮助年迈的农业劳动者把经营的责任移交给自己的儿子或将他们经营的土地交给具有很少一点土地的年轻人，人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期使经营者年轻化和经营集中化。这些应会有利于提高法国农业的现代化程度和生产效益，使法国能够对付欧洲同行的竞争。这些措施首先是退休金制度，其次是退业养老津贴，这种津贴是给予年迈的农业劳动者，条件是他们把自己的土地让给需要扩大经营的年

轻人。立法者的意图很经常地受到家庭结构的扭曲：父亲为了拿到退休金和退业养老津贴，只是在法律形式上把经营权让给儿子。从外表上看，在家庭关系和劳动关系上，什么也没有改变，仍是父亲指挥，儿子劳动。然而，这一反常的结果并不能阻止一切预期的结果：在法律上，儿子成了经营主，父亲退休了。

领取退休金，不再是工地所有者，这是把作为家长的父亲变成休闲的老人，因此也就改变了家庭的结构。特别是，如果年轻人与此同时离开父亲的住宅去建造自己的住宅，那情况更是如此。家庭经营这个概念本身会因此遭到驳弃。此外，平均寿命的延长，使村庄里的老年人成为人数越来越多的群体。除了农业和其他职业的退休者，还有退休后返回到村庄里养老的城市人。在这三种情况的影响下，“第三年龄”（这是指老年人，相对于少年和青年而言——译者注）取得了自身的存在地位。社会互助福利员们曾惊奇地看到，第三年龄俱乐部“骤然兴起”，而他们原预料会有一些阻力的。

农民家庭完全解体了：像城市家庭一样，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个人活动。这并不妨碍家庭之间仍维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祖母在空闲的时候可以照料孙子孙女们，如果孩子们不使她过于劳累，她会照料得更好；同一个菜园可以为全体家人服务；当屠宰了一只母羊时，每个小家庭都可分一块放在冰柜里。家庭的分组减少到最低限度，但亲属们编织着相互间的密切关系。因为与一个基础家庭相连的，有两对祖辈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家庭，一些兄弟姐妹已离开了家乡，但在假期和周末，他们会返回家乡，住进在兄弟们的帮助下用过去的谷仓改建的小农舍。这样，所有的孙辈堂表兄弟姐妹们重逢了，可以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由于事物的一种奇怪的回

复规律，联系家庭组织的亲属关系重新建立了联合家庭的结构。家庭组织之间可能相距很远，但在一年中的某些时期，他们会聚在一起。在亲属关系的网结上，确实还存有“家庭”经营，但家庭和经营不再是完全重合的了。这种“社区化亲族关系”的结构也在城市甚至美国成长发育着。

如果祖父和祖母都“退休了”，长子重新开始经营，一个兄弟去了巴黎，一个妹妹嫁给农业劳动者，那么，在家族中就有了两个农场；第三代的年轻夫妇住在邻近的地方，但都在外面有职业；而巴黎人则把谷仓改造成第二住宅，在可能的时候回来住。如果所有的亲属都愿意在农忙的时候助一臂之力，那么从理论上说，这些农场的产品是可以养活整个家族的。在这种“社区化亲族关系”中，通过劳动和食品的交换实现了多种兼业。以下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但值得考虑：如果土地仍是共有的，仅有一个或两个全工的农业劳动者，劳动是分配给所有的亲属，并且所有亲属的家庭食物都来自农场的产品，那么“家庭经营”就解体了，它扩散到全部亲属。但如此完美的情况是不常碰到的。相反，在父母和已婚子女之间或兄弟和姐妹之间，由两三个家庭组成的半共同体大量出现。这是由于年轻人留在了家乡或返回了家乡，另外还有观念的变化和失业的因素，特别是由于在小城市工作可以驱车上下班。

多种兼营活动应走出地下状态

因为我们掌握的资料太少，所以无法证明家庭、亲属、农业经营和非农业就业之间的各种配合形式是否正在不断增多和向多样化发展。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不足一半的农业经营是由家庭所有成员从事的全工时经营。如果在大多数情况

下，家庭和经营不再重合，难道没有必要修正观念，为多种兼业制定一项政策，而不是总把它当作一种合乎规范的例外吗？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谁都不想揭示的隐蔽现象吧。统计学家们近来取得了重大的进步，这些进步可以使测定更为准确，但并不能因此就断言拥有了一种完美的测定方法。事实上，农业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兼业活动，如果不是说处于地下状态，也常常是在审慎的情况下进行的。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数据：20%的经营主从事另外一项全工时职业，这个比例30年以来差不多一直是稳定的。相反，在地区分布上发生了很大改变，儿乎在所有的地区，都有一些双重就业人员，而在20年以前，这种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诺曼底地区和山区。家长是农业劳动者，但至少有一人出外工作的家庭在1963年占30%，1977年达到40%，今天达到50%。这些数据的修正量在10个百分点左右，因为一切更高的精确度都是骗人的，人们只能作出一种估计。最后，约有70%的农业劳动者家庭有农业以外的收入，在整体上，农业收入只占这些家庭的总收入的2/3。这种数量比例根据经营的所在地区和类别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中等经营者家庭较之小经营者家庭和大经营者家庭更为“农业化”一些。如果我们把社区化亲属关系按照前面对它介绍的情况进行分析，这种现象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

经营者的双重从业活动和家庭的多种兼业活动以非常多样的方式进行。下面是一些典型例子：

——农业劳动者并不是全部时间都忙于农业经营，然而他并没有另外的职业：或许因为他的经营规模太小，他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就业不足的状态，只好到别人家里干点零活；

或许因为他的经营规模太大和只需要从事季节性的劳动，他因此而享受着长时期的闲暇时光。

——农业劳动者同时也是全工时的受薪者或商人：1/5的农业劳动者是这种情况。

——家庭有一个成员从事一项其他的全工时职业：这种情况约占全部经营者的1/3。

——家庭有一个成员从事一些多少带有地下性质的工作：黑工、劳务交换、不同性质的物物交换……。

确实有不到1/3的家庭依靠农业经营生活，而且仅仅依靠这项经营生活。

如果我们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应当研究一下非农业劳动者从事的农业活动：

——尽管农业劳动者急剧减少，但45%的家庭仍有自己的一个菜园，他们在那里种植蔬菜和水果：大约有1/3的新鲜蔬菜不是购买的，而是消费者种植的和交换的。

——“多面手”从严格意义上说都是些双重从业者，考虑到他们的主要就业活动是较为重要的（花费的时间和收入），因而可以说，他们的农业劳动是附属性的，他们人数不多，但色彩各异。

——“小多面手”是些从事农业小生产的城市人或退休者：饲养一些肉食家畜的肉店老板、拥有乡下第二住宅的剪羊毛工、供给合作社造酒葡萄的葡萄园丁，等等。

——由于一周劳动时间的减少和退休时间的提前，近几年采集、打猎、钓鱼以及偷猎偷渔的活动大量增加；采集的蘑菇可以成为基本收入的补充部分。

最后，农业生产本身的定义引起争论。一方面，为罐头食品厂等单位提供谷物、甜菜、奶、蔬菜和水果的大众化生

产需要很多方面的投入，产品要经过很多加工程序之后方可食用和销售给消费者；另一方面，农业劳动者到附近的小城市挨家挨户地出售他们生产的蔬菜、蛋、禽和奶。这些“农业生产者”，或更贴切地说，“食品生产者”，至少有一半的从业活动应当像商业活动那样来入帐。当农场变成乡村寄宿所、宿营地和客栈时，就跨越了农业和商业之间的一步之遥。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举一个佩里戈尔地区生产肥鹅肝的特殊例子：10年来，很多农业劳动妇女开始饲养鹅。不久，她们又开始把鹅催肥，以便出售鲜鹅肝，并制成肝酱、罐头和肉冻，每年都供不应求。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制作罐头并进行出售并不是农业活动；妻子从事的食品交易完全独立于她丈夫所从事的农业经营。波尔多的葡萄种植者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让自己的父亲们在一周内每天去一个不同的小镇的集市上销售他们自己酿造的酒。农业劳动者指责其它行业的“多面手”夺去了他们的土地，这个论据会很容易反过来与他们自己作对。这是作茧自缚，因为“新村民”开始饲养奶羊，制作奶酪，并到附近城市的市场上去出售，同时还从事一些修修弄弄的小营生，那么，他们是农业劳动者吗？从郊区工人的菜园到多种兼业家庭的经营，其间并没有结构的差别，而只是农业生产、自身消费和货币收入三者间的均衡有所不同。

所有这些从业活动都是边缘性的，有时规模极小。但这类活动不可胜数，特别是，它们使很多农业经营体可以继续存在，使很多家庭可以生活得更好，能够留在乡村，自己建造住房，不增加失业者的人数和不在城市里要求住宅。从国家的角度看，还应对它们在其它方面的价值作出总体估量，

如节省了投资和社会迁移费用。所有这些多种兼业活动的形式只是整个社会的一种更为普遍的演化的表现之一，即人们恰当地称为地下经济或未定形经济的发育。它使所有的经济学家感到忧虑，因为他们的分析无法把握这种现象；它也使政府感到忧虑，因为它避开了政府的直接抽税。

人们有时倾向于把这些从业活动说成是过渡现象，期望它们会返回到正常状态。这种贬低这些事实的作法在我看来是错误的和有害的。相反，我认为，这是我们的社会在高速发展之后越来越走向多样化的结果。以前的高速发展是通过集中化、精简化和规模经营实现的。如果说这个高速发展时期结束了，如果说我们已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那么可以预料，人们的能量会调动起来运用到日常生活上和改善这种生活的细小措施上。在20年前，人们大讲工人-农民的出现是走向农业人口外流的一个阶段，而且有时情况的确是这样。但这种现象稳定下来，并像前面所说的，分散在所有的地区。

12年前，H·拉马什^①对莫尔比昂省的一个村庄进行了研究。他根据各种类别的农业劳动者的管理目标来分析他们的前景，得出结论说，多种经营的小农正走向无产阶级化。他还宣告说，这些小农注定会很快消失。可是过了10年以后，他惊讶万分地看到，他们生活得很好，并充满活力，成为一些协会的负责人和足球活动的领导人，而足球是该地区的重大社会活动。不过，他们只是成了边缘性的农业劳动者：或者一对夫妇中有一人从事受薪工作，或者夫妻两人都从事少量工作。多种兼业者广泛地参加各种地下经济活

^① H·拉马什：《面对市场的农民：布列塔尼地区的无土饲养业》，载《劳动社会学》1977年第2期和《社会、文化变迁持续观察课题文集》第7卷。

动，为增加地方的经济活力和社会活力做出了贡献，但只有出于良好的意图才能对他们的贡献作出公正的评价。他们留在村庄里，同时也追随着时代的旋律。由于“生活在家乡”，他们抵御了城市里威胁着他们的失业危险，特别是保护了自己在一个地方社会中的社会地位，这个地方社会规定并确认了他们的个人身份和家庭身份。为了使他们的选择对他们自己和其他人都具有意义，他们当然必须在乡村从业活动中不失身份。

布列塔尼地区的乡村复兴是乡村青年的成果，这些青年拒绝离开自己的村庄，并找到了在本地或去附近城市工作的谋生手段。这种现象到处可以碰到。于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新的乡村阶级，这个阶级对自身的界定更多地是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通过他们的职业活动。这个农村中“新的小资产阶级”与最近社会学研究描述的城市新兴小资产阶级有令人惊奇的相似之处^①。虽然是些来源不同的人奇怪地汇合到一起，但他们的共同点是处于劳工和高级职员之间的中介位置。他们希望自己处在生产体系的边缘：多种兼业的小经营者、教员、医疗辅助行业，等等。他们大多数都是受薪者，也是做杂活的，但无论什么情况总是享有社会保险者。他们取代了主要由小店主、手工艺者等小企业家组成的传统小资产阶级。重要的是，他们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推动了协作组织的发展，担负起公民责任。他们的代表有很多人在1981年春随F·密特朗而当选。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得出两个对制定农业政策十分重要的结论：一是今天谁都不知道如何给农业经营下定义，二是一

^① 参阅《社会、文化变迁持续观察课题文集》第6卷和第16卷。

个新的乡村阶级正在产生。比利时政府大力保护的生产者是从事饲养业的多种经营者。他们总是根据“农业政策”多变的鼓励措施在奶和肉之间左右摇摆，而兼营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者出售可直接消费的产品(酒、奶、酪、家禽等)。他们自己克服困境，以便使他们的劳动获得最大的价值。这两者之间难道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可以说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只有共同的国家规章、农业信贷银行、社会互助会和农业经营者联合会全国联盟，等等。今天，不再是农业劳动者来创立农业和农业机构，而是行政机构与职业团体通过给农业劳动者配备高级管理人员来决定农业及农业劳动者的特点。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法国农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统一配备制”却陷入它所鼓励的多样化之中。如果农业组织和农业部拒绝正视现实，仍然只承认“全工的家庭农业经营”，那他们就只剩下一个十分狭窄的社会基础，很快会减少到只有50万个家庭。

一个演变正在悄悄地呈现出轮廓，这在农业中学和各种常设培训班的新式教育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到。如果在农业中学里，人们教给山区的农业劳动青年当优秀的滑雪教练，那就是鼓励他们从事多种兼业活动；同样，如果人们向农村妇女传授管理旅店的基础知识，且不说给予乡村寄宿所津贴等等，那不言而喻是在鼓励多种兼业和从事副业。但合法性的问题将随之提出。农业联合会和农业政策负责人将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他们应当给予各种兼业活动一种合法性。农业经营者联合会全国联盟于1983年召开的大会曾审慎地暗示过这一点，但愿这预示着看法上的转变。多种兼业作为走向城市化的阶段或小经营者生存的手段，应当被提高到它应有的地位：它是乡村社会获得新生的一种预兆或一种工具。

农业及农业劳动者领导层的配备

自1967年以来，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在政府、农业部、计划署与那些同时也是基层劳动者的家庭经营主之间，可以说产生了决策的中间层次。价格不再是把政府决策传递给经营主的唯一机制。联合会和专业组织，农业公会和省级管理机构，特别是合作、信贷和互助组织，都获得极大的发展，成为一些强大的机构。农业是唯一享有一套独立教育系统的职业，这个教育系统从中学一直到农学院。

约束农业劳动者的联系网络和机构网络变得更加狭小，更带有束缚性，但也更有弹性，因为更多样化了，不管怎么说是更具有渗透力和更具有鼓动性了，如果不是更具有指导性的话。在省一级，所有这些行政管理的、合作的、互助的、技术的和联合会的机构把大量的“官员”、管理人员、鼓动人员和技术人员等等联合在一起，服从于一小部分农业领导人的权威。这些领导人兼任着负责人、主管和董事，掌握着越来越多的决策权。农业商行和农业信贷银行地区分行都设立在雄伟的大楼里，与省政府和法国国家银行争辉斗艳。

过去仅类似显贵会议的农业公会转变成真正的行政机构，具有一些领导人和一些专门的办事机构。过去属于农业管理局局长负责范围的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移交给他们，并将这项工作改为“农业发展”这样一个更为宏伟的名称。不幸的是，名称和负责人的改变并没有带来效率上令人瞩目的改进。在50年代，在生气勃勃的农业劳动者的影响下和由于他们惊人的社会创造力，产生了众多的新组织：农业资料共用合作社、农业技术研究中心、土地整治和乡村建设协会、管理中心、家庭乡村培训所、农业共同利益协会、农业共同经

营组，等等。政府尽最大努力指导和帮助了这些使外国人羡慕、并使我们的欧洲竞争者不安的创举。甚至荷兰人也来学习法国的新事物，并且有时还从中获得启发。然而，一旦“职业人士”掌握了进程，进展就减缓了，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了。争辩、语汇、推论总是和20年前一个样，而农业劳动者的状况已完全改变了。

以个人主义闻名的农业劳动者却建立起一个协会的和组织的网络，这个网络在任何其它职业中都不存在，它赋予农业经营者联合会全国联盟以及该会的主席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农业信贷银行的网络化为9 000个营业网点，全国农业信贷银行的发展，使它在一个时期内以其大量的存款成为世界首要银行机构。法国农业劳动者对借款的怀疑态度是有名的，可他们却建立起一个列入世界首位的银行，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悖论。

在国家一级，责任和权力的布局在近20年内也完全改变了。过去，主要的权力机构是农业部，它依靠农业信贷银行和总部设在巴黎日耳曼大街上的大多数合作团体的支持。总稽查署是出了名的激进派、共济会派，换句话说就是左派的，因为是共和主义血统的。在对面，有农业联合会、农业公会，有农业信贷银行(布列塔尼地区、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和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和农业合作社的网络，有保护农产品(谷物、甜菜、奶，等等)的强大专业组织，还有聚集了一半以上中、小学生的农业教育网，所有这些机构和组织都来源于右派，通过第一代天主教的活动分子使它们焕发了新貌。正像人们在战前开玩笑说的那样：“左派的牛享有政府的津贴，而右派的牛享有上帝的恩惠”……社会党人有一种农业理论，自1900年前后以来，他们一直试图把这种理论推广到农村。

但除了在某些地区(南部葡萄产区)外,基本上没有成功,因为他们除了小学教员没有其它的传播网络,而对小学教员来说,农业理论并非他们首要关心的事情。相反,共产党人更为成功地扎下了根,正像家庭农业经营协调及保卫运动和他们的报纸《土地》所证明的。曾是首要农业权力机构的农业部今天变成一个失去其主要特权的管理部门,并受同行业的监督。在一些急剧扩展的农业组织与桥梁公路工程师队伍这个强劲对手的钳夹下,由三个部门(农业管理局、乡村工程局和河泊森林管理局)的工程师合并成的乡村河泊森林工程局的队伍不断错过增加自己职责范围的各种机会,由于不断地放弃责任,他们今天实际上已不再是一支“强大队伍”。然而,在初始的时候,这些工程师曾一度压倒过国立行政学院毕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后者从未让出过他们在法国总理府中的要职。

与此相反,桥梁公路工程学院培养出的工程师队伍采取了一项坚定的和有效的策略,使设备部成为一个主管地面设施的技术大部,并随后主管了环境保护。30年前,农业管理局(也包括乡村工程局和河泊森林管理局)与桥梁工程局是平分秋色的,农业管理局局长是省长的政策顾问。今天,设备管理局的职员平均比农业管理局多5倍,它的下属部门还有实地换班人员。设备管理局的局长已难以忍受省长的监护,并让省长感觉到这一点。或许地方分权的主要结果是使设备管理局的局长脱离省长而自主:削弱省长的班子,就等于加强桥梁公路工程的班子。

在河泊森林管理局的人员中,既有农艺师,也有巴黎综合工科学院毕业的工程师,这是一支曾让其他国家同类管理部门羡慕的“强大队伍”。100年来植树造林的努力和反对生

态侵蚀的斗争使这支队伍成为环境保护的世界先驱。南锡森林管理学院曾在全世界享有盛誉。作为森林管理技术人员，他们没有能够预料到生态和环境会成为科学和政治的重大事务。他们任凭植物学家把他们的实践转化成科学——生态学。特别是，由于受工业的迷惑，他们同意了建立国家森林局，自以为他们在成为林业系统的负责人之后，会变得更有权力；这实际上是忘记了，“森林保守党”的官员不会转变成工业家，如果他们真的发生这种转变，他们就会从而失去自己的护林员精神。他们在转变中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也未能使法国的森林获得收益。由于他们在需要的时候缺乏想象，因而把已经形成的活动范围让给了桥梁工程师们，环境保护的责任由设备部兼负起来。把管理自然的工作托付给混凝土的专家们，这是让人奇怪的。头脑清醒而又雄心勃勃的工程师们在这一点上没有弄错：他们离开了自己所属的部，加入了“别的部”，但在那儿，他们会总是受到怠慢。

欧洲共同市场的创建使农业政策成为一个关系到国家重大政策和国际重大政策的问题。1965年，戴高乐由于缺少农业劳动者的支持，在首轮选举中未获得半数选票。因为他拒绝英国加入共同市场，这使盼望着扩大自己的出口量的农业劳动者失望了。在共同市场的马拉松式的谈判中，法国农业部是法国农业劳动者的辩护人。有时农业部甚至偷偷地感谢农业组织领导人挑起的暴力示威活动，而它的内政部同僚则必须去镇压这些暴力示威。这种默契可能会令人惊奇。政府的决策是在计划总署和财政部制定的，法国的农业政策也不是在总理府设计的，因为农业、乡村建设和河泊森林部门的官员从不愿意跳出他们的技术权限，去学习一下经济和财政，关心一下重大政策。

领导着国家农业信贷银行的财政稽查员成功地把由地方分行和地区分行组成的互助会网络转变成头等的金融集团，但不受农业部的管辖。今天，生产政策是由农业信贷银行营业所实施的。在提供贷款之前，它要求它的顾客提交经营的“发展计划”。在各个地区，每项生产的农业政策的实施都掌握在农业信贷银行地区分行行长的手中。

于是，E·皮萨尼想把河泊森林管理局、乡村工程局和农业管理局三个部门融合在一起，以便建立一个能够与桥梁和矿业管理部门相抗衡的强大机构。奇怪的是，事与愿违，这些曾享有盛名的管理部门近30年来一再错过给予它们的一切机会。对此，用特殊性和偶然性都无法解释。关于这一点，只有与桥梁管理部门和同行业进行着的双重竞争的处境；特别是一种政治意志，可能是唯一可以说明，为什么会一再拒绝从法国社会发生的无数变迁中得到好处。也只有一种政治意志才能重新使农业部具有一种统一性，使乡村河泊森林工程局的人员具有一种团队精神，使官员们担负起一些重要任务。由于过去的农民已经消失，农业部不能把自己简化为农业生产和食品生产部，而应当成为乡村部，重新采用J·希拉克在一个时期授予它的名称：农业和乡村治理部。这会迫使它重视乡村社会当前存在的真实问题。为了不至于重新成为农业生产和食品生产的领导机构，农业部应停止扮演并非是其真正身份的经济学家和工业家的角色，而应重新担负起它制定政策的首要职责。农业部门的人员应重新抓住应由他们主管的事情：关于自然和生活必需品方面的事情。

政治和政策

虽然农业人口40年来持续减少，但仍保持着重要的政治

影响，这是一个奇特的悖论。在法国像在整个西欧和美国一样，在20年前有效的东西在今天仍然有效。这种现象众所周知，所有的国家都对它进行了分析。在华盛顿、伦敦、布鲁塞尔和巴黎，农业压力集团都同样具有影响力。农业劳动者尽管人数不多，但分散在各地，除了大城市，每个议员都要在自己的选民中考虑到农业劳动者。而且，农业劳动者的选票分散在所有的政党，尽管与全体选民相比，他们偏向右派。所以，所有的政党都极力争夺这些能够造成差别的边缘选票。农业组织形成了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强大多样的和具有渗透力的网络，他们的口号也随之产生。逆之者要付出昂贵的代价，顺之者则会获得好处。他们不仅分散在全国各地，而且具有强大的组织，这使他们的示威能力超过所有其他社会阶层。知名人士组成的网络也提请各级权力机构重视农业劳动者的抱怨。

农村和农业之间的混淆是如此严重，而且对大家来说又似乎是太明显了，以致谁都没有“看到”显示人口中的农业劳动者减少的统计数据：农业劳动者依然是最典型的乡下人，所有的人都高估了他们的人数，不管是公众舆论还是政治家。最后，观念上的完全转变使得已消失的农民成为一切道德的楷模，使得大自然成为城市人眼中最珍贵的地方，从而加强了农业劳动者的地位，因为他们一直被看作农民和自然的守护人，虽然实际上他们经常成为大自然的开发者，毫无“生态上的”顾忌。以上我们简要地论述了为什么农民曾具有奇特的影响力，农业劳动者始终拥有着这种影响力，而且，他们懂得了非常巧妙地 and 极其有效地运用这种影响力。

各种职业流派的影响力曾长期受到人们的种种猜测，直到1982年，社会党政府决定在选举的时候与农业公会站在一

起，以期农业经营者联合会全国联盟会因而削弱并可能分裂成两派。出人意料的是，尽管家庭农业经营协调及保卫运动经受了共产党走向衰落的打击，而且，特别是受到自己在理论上变化不定的影响，但仍然聚集了近10%的选票，农民-劳工联盟也是如此；而农业经营者联合会全国联盟获得了近70%的选票，它的确分成了两个流派，这使得它的敌人期望它真正分裂成两个组织，但这是完全没有把握的事。

在选举方面，近20年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们不能再把农业劳动者的选票和乡村选票等同起来。地区间的对比变得模糊不清了：西部地区投右派的票的人数不再是那么众多，而且还选举出许多社会党议员，左派的堡垒也崩溃了，如在朗格多克地区就是这样。要想了解农业劳动者在这种彻底转向变化中的角色是非常困难的。在布列塔尼地区，长期以来，农业劳动者一直是不安定的，随时都会发生示威游行。直到1977年的市镇选举和1981年的议会大选，农民-劳工联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种影响没有在选票上表现出来。从总体上看，由于传统小农差不多都消失了，这就使共产党失去了它的选民中的主要部分：根据I·布萨尔的精巧计算^①，只剩下4%的农业劳动者把选票投给共产党。相反，社会党没有失去选票，他们找到了自己缺少的农村基础，这是由于农民-劳工联盟转向了他们一边，该组织的一名重要推动者B·塔娄变成了社会党的农业专家。然而，绝大多数的农业劳动者在选举中支持“右派”，这种趋向近10年来可以说是增强的。

法国的政治-行政结构依然带有浓厚的乡村色彩，这也

^① I·布萨尔：《农业劳动者的选举行为》，载《乡村经济学》，第149期。

加强了农业劳动者的影响力，我们已指出，在36 000个市镇中，有33 000个是乡镇(从前面界定的广义上讲)，也就是说，在36 000个市镇政府首脑中，有33 000个是乡镇的，所有这些市镇政府首脑都有平等的合法地位，从巴黎市政府一直到100人的乡镇政府。在50万个市镇议员中，有47万个是乡镇的(不足1万居民的市镇)，也就是说每千名选民就有一个乡镇议员。虽然全国青年农业劳动者中心在一个时期曾对乡镇议会不满，但农业劳动者继续支持乡镇议会。省议会的选举方式巩固了乡村代表的这种优势。省议员可以随便出入省政府和技术部门，而专区区长们则帮助和配合乡村的镇长，这与政府官员和乡村当选者之间的默契是互为条件的。这种默契在政府官员和一些数量要少得多的城市当选者之间不可能存在：这也就是P·格雷明所描述的外围权力^①。

所有这些显要人物的网络都通向巴黎部长们的办公室，特别是通向参议院。参议院的选举方式使它成为法国所有小乡镇的大议会。地方分权和权力从省长向省议会主席和地区议会主席的转移大概将会增强乡村当选者的活动能力。这些乡村当选者在地区经济社会委员会中由职业当选者接替：农业信贷银行、农业经营者联合会全国联盟、农业公会和社会互助会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都是些重要的知名人士，无论是在外省还是在巴黎，他们懂得如何使人们听取他们的意见。

在“辉煌的30年”的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迅速推进，那时，法国的农业政策和欧洲共同体的统一农业政策就在原则上制定了。农业劳动者纷纷离开土地，轻而易举地

^① P·格雷明：《外围权力：法国政治体系中的官僚和显要人物》，瑟叶出版社，巴黎，1976年。

在城市里找到工作。留下来的人利用这种人口外流再次获得土地和扩大经营规模，并在技术现代化方面作出异乎寻常的努力，从而使产量获得惊人的提高。于是，法国在农业和食品上的贸易逆差变成了顺差，法国的农业劳动者为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出口商而自豪，而与此同时，他们的人数减少了2/3，法国人口增加了1/4。这个跃进是惊人的，人们可以理解，领导这一跃进的那些人有理由为此感到骄傲。

从60年代末起，农业劳动者遇到一个新的抉择：或者顺势继续前进，按照荷兰的样板实现第二次跃进；或者改变节奏，找到一些更加多样化的生产方式，这些生产方式更少依赖于来自工业（化肥、机器）和进口（石油、天然肥料、甚至大豆）的生产要素。人们合理地认为，继续坚持集中经营和减少农业劳动力的政策不再有重要的经济优势和社会优势了。

由于掌权的人物依然如故，所以法国和欧洲共同市场的农业政策继续坚持其努力方向。但并非谁都没有注意到，在农业经营、乡村社会和国内、国际经济环境方面，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修订农业政策方面，R·杜孟无疑是最好的代表。这种修订本来应当在1965年就进行的。在实施农业现代化的前两个计划的过程中，杜孟作为J·莫耐的顾问曾去过美国，从美国带回一本关于“美国农业教训”的书，并在50年代成为饲料革命的热情宣传家。他的思想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反响，这使他感到失望，于是他开始遍访第三世界国家，发表意见说非洲的起步不好，给所有的国家元首提建议，包括F·卡斯特罗，但后者对他的建议几乎是毫不理睬。返回法国后，他变成生态学者们的预言家。为了说明他的见解，他甚至作了法国总统候选人。某些人拿这种180度的转向来开玩笑，

但这是不对的。在第一个时期，必须是生产本位主义者，促进农业人口外流，以便保证农业的恢复。而在第二个时期，必须用另一种政策来抑制生产本位主义的政策，刹住农业人口特别是乡村人口的外流。那些农业组织的活动分子一旦当上农业组织的领导，就以为应当继续走曾使他们取得成功的道路，而不愿倾听老农学家的逆耳忠告。

农业全部预算的总额和欧洲农业指导及担保基金会的资助实际上就像是这样的情况：消费者花钱购买生产者出售给他们的产品时 $2/3$ 的款是在商店支付的， $1/3$ 的款是在税务所支付的。这就像是一个狡猾的会计师要涂改帐目，把本应记入农业帐簿上的款列入了国家帐簿。从这种观点上看，农业有些像一个由国家和顾客们资助的公用事业部门，不过它的顾客是全部法国人。家庭的食品支出也被同样地缩减了，但从总体来说，在国家的帐目上，结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以家庭预算中食品开支部分的减少来测量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这表现出一种奇怪的先验逻辑，即靠牺牲食品生产来使工业生产增值。这就导致了 $8 \sim 9\%$ 的就业人口生产 $4 \sim 5\%$ 的国民生产总值。然而，农业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并不比其他劳动者低。因此，通过某种其它的办法对这种纯粹簿记上的不平衡进行部分的补偿是正常的。农业产品的成本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农业的资助并不是一种优惠，而只是一种偿还这些成本的间接方法。按照合理的逻辑，应当把食品的价格提高一半。

30年来实行的政策促进了农业人口的迅速外流，这种外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是有益的。在6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试图计算出农业人口外流的代价和收益，以期知道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是加快这种外流有利还是刹住这种外流有

利。从一开始，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们就非常诚实地宣布，他们只能对收益和成本进行商人式的权衡：在他们看来，社会代价近似一种法律上的“损害赔偿”，不能被计算在内。尽管这样，某些经济学家带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断言，必须减少农业劳动者的人数。这种信念在充分就业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总体上说是有道理的，但到了1983年就显得不明智了。

国家的作用是通过两套平行而又矛盾的措施来体现的：一方面，“经济的”措施旨在为农业生产和食品的商业化提供装备和进行筹划，并且使其赢利；另一方面，一些“选票主义”的措施是为了在小经营者的不满可能会转化为不利的选票时帮助这些小经营者。1965年，在总统大选首轮选举中，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这标志着一种政策向另一种政策的过渡；那么，M·罗卡尔取代E·克雷松出任农业部长是不是一个相反的演变呢？这一个部长使一些人高兴，之后另一个部长又使另一些人高兴。这些农业政策的并置使农业在没有出现太多的政治冲突的情况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唯一没有得到帮助的是那些第一批离开自己的农场去城市找工作的农业劳动者。他们在价格还较低的时期卖掉了自己的土地和房屋，未能从60年代导致地价飞涨的地产投机中获利，也没有从第二住宅的热潮中得到好处。第二住宅的流行使那些能够改造成小农舍的小谷仓具有了出人意料的价值。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者从外流到城市去的邻居手里买到了土地和房屋，他们是农业人口外流的最大受益者。

今天，农业政策的外部条件和对它的要求都完全改变了。当前，工业完成了一个过于缓慢的转换阶段，转向了一些越来越少需要劳动力的生产和生产方式，而此时正值众多

裁后出生的人到了工作的年龄，而且妇女这时也希望得到一项职业。因此，经济的首要需求不再是为工业找到劳动力，而是相反，要为所有的人找到工作。从1965年开始，每周的、每年的和终身的劳动时间都缩短了，并且还会进一步缩短，而非商业性的从业活动将继续发展。

对于环境的重视和农业经营方式的多样化必然会导致农业政策的多样化。必须断然地放弃那种把一切农业经营者转变为“赢利的”全工时生产者的奢望，丢掉那个怪物般的设立农业劳动者职业执照的想法。这种职业执照使得只有执照持有者才能享受政府的帮助和享有出售自己的产品的权力，某些想网罗人马的职业领导人对这个设想十分衷情。过去的经历表明，人们可以继续推行两套并行的政策，甚至于三套，一般要考虑到对山区、薄弱的地区和园林地区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

一方面，必须继续坚持以增加大众生产的效益为目的的经济政策，以便降低生产成本。谷物、甜菜、奶、葡萄酒、水果和日常蔬菜可以采用效益更好的方法来生产。生产者通常能够经受住国际竞争的压力，除非竞争是不正当的，或者市场被搞倾销的人所垄断。那时，有必要给予帮助。不过，在农业产品出口使纳税人付出过高的代价时，还要不惜任何代价（在其本义上讲）进行这种出口，而且同时还说是绿色石油，这是可笑的。

另一方面，应当制定一项包括许多特殊措施的政策，以便促进花费很多劳力的手工型高级生产。例如，在过去的农场里，人们对劳动不进行簿记，劳动不被作为一种真正的成本，它的投入是大量的；此外，生产者是难以到达销售市场的。决定离开合作社去自己造酒的葡萄种植者手里掌握着技

术，但如果他没有一些多少被吸引住的来自饭店和企业委员会的老主顾，他就很难把自己的葡萄酒卖出去。因此，应当发展直接销售合作社，增加根据产品和地区进行分类的集体性广告，促进邮售和直接销售。

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这个社会越来越形成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但不是一些四周有边界的领地或由一些界限区分开的类别。巨商们懂得这一点，他们越来越巧妙地使自己的产品适合于各种类型的顾客。在此之前，农业手工艺生产所固有的多样化，曾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但如果恰当地运用这种多样化，可将它与不同层次的社会网络联结在一起，变成一种机会。

如果人们希望法国重新变成一个花园，而不是一大片建筑低劣的城郊，那么，农业机构就必须按照一种政治意志改变他们的看法，农业部应当成为一个管理自然的大部，乡村河泊森林工程师应当成为乡村社区的顾问，而不仅仅是农业劳动者的顾问。农业信贷银行是由农业领导人控制的，但在它的存户中，农业劳动者不足1/4。如果把它的名称改为乡村信贷银行和把银行的权力在不同类别的用户之间进行分配，就像在一个互助机构中通常采用的那种做法，那么它的所有积极因素会被很容易地调动起来，集中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用户们自身的目标了。然而，这样一种政策会受到农业劳动者联合会和工会的毫无诚意的对待。当他们当中一些人是全工时的农业劳动者、而另一些人是固定的受薪者的时候，他们更容易各自网罗自己的队伍。至于社会保险机构和税务局，它们应创造一些新的提取和征收办法。

在战后的时期，正是年轻的农业劳动者成为我们目睹的

所有那些惊人变化的动力。30年之后，他们可以对自己从事的静悄悄的革命事业感到满意了：现在，农业问题已属于日常经济管理的范围。今天，农业组织的活动分子们动员起来是为了拯救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使这些遗产造福乡村。他们是新的乡村中等阶级的领导者，这个新的阶级对于国家的社会平衡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此外，既然他们的代表已在1981年的议会大选中纷纷进入国会，而且这些代表还拥有社会教育家和社会鼓动家的经验，那他们将会成为乡村经济和乡村文化协调发展的宣传家。这种协调发展是以多种从业活动为基础的，其中农业手工艺生产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没有想象力和政治意志的结合，则会一事无成。

附 录

参 考 书 目

这个书目单并不是齐全的，仅仅是为了读者的方便把写作本书参考的书籍归在一起。

A

阿兰斯堡(C.):《社区作为客体和样本》，载《美国人类学家》，1961年，第241~264页。

阿尔朗(M.):《通过文学看法国农民》，巴黎，斯托克出版社，1941年，共191页。

阿隆(R.):《工业社会十八讲》，巴黎，嘉利玛出版社，1962年，共377页。

阿尔道(M.):《农业劳动者的职业》，载《经济学和人文主义》杂志，1944年。

奥吉-拉利贝(M.):《农业联合会和农业合作社》，巴黎，科兰出版社，1926年，共211页。

《1880至1940年的法国农业政策》，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0年，共483页。

《农业革命》，巴黎，米歇尔出版社，1955年，共437页。

埃万-普利查(E.E.):《努厄尔人》，牛津，克拉兰敦出版社，1940年，共271页。

B

班菲尔德(E.):《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纽约，哥伦科自由出版

- 社，1958年，共204页。
- 巴戎(L.)：《农民》，勒比伊，马必斯出版社，1945年，共307页。
- 巴瑟(F.)：《波斯南部的游牧者》，奥斯陆，大学出版社，1964年，共159页。
- 贝代尔(M.)：《一千公顷土地的地貌》，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37年，共140页。
- 贝尔(D.)：《劳动和对劳动的不满》，波士顿，毕松出版社，1956年，共56页。
- 贝内迪柯特(H. R.)：《我们能解决农业问题吗？——对联邦政府农业援助的分析》，纽约，二十世纪基金会出版，1955年，共601页。
- 贝诺瓦-盖尔波(O.)：《中等企业的目标和它们的等级系统》，法国国家研究中心社会学研究中心出版，1966年，共98页，速印本。
- 班夫纳蒂(B.)：《处在文化转变中的农业》，阿森，范戈卡姆出版社，1961年，共468页。
- 贝尔诺和布朗卡：《努维尔，一个法国村庄》，巴黎，人类文化学研究所出版，1953年，共447页。
- 布洛克(M.)：《法国十八世纪争取土地个体化的斗争》，载《经济社会史年鉴》第2卷，1930年，第329~383页，第511~556页。《作为集体心理学问题的技术变革》，载《正常心理学和病理心理学》杂志第12期，1948年，第104~120页。
- 《水磨的出现和征服》，载《经济社会史年鉴》第7卷，1935年，第538~563页。
- 布尔迪厄(P.)：《独身生活和农民的状况》，载《乡村研究》第2期，1962年，第32~135页。
- 《阿尔及利亚农民对时间的态度》，载皮特·利沃编定的《地中海地区的乡下人》，巴黎，穆东出版社，1963年，第55~72页。
- 布列托耐(J.)：《对乡村环境中人的全面发展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载《农业部杂志》，1954年，第95~100页。

贝巴提丝(M.):《无声的革命:农民的斗争》,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63年,共277页。

C

柴雅诺夫(A.):《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理论当前存在的问题》,载《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献》,1924年,第577~613页。

D

达兰多夫(R.):《社会人》,科隆和奥普拉登,西德出版社,1960年,共71页。

当皮埃尔(E. de):《黑棉花和白咖啡:乌班吉河上游地区制定法律总则前夕的两种文化》,载《非洲研究手册》,第1卷,1960年,第128~147页。

多扎(A.):《法国的村庄和农民》,巴黎,嘉利玛出版社,1941年,共219页。

德拉图什(R.):《中世纪的知识精英和农业》,载为纪念F·勒普莱出版的《社会研究文集》,巴黎,皮卡尔出版社,1956年,第147~157页。

德雷阿热(A.):《勃艮第地区十一世纪初以前的乡村生活》,马扎,普洛塔出版社,1941年,共两卷,共774页。

迪翁(R.):《论法国乡村风景的构成》,图尔,阿洛特出版社,1934年,共162页。

多吉尔(H.):《举起长柄叉》,巴黎,法国作品出版社,1935年,共220页。

杜比(G.):《西方中世纪的乡村经济和农业生活》,巴黎,奥比埃出版社,1962年,共两卷,共823页。

杜孟(R.):《世界农业经济》,巴黎,达洛兹出版社,1954年,共595页。

《被遗忘的无产阶级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载《思想》杂志,1955年6月号,第897~916页。

《黑非洲举步维艰》，巴黎，瑟叶出版社，1962年，共287页。
德拉·利维叶(H-T)：《关于某些法国家庭经营中农业劳动者妻子的劳动的调查报告》，载《乡村经济》，1961年第49期，第11～27页。

E

厄叶和皮叶隆：《学龄儿童的智力水平》，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共两卷，第284～299页。

F

福舍(D.)：《农民生活的常规习惯和变革》，载《普通心理学和病理心理学》杂志，第41期，1948年，第89～94页。

《农民和机器》，巴黎，午夜出版社，1954年，共280页。

《一个地理学家眼中的乡村生活》，图卢兹，地理学研究所出版，1962年，共319页。

福维(J.)和孟德拉斯(H.)：《当代法国的农民和政治》，巴黎，科兰出版社，1958年，共532页。

弗布沃(L.)：《十六世纪无宗教信仰的问题》，巴黎，米歇尔出版社，1942年，共549页。

弗尔斯特豪森(H.H.)：《荷兰一个农村社区的经济知识和理解力》，瓦格宁根出版社，1965年，共118页。

弗里塞利(J.)：《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一种分配理论的基础资料》，巴黎，吉南出版社，1960年，共396页。

弗莱斯(P.)：《关于时间的心理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7年，共328页。

弗利德尔(E.)：《瓦西利卡：现代希腊的一个村庄》，纽约，温斯顿出版社，1962年，共110页。

弗里德曼(G.)：《法国的城市和农村：城市文明和农村文明》，巴黎，科兰出版社，1953年，共481页。

《关于人和技术的七项研究》，巴黎，贡提埃出版社，1966年，

共 215 页。

范登邦：《荷兰进步农民的某些特点》，载《乡村社会学》，1957年，第 22 期，第 205~212 页。

《在采用新的农业做法时地方团体的不同态度》，同上，1960 年，第 25 期，第 308~320 页。

G

古丹(P.)：《利马涅平原地区的土地合并》，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53 年，第 149~156 页。

戈拉维尔(J.)：《莫莱特的农民》，巴黎，科兰出版社，1948 年，共 123 页。

葛斯帕林(A. de)：《农业课程》，巴黎，乡村之家书局出版，共 16 卷。

葛德里埃(M.)：《经济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巴黎，马斯贝罗出版社，1966 年，共 295 页。

葛朗(R.)和德拉图什(R.)：《中世纪的农业：从罗马帝国的末期到十六世纪》，巴黎，波卡尔出版社，1950 年，第 3 卷，共 740 页。

格利奥勒(M.)：《水神：和奥格特姆利的谈话》，巴黎，法雅出版社，1966 年，共 220 页。

格利斯奥德(W.)：《农业和民主》，纽约，哈库特出版社，1948 年，共 227 页。

古尔维奇(G.)：《社会时间的倍增现象》，巴黎，大学文献中心出版，1958 年，共 129 页。

H

哈列维(D.)：《中部地区农民访问记》，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35 年，共 350 页。

《显要人物的终结》，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39 和 1937 年。

哈佩(R.)：《怎样改变农业劳动者的行为》，载《法国社会编年史》，

1954年，第147~155页。

哈扎尔(P.)：《欧洲道德心的危机》，巴黎，伯瓦文出版社，1935年，共474页。

赫安(B.)和格罗斯(N.)：《杂交玉米种子的普及》，载《乡村社会学》，1943年，第8期，第15~24页。

J

吉洛和斯比册：《农业劳动者的精神面貌》，载《法国社会学》杂志，第6期，1955年，第2~15页。

吉尔维·塞沃兰和维叶：《没有农民的法国》，巴黎，瑟叶出版社，1965年，共128页。

吉奥诺(J.)：《就贫穷与和平问题写给农民的一些信》，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55年，共92页。

《关于多米尼西问题的笔记》，巴黎，嘉利玛出版社，1955年，共153页。

吉拉尔(A.)和巴斯蒂德(H.)：《农村结婚女子的预算时期》，载《人口》杂志，1959年，第14期，第253~284页。

吉约明(E.)：《天真汉的生活》，巴黎，斯托克出版社，1942年，共313页。

《农民如何看待自身》，巴黎，斯托克出版社，1953年，共311页。

K

凯幸(E.)：《美索不达米亚古代法中不动产转让的信条》，载《社会学年鉴》，1952年，第107~161页。

克雷蒙(P.)：《萨拉威斯》，朗杜兹，朗格多克出版社，1953年，共238页。

库蒂(Pb.)：《在对商业化的调查中关于研究过程的思考》，载《人文科学联系公报》，巴黎，海外科技研究局出版，1966年8月，第1~24页。

卡兹和拉扎兹弗尔德：《个人影响力：人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

纽约，哥伦科自由出版社，1955年，共400页。

柯布莱(B.)：《阿·维·卡雅诺夫：1908~1930年俄国农业思想(发展中的交叉点)》，载《俄国和苏联社会手册》，1965年第5期，第411~460页。

考依列(A.)：《哲学思想史研究》，巴黎，科兰出版社，196年，共300页。

L

拉巴(E.)：《农民精神：土地、人种、学校》，巴黎，德拉干哈夫出版社，1919年。

拉布鲁斯(B.)：《农业报刊》，载《农民和政治》，福维和孟海拉斯合著，巴黎，科兰出版社，1958年，第303~317页。

拉蒂尔(M.)：《农业收入的变化》，巴黎，科兰出版社，1959年，共378页。

拉沃涅(L. de)：《1789年以前的法国乡村经济》，巴黎，吉兰姆出版社，1960年。

勒费布沃(H.)：《农村社会学的问题：农民共同体和它的历史社会学的问题》，载《社会学国际手册》，1949年，第6卷，第79~100页。

《比利牛斯山地区的人》，洛森，会合出版社，1965年，共133页。

莱特(N.)：《法国的政治苦恼》，巴黎，普隆出版社，1958年，共192页。《恶的困扰》，巴黎，未注明年代和出版社，共61页，复印本。

勒普莱(F.)：《欧洲工人》，巴黎，丹图出版社和拉切出版社，1877~1879年，共7卷。

莱内(N.)：《传统社会的消逝》，纽约，哥伦科自由出版社，1958年，共466页。

勒华拉杜利(E.)：《朗格多克地区的农民》，巴黎，国民教育刊物出版社，1966年，共两卷，共1035页。

勒沃(R.)：《教育和农业科学的普及》，载《农民和政治》，福维和

- 孟德拉斯合著，巴黎，科兰出版社，1958年，第269~280页。
- 勒维斯克(A.)：《伊尔-维兰省乡村移民的心理学问题》，巴黎，全国移民及乡村定居协会出版，1958年，共215页。
- 林顿(R.)：《人的研究》，纽约和伦敦，艾普顿-世纪出版社，1936年，共503页。
- 利翁伯格(H.)：《新思想和新做法的采纳》，衣阿华大学出版社，1962年，共163页。
- 利翁伯格和阿辛格：《密苏里州东北部农业社区中作为农业信息传播要素的邻居关系》，载《农村社会学》，1954年，第19期，第377~384页。
- 莱德弗尔德(R.)：《小社区》，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6年，共182页。《村庄是在进步的事物》，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0年。《农民社会和文化》，同上，1956年，共182页。
- 雷蒙(R.)：《弗兰克林的道德和纳税君主制度下的法国信念》，载《现代历史和当代历史》杂志，1960年，第7期，第193~214页。
- 利马莱和塔维尼埃：《农业指导补充法的制订和表决》，载《政治学法国评论》，1963年，第13期，第389~425页。
- 利维叶(G.)和马热(M.)：《村庄共同体的节日和仪式》，载《农业和社区》，巴黎，梅迪西书局出版，1943年，第75~95页。
- 罗舍布拉夫-斯本列(A-M.)：《社会心理学的角色概念》，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2年，共434页。
- 罗吉(E. H.)：《革新的传播》，纽约，哥伦科自由出版社，1962年，共367页。
- 罗吉·德·拉贝吉利：《关于阻碍进步的主要流弊的研究》，巴黎，1788年。
- 卢普耐尔(G.)：《十八世纪的城市和乡村：论第戎区域的人口》，巴黎，科兰出版社，1955年，共359页。
- 罗叶(J. H.)：《从多吉尔到布热德》，载《农民和政治》，福维和孟

德拉斯合著，第153~182页。

罗兹埃(A. F.)：《农业的全部课程：理论、实践、经济、乡村医学和兽医学》，巴黎，马肖出版社，1805年，共11卷。

赖特(G.)：《法国的农业革命：二十世纪的农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4年，共271页。

M

马热(M.)：《乡村财产地点变动的日期：根据地方习俗汇编撰写的地图绘制纲要》，载《农业合作经济研究》，1942年，第2期，第371~344页。

《评作为人类学研究范围的村庄》，载《心理学公报》，1955年，第8期，第373~382页。

麦尔(L.)：《小规模的社会怎样变化》，载《社会科学概观》，1965年，第20~35页。

马拉西(L.)：《农业经营经济学》，巴黎，科兰出版社，1958年，共302页。

马里约特(M.)：《不发达农业地区的农业现代化》，载《法国社会编年史》，第2册，1954年，第123~134页。

《印第安村庄》，载《回忆录》，协助旅客友好协会出版，1955年，No. 83，第324~333页。

马克思(K.)：《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巴黎，社会出版社，1963年，共132页。

马斯贝乔尔：《田野的永恒秩序》，巴黎，梅迪西书局出版，1946年，共589页。

莫科尔：《社会空间》，巴黎/海牙，穆东出版社，1966年，共207页。

莫维特和格拉肖-阿尔潘德利：《闲暇和乡村儿童的文化教育》，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6年，共343页。

梅斯特(A.)：《黑非洲能否起步？》，巴黎，瑟叶出版社，1966年，共450页。

孟德拉斯(H.):《农村社会学研究》,巴黎,科兰出版社,1953年,共138页。

《农民和农业现代化》,巴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出版,1958年,共142页。

《埃皮鲁斯的六个村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1961年,共92页。

《法国乡村社会》,孟德拉斯主编,巴黎,法国政治科学基金会出版,1962年,共156页。

《农村社会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7年。

默顿(R. K.):《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方法概论》,巴黎,普隆出版社,1966年,共524页。

米洛(J.):《农民心态》,载《今天的农业和未来的农业》,米洛和蒙达涅合著,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340~370页。

米耐(H.):《文化和农业》,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49年,共96页。

米娄(E.):《强盛国王时期的一个法国省份:拉布利》,巴黎,阿舍特出版社,1958年,共352页。

莫娄和勒布尔:《农业经营的劳动和管理》,巴黎,森塞尔出版社,1957年,共70页。

莫斯克维奇(M.):《农民和现代化》,载《舟》,1960年,第4期,第65~73页。《乡村的社会变化和妇女的角色》,载《社会学的法国评论》,1960年,第1期,第314~322页。《乡村环境中的儿童性格》,载《乡村研究》,1961年,第1期,第57~69页。

N

纳代尔:《社会结构的理论》,伦敦,科恩和西部出版社,1957年,共159页。

纳维尔(P.):《自动化和人工劳动》,巴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出版，1961年，共743页。

诺夫堡(Comte de):《农民》，巴黎，布鲁和戈依出版社，1945年，共190页。

诺沙都(F. de):《论使农业教育进入公共教育的必要性和方法》，巴黎，余扎尔出版社。

尼尔松(M.):《原始时间的计算》，伦敦，格利鲁普出版社，1960年，共384页。

诺尔(H.):《我怎样战胜苦难》，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44年，共235页。

P

帕波兹(J-C.):《关于纳依地区种植杂交玉米的初步调查》，载《乡村经济》，1960年，总第45期，第29~43页。

皮亚杰(J.):《儿童的时间概念的发展》，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46年，共300页。

皮特利沃(J.):《塞拉的人民》，伦敦，威登费德出版社，1954年。

Q

乔治(P.):《通过世界看农村和乡村问题》，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6年，共397页。

R

儒哥拉尔(M. de):《农业企业的法律特点》，载《乡村生活的社会特点》，巴黎，达洛兹出版社，1958年，第34~74页。

莱格(A.):《1787年、1788年和1789年法国游记》，巴黎，科兰出版社，1931年，共1283页。

《新闻消息在农业劳动者的生活中》，载《民意测验》，1964年，第1期，第1~77页。

《法国的农业现代化》，载《民意测验》，1953年，第15期，共51页。

《时间的压力》，载《民意测验》，1953年，第3期，第11~15页。

S

松巴德洛威(J.)：《布列塔尼地区和加龙河地区》，巴黎，法国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出版，1946年，共188页。

松巴德洛威和莫望：《法国农业的小企业具有的可能性》，巴黎，萨代普开发公司出版，1954年，共151页。

松巴德洛威和普瓦特文：《农业经营管理》，巴黎，杜诺出版社，1957年，共222页。

萨勒隆(L.)：《农业的合作制》，巴黎，杜诺出版社，1937年，共263页。

斯克拉非(T.)：《中世纪上普罗旺斯地区的耕作，树木砍伐和牧场》，巴黎，国家教育刊物出版社，1959年，共271页。

塞尔(O. de)：《农业和乡村家庭的活动场所》，巴黎，余扎尔出版社，1804年，共两卷，共948页。

斯托兹尔(J.)：《社会心理学》，巴黎，弗拉马利翁出版社，1963年，共316页。

T

唐巴斯勒(M. de)：《罗维尔的农业编年史、或农业、乡村经济和农业立法文集》，巴黎，余扎尔出版社，1824年，共8卷。

塔德(G.)：《模仿的规则》，巴黎，阿尔康出版社，1927年，共428页。

塔维尼埃(Y.)：《农民团会主义和政府的农业政策(1958~1962)》，载《政治学法国评论》，1962年，第12期，第599~646页。
《在土地问题上的团会力量和政治力量》，载《法国社会学界：法国社会的趋势和意愿》，巴黎，工业经济社会研究及资料公司出版，1966年，第52~112页。

塔尼维埃和孟德拉斯：《1961年6月的示威》，载《政治学法国评论》，1962年，第12期，第648~761页。

泰罗(L.)和琼斯(A. R.):《乡村生活和都市化社会》,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年,共493页。

塔博特(R.):《我的村庄》,巴黎,德拉格哈夫出版社,1945年,共249页。

托尔耐:《农民经济:经济史的概念》,载《高等商业学院年鉴》,1964年,第417~432页。

托克维尔(A. de):《回忆录》,巴黎,嘉利玛出版社,1942年,共276页。《旧制度和革命》,同上,1953年,共449页。

W

瓦拉亚克(A.):《传统文明和方式》,巴黎,米歇尔出版社,1942年,共403页。

沃邦:《王室的什一税》,巴黎,吉约明出版社,1889年,共208页。

维耐尔(M.):《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和农民》,巴黎,国民教育刊物出版社,1957年,共126页。

瓦尔耐(C. K.):《自1875年以来法国的葡萄种植者和政府》,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0年,共303页。

韦伯(M.):《学者和政治》,巴黎,普隆出版社,1959年,共230页。《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巴黎,同上,1964年,共321页。《论科学理论》,巴黎,同上,1965年,共537页。

维叶(E.):《传统和传统主义》,载《汇流》,1953年,第2期,第106~116页。

沃勒斯(J.):《叙利亚和近东的农民》,巴黎,嘉利玛出版社,1946年,共330页。

威廉:《关于一个英国村庄的社会学:格斯福舍》,伦敦,卢勒杰和科根出版社,1956年,共246页。

维肯宁(E.):《在改进习惯做法上的信息来源》,载《乡村社会学》,1950年,第15期,第19~30页。

威斯特马克(N.):《人的因素和农业的成就》,载《法国社会编年

史》，1954年，第2期，第135~146页。

维利(L.)：《沃克吕兹省的村庄》，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7年，共345页。

X

西拜德(M.)：《从农业成本到农业纯收益》，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46年，共447页。

西拜德(M.)和维叶(G.)：《农业》，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5年，共527页。

Y

依格比(E.)：《都市时代的农场和农民》，纽约，二十世纪基金会出版，1963年，共183页。

于贝尔(H.)和毛斯(M.)：《时间的表象》，载《宗教史文集》，巴黎，阿尔冈出版社，1929年，共236页。

约利维(M.)：《贾布莱叶地区的农业劳动者对农业现代化的态度》，载《乡村经济》，总第70期，1966年，第15~23页。

《法国的农业劳动者：生活条件和看法》，载《民意测验》，1966年，共163页。

约勒(J.)：《抵达者》，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09年，共352页。

《农民的苦恼》，巴黎，斯普斯出版社，1930年，共296页。

Z

朱斯坦(E.)：《十八世纪农业的乡村社会(1757~1793)》，圣罗出版社，1935年，第16(前言)~371页。

二、人名索引

- | A | | | |
|------------------|--------|-----------------|-------|
| ARENSBERG (C.) | 阿兰斯堡 | BENVENUTI (B.) | 班夫纳蒂 |
| ARLAND (M.) | 阿尔朗 | BERGMANN (D.) | 贝格曼 |
| ARON (R.) | 阿隆 | BERNOT | 贝尔诺 |
| ARTAUD (M.) | 阿尔道 | BLANCARD | 布朗卡 |
| AUCÉ-LARIBÉ | | BLOCH (M.) | 布洛克 |
| (M.) | 奥吉-拉利贝 | BOURDIEU (P.) | 布尔迪厄 |
| | | BRETONNÈS (J.) | 布列托耐 |
| | | BRIE (J. de) | 布利 |
| B | | C | |
| BACHELARD | 巴斯拉尔 | CASSIN (E.) | 凯辛 |
| BALZAC (H.) | 巴尔扎克 | CÉPÈDE (M.) | 西拜德 |
| BANFIELD (E.) | 班菲尔德 | CHARLEMAGNE | 查理曼 |
| BARJON (L.) | 巴戎 | CHOMBART DE | |
| BARRÈRE (D.) | 巴莱尔 | LAUWE (J.) | 松巴德洛威 |
| BARTH (F.) | 巴瑟 | CLEMENT (P.) | 克雷蒙 |
| BASSOUL (R.) | 巴苏尔 | COLUMELLE | 科伦素尔 |
| BASTIDE (R.) | 巴斯蒂德 | COUTIN (P.) | 古丹 |
| BEDEL (M.) | 贝代尔 | COUTY (P.) | 库蒂 |
| BELL (D.) | 贝尔 | CUISENIER (J.) | 居依瑟尼 |
| BENEDICT (M. R.) | 贝内迪柯特 | | |
| BENOIT-GUILBOT | 贝诺瓦-盖 | D | |
| (O.) | 尔波 | DAHRENDORF (R.) | 达兰多夫 |

DAMPIERRE(E. de) 当皮埃尔
 DAUZAT(A.) 多扎
 DEBATISSE(M.) 德巴提丝
 DELATOUCHE(R.) 德拉图什
 DELÉAGE(A.) 德雷阿热
 DION(R.) 迪翁
 DOMBASLE(M. de) 多巴瑟
 DORGÈRES(H.) 多吉尔
 DOMINICI(G.) 多米尼西
 DUBY(G) 杜比
 DUMONT(R.) 杜孟
 DUPLEX(J.) 杜普莱斯
 DUPORT 杜波尔

E

EVANS-PRITCH- 埃万-普利
 ARD(E. E.) 查

F

FAIRÉ(M.) 费列
 FAUCHER(D.) 福舍
 FAUVET(J.) 福维
 FEBVRE(L.) 费布沃
 FERECELLI(J.) 弗里塞里
 FLAUBERT(G.) 福娄拜
 FRAISSE(P.) 福莱斯
 FRIEDL(E.) 弗利德尔
 FRIEDMAN(G.) 弗利德曼

G

GAMBETTA 甘必大

GARAVEL(J.) 戈拉维尔
 GASPARIN(A.) 葛斯柏林
 GEORGES(P.) 乔治
 GÉRAUD 吉洛
 GÉRVAIS(M.) 吉尔维
 GIONO(J.) 吉奥诺
 GIRARD(A.) 吉拉尔
 GOVERNEC(M.) 古夫耐克
 GRAND(R.) 葛朗
 GRATIOT-ALPHA- 格拉肖-阿
 NDÉRY 尔潘德利
 GRIAULE(M.) 格利奥勒
 GRISWOLD(M.) 格利斯沃德
 GROSS 格罗斯
 GUÉBRIANT
 (comte de) 葛布利昂
 GURVITCH(G.) 吉尔维奇
 GUILLAUMIN(E.) 吉约明

H

HALÉVY(D.) 哈列维
 HARPER(R.) 哈佩
 HASSINGER 阿辛格
 HAZARD(P.) 哈扎尔
 HIGHBEE(E.) 依格比
 HÉSIODE 赫西俄德
 HEUYER 厄叶
 HOFFMANN(M.) 霍夫曼
 HOMAIS(M.) 奥麦
 HOURDEGUIN 乌德干

HUBERT(H.)	于贝尔	LEVEAU(R.)	勒沃
J		LEVESQUE(A.)	莱维斯克
JOLLIVET(M.)	约利维	LIOMBERGER(H.)	利翁伯格
JUGLART(M, de)	儒哥拉尔	LINTON(R.)	林顿
JUSTIN(E.)	朱斯坦	M	
K		MADEC(J.)	马代克
KATZ	卡兹	MAHO(J.)	马欧
KERBBLAY(B.)	柯布莱	MAGET(M.)	马热
KOYRÉ(A.)	考依列	MAIR(L.)	麦尔
KREHER(Dr)	克雷赫	MALASSIS(L.)	马拉西
L		MARRIOTT	
LABAT(E.)	拉巴	(McKim)	马利约特
LABRUSSE(B.)	拉布鲁斯	MARX(K.)	马克思
LAFFEMAS	拉夫马斯	MASPÉTIOL	马斯贝乔尔
LANNEAU(J.)	拉诺	MAUCORPS(P. H.)	莫科尔
LATIL(M.)	拉蒂尔	MAUSS	毛斯
LAVERGNE(L, de)	拉沃涅	MAUSSABRÉ	
LAZARSFELD	拉扎兹弗尔 德	(marquis de)	莫萨布雷
LECLERC(E.)	莱克赖尔	MAUVETTE	莫维特
LEFEBVRE(H.)	勒费布沃	MEISTER(A.)	梅斯特
LEITES(N.)	莱特	MELINE, 281	梅里纳
LEPLAY(F.)	勒普莱	MENDRAS(H.)	孟德拉斯
LERNER(D.)	莱内	MERTON(R. K.)	默顿
LEROYLADURIE		MILHAU(J.)	米洛
(E.)	勒华拉杜利	MINER(H.)	米耐
LESTAPIS(E, de)	莱斯塔比	MIREAUX(E.)	米娄
		MOREAU	莫娄
		MORVAN(F.)	莫望
		MOSCOVICI(M.)	莫斯克维奇

N

NADEL 纳代尔
 NAVILLE(P.) 纳维尔
 NEUFBOURG
 (comte de) 诺夫堡
 NEUFCHATEAU
 (F. de) 诺沙都
 NORRE 诺尔

P

PAPOZ(J.C.) 帕波兹
 PIAGET(J.) 皮亚杰
 PIÉRON 皮叶隆
 PITT-RIVERS(J.) 皮特利沃
 POITEVIN 普瓦特文
 PROUST(M.) 普鲁斯特

R

RAMBAUD(P.) 朗博
 REBOUL(C.) 勒布尔
 REDFIELD(R.) 莱德弗尔德
 REMOND(R.) 雷蒙
 RIDGEWAY 里奇威
 RIMAREIX(G.) 利马莱
 RIVIÈRE
 (M. T. de la) 德拉利维叶
 RIVIÈRE(C.) 利维叶
 ROCHEBLAVE-
 SPENLÉ(A. M.) 罗舍布拉夫-斯本列

ROGERS(E. M.) 罗吉
 ROQUIGNY 罗凯尼
 ROUPNEL(G.) 卢普耐尔
 ROYER(J. M.) 罗叶
 ROZIER(L.) 罗兹埃
 RYAN(B.) 赫安

S

SALLERON(L.) 萨勒隆
 SCLAFERT(T.) 斯克拉非
 SERRES(O. de) 塞尔
 SEVERAC(G.) 塞维哈克
 SERVOLIN(C.) 塞沃兰
 SPITZER 斯比册
 STOETZEL 斯托兹尔
 SUGER 苏吉

T

TANGUY-
 PRIGENT 唐居伊-盖利让
 TARDE(G.) 塔德
 TAVERNIER(y.) 塔维尼埃
 TCHAYANOV(A.) 柴雅诺夫
 THABAULT(R.) 塔博特
 THOMINES-
 DEMAZURES 托米纳-德拉奈尔
 (M.)
 THORNER 托尔耐
 TOCQUEVILLE
 (A. de) 托克维尔

W		VARRON	瓦隆
WARNER(C. K.)	瓦尔耐	VARAGNAC(A.)	瓦拉亚克
WEBER(M.)	韦伯	VAUBAN	沃邦
WEIL(É.)	维叶	VENARD(M.)	维耐尔
WESTERMARK		VIRGILE	维吉尔
(N.)	威斯特马克	VOGUE	沃盖
WEURLESSE(J.)	沃勒斯		X
WICKHAM(S.)	威廉	XÉNOPHON	芝诺芬
WILLIAMS	威廉		Y
WILKENING(É.)	维肯宁	YOLE(J.)	约勒
WRIGHT(G.)	赖特	YOUNG(A.)	荣格
WYLIE(L.)	维利		Z
V		ZOLA(E.)	左拉
VAN DEN BAN	范登邦		